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民族之父—富兰克林



## 作者前言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是美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开国元勋之一，他还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深受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在各国人民心目中，富兰克林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贫困的小商人家庭，只上了两年小学便于10岁那年走上了谋生创业的道路。他心怀大志，善于动脑，勤奋刻苦，在边工作边学习的艰苦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书本知识和社会经验，成长为一个在各方面均有重大建树的旷世奇才和时代伟人。他是电气科学的先驱，为电荷守恒定律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做出了避雷针、平面电容器和“富兰克林火炉”等重大发明，并在机械、化工、天文、地质、生物、光学和金融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为费城和美国人民做出了许多其它贡献：创建了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组织了北美第一个哲学会、创建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第一流的报纸、杂志以及消防队、专职警察机构、医院和民兵自卫组织，并在邮政和路政事业中大放异彩。富兰克林一生勤于思考和笔耕，写下了浩繁的著述，针砭时弊，挞伐邪恶，颂扬并光大人间正气和真善美，为人类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穷理查历书》一书曾广泛流传于欧美各国，成为一部影响巨大的世界性畅销书。更为重要的是，富兰克林还是一位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正义战士。他早年致力于反对殖民地业主和总督的专横统治，争取北美人民正当权利的斗争，后来又献身于打碎英国殖民枷锁，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伟大事业，他是主张英属北美殖民地联合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的制定者，《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独立战争中代表美国出使欧洲，缔结美法联盟，游说欧洲各国支持美国革命，胜利以后又为创建新型的联邦制国家而呕心沥血，是费城制宪会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富兰克林专心致力于为美利坚民族和世界人民谋幸福的事业，为此耗费了全部精力和心血，他的生命已经与美利坚民族的事业紧密地溶为一体，称他为“民族之父”是恰如其分的。观察他的一生便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脉络，使人深受教育和启迪，这正是我们撰写本书的重大意义所在。

本书是国内撰写的全面介绍和评述富兰克林的首部著作，无论在内容、观点和史料的运用上，还是在写作风格和文字技巧上，都有不同于外国出版的传记之处。它覆盖了1706至1790年富兰克林的全部人生轨迹，其重点放在他为促进人类科学文化事业，为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正当权利，为争取美利坚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国家而奋斗的岁月，对其成长经历、思想主张和私人生活方面的情况亦作深入细致的探讨。笔者力求坚持唯物史观，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从历史，社会和人结合的角度，对富兰克林这一时代伟人进行深入细致的全方位的研究，使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由我和杨明共同完成。在写作过程中，笔者本人得到了有关部门和许多学界同仁的关心指导，老友王庆生同志和淄博国际招商总公司的徐华田同志更是在各方面给以巨大的关怀和帮助，在此特表示深深的谢意。

刘文涛

1996年5月于济南

## 序 言

美国独立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从此，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它以崭新的面貌在新大陆上迅速崛起。因此，当初签署《独立宣言》的人们被尊之为美国的“国父”，受到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热爱和崇敬。在国父们当中，要数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为这个新国家所做的贡献最大，美国人称他们为“开国三杰”。

华盛顿是一位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统率大陆军浴血奋战8年，终于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他还领导制定了一部沿用至今的国家大法——《联邦宪法》，为美国的共和制和联邦制国家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后他出任美国首任总统，为新国家的建设事业励精图治，成就斐然。华盛顿的名字已成为美国独立的代名词。杰斐逊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气势如虹的手笔撰写了《独立宣言》。这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官方文件不仅宣告了美国正式独立，同时也是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的宣言书。他还是《英属美洲权利概论》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人，为实现北美的宗教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代表作《弗吉尼亚纪事》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第三任总统，政绩卓著；他还是弗吉尼亚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创建者。杰斐逊是美国文明和“1776精神”的杰出代表。富兰克林是一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发明家和科学家，他是电气科学的先驱，有过多项重大发明，“费城电风筝试验”的故事早已传遍全球，脍炙人口；他还是北美第一个图书馆的创建者，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述颇丰。富兰克林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革命家和外交家，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战争中代表美国出使欧洲，游说西方列强支持美国独立，建国后又为创建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而呕心沥血。富兰克林从一个印刷工成长为世界伟人的经历已成为所谓“美国神话”的象征。

1996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20周年纪念日（1776—1996），在这一日子来临之际，编纂出版一套美国人物丛书，以中国传统的史学传记形式和优美细腻的文笔，把美国“开国三杰”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业绩介绍给国人，确实是有必要的。

作者们在撰写该套书时，注意了学习汲取前人写历史传记的优点和长处，并特别注意把握住以下几个环节：

（一）从多方位、多视角、全面而深刻地描述传主的一生，把他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写历史传记切忌把人物描绘成一幅静止的画面：呆滞，险谱化，毫无生气。应该把人物动态化，使其呼之欲出，跃然纸上，甚至使人产生可闻其声、可见其人之感。作者们在人物处理上注意了把握总体观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由表及里地写传主一生的各个侧面和层面。不仅写传主的政治、军事活动和重要功绩，而且也细致入微地写他们的生活细节——家庭、婚恋、生活情趣和轶闻琐事等；不仅写传主的政治言行、行为作派、爱好习惯等外在表征，而且还直接闯入他们的内心深处，揭示其性格特点、道德品质和丰富多采的感情世界；不仅表现传主的辉煌业绩和人生大节，而且还直笔其生活小节，甚至某些弱点和缺陷，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展示传主的“庐山真面目”，把他们各自的独特风貌活生生地再现出来，使读者感到既真实可

信又兴味盎然。

（二）把对传主们思想理论的研究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开国三杰”都是极具政治头脑的杰出政治家和博采众长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他们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是对古代希腊，罗马以来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是美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精神产物，对美国和世界历史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者们都注意拿出相当的篇幅对传主们的思想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写作中，作者们注意把传主的思想发展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与他们的人生经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阐释，与他们的重大政治实践交互穿插叙述，从而使读者看到他们的思想是如阿指导革命实践并影响历之进程的。另外，作者们还把传主的思想理论分解为若干部分：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制宪思想、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等等，并把这些内容分别放在适当的章节里进行具体分析论述，同时还注意把传主的思想理论与他们的道德情操，理想抱负融合在一起进行阐述，使其显得更加自然得体、细腻深刻。这样条分缕析、精雕细琢地处理，可以使读者对传主们的思想体系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体味到他们思想和人格的巨大魅力，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本着济世救民的精神一步一步创造出他们的思想理论的。

（三）力求用生动感人的文笔写出真实可信、高学术品位的传记著作。一部好的人物传记应该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写传记如果片面强调科学性而不计其他，就会陷于枯燥晦涩，曲高和寡，读来味同嚼蜡，兴趣索然，这样便无法发挥传记的教育功能，从而大大降低其社会效益。反之，如果只重视其可读性而忽略了科学性，就会使传记失其真实而流于虚构。只有用富于文采的笔触写出以史实和科学研究为依据的真人真事，才算得上一部好的传记作品。作者们在写作时注意了对这一原则的把握。书中所叙之事都经过了认真的考证和查实，以免以讹传讹，谬误流传。另一方面，作者们又注意运用中国传统文史作品流畅优美的笔法，无论叙述过程、分析议论，还是写景状物，都力求文情并茂、恰其分，以便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塑造出真实感人的历史人物形象，以飨读者。

本丛书被列入山东省教委科学研究项目。

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查阅参考了大量中外文资料，深受许多学者惠助，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刘文涛

1995年10月于济南

《美国开国三杰》丛书编委会

|     |     |     |     |
|-----|-----|-----|-----|
| 主 编 | 刘文涛 |     |     |
| 副主编 | 杨 明 | 阮宗泽 | 王建吉 |
| 编 委 | 刘文涛 | 杨 明 | 阮宗泽 |
|     | 徐向梅 | 倪世光 | 王建吉 |
|     | 张益兰 | 伍 清 | 一 鸣 |
|     | 任 鹰 | 李 言 |     |

美国开国三杰

民族之父富兰克林

刘文涛杨明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 《美国开国三杰》 民族之父富兰克林

## 第一章家境寒微

在许多方面，富兰克林是由他在新英格兰的青少年时代的清教信仰所塑成的。在这一代人身上，节俭、勤勉、苦干、实用的教育和明显的美德行为等德行体现了清教徒的力求上进的精神。

R·C·西蒙斯

1706年1月6日（新历1月17日）是个礼拜天，在北美波士顿米尔克大街的乔赛亚·富兰克林先生家中，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了。这个健康、灵秀而又极普通的男婴取名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乔赛亚先生最小的儿子。父亲紧紧抱着新生儿，穿过寒风凛冽的大街，去旧南部教堂接受洗礼，虔诚地祈祷儿子岁岁平安，长大成人。乔赛亚做梦也未想到，此时安睡在他怀抱中的是一个超世绝伦的儿子，他长大后成了赫赫有名的出版商，出世超凡的哲人，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举世瞩目的科学家，为美利坚民族独立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大师。由于本杰明·富兰克林毕生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而奋斗，创下了留芳青史的丰功伟绩，从而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世界伟人的神圣殿堂，并被历史学家誉为美国“开国三杰”之一，而他从一个普通印刷工一步步成长为世界伟人的经历，则成为所谓“美国神话”的象征。本书的宗旨在于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人生轨迹详细地展示给读者，以使国人对这位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旷世奇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祖籍是英国北安普敦郡的埃克顿。根据埃克顿保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到17世纪末叶，富兰克林家族至少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两个世纪。在历史上，富兰克林在英格兰也算得上是高贵的姓氏，但由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这一族系中的许多分支早已家道中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谋取生计的体面人家。

埃克顿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伦敦盆地与米德兰平原之间，地势高平，四季温润，远离都市的嘈杂与喧嚣，是一块静谧祥和的土地。离这儿不远的地方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于是，采矿、冶炼和打铁便成了当地居民安身立命的手段和引为自豪的职业，富兰克林家族也受到这种生活氛围的深刻熏陶。本杰明的祖父托马斯生于1598年，那时，他家大约有30英亩土地，还有一个不大的铁匠铺。托马斯终身以打铁、务农为业，在祖上传下的基业上辛勤劳作了一生。

在托马斯生活的年代，清教徒运动在英国正方兴未艾。以国王为首的旧贵族阶级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国教在英国的统治地位。国教的教义在性质上与天主教十分相近，它保留了繁杂的宗教仪式，倡导君权神授，宣扬暴力是罪恶。这一切恰恰与要求变革现状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于是，他们以卡尔文教为旗帜，要求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一场意义深远的清教徒运动便在英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清教主张人人读《圣经》，直接领悟上苍的旨意，废除主教制和繁琐仪式，让教会廉洁。托马斯的一家都是清教的拥护者，不仅虔诚信奉其教义，而且积极进行宣扬。面对当局实施的残酷的宗教迫害，他们绞尽了脑汁，巧妙周旋。为了保住家中唯一的一部《圣经》，托马斯把书绑在一张凳子的背面，诵读时派一个孩子在门口瞭望，一旦发现当局的人前来搜捕，便立即将凳子反过来坐在身下。清教精神已经在他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老托马斯辛苦一生，共养育了四个儿子。长子托马斯是家业的继承者，他为人老成持重，处事有方，曾经在当地出往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公职，在北美普顿郡小有名气。老二约翰善良纯朴，待人厚道，早年去牛津郡的班伯里谋生，学得了一手染羊毛的好手艺，开了一片染坊，生意还算兴隆。老三本杰明心存大志，也颇有才气，只是因时运不济，事业和生活都历尽坎坷，因而变得更为清高孤傲。他善于吟诗作赋，喜欢对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思索探讨。或许是性情相投，或许是出于与兄弟乔赛亚的手足深情，他与和自己同名的侄子（即本书的主人公）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并给予了他慈父般的关怀和重大的人生启迪。

最小的儿子往往是最聪明的。老四乔赛亚生于1655年，没上过多少学，但善于钻研，颇有学识。在他身上人们不难找到英格兰人的许多传统美德：忠诚、勤勉、坚韧、办事有条有理，严谨守信。乔赛亚天生聪颖灵悟，遇事勤于思考，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有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不到20岁时，他娶了年长他三岁的玛丽为妻，从此自立门户，五年之后便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摆脱日益窘迫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躲避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疯狂的宗教迫害，乔赛亚的目光由世代相袭的祖居地转向了大洋彼岸的北美新大陆。1683年夏末秋初，乔赛亚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携妻带子踏上了移民远迁的漫漫路途。故土难舍，生离死别，乔赛亚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坐上轮船。望着茫茫海天和汹涌的波涛，他感到惶恐不安，头晕目眩。经过两个月的日夜颠簸，航船终于到了阳光灿灿、金风习习的彼岸。一踏上波士顿这片肥沃神奇的黑土地，乔赛亚心灵深处突然产生出一种浓浓的归属感，他爱上这片土地，并终生滞留在这里。

波士顿是由首批在此登陆的英国清教徒于1630年建立的，因英国林肯郡的波士顿而得其名。清教徒在英国国内获胜后，波士顿与伦敦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逐渐发展成为英属北美最大的城市。波士顿三面环海，与大陆仅以一段不太宽的陆桥相连，是麻萨诸塞的政治、经济和文比中心。英王詹姆斯二世为了加强对各殖民地的集中统治，将麻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罗德艾兰合并为新英格兰，并于1686年任命安德洛斯为该殖民地的总督，总督署便设在波士顿，使这座城市百业俱兴，面貌焕然一新。

波士顿的兴盛，为前来镀金的移民们提供了机遇。乔赛亚本来打算重操旧业，可发现染色业在当地几乎无人问津，于是毅然改弦易辙，转而经营肥皂和蜡烛制造业。他在米尔克大街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一栋旧房，经过修缮扩建，构筑起了新的家园，虽然面积不大，却功能齐全，既是居家住处，又是生产作坊兼商店。房屋修整完毕后，乔赛亚在门面上高悬起一块蓝色圆球门标，骄傲地向人们宣告：富兰克林一家在波士顿定居了。由于肥皂和蜡烛的销路很广，利润可观，乔赛亚又精通商道，聪明守信，生意越做越红火，很快就成了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商人。

令人遗憾的是，乔赛亚赚的钱不少，但花销更大，因为以算术级数增长的收入转瞬就会被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夫人玛丽五年内又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但其中的两个儿子都未能活过半个月，玛丽也在生下第七个孩子后因产褥热而撒手人寰。半年之后，乔赛亚又娶了22岁的阿拜亚·福尔杰为妻。这一结合是和谐美满的，二人珠联璧合，伉俪情深，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共生育了10个儿女，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排行倒数第三。

本杰明的生母阿拜亚·富兰克林的父亲是当地的首批移民，在波士顿是位很有名气的教师和土地测量员。在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阿拜亚是一位极富教养的女性，她贤惠善良，深明事理，外表柔弱而性格坚毅，来到富兰克林家后便成为丈夫的贤内助和儿女们的好母亲。阿拜亚不仅用自己丰厚甜润的乳汁哺育了众多的儿女们，而且对丈夫前妻的子女也毫无歧视，视同己出。在富兰克林心目中，母亲的形象是完美无缺的，她不仅给予他生命，抚养他茁壮成长，而且还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和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几乎还在襁褓之中，阿拜亚就开始对富兰克林进行启蒙教育。母亲那轻柔而充满深情的话语，给了他最初的人生启迪，母亲慈祥友善的笑靥，铸就了他仁爱慈善、博大宽容的胸怀，母亲那双勤劳灵巧的手，赋予了他不甘沉沦、勤奋努力的意志力和秉性。多少年过去后，富兰克林回想起母亲时曾用无限感慨的口吻赞叹道：“在我心目中，她永远是一位天使！”

富兰克林不知道父亲年轻时是什么模样，因为他出生时父亲已年届五旬了，岁月的侵蚀已使他的两鬓开始斑白，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父亲是个性格开朗，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男子汉，没有被家庭和工作拖垮，也不会向年龄和命运屈服。为了养家糊口，他一生忙碌，致力于务工经商，但他的业余生活仍然是丰富多采的。他对音乐和美术有相当高的鉴赏力，向往政治自由和宗教宽容，还热心公益事业。他为人忠厚正直、公道干练，在当地早有了名气。四邻八舍发生矛盾纠纷时都愿意请他去调解仲裁，甚至当地的官员要人们也常常前来造访，就一些有关公共事务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尽管他时常被这些冗杂的琐事缠得分身无术，但还是尽心尽力地为他人效力，并乐此不疲。在家里，父亲既是一家之主，又是孩子们的老师和大朋友。由于经济拮据，他没有能力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学费，但他却摸索出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教育后代：他经常请一些有学识并且擅长辞令的朋友前来聚会交谈，话题广泛，涉及到宗教、哲学、教育、生活等各个方面，孩子们被允许旁听，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希望在一种具有浓厚学术气息的氛围中陶冶孩子们的情趣，开发他们的智力。在父亲的身旁，孩子们的永远是快乐充实的。

家里有太多的孩子，又有太多的肥皂，一次偶然的疏忽，富兰克林的一个年幼的哥哥埃比尼泽不幸淹死在盛满肥皂液的大盆里。父母伤心至极，对子女的照料更加细心周到了。父亲每天从柜台上大把大把地收进钞票，又由母亲大把大把地送到食品店、杂货铺，换来须臾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用餐的时候是家中最热闹紧张的时刻，一张由父亲亲手制作的侍大餐桌摆在房间中央，上面从来不铺桌布，几张凳子总是被冷落在一旁，孩子们站在餐桌四周就餐，以便可以伸手够到距自己最遥远的盘子。每顿饭即使安排得再丰盛也会被一扫而光，孩子们的胃口总是那么好，对于食品的味道和质量毫不挑剔，父母也从来不会为剩余食品发霉变质而发愁。

由于子女太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十分悬殊，最小的妹妹简出生时，大姐伊丽莎白已经出嫁了。在兄弟姐妹当中，富兰克林最钦佩的是哥哥乔赛亚——一名搏击风浪的海员；最喜爱的是小妹妹简，她的眼睛像绿宝石那样纯洁无瑕，深邃动人。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父母那美妙动听的歌声。父亲的歌声激越深沉，完全可以胜任教堂圣诗班的领唱。饭后茶余，他经常用优美的男中音唱赞美诗和古老的英格兰民歌，母亲则用轻柔圆润的低吟相伴相随，十几个孩子在一旁动情地听着，时而也轻轻地随唱，陶醉在无限美妙的音乐世界里。米尔克大街那幢挂着蓝色圆球门标的房子里常常歌声不

绝，余音缭绕。

这是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物质上虽十分匮乏，却过着富足充实的精神生活。在这种特殊的生活氛围中，人的情趣会趋于高雅，精神和品格也能得以净化升华，从而洗心革面，驱恶向善。

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生性好动，爱好广泛，而且常常耽于幻想。最初，他对军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历史上那些伟大统帅崇拜得五体投地，立志要献身疆场，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军事伟业。父亲对他的这一念头感到惊愕不已，进行了严厉的劝阻。远在本杰明伯伯也多次来信，告诫他不要盲目行事，并寄来他本人整理的关于战争是罪恶的名言警句。后来，富兰克林又喜欢上大海，希望像哥哥乔赛亚那样作一名遨游世界的水手。这一想法日夜缠绕着他，竟使他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关于海的梦：他是一簇浪花，在海的怀抱里自由自在地玩耍；浪花越冲越高，升腾到空中变成一朵白云，在风的吹拂下漫无边际地四处周游……后来风停了，他扑通一声掉入大海，淹没在冰冷漆黑的海水之中……“妈妈！我要淹死了！”哭喊声惊醒了全家，妈妈好不容易才把他唤醒，发现他已经把被褥尿湿了一大片。父亲耐心地听他倾吐了海的故事，心疼地对他说：“傻孩子，大海可不是好玩的地方，你知道吗？当年爸爸来北美时在海上经历了多少风险啊！”

居家过日子离不开钱。富兰克林小时候只知道钱有用，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它，因为家里从来没有多余的钱给他零花。七岁时，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枚铜币，他喜出望外地跑进玩具店，买了一只期盼已久的哨子。于是，大街小巷响起了他那高亢刺耳的哨音。当哥哥詹姆斯告诉他这只哨子其实很便宜，他至少多花了3倍的冤枉钱时，他后悔地流下了眼泪，反思的懊悔远远超过了哨子带来的欢乐。这时候，他才懵懵懂懂地知道一点关于钱的事情：钱既能使人得到享乐，更能捉弄人。

至要无如教子，至乐无如读书。虔诚的清教徒乔赛亚一直认为，聪明勤奋、灵气十足的小儿子很适合于从事神圣的教会工作，从伦敦来的三伯父本杰明也持这一看法，还特意把自己多年记录的布道演讲录送给了小侄子。于是，八岁的富兰克林被送到文法学校开始了读书生涯。由于富兰克林对于词汇、文法、写作极有领悟力，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在班内遥遥领先。但经过一番权衡利弊，父亲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文法学校高昂的费用使家庭难以承受，从事教会工作对他们这个阶层来讲机会也不多，况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当时常常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一贫如洗。因此，不如送儿子到更有实际用途的写算学校去就读。在写算学校里，富兰克林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还练就了漂亮的书法。可能是由于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暂时未能开发出来的缘故，他对数学课总是提不起情绪，考试成绩糟糕透顶。有鉴于此，父亲决定结束他的学习生涯。于是，10岁的富兰克林回到家中，极不情愿地干起加工蜡烛、照看铺面的活计。

富兰克林虽然被迫停止了学业，然而，短短的学校生活已经点燃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读书已成了他人生的第一精神需要，这一习惯必将伴随他走完一生的道路。没有老师指教他便自学。白天工作繁忙不得闲暇，于是晚上打烊后便成了最好的学习时间。他把自己反锁在小屋里，伏案苦读，夜夜不辍。他读的书种类繁多，涉猎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既有长老会教的教义，也有从各处收集来的小册子和通俗读物，还有一些名家的作品，涉及到政治、法律、科技、宗教、文学等方方面面，如：科顿·马瑟的《为善论》、笛卡

尔的《哲学原理》、约瑟夫·爱迭孙的《观察报》、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普鲁塔克的《名人传》等等。这些作品对富兰克林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对他人生坐标的定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些书‘对我的思想可能起着转折的作用，影响着我日后生活中的某些大事’”。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对名人传记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对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常常反复阅读，不忍释卷，从这时起，他似乎已能从前人的足迹和丰功伟绩中汲取人生的动力和丰富的精神食粮。已经结束了的学习生活，在挑灯夜读中又得以延续，好在家中有的是蜡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对于精力过剩、富于幻想的富兰克林来说，日复一日的简单机械的劳动无异于服苦役，他所企盼的是一种带有创造性和刺激性的工作。这一时期，对海洋的向往仍然时时冲击着他的心灵。每当看到蓝蓝的海水和辽阔的海面，他便会把所有的疲劳和愁苦置之脑后，大海的魅力甚至能激发他丰富的联想和创造力。他曾经设计制造过一种简易的划水用具——一种扁扁的椭圆型木套，把它戴在手上划水可以明显加快游泳速度，只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在父亲的指导下，他还做过一只画着蓝鸟的大风筝，起风的时候，他抓住风筝线悠然自得地在水面上随风漂行，同时享受着游泳和放风筝的双重乐趣。每当这时，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早已离开了喧闹的尘世，完全融入那蔚蓝色的天空和雄浑神秘的大海。

看到小儿子心灵手巧，富有创造性和冒险精神，老乔赛亚感到由衷地欣慰。但看到儿子对大海的那种痴迷，又产生了几分忧虑。他担心小儿子也会像他的哥哥乔赛亚那样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又怕他好高骛远，在不着边际的幻想中耽误了锦绣前程。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儿子回到现实中来，学会一些为社会所需要的真实本领，在脚下的这片黑土地上踏踏实实地闯出一条人生之路。

要想让儿童了解世界的玄妙，再也没有让他们到社会上去体察民情更理想的事了。老乔赛亚带着这孩子穿大街走小巷，寻访了木匠、瓦匠、铜匠、刀匠等各个行当，观察他们的劳作和生活起居，借以了解儿子心中的职业倾向。经过一番考察，老乔赛亚发现小儿子对机械制作很感兴趣，时常玩刀弄斧，敲敲打打，制造出一些稀奇古怪而又充满智慧的东西。不过他还发现，孩子最大的兴趣仍然是读书，他已经把父亲收集的有关宗教论战的书籍认真地读了一遍，正在他家居住的三伯父带给他的一些手抄的专题小册子，他也一一拜读完了，还做了笔记和摘要。只要手中有钱，他总是用来买书。今非昔比，他对钱的使用已经十分精通了：先买一套《约翰·班扬文集》，读过后再到书摊上换一套伯顿的《历史文集》，如此往复，既博览了群书，又经济划算。权衡再三，老父终于给儿子找到了一份既能把他留在陆地上又能使他心满意足的职业——到他的哥哥詹姆斯那里去当印刷工。在经济文化尚不发达的殖民地时代，这或许是能使书报文字与机械发生直接关系的唯一职业了。

詹姆斯比富兰克林大九岁，早年在伦敦学习印刷技术，学成后购买了印刷机和铅字返回波士顿，经营印刷业。富兰克林服从了父亲的决定，并按照当时的惯例与哥哥正式签订了师徒合同，由父亲充当公证人。合同明文规定弟弟富兰克林自签约之日起以学徒身份学习技术，并为其兄弟服务，直至年满21周岁为止。学徒期间必须忠实地服从师傅，保守其秘密，执行其命令，

不得酗酒、玩牌、赌博、缔结婚约，所有言行对师傅必须忠顺。而师傅则要指导徒弟学好技术，向他提供饮食、住宿及其它生活必需品。父亲为富兰克林交纳了 10 英镑学费、母亲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为他密密匝匝地缝制了工装——一件棕褐色的皮围裙。就这样，一纸契约把亲兄弟变成了师傅与徒弟，这位未来共和国的缔造者从 12 岁起就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詹姆斯是个争强好胜、精明强干的能人，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遵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古训，严格管教约束小弟，有时几近于苛刻。学习印刷技术对富兰克林来说并不困难，他很快就精通了铅字排版、油墨印刷、装订裁切等基本工艺，还能不断钻研思索，对设备和工艺进行革新改造，工友们都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小学徒，只有哥哥总是对他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本杰明很看不惯哥哥那副咄咄逼人的架子，经常回家找父亲评理，而老父总是苦口婆心地规劝，设法使这对师徒兄弟重归于好。

18 世纪初的波士顿虽为大城市，但实际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城里的印刷商又不止一个，因此詹姆斯的生意并不太好做，只能印一些宗教宣传品和为数不多的教科书。为了使自己的印刷所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富兰克林开动了脑筋，不断改进工艺，更新版面，提高质量，千方百计扩大营业额，成了哥哥在生意场上的得力助手。但哥哥的面孔似乎并没有多大改观，好在富兰克林对此已经逐渐适应了。

十三四岁正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年龄，酷爱文学的富兰克林又对诗歌着了迷，梦想将来作一个大诗人，用隽永凝炼的不朽诗句揭露虚假伪善，鞭挞庸俗黑暗，赞美正直善良，歌颂道德理性。工作之余，他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用稚嫩的笔拼写出一些自以为很美的诗句。三伯伯是他诗作的忠实读者，不仅对他备加赞赏，还把自己以前写的诗作手稿（两卷四开本）送给他浏览。但父亲却不以为然，他给富兰克林火一般燃烧的诗兴大泼冷水，告诉他，“诗歌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和美妙的意境，没有深厚的生活底蕴、丰富的想象力和精炼的文笔，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哗众取宠，便是无病呻吟。”父亲一向对三哥十分敬重，但这次却用含蓄婉转的口吻挖苦道：“家里有一个诗人就足够了。”父亲的劝诫使富兰克林放弃了作诗人的打算，已经发表的诗作《灯塔的悲剧》和《水手之歌》成了他诗歌创作生涯的起点和终结。在父亲的点拨下，富兰克林的创作冲动转向了散文。散文题材广泛，形式灵活，是一种十分实用便捷的文体，许多著名作家都是从学散文起步的。富兰克林不间断地进行散文习作，用一种自然朴实流畅的文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诉诸笔端。日后富兰克林成长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那措辞典雅、叙述条理、逻辑严谨而又活泼流畅的文笔。多年后，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曾公开承认：“散文创作在我的一生中作用极大，是推进我进步的最基本的方法。”

学徒的生活是清苦而劳累的，但这对于富兰克林来说却算不了什么。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体格一向十分健康，精力旺盛，而且也由于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安逸和享乐，而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止境地探索尚未发现的真理，不断地增长新的知识和技能，他的身上存在着一种永远也无法满足的强烈的求知欲望。正因为如此，他常常手不释卷，惜时如金，在他的时间表上，每天 24 个小时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 时间         | 工作、学习和生活安排                          |
|------------|-------------------------------------|
| 早晨（5—7时）   | 起床，盥洗；祈祷上帝；考虑一天的工作，订下当天的学习和工作计划；早餐。 |
| 上午（8—11时）  | 工作                                  |
| 中午（12—13时） | 读书，午餐                               |
| 下午（14—17时） | 工作                                  |
| 晚上（18—21时） | 整理什物；晚餐；读书和写作。                      |
| 夜间（22—4时）  | 睡觉                                  |

富兰克林严格遵守了这个时间表，并能做到持之以恒。为了再挤出一点时间读书，他接受了一本科学杂志中介绍的素食法，从哥哥那里讨来了膳食费的一半，单独起火做饭。每顿吃些经济方便的素食，如：面包、馅饼、麦糊、土豆片或葡萄干等等，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认为这样做可以一举多得：既有益于身体，又能保持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自己的求知欲达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星期天本来是进教堂做礼拜的日子，在家里老乔赛亚对此事一向抓得很紧，可现在哥哥除了工作上对他十分严格之外，对祈祷之类的事情并不怎么上心。于是，每个礼拜日都成了富兰克林的读书日，日积月累，使他获益匪浅。由于受到新兴宗教观的影响，再加上他的这种特殊生活方式，使他成了一位自然神论者。他承认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在创造人类及天地万物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认为世界既已造就，上帝就退而不再干预自然进程和人类行为，宇宙万物将自行按照自然法则运行。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无神论，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进步的宗教观。对此，老乔赛亚是难以容忍的，但此时他对儿子已感到无能为力了。其实，富兰克林并不反对做礼拜（他每天早晨都要向上帝祈祷），但他更相信自己的悟性和能力，希望通过阅读和思考，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探索社会和人生，并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去造福人类，回报社会。书多笔渐重，睡少枕长新。在锲而不舍的艰苦自学中，他终于搞通了在学校时未能及格的数学，还学会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更为重要的是，他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坐标：要做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成就一番对人民和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有益的大事业。为了达到这一崇高的境界，他立誓排除一切诱惑和干扰，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勇敢地走下去。

北美殖民地并不是人间天堂，它虽然不像旧大陆那样充满专制暴政，但昏庸愚昧、保守专横和不平等现象却比比皆是。当时波士顿仅有的两份报《波士顿邮报》和《波士顿报》都是由官方创办的，观点陈旧保守，版面呆板乏味，毫无生气。詹姆斯和一些崇尚自由民主精神的人们决定创办一份全新的报纸，针贬时弊，嘲弄迂腐，追求进步，替那些正在为北美的开发事业流血流汗的人们摇旗呐喊，歌功颂德。

1721年8月7日，《新英格兰报》在詹姆斯·富兰克林的印刷所问世了。它以严肃的主题、富于文采的手笔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各种体裁追踪时事，点评热门话题，披露社会内幕，给沉闷的波士顿城带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新鲜气息。广大商人、作坊主，工匠和市民立即对这份报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时间，该报所报道的许多内容都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活题，报纸的发行量与日俱增。

《新英格兰报》的创办把富兰克林从小小的印刷所引入到了复杂纷坛的社会事务之中。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天地，五光十色，变幻无穷，充满了魅力。他真羡慕那些撰稿人，用小小的笔杆子就可以指点江山，扭转乾坤。于是他也跃跃欲试，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但他又怕遭到哥哥的拒绝，于是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

1722年4月2日，《新英格兰报》刊载了一篇署名为“沉默的多古德”的散文。该文以第一人称向人们讲述了多古德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她出生在来自新英格兰的船上，父亲死于航行途中，母亲含辛茹苦将她拉扯成人。后来她跟一位善良博学的牧师学会了写作、计算和缝纫。又与这位恩人结为眷属。但幸福总要有不幸相伴，在有了三个孩子以后她又成了寡妇。该作构思精巧，文辞典雅，犹如一首凄婉动人、如怨如诉的抒情诗，于平铺直叙之中向人们展示了世间的许多美好的品格。作者通过该文主人公说出的一段自白发人深省：“我仇恨罪恶，以美德为友。我主张博爱，宽恕个人的伪善；真诚地热爱丈夫和所有的人，与专制政府和集权为敌。……为了将来，我要扫除一切阻止我为同胞效力的障碍。”

多古德夫人的命运招致了普遍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那震撼人心的呼唤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共鸣，人们互相传阅，以先睹为快。长兄和朋友们对多古德的文章也十分赞赏，这不仅是因文章的内容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而且文章的成功也为报纸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但他们并未在意多古德为何方人士，因为当时的撰稿者多用笔名，而这篇文章又是从门缝里悄悄塞进来的。这类事情以后又发生多次，“沉默的多古德”的稿件无一例外地被采用了，并继续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直到《哈佛学院之梦》一文发表，多古德的真实身份才终于被揭穿。书中的一段内容引起了哥哥詹姆斯的警觉：

贫穷和财富把守着学院的大门。“学问”坐在一个高高的宝座上，只有通过艰难的台阶方能到达那里。无数善男信女依仗父母的钱财架桥铺路历尽艰辛踏入“学问”的圣殿，终于学会了“如何保持自己的优雅姿态和绅士派头”，然后“仍然像个傻瓜一样返回，变得更加高傲狂妄，自命不凡”。

这样一种伊索笔下吃不着葡萄的狐狸的感受实在与多古德寡妇的身份和性格相去甚远，分明是富兰克林对未能进高等学府深造表露出的遗憾和愤怒情绪，也是他对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徒有虚名的“学者们”的一种嘲讽和抗议。多疑敏感的詹姆斯发现了秘密所在，在严厉逼问之下，富兰克林吐露了真情。兄长认为自己受到了小弟的愚弄，于是恼羞成怒，拳脚相加。詹姆斯一直自我标榜信奉自由民主原则，但在自己的小圈子实行的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家长制。但是，富兰克林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坚毅的性格，从不会向任何暴力和强权低头，一点点皮肉之苦不仅不会泯灭他心中追求正义和真善美的希望之火，反而更能激励他奋发向上，勇往直前，永远与专横愚昧、暴虐偏见作斗争。

对于富兰克林兄弟来说，1723年是个多事之秋，变故迭出，险象环生，一波三折。

《新英格兰报》对世事的评论和尖刻的嘲讽使广大民众拍手称快，但却深深地激怒了当地的权势阶层，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詹姆斯投入了冰冷阴森的石头监牢。他算得上一条汉子，没有出卖朋友，也没有背叛自己。参事

会还把富兰克林抓去严加讯问，富兰克林不为所动，没有向淫威屈服。不久他获得了释放，因为在当代人看来，徒弟为师傅保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况且当局从这个小伙子倔强的性格看出，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哥哥被捕入狱使富兰克林进一步认清了专制暴政的丑恶本质，也更坚定了他为自由民主原则而斗争的决心，他用自己尚还稚嫩瘦弱的双肩毅然挑起了印刷所的重担。在这一段时间里，“多古德”的小品文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新英格兰报》上，他喜笑怒骂，冷嘲热讽，用犀利的笔触对殖民地存在的政治专横、宗教迫害和言论不自由等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一篇题为《伦敦日记摘要》的文章中指出：“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智慧之类的东西，言论不自由就不可能有公众的自由，每个人都不能使用他的权利去损害或控制其他人的权利。……凡是想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的人，必然先从压制言论自由做起。”他在另一篇文章则指出：“一个国家，究竟受伪善地自称对宗教虔诚的人的危害大，还是受公开亵渎神灵的人的危害大。……我认为：二者之中伪善的人更有危害，特别是当他在政府中占据着职位时。”接着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疾呼：“把骗子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吧，使受骗者醒悟过来吧！”

数月后，监狱当局把疾病缠身、形销骨立的詹姆斯放了出来，随之下了一道通令：禁止詹姆斯继续印刷出版他的报纸及类似的出版物。这对詹姆斯的个人事业是致命的一击，等于把他逼入了绝境。詹姆斯与朋友们想出了一个与当局巧妙周旋的办法：对外宣布兄弟二人解除师徒关系，今后以本杰明的名义出版报纸，暗地里两兄弟再续签一份师徒契约。这样既可以使报纸和印刷所生存下去，又可以使原来的契约继续有效，弟弟仍然是徒弟，处在哥哥的控制之下。这一时期，本杰明主编的《新英格兰报》越办越红火，在波士顿街头成了抢手货，即使一再扩大发行仍供不应求。两兄弟在与殖民当局作斗争时情同手足，心心相印，但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感情和性格却格格不入，利益上的冲突更使他们之间的积怨加深，难以弥合。富兰克林想趁新契约正式签定之前摆脱哥哥的控制另谋出路，而哥哥却四处游说八方设障，使弟弟求职无门，当地官府和教会也把他视为反叛者和异教徒。富兰克林感到自己在波士顿已经没有立锥之地了，于是决定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找回做人的尊严，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创造出自己的事业和辉煌。初秋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夜色如墨，一条单桅帆船载着形单影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消失在迷茫的大海之中。40年前的这个季节里，父亲乔赛亚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新大陆，寻找理想中的那片乐土。而今，17岁的富兰克林与双亲不辞而别，他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寻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新天地。



## 第二章独闯世界

费城居民相互间的差异要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城市小得多。财富并没有产生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有朝一日，他也会处于与他最富有的邻居同等的地位。

雅各布·迪歇

初秋时节，没有狂风，没有巨浪，海面上寂静无声。一叶扁舟在阴森森、黑黝黝的大海上缓缓地漂动。夜幕中，船夫的身影时隐时现，寥落的星辰若暗若明。心情忐忑不安的富兰克林蜷缩在船舱的一角，浑身充满寒意，瑟瑟发抖。

此时此刻，富兰克林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想起年迈的父母，他的心在隐隐作痛。他们辛勤哺育了他，在他身上撒下了绵绵不尽的亲情，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而他如今却要不辞而别，一走了之。对于离别养育了他的这片故土，他感到十分惆怅：他在这里堂堂正正地度过了17个年头，如今却要私自中止合同，在夜幕的遮掩下悄悄地离去。面对个人的前程，他又是那样迷惘茫然。这是他第一次出海，举目无亲，一文不名，除了有熟练的印刷技术和读过几本书外别无长物，未来在他面前仅仅是一个未知数，茫茫海天，哪里是他的归宿？何处是他停泊的安全港湾？但是，富兰克林的心灵深处始终燃烧着一股不息的青春之火和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热望，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时刻支撑着他，经受命运的考验，顽强地度过难关，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步勇敢地走下去。

还算幸运，300海里的航程一帆风顺，三天之后，小船到达了纽约。

纽约城位于哈德逊河河口地带，内陆辽阔平坦，外有天然良港，是新大陆最早开发的中心地区。英国人于1664年占领了该地，并以英格兰的约克郡重新命名，按照当时的习惯称之为“新约克”，即纽约（New York）。与由清一色的英国清教徒建立的波士顿不同，纽约是一座由多民族组成的城市，居民中大多数是来自荷兰、英国、法国和芬兰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民族风情五光十色。初来乍到，一切事情对于富兰克林都是那样陌生。他茫然地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在他眼中，每个行人都对他流露出一种冷漠轻蔑的神情，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仙与当地人分离开来，无法沟通。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冷漠坚硬的外壳之下，人与人之间仍保持着某些密不可分的联系。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中有一种类似于同乡会的民间互助组织，在他们的指点下，富兰克林找到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老人。

布雷德福早先在费城创办印刷所，因冒犯了总督大人，不得不迁居纽约谋生，但他的儿子安德鲁则留在了费城。经营有方、老于世故的布雷德福在纽约印刷界已经独占鳌头，他认为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不同凡响的高贵气质，于是认定这位后生必将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他希望富兰克林能成为儿子的得力助手，而这正是谋职心切的富兰克林所求之不得的，二人一拍即合。怀揣着老人手书的推荐信，富兰克林又匆匆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曾几何时，富兰克林对大海充满痴情，迷恋至深。然而，这次赴费城的海上旅行却使他吃尽了苦头。他们在航行途中遇到了大风暴，狂飙骤起，惊涛裂岸，航船就像一只纸做的玩具，在海浪的拍击下忽儿冲向空中，忽儿又坠入浪谷。头晕、恶心、呕吐以及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一齐涌来，弄得富兰克林痛苦万状。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抛向礁石，船身在轰然巨响中摔得七零八

落，十几名乘客拼命爬上礁石才幸免于难，他们眼巴巴地瞭望着海面，期盼着过往的船只前来营救。礁石上是一片荒漠之地，没有淡水，也没有食品，只有死亡的恐惧不断袭扰着这群落难者。幸运的是，富兰克林从一位乘客那里找到一本荷兰文的《天路历程》，这本书竟成了他解除恐惧与饥饿的灵丹妙药，陪伴着他度过了生命中的一个危难时刻。

《天路历程》讲述的是一位基督徒跋山涉水，历尽坎坷，最后到达天国之城的人生经历。作者约翰·班扬是典型的英国清教徒作家，他的作品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先后被译成 100 多种文字出版。富兰克林向来仰慕班扬口语化的文字表达方式和把叙述与对话揉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更钦佩其作品中那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意境。在落难之际拜读这部熟悉的作品，触景生情，更使他感慨万端，从中悟出了不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时，他还想起了他曾读过的《鲁滨逊漂流记》、《力士参孙》等作品，笛福、弥尔顿笔下的那些历尽艰难、不屈不挠的人物形象使他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启迪，给了他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

整整两天水米未沾了。一排海浪把一条肥硕的鳕鱼冲上礁石，饥饿的人们蜂拥而上捉住它，用刀割，用手撕，然后坐在用破船板生起的篝火旁，吃起了半生不熟的烤鱼片。富兰克林形成素食的习惯已经若干年了，但为了生存下去，他强忍住阵阵袭来的恶心，把鱼片囫圇吞入肚内，而后生平第一次喝了一大口烈性酒。鱼片宴结束后，落难者们的福音也接踵而至，一条过路商船搭救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安博依。富兰克林不顾旅途劳顿，又冒着瓢泼大雨步行赶往伯灵顿，而后乘船顺河西下，终于在星期日日出之际到达了费城。

一路风尘仆仆使长相原本十分灵秀的富兰克林变成了一个邋邋遢遢的流浪汉，形同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神秘游僧济公：身材瘦弱无力，脸面肮脏憔悴，衣衫褴褛不整，沾满了污泥和油垢，就连那双明亮智慧的灰眼睛也蒙上了一层红红的血丝。显得既滑稽可笑又招人怜悯。此时，他的行囊袋已托付给邮局寄送，何时能收到尚不得而知。再说，眼下急需处理的事务不是修整仪表，而是填饱那饥肠辘辘的肚皮。地域不同，物价迥异。他拿出三个便士去买面包，店主却塞给了他三只像 16 开本书那么大的长面包，令他不胜惊讶，因为这点钱在波士顿只能买到一块小小的软饼。

富兰克林风卷残云般地啃下了一只大面包，顿时感到口渴难忍，于是鼓足勇气敲开了市场街上一户中等人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位美丽秀气的姑娘，她身着淡紫色的碎花长裙，领口、袖口四周还镶着白色花边，高盘的发髻简洁雅致，几绺秀发飘逸在发髻的外边，显得朴实端庄，温柔敦厚。姑娘被门口这位形如乞丐、抱着两只大面包的小伙子吓了一跳，看清“真相”后又忍俊不禁，嫣然一笑。本杰明长这么大还从未和任何一个女孩子有过深交，第一次如此近地面对一位楚楚动人的姑娘竟使他腼腆地低下了头，窘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他实不甘心让姑娘看到自己这副尊容，匆匆地问了问路便逃之夭夭了。他大步流星地走到路旁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旁，站在一块大青石上，捧起甘甜清冽的河水狂饮了一番，而后又把涨得通红发烫的脸埋入水中，浸泡了许久、许久。

这位使富兰克林怦然心动的姑娘就是他日后的初恋情人——德伯拉·里德。

费城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首府，位于特拉华和丘尔基尔两大河流涨潮

时的交汇处。这块殖民地的创始人小威廉·佩恩是战功卓著的英国海军上将威廉·佩恩的儿子，1681年复辟王朝君主查理二世签署特许状，把这一大片土地赠送给了他，以偿还欠他父亲的16000英镑款项，并指定，以“宾”（佩恩之音）命名这一地区，同时，应小威廉·佩恩的请求，在“宾”的后面又缀上了“夕法尼亚”（林地之意）一词，形成了现在的名称。确实名不虚传，这里是林木的海洋，河流两岸延绵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白橡树、杨树、松树、枫树……茂密杂错地生长在一起，林地中还有大片大片绿色如茵的草地，其间盛开着绚丽多姿的野花，真是草木苍翠，景物宜人。在河口和森林地带的下面便是一望无垠的万顷良田。此时正值秋收季节，沃野飘香，遍地金黄，到处是一派繁忙快乐的丰收景象。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勤劳的拓荒者使宾夕法尼亚成了北美殖民地首屈一指的大谷仓。

费城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宽松祥和的特殊社会氛围。初建该城时，威廉·佩恩执意要将她命名为“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意为兄弟之爱），这与他所虔信的教友派理想密切相关。教友派兴起于17世纪早期的英国，它与其它基督教派的相异之处是：它没有成文的经典和教义，也没有专职的牧师、圣礼和节日，而是直接依靠上帝的启示指导信徒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威廉·佩恩不仅亲至北美传教，还先后选送了近千名会友前来北美。佩恩及其后嗣们长期致力于发展社会福利，热心科技、教育事业和工商业，并以主张释放奴隶、信仰自由、男女平等和反对战争与暴力而闻名于世。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当时的费城在人口、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均赶不上波士顿和纽约。

富兰克林此时没有心思去浏览这里的市容风貌，他顺着河边慢慢地走着，刚才那位姑娘的倩影似乎还在他的眼前晃动。不知不觉，他随着前去作礼拜的人群来到了市场附近的教友会教堂，乘虔诚的教徒默念祈祷之机，坐在长椅上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而后，他把自己精心梳洗打扮了一番，便去寻找安德鲁印刷所。未曾想到，他在印刷所里同时遇到了布雷德福父子两人。原来，威廉·布雷德福已经骑马从纽约赶到了这里，因为他十分希望儿子能留住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儿子安德鲁显得比父亲更有派头，但显然缺乏文化修养，他是另外一种人：眼睛紧盯着上层人士，面颊上的笑容只对当权者开放，对平民百姓则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富兰克林向来讨厌与这种市侩小人打交道，而安德鲁也丝毫没有流露出要雇佣他的意向。尴尬之余，布雷德福老人只好领着富兰克林来到了新近开业的凯默印刷所。

塞缪尔·凯默是个自命不凡、耽于幻想的人物。矮胖的身躯，硕大的头颅，棕红色的大胡子长满了脸面和腮帮，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他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似乎从未满意过，总是四处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时乖命蹇。但他又活得十分快乐潇洒，因为他的大脑时常沉湎于发财致富的梦幻之中。到了50岁开外，他才想起干一点实事，决定开一家印刷厂，于是用全部积蓄买下了一台陈旧的印刷机和一套磨损严重的铅字。尽管他此时对印刷技术还一窍不通，但却立下了宏愿：要与安德鲁·布雷德福的印刷厂决一雌雄，独霸费城的印刷业。

凯默让富兰克林上机器操作一下。看到这位年轻人动作熟练利索，排字印刷样样精通，凯默感到这是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好帮手，当即表示愿意雇用他，但把工资压得很低。

此时的富兰克林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有一份

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

凯默的房子太拥挤了，但他又不希望自己的雇工住到竞争对手布雷德福家里去，于是他为富兰克林租到了一间价格低廉的居室。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这间房屋的主人恰恰就是使他怦然心动的姑娘的母亲。

这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峦、森林、房屋和街道，似乎世间万物都被凝固在这银装素裹之中，只有特拉华河的激流永不停息地向着大海奔涌。

富兰克林开始了他在费城打工谋生的生活。白天在印刷所排版印刷，裁切装订，除了干与印刷有关的工作外，还要担负店里各种杂务和伺候老板。直到天黑他才能回到自己的小家，吃过简单的饭食后，便开始挑灯夜读。

窗外寒气逼人，室内滴水成冰。破损了的壁炉必须靠在跟前不断添柴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可富兰克林一看书就入了神，常常是柴尽火熄，室内与室外的温度相差无几。

就这样，本书的主人公——一位年轻的印刷工人，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竭尽全力挣扎着、拼搏着、奋斗着。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所云极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在这种极其严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富兰克林不仅锻炼了意志，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各种才干，而且积淀了坚实深厚的生活底蕴，消化吸收了前人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食粮。在这一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一个美好高尚的崭新精神境界正在他的心灵深处孕育升华。

读书笔耕，夜深人静之时，思国怀乡之愁常常油然而生。远方的父母是否安康？家中蜡烛的销路如何？哥哥詹姆斯能不能原谅小弟？小妹妹简的眼睛还像绿宝石那样美丽可爱吗？孤独与寂寞寸步不离地伴随着富兰克林。但是身处困境并没有使他萎缩不振，消沉颓唐。每当思乡之时，他常常借以自我激励：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以宽慰父母亲人的养育之恩和手足深情。

从一踏上费城的土地，富兰克林就获得了一种归属感，觉得这里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一时也说不清楚。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初步认识到：相对于波士顿来说，这里的社会氛围是比较自由宽松的。宗教专制在费城没有什么市场，人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不受官方教会繁文缛节的束缚。另外，这里还没有老父亲喋喋不休的训导和兄长粗暴蛮横的呵斥。由于店老板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几乎是个门外汉，这就为他在印刷出版界崭露头角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的经济收入也比以前要好一些，加上费城的物价比较便宜，节衣缩食省下一些钱，可以买许多以前不敢问津的书籍，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挤出时间又为他尽快读完这些书提供了保证。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费城，富兰克林很快就结识了一些笃学好志的青年朋友，如沃森、奥斯本等等，尤其是立志要成为诗人的拉尔夫，他们在一起谈古论今，交流学术和人生体验，抒发壮志豪情，使富兰克林受益匪浅。另外，使他感到十分惬意的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心上人，由于她的出现，富兰克林滋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与冲动。

德伯拉·里德小姐，此时正值青春豆蔻年华，她体态匀称，头发黑亮，肌肤丰洁鲜嫩，有一双深褐色、富有表情的大眼睛，虽不能说是绝代佳人，却也显得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聪明伶俐，心地善良，勤快能干，尤其擅长女红，缝纫裁剪样样精通，虽未进过校门，可读过不少书，写得一手漂亮娟秀的文字。里德小姐的父亲是个房地产商，刚谢世不久。母亲里德太太勤

劳朴实，靠出售一种治疗皮肤病的祖传成药养家糊口。她持家有方，生活节俭，最大的享受就是喝茶，茶叶便成为她眼中最高级的奢侈品。里德太太对女儿的管束向来非常严厉，尤其注意不让她轻易与成年男性接触。但新房客的到来却打破了他们家多年的沉寂气氛。

两个人的初次谈话是从调侃戏谑开始的。里德小姐嘲讽富兰克林是一个一无所有、居无定所的流浪儿，而富兰克林则认真地宣称：自己不仅有一双灵巧的手，而且还有一颗“火热的心”。就在这次漫谈当中，里德小姐完全被富兰克林的风采和幽默感迷住了。这是一个她平生所见到的最富有魅力的真正的男子汉：身高5英尺9英寸，体格强健有力，思维敏捷，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明亮清澈的眼睛里时常流露出一种刚毅不屈的神态，浑身散发出一种成年男子才有的阳刚之气。谈话结束时，里德小姐动情地柔声问他：“你能永久地住在这里吗？”富兰克林充满深情地望着她，回答道：“只要费城能留住我的心。”

那是一个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风也柔和，云也浪漫，富兰克林那滚烫的双唇深深地印在了里德小姐红润火热的面颊上，两颗激烈跳动的心脏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冬天不知不觉过去了，春天贸然来到了北美大地。富兰克林离家出走已整整半年之久了，还不曾向家人报过平安，也未得到过家里的音讯。其实，他的思乡之情是非常浓烈的，但却在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认为回家的时机还不成熟，自己应该干出一点名堂再回家，一方面可以宽慰二位高堂，给亲朋好友一个意外的惊喜。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詹姆斯哥哥不再敢小瞧自己。但是，他于4月初突然接到了姐夫的一封信，这件事打乱了他的计划。

姐夫罗伯特·霍姆斯是一只商船的船长，经常航行于波士顿与待拉华之间做生意，他不知如何打听到了富兰克林的下落，于是来信告诉他，父母为他的失踪焦急万分，经常以泪洗面，劝他立即返回家乡。

接到这封来信，富兰克林不禁潸然泪下，对二老的歉疚、海上漂泊所遇到的种种艰险和独闯江湖的辛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使他恨不得立即大哭一场。但为了使家人放心，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对自己所遭遇的艰难困苦一字未提，只是讲述了自己离家出走和留在费城的原因，并向姐夫暗示：在这件事上自己并没有什么过失。

当姐夫霍姆斯船长阅读这封信时，恰巧宾夕法尼亚总督威廉·基思先生也在场，于是霍姆斯向他谈起了自己的这位亲戚，并把富兰克林的信也给他看了。看完信后总督感到很惊讶，没想到一个年轻人竟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敏捷的才思和流畅的文笔。他当即对霍姆斯说，这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如果给他以适当的扶植，是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他提议，让富兰克林在费城自开一家印刷厂，经费由富兰克林的家人资助，不足部分由他设法解决，他还可以帮他解决招揽生意等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霍姆斯的赞许。

一周之后，富兰克林正在全神贯注地整理铅字，基思总督突然来到了印刷所。贵客上门使凯默先生喜出望外，激动得不知所措，每一根胡子都在颤抖。但当他弄清楚总督大人是来拜访富兰克林时，好一阵子扫兴，他没想到这个小伙子竟有如此广大的神通，一个劲地抱怨他为什么从不向他流露。

富兰克林得知了总督先生的计划后，便向凯默谎称母亲有病，告假回乡探亲。由于有总督大人撑腰，凯默不敢怠慢，不仅立即应允，还预支了一笔

薪水。里德小姐听说富兰克林要去探望父母，虽感到恋恋不舍，但还是为未来的公婆准备了一份丰厚的礼品：自己亲手绣制的带花边的桌布、餐巾，以及家中自制的火腿，装了满满一大包。望着乘船远去的富兰克林，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上帝保佑你早日归来！”

大约在 1724 年 5 月上旬，富兰克林返回了波士顿。蓝色圆球门标依然那么忠实地守卫着门户，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熟悉亲切，只是父母亲变得更加苍老了。面对久别归来的浪子，全家人欢天喜地，没有一句埋怨话。父亲扳着小儿子结实的肩膀使劲晃了晃，满意地点了点头，说：“真是富兰克林家的一棵好苗子！”母亲则把满腔的柔情融入到一阵忙碌之中：把家里的鸡蛋、麦粉、白糖和果酱拿出来，调合在一起，精心烘制了一块特大的蛋糕，蛋糕上涂了一层彩色奶油，中间是一个醒目的大字：“Happy”。晚上，除了詹姆斯以外，在费城的兄弟姐妹们都赶来了，围坐在铺着新桌布的餐桌旁，分享着美味佳肴和富兰克林带来的喜庆吉祥，家中充满欢声笑语。这位来自费城的公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离乡之后自己所做的那些值得一提的事情，还颇为得意地把里德小姐夸赞了一番，但对于在异地他乡的艰辛和愁苦却只字不提。

温暖如春的家庭气息使富兰克林真正理解了母爱和父爱的深刻含义，于是他听从了二老的劝告，主动前去印刷厂看望哥哥。詹姆斯此时正在柜台前接待客人，见到远道而来的弟弟并未露出惊喜之色，只是很勉强地应酬了一下，便又去工作了。富兰克林此时已经从父母身上学会了忍耐和宽以待人，在孤身奋斗的经历中也理解了哥哥的困境和苦衷，他毫不介意哥哥的冷漠，和颜悦色地和那些熟悉的伙计们谈起了费城的见闻。伙计们都把他当作星外来客，这个摸摸他身上那块铮亮的表，那个掂掂他带来的光洁精巧的银币，个个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最后，这位衣锦还乡的小伙子给大家留下了 8 便士酒钱便告辞了。兄弟俩虽然没有握手言和，而且弟弟的炫耀又一次刺痛了哥哥的自尊心，但这次会面使詹姆斯深深认识到：自己的这位弟弟绝不是一位甘心久居人下的凡人。

富兰克林随身还带来了一封总督先生致父亲的亲笔信。在信中，总督对富兰克林的才干和前途大加赞赏，请求乔赛亚老人对儿子的事业给予慷慨资助。这封充满激情的信使全家人都感到了振奋，特别是年轻的兄弟姐妹们，都深深地被总督大人的义举所感动。但是，一生坎坷，历尽人间沧桑的父亲却心存疑虑。他戴上老花镜反复地阅读这封信，仔细地揣摩信中的每一句话，苦苦地思索。丰富的人生阅历告诉他，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他信仰的上帝只保佑那些用自己的双手营造幸福的人。几天之后，他把儿子叫到自己房内，父子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学业才几年便想独立门户是一个草率的决定，事业上的急功近利只能导致失败，他现在所需要的仍是踏踏实实地工作和学习，随着经验和财富的积累，到 21 岁时再独立开业会更有成功的把握。另外，老父还叮嘱他不要过早地考虑个人的婚事，家庭的拖累会使一个天才蜕变成庸人。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却并不顺儿子的心意。富兰克林想说服父亲，但又怕伤了老人家的的心，于是只好顺从了父亲的旨意。不久，富兰克林便踏上了返回费城的路程。

此次离家之后，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富兰克林仅仅探视过两三次。其实，他对父母是十分怀念和敬重的，之所以未能经常返乡服侍老人，主要是由于

日后他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繁杂的社会事务和神圣的历史使命不可推卸地落在了他的肩上，使他无法脱身。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个人了，历史把他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所幸的是，富兰克林创下的历史伟业使他成了为人类所爱戴的世界伟人，这一殊荣一定会使二位老人的拳拳爱子之心和在天之灵得到极大的宽慰。父母百年之后合葬于波士顿，富兰克林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在墓前竖起了一块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乔赛亚·富兰克林

与其妻阿拜亚合葬于此。

二人相亲相爱五十五载，白头偕老。

他们没有可继产业和收益丰厚的职业，

仰赖上苍恩泽

艰辛劳作，诚实勤奋，

供养全家，安居乐业，

养育十三个儿女

和七个孙子、孙女，

声誉卓著。

读者应从中受到启示，对事业孜孜以求，

坚信上帝。

先考诚挚持重，

先妣谨慎贤慧。

谨立此碑，作为儿辈对先人的纪念。

是的，儿子从父母身上没有得到什么钱财家产，可是得到的丰厚亲情却使他刻骨铭心，永世难忘，获得的精神财富则终生享用不尽。

返回费城的航程是十分顺利的，只是同行的朋友柯林斯给富兰克林带来不少麻烦。柯林斯是富兰克林孩提时代情趣相投的挚友，两人一直维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当年柯林斯是个非常出众的青年，博览群书，胸怀大志，洁身自好。但是，他由于陷入夫恋的痛苦而无法自拔，整天以酒浇愁，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富兰克林不愿意看到这个有才华的青年在醉生梦死之中葬送了锦绣前程，于是带着他同行去费城，希望在新的环境中能使他找回失去的理智和信心。四只大木箱和两大提包书籍是柯林斯的全部家当，全船的人都向书的主人投之以惊奇羡慕的眼光，只有老船长一个劲地抱怨书的分量太重。就是这些书，曾塑造出一个高尚纯粹的灵魂，而眼前的柯林斯却被酒精烧得神魂颠倒，一路上蛮不讲理，惹是生非，闹得全船人都不得安宁。他还聚众豪赌，输了钱就向富兰克林借，直到把富兰克林替哥哥的一位朋友保管的一笔款子挥霍殆尽才罢休。柯林斯的整个身心都被酒精腐蚀了，成了依附于富兰克林的一个可怜的寄生虫。后来，他悄悄地跟随他人去了巴巴多斯，没有带走一本书，因为这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就这样，富兰克林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自我毁灭的过程。这对于他无异于敲响了一次警钟，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人生在世，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骨气、毅力和理智，在逆境当中更不能失去这些宝贵的东西，否则只能自暴自弃，走向沉沦。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这次返乡和柯林斯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彻底告别了故乡亲友和过去的一切，一无所有、满怀希望地迈向一个崭新的

世界。这是一个魅力无穷、变幻莫测的大于世界，前程在他面前显得虚幻飘渺，扑朔迷离。人生之旅是那么漫长曲折，就如同攀登一片险峻的山脉，近处茂草迷离，藤蔓缠绕，远处险峰陡峙，重峦叠嶂，还有潜藏的猛兽，隐蔽的深渊，稍有不慎就会葬身虎口，或跌入谷底。攀登者需要拿出惊人的力量、胆略和毅力，也要调动他所有的机智、狡猾和凶猛。在这条通往希望的拼搏之路上，阻碍他前进的除了那些可见的障碍之外，还有种种不受个人控制的因素，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并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色彩。

然而，面对未来，富兰克林十分坦然，内心充满了自信、幻想，还有几分必胜的豪情，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年了。

富兰克林回到费城后立即拜见了基思总督，当得知老乔赛亚不同意资助儿子的事业后，总督先生并没有感到惊讶恼火，而是向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建议：建新印刷厂所需资金将由他本人全部提供，富兰克林只需写一份清单，详细列举建厂所需要的货物。当富兰克林写好这份清单时，基思总督又提出了一项新建议：由富兰克林亲自去伦敦挑选这批货物，同时在英国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总督向他许诺，亲笔写一封推荐信，由富兰克林携信去见他的伦敦友人，由他们帮助富兰克林具体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总督的建议犹如一股春风迎面扑来，使富兰克林感到十分欣慰，也重新唤起他独立创业的信心和热情。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酝酿，1724年秋天，富兰克林告别了费城的朋友和里德小姐，与好友拉尔夫一起来到纽卡斯尔，登上了“伦敦希望”号轮船，横渡大西洋，奔赴英国。



### 第三章山重水复

一个人的品德和性格不是由幸运与成功塑成的，而是由不幸和考验造就的；一个哲学家的成长不取决于顺利，而是由创伤所决定的，其前提条件当然是他需具备某些天赋的素质，首先是精神。

威廉·F·施拉姆

伦敦是无与伦比的日不落帝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中樯桅林立，万帆竞渡，从世界各地搜购来的原材料经由这里大批量地运进，经加工之后，又大批量地销往世界各地，使伦敦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中心。经商发财的精神渗透了整个英国社会，就连顽固保守的地主贵族也纷纷向工商业转移，而合股公司的兴起则把几乎所有的富人（包括宫廷大吏在内）都卷入到了商海之中。男人们挖空心思地营利挣钱，把大笔大笔的金钱投资于工商企业，而一些发财心切又别无长物的年轻女性则把道貌岸然的绅士们视为猎物，公开做起了美色与金钱的交易，于是卖淫成了一种收益不菲的“无烟工业”，伦敦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嫖娼卖淫之所。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中，金钱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正如英国著名作家笛福所说：“我走遍了全英国，发现人生的重要目的乃是‘赚钱’。”

这就是以宗教迫害为标志的黑暗时代刚刚结束之后的英国，年轻的印刷工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即将来到这个陌生母国。

富兰克林千里迢迢来伦敦也与赚钱谋生有关。他是一个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从父亲语重心长的教诲中，从哥哥詹姆斯粗狂暴戾的训斥中，从凯默老板刻薄尖酸的奸笑中，从里德太太轻蔑揶揄的眼神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金钱的分量。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的作用是什么东西也无法替代的。但是富兰克林始终坚守着一个信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曾不止一次地立誓：要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智慧乃至整个身心，来获取社会丰厚的酬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忍痛告别故土和热恋情人，漂洋过海来到旧大陆的主要原因。

使富兰克林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已被铜臭污染了的时代，他的伦敦之行得到了基思总督慷慨大度的支持，仁慈的总督先生还许诺为他写一封推荐信，以促成他此行的使命。遗憾的是，直到富兰克林登上轮船，也未见致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但据总督的秘书说，这封信已经先期送到船上了。而船长则告诉他，所有的信件都装在一个袋子里面，一时无法取出，但他答应，一定在到达英国之前把信件找出来。

就这样，富兰克林和那位一心要作一名大诗人的好友詹姆斯·拉尔夫踏上了远去英国的航程。鉴于他们是总督先生的好友，所以被船长请进了头等舱。坐在铺着厚厚毛毯和洁净床单的舒适的铺位上，踌躇满志的富兰克林与拉尔夫敞开心扉畅谈未来，构想着理想中的美好前景。同行的人们都对两位青年的远大志向深感叹服，大加赞赏。只有老于世故的教友会商人托马斯·德纳姆先生不以为然，时常为他们高涨的激情泼一点冷水，并指出他们并不了解基思总督的为人，令大家都十分扫兴。

德纳姆先生的话虽不中听，却句句中肯。圣诞节的前一天，他们到达了伦敦，这时才发现总督并没有给他写什么信件。迷茫之余，还是德纳姆先生

点明了事情的真相，并使他们若有所思：“我们尊敬的国王陛下不是允诺赐福于他所有的臣民吗？可是还有几十万茅舍村民和无业游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全能的上帝不是保佑着他忠实的信徒吗？又有多少虔诚的教徒穷困潦倒，死于非命。基思是只浅薄的鸚鵡，他想讨好每一个人，但又没有什么可以给人的东西，只好给人一个希望。”

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希望——一个美丽动人而又虚幻的泡沫！

从饱经风霜的德纳姆先生那里，富兰克林终于弄懂了总督的为人和江湖的险恶，也体会到了父亲在这件事上的远见和一片苦心。他只有18岁，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幻想、善良、忠诚和正直。而今在异地他乡，他深深地领教了什么叫虚伪、奸诈、愚弄和欺骗。伦敦之行的全部热情和梦想随着基思谎言的拆穿而付之东流了，人海茫茫，山重水复，富兰克林的心头只剩下懊恼与悔恨。

德纳姆老人充满同情地宽慰了这个沮丧透顶的年轻人，鼓励他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并给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联系地址。倒是同行的拉尔夫很镇静。他对基思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也不抱希望，所以对事情的结局并不感到意外和失望。在一个简陋僻静的旅馆里，富兰克林度过了一个没有圣诞树和蜡烛的漫长的圣诞之夜。比富兰克林大10岁的拉尔夫所钟情的是文学艺术，认为自己是天生的诗人，坚信自己在伦敦的艺术天地里能够施展才华，大显身手，所以狠心撇下了年轻的妻子和才出世三个月的女儿，来英国闯荡。诗人的气质就是与众不同，拉尔夫用诗一般火热的语言温暖了富兰克林的心，并重新唤醒了他的建功立业的激情。两个年轻人决心白手起家，努力拼搏，用智慧和汗水在这座世间最繁华的城市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一周之后，富兰克林在巴塞洛繆道口的帕尔默印刷厂找到了工作，这是当地一家很有名气的印刷厂，生意兴隆，再加上富兰克林技术好，干活卖力，收入是比较高的。而拉尔夫则由于没有专门的技术而又眼高手低、过于挑剔，始终未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依靠富兰克林的那份工资，这对患难兄弟总算在伦敦站住了脚。

汉诺威王朝统治的巩固，使英国进入了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富庶的时期，一个学术文化昌明进步的时期。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的那句寓意深刻的格言“让熟睡的狗去睡吧！”（原文为“Let Sleeping dogs lie！”意为不要惹是生非），已为人们所领会。他推行的休养生息、宽舒和平政策，博得了王室的信赖和下院的支持，也受到了臣民的拥护，虽然他也时常使用贿赂拉拢等政客手腕，但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太介意。这是一个重视智力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约翰·洛克大胆提出并论证了理性是人自身的产物，以实例的观察和推理的法则能够探测自然界的奥秘；艾萨克·牛顿以数学的例证推导出宇宙运行的公式，使人们对理智的力量和自然界的秩序有了极为深刻的再认识；丹尼尔·笛福发展并超越了前人流浪汉小说的传统，无情地揭露、剖析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亚历山大·波普则在诗的韵律、用词和诗的理性的超然物外的境界中尽情遨游，发现了若干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准则。18世纪初的英国文化拥有无限的活力和创造性，她涉及的领域极为广阔，充满了理性和批判精神。文字笔墨似乎从未发生过如此巨大深远的威力。伦敦人对政治、文化、社会诸问题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使得来自北美的富兰克林禁不住拍案叫绝，兴奋不已。

置身于这浓郁的文化氛围里，富兰克林很快就从极度失意懊悔之中解脱

了出来。对知识的追求和新生活的向往大大淡化了对生活前景的忧虑，甚至淡化了对亲人故土的思念，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活的激流之中。

与科学文化事业的昌盛相适应，这一时期伦敦的印刷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帕尔默印刷厂拥有当时第一流的生产设备，还有 50 多名技术熟练的工人，生意做得十分红火。富兰克林很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他认真钻研，细心琢磨，很快就掌握了这里的每一道生产工序和技术，对那些先进的生产设备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久，他勤奋负责的敬业精神和精湛的操作技术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老板常常把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任务交给他去做，而他每次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周工资额就从 40 先令增加到了 60 先令，而且还能时常得到加班费和老板的额外赏赐，这是一般工人所望尘莫及的。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富兰克林处事十分谨慎，待人很谦和，并继续保持着节俭朴实、起居规律等生活习惯，一日三餐总是粗茶淡饭，一杯牛奶，一块面包，一方薄饼是他常吃的主食，最多再加一点乳酪、牛肉以及蔬菜水果；省下的钱不仅要购买书籍，而且还要供养好友拉尔夫。富兰克林清教徒式的生活与周围那些酗酒成性的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的感化和说服下，不少伙计也改掉了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不仅节省了不少钱财，还避免酒后闹事造成的种种麻烦。厂里的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富兰克林为“喝水的美洲人”。

在旁人看来，“喝水的美洲人”白天工作，晚间读书学习，像只幸福鸟一样欢乐地生活在伦敦，没有忧愁，也没有烦恼。但事实并非如此，麻烦和忧虑也时常向他袭来，特别是当他回想起临行前向德伯拉·里德家求婚那尴尬的一幕时，富兰克林的心像灌了铅水似地沉重……

在得到总督的慷慨许诺之后，富兰克林感到十分激动，他甚至认为事业的成功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处在亢奋状态的他自然联想到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富兰克林与里德小姐虽然早已处于热恋之中，但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家里，他们只能偶尔暗送秋波，只有在晚间相约来到小树林里，他们才敢携手漫游，相依相偎。每当小伙子感情冲动地拥抱并提出结婚的请求时，姑娘虽十分顺从，但她的答复却总是一句话：“这要经过我母亲的批准。”虽然爱情之火越燃越旺，然而富兰克林却始终鼓不起勇气向里德太太当面提出这一要求，因为他很清楚，凭着自己目前的地位和财产，过早地采取行动只能是自讨无趣。

那时的北美仍然沿袭着英国的古风：婚姻大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之命，而家长们则要依据家世、财产、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的条件考虑子女的婚姻取向，讲究门当户对。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婚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的生存与荣辱、兴盛与衰败，而父母一旦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年轻一代纯朴美好的爱情便成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受害者和牺牲品。由于新教运动的冲击，宽容精神开始在社会中滋生蔓延，人们开始注意并张扬心境中纯真美好的自然感情，买卖式的婚姻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这种变化是极为缓慢而不平衡的。年事已高的里德太太虽然曾经跟着丈夫见过一些世面，但并没有开化到让女儿自由恋爱择偶的程度。她固执地坚守着只有供吃穿享用的财产才是幸福生活可靠的保障这一清教徒的信条，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一个家境殷实、诚信可靠的有产者，以

保岁岁平安，免除饥寒劳顿之苦。

8月的炎热为山青水秀的费城平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红脖子的知更鸟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欢唱，蝉儿则直着嗓门在灼热的阳光下拼命地鼓噪。难耐的酷夏无情地剥去了人们用理智和信条精心编织起来的层层外衣，把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能的部分又还原于人本身。富兰克林原本比较清醒的头脑也被夏日的高温燥热搅乱了。伦敦之行肯定是改变命运的好事，但与心爱的姑娘久别却令人难以忍受，如果能在临行前与心上人结下百年之好，用合法的婚姻作为永恒之爱的可靠保证，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富兰克林按捺不住涌动于全身的激情，终于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黄昏走进姑娘的家门去求婚。打量着眼前这位踟躇不安的年轻人，里德太太仔细地权衡着这桩婚姻的利弊得失。其实，老太太对这位房客的品质才貌都很中意，只是对他的经济能力和前途感到心中无底。尽管富兰克林拍着胸脯向她保证，他从伦敦归来后将经营费城最大的印刷厂，但里德太太仍不忍心女儿嫁给一个前程未卜的工匠。她十分清楚：横渡大西洋在当时来说仍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旅行，开设工厂能否成功更是难以预料。于是，老太太以一种圆滑世故的答复一锤定音：你们都还年轻，等两年后再提婚姻大事也不迟。

富兰克林悻悻地走出了里德太太的家门。他知道，自己的结婚请求实际上遭到了拒绝。他感到气愤难忍，但又无可奈何。痛定思痛，他幡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对于他这样出身贫寒、手头拮据的工匠来说，要想获得美满的婚姻，其人生历程的轨迹就不能像通常人那样——安家立业，而必须是先立业，后安家，父亲就是这样劝诫他的。

基思的谎言使富兰克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孤身拼搏在异地他乡，前途渺茫，返家无期。虽说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但全部收入扣除了生活费和购书外便所剩无几了，开设工厂的计划成了天方夜谭，构筑爱巢的美梦也化为泡影，他为对里德太太夸下的海口而追悔莫及，甚至对临行前与里德小姐的海誓山盟而感到羞愧难当。他曾几次准备提笔写信，对心上人倾诉一个海外游子的苦衷和绵绵的相思之情，但一想到里德太太那轻蔑猜疑的目光，他的笔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知道自己信件肯定会先经过里德太太的审查，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直到离开费城半年之后，他才给里德小姐发出了一封信，信中简单地报了平安，并告知不可能在近期返回。后来他认识到，这是自己犯下的一个致命的错误。

富兰克林对心上人情有独钟，向往过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论者，也不是一个目光短浅、意志薄弱的庸人。他热爱人生，热爱工作，并且有着更为广阔、更加充实的精神生活领域。

在伦敦这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世界性大都市里，富兰克林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就像在费城时那样，他的周围很快又聚集起一批喜欢读书和思考的伙伴。白天，他在工厂里勤奋工作，从不偷懒，夜晚便成了他刻苦攻读钻研的大好时光。为了能读到更多的书籍，他设法与隔壁的书店老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获准可以随时借走书架上的每一本书，读过之后再完璧归赵。面对浩瀚的书海——这些在北美不可能见到的精神食粮，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咀嚼着，有时简直就像狼吞虎咽，无论是政治、宗教、历史和文学作品，还是天文、地理或科技著作，他都喜欢浏览，并且一捧起书本就爱不释手，经常苦读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每当读到精彩绝妙之处，他常常会不知不觉地读出声来，津津有味，如醉如痴。面对一些一时弄不懂的难题，

他常常陷入长久的思索，试图解开迷津，追根求源。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还结识了一些学者、作家和社会名流，经常主动地与他们攀谈，探讨一些有意义的学术和社会热点问题。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他逐渐形成了思维敏捷、语言风趣幽默、举止优雅和善于交际等性格特征，他既能够与下层劳动者交朋友，也能出入大雅之堂，用经过润饰的高雅语言与社会上流人士频繁交往。亨利·彭斯顿博士曾答应带他去见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先生（富兰克林曾为此激动了好长一个时期），可惜未果。聊以自慰的是，他有幸见到了继牛顿之后出任皇家学会主席的汉斯·斯隆博士，并参观了博士家中收藏甚丰的奇物珍品。由于经常与饱学多才之士交往，富兰克林的学识德才、言谈举止和各方面的能力都有了迅速提高，同时，五彩缤纷的世界更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思维，摆在他面前的人生道路也变得更加宽广了。

富兰克林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了，他相信宇宙第一推动力的存在，笃信自然规律、宇宙秩序和科学的威力，推崇理性、善行和道德的力量。当他为威廉·沃拉斯顿的早期作品《自然宗教》一书排版时，对作者形而上学的论证方式和由此得出的关于自然宗教的结论未敢苟同，于是有感而发写出了《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一文。他以商榷探讨的口吻试图证明：世界上可能没有像天生的美德和邪恶这样的东西，推动人们行动的因素是避免痛苦和享受欢乐的愿望。他指出：

“在宇宙的秩序和安排中，这种痛苦和不安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假如它现在就从地球上消失，其结果是：所有动物的造物将以不安离去时的姿态纹丝不动，从此以后将不会有一个肢体、手指再活动了，我们将全部处于泥塑木雕状态。”

写到这里，他笔锋一转，又发表了一番宏论：“君主不会比奴隶更幸福，乞丐不会比富翁更悲惨。”所以不需要想象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到来，因为健康的乞丐比病夫国王更为快乐。文章还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发表了见解，以为辛勤劳动的人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果实分给那些寄生的懒人，这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很明显，他正在试图揭示这个社会的深刻弊端，虽然此时他的认识还很肤浅。

文章写完后，富兰克林自费付印了100份分送给友人，扉页上印有德莱顿的诗句：

存在即是正确，而半盲人  
只见部分锁链，最近一节；  
公平之秤高悬于天穹，  
他的双眼无法达到。

另外还有一个说明：“谨以此文献给我忠实的朋友拉尔夫。”

拉尔夫确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同命相连的患难之交。但随着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两人的关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感情奔放是诗人必备的素质，但如果发展到放荡不羁的程度则会产生人性的扭曲和变态。面对逆境，拉尔夫充满了信心和乐观精神，但在安逸之中却惰性十足，整天沉迷于幻想之中。他时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在精神享受和感官刺激中调节情绪，而一切开支都要由富兰克林提供。他发誓要找到能施展才华的职业，先后尝试过当演员、撰稿人、记者和编辑，但一事无成，只好在吟诗作赋之中悠闲度日。鉴于自己的经验，富兰克林力劝他改写散文，拉尔夫接受了这一劝告，却并未放弃当诗人的念头。此时，拉尔夫已经完全把费城的妻儿老小抛到脑后了，

隔壁那个举止活泼、谈吐风趣的女帽子商成了他追求的目标，由插科打诨，谈情说爱发展到同床共枕，在同居的欢乐中他写出了更多的诗篇，但一篇也未能发表。年轻的富兰克林为了朋友不惜肝脑涂地，把薪水的一半交给他使用，还为他保守美洲已有妻室的秘密，在拉尔夫去伯克郡当教师后，他又担负起了照料他的情人的重任，不仅为她支付生活费用，还要不时给以感情上的慰藉。有意无意之中，生命里难以驾驭的原始冲动促使他向女帽子商发出了求爱的信号，但遭到拒绝。拉尔夫得知后怒发冲冠，声称所欠富兰克林 27 镑债款一笔勾销，并把情人带走了。

富兰克林失去了拉尔夫的友谊，同时也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从此，他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更有意义了。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上去，正如他本人在《自传》中所描述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勤奋工作、读书、研究和交友，除此之外所费甚微。”就这样，富兰克林在伦敦整整生活了 18 个月，构成了他人生旅途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由于基思总督的谎言和他本人的幼稚轻信，富兰克林赴伦敦的本来目的完全落空了，他在这里也未能赚到大钱，但他的伦敦生活并不像某些传记作者说的那样是在“思念故土和碌碌无为”之中度过的。笔者认为，在富兰克林早年的成长历程中，伦敦之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突遭变故和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富兰克林没有自暴自弃，走向沉沦，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在工作中坚定地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逆境和挫折的严峻考验，从而懂得了更多的人生道理，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发扬了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充分利用伦敦良好的文化环境，努力钻研，苦读不辍。在这一过程中，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才干，提高了思维能力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能力，也结识了不少思想先进、学识渊博的友人。因此可以说，伦敦时期的生活磨炼在富兰克林的成长道路上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英国毕竟不是富兰克林的久留之地，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北美的沃土之中。随着时光一天一天流逝，他对伦敦的生活开始感到厌倦，思乡之情日益浓烈。就在这时，与他一起横渡大西洋的商人德纳姆找到了他，给他指出了一条返乡之路。德纳姆在美洲有一笔积蓄，他打算在费城开一家商店，只要富兰克林同意去做他的职员，他可以为他提供 10 英镑川资。虽然富兰克林对从熟悉的印刷业转到经营杂货颇感不快，但返家心切的他此时已别无选择了。于是二人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不久，德纳姆购进了一批货物，富兰克林便辞去了工作，收拾好书籍行囊，并给里德太太挑选了一些精美的礼品。1726 年 7 月 22 日下午，他们离开了伦敦，次日，他们从格雷夫森德起航了。

富兰克林一行乘坐的“伯克郡”号轮船在海面上顺风疾驶，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大海，海面风平浪静，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粼粼的波光。此时，富兰克林仿佛又回到了儿时，找回了对大海的那份留恋和痴迷，于是他成了这次航行中最活跃的一位旅客。他时而与德纳姆先生打牌聊天，时而与同伴面红耳赤地争论一些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时而又跳入碧蓝深邃的大海，在清冽的海水中尽情地嬉戏、畅游。此外，他还拿出很多时间观测天象和海潮的变化，并详细地记录了沿途所见到的风土人情和有趣的海洋生物。就在这次航行期间，富兰克林还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认真地制订了一份用来约束自己行动的计划，并打算把它贯彻于自己的一生。

这个计划的大致内容如下：

第一，生活要厉行节俭，特别是在付清所有的债务之前。

第二，在任何场合都力求讲实话，不要给人以不可能兑现的许诺，对人始终保持真诚和友善。

第三，勤勉地从事所承担的事务，打消任何突然发财致富的幻想，勤奋和毅力是达到丰衣足食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四，决不说别人的坏话，即使是实情也不说，对人要宽容大度，多讲别人的优点。

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计划了，浅显易懂，简明扼要。但谁能说其中不包含着某些深刻的含义和人生体验呢？或许这就是富兰克林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小结吧。

## 第四章立业成家

一种爱情如果轻易便能获取，无须克服许多内外障碍，可能会减少一些痛苦，但是，它却不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快乐。

玛丽·冯·吕布尔

在阔别了将近两年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第二故乡——费城。此时他已经年满 20 周岁了，身高 5 英尺 10 英寸，臂膀坚实，头颅硕大，浓浓密密的褐色长发覆盖着饱满的天庭，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透露出几分机敏、沉着和刚毅，衣着整洁朴实，举止稳健，给人一种既醇厚庄重又聪颖深邃的印象。

回到费城的当天，富兰克林就去探望心爱的姑娘德伯拉·里德。还是那条窄窄的街道，还是那扇熟悉亲切的大门，但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个冷酷残忍的事实：由于在苦苦等待之中只得到富兰克林归程无期的一封短信，目光短浅的亲戚们便把德伯拉·里德小姐嫁给了一位据说手艺很高的陶工罗杰斯。但婚后不久便发现，罗杰斯是个不务正业的无赖之徒，据说在外面早有妻室，德伯拉·里德同他没有共同语言，拒不使用他的姓氏，不久两人便分手了。后来罗杰斯负债潜逃，留给德伯拉的只有一笔债务和心酸痛苦的回忆。

事已至此还能说什么呢？虽然里德老太太痛哭流涕地抱怨自己害了亲生女儿。但富兰克林还是坦率地承认是自己的那封信造成了她们的不幸。他用最诚挚的语言宽慰受到生活煎熬的母女俩，然后把从伦敦带来的精美茶具放在桌上，便悄然离去了。

富兰克林不知不觉又来到路边那条小河旁，站在那块熟悉的大青石上。他依稀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句话——人不能两次涉足于同一条河，他不禁抚胸长叹：人难道连爱河也不能重涉吗？

在刚回到费城的一段时间里，富兰克林一直在为新的工作而忙忙碌碌。他跟着德纳姆先生在水街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从寻找店址，进行室内外装修，到上货、开张，几乎全部是自己动手，忙里忙外，一天到晚不得偷闲。但是，富兰克林的心却在悄悄地滴血，事业未果，爱情又受挫，这出乎意料的变故简直令他无法接受。幸亏德纳姆先生待他如同亲儿子一般疼爱，不仅手把手地教他如何进货、定价、记帐和销售，还给予他充满舐犊深情般的人生教诲，才把他从感情的泥沼中解脱了出来。很快，他对杂货的经营业务就很在行了，虽然他对这个行当并不怎么感兴趣。

此时，基思先生已经从总督降为普通平民了，每当两人在大街上不期而遇时，基思总是装作视而不见，以此掩饰内心的空虚不安。对于基思先生的没落，富兰克林并没有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反而对他的故作镇定之态产生出一种怜悯；在富兰克林看来，上天已经对他的行为进行惩罚了（在良心和官阶上）。

往日的恩恩怨怨已成为过眼云烟，而未来的前程却仍在茫茫雾霭之中。此时，思乡之情又升起在他的心头，他十分惦念远方年迈的父母，可又无颜去见江东父老。在他 21 周岁生日到来之际，他那年仅 15 岁的小妹妹简已快要出嫁了，而且听说她已出落成亭亭玉立、妩媚动人的大姑娘。于是，他送去了一架子纺车作为妹妹的新婚贺礼，并以历经磨难的长者的口吻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自己关于道德问题的见解，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妹



妹，请记住：端庄稳重能使最不好看的贞女变得柔美动人，而缺了它，是会使最完美漂亮的女人变得妖艳可憎。当女子最鲜明的美德反映在同一女子的体态和心灵的其他优点上时，它使那女子比天使更可爱。请原谅我的直率和放肆。”

杂货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起来，但是另一场灾难降临了：老板与雇员突然双双病倒。富兰克林得了急性胸膜炎，整个胸部撕裂般地疼痛，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他几乎停止了思维，任凭病魔肆虐而毫无反抗，似乎在等候上帝的召唤。后来病情好转了，他反而感到有些失望，其原因如同他在《自传》中写道：“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令我遗憾的是我迟早还要重新去干那种不愉快的工作。”德纳姆先生得的不知是什么病，高热不退，浑身疼痛难忍，缠绵病榻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老人立下遗嘱：将遗产中的一部分赠给了忠诚谦和的伙伴富兰克林，并免去了他所欠的债务。慈祥的老人无牵无挂地走了，商店又换了主人，于是，孑然一身的富兰克林又回到了他的老主人凯默先生那里，重操旧业。

在弱者眼中，不幸是可怕的灾难和不可逾越的深渊，但对于强者和天才来说，却往往是无价之宝和再一次冲击的巨大动力。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失恋、失业的打击和死亡的威胁之后，富兰克林变得愈益成熟起来。尽管要走的路仍十分漫长坎坷，成功的喜悦似乎总是与他无缘，但是，他克服困难、不断进取的能力和勇气却与日俱增，性格和毅力也变得更加坚韧顽强，而所有这些正是他在逆境中获得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成为他日后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素质。

费城与伦敦相比的确十分落后，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起步晚和资金不足，最重要的还是英国政府推行的殖民地政策所致。殖民统治者为了保证英伦三岛制造业和商业贸易的高额利润，千方百计限制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17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许多限制北美工商业的措施，例如：禁止北美与别的国家直接通商、限制北美工业的发展，迫使殖民地购买英国的工业品，等等，以便使北美永远是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些歧视性经济政策给北美经济的发展繁荣带来了巨大压力。

此时，富兰克林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尚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是为费城印刷业的不景气而忧心忡忡。几年过去了，城内原有的两家印刷厂不仅没有任何改进，经营状况反而更加糟糕，设备和技术也日益老化落后。在英王委任的总督的严密控制下，每年只有少得可怜的印刷品问世。倒是两位印刷厂主变化颇大：布雷德福的印刷所日益衰败，人也变得更庸俗了；凯默的情况稍稍好些，但却因此更加傲慢粗鲁。俩人同样都很器重打算重操旧业的富兰克林，富兰克林选择了后者仅仅是由于凯默出了更高的价钱。但他很快就发现：凯默实际是指望他来扭转已陷入窘境的生产局面，并训练他手下那批工资低廉的新工人。

士别三日，本当刮目相看，但两年过去了，凯默在对印刷业的工艺技术和经营方面却丝毫没有长进，印刷所的管理工作混乱不堪，工人们技术粗糙，产品的质量相当差。富兰克林并不在意凯默雇用他有何意图，他只知道凭良心干活挣钱是人的本份，因此工作相当努力，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每一个工人，很快就使他们成了各道工序上的熟练技工，他也自然而然成了工人们的好伙伴和领头人。富兰克林还经常过问印刷所的货源和销售问题，使厂里的活计多了起来，机器保持了正常运转，生产秩序也显得井井有

条。

富兰克林对凯默的最大贡献是他为凯默完成了新泽西纸币的印刷业务。印刷纸币需要雕刻图版以及各种复杂的字体和花纹。当地没有人能干得了这个技术要求很高的活计，为此富兰克林颇下了一番苦功，圆满完成了制版工作，还为此专门设计了一部铜版印刷机（在当地属于首创）。这宗业务完成后，凯默赚了一大笔钱。这一时期，富兰克林的业余生活仍然是十分忙碌充实的，读书学习之余，常与一些好学上进、关心政治的青年在一起研究学术，议论时局。1727年秋天，他们组织了一个名叫“共读会”的小团体，经常聚集在一起读书写作，互相切磋，共同研究政治、社会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富兰克林学识渊博，阅历丰富，人品又很高尚，从而成了这个团体的核心人物。

由于富兰克林德才兼备，富有感人的人格魅力，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与尊重，无论在印刷所里还是在“共读会”中，他都像磁石一样牢牢地把周围的人吸引在他的身旁。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商人们前来洽谈业务，往往并不介意凯默的存在，而是愿意直接同富兰克林打交道；印刷所的工人也大都成了富兰克林的崇拜者，他们对凯默敬而远之，整天围着富兰克林转；就连一些当地政要也常常光顾这家小小的印刷所，邀请富兰克林先生去他们家中作客。日子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凯默的心理逐渐失去了平衡，他为主仆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而大伤脑筋。随着印刷所生意开始好转，生产秩序日益走上正轨，在凯默眼中，富兰克林已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决定找机会赶走这个讨厌鬼。

一天，楼下院子外面有人在大声争吵，富兰克林闻声向窗外观望了一会儿，凯默发现后立即破口大骂，口口声声地说：“我的印刷所里决不养活这种好吃懒做爱管闲事的人！”富兰克林心中明白，凯默是在借题发挥，准备过河拆桥了。于是，他当众对凯默的小人行径进行了尖厉的指责，然后毅然离开了这个印刷所。其实，富兰克林的这一举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在多年的打工生活中，他已经品尝了人生的种种苦果，深切体验到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和漂泊不定，他早就希望摆脱掉这种羁绊，独立地经营自己的印刷所，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营造出一种崭新的、幸福充实的生活方式。

1728年的阳春三月，费城有史以来的第三家印刷所开张了，主人是休·梅雷迪斯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梅雷迪斯原先也是凯默印刷所的工人，来自不列颠岛南威尔士的一个农民家庭，朴实正直，粗通文墨，唯一的毛病是嗜酒如命。在凯默手下工作期间，他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巨大影响，不仅戒了酒。而且成了共读会中的骨干分子，好学上进，锐意进取，使前来费城探望儿子的老父亲感到震惊。老梅雷迪斯认定了儿子只有跟着富兰克林才会有出息，因此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200英镑），让儿子与富兰克林合伙开办印刷厂，儿子拥有全部股份之中的100英镑，另外一半记在富兰克林名下，先以借贷的形式替富兰克林垫上，富兰克林应在两年之内还清，以后印刷厂由富兰克林全权掌管，利润五五分成。

两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市场街南面租了一幢楼房，年租金24英镑。这幢房子不仅使用面积大，而且离德伯拉家很近，站在楼上就能清楚地看到那扇熟悉的房门。刚开张的印刷所，用不了这么多房间，于是他们便把其中的一

半租给了玻璃商托马斯·戈弗雷。戈弗雷先生是共读会的成员，为人精明，博学多闻，尤其喜欢数学。戈弗雷太太是个勤快而又多嘴的胖女人，与二房东相处很好，并负责为在楼里工作的人们提供膳食。

新店铺刚开张便迎来了一个顾客——一位初次进城的农民。这位农民是由一个热心的共读会成员布赖恩特纳尔介绍来的，他付给了富兰克林5个先令，抱着一摞印刷清晰、装订精致的帐本心满意足地离去了。直到50年之后，富兰克林还清楚地记得他创业生涯中的这第一笔收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个乡下人的5先令给予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获得的任何一枚硬币，因为它是我的第一笔收益，而且来得如此及时。”

办印刷所的本钱是老梅雷迪斯多年的积蓄，但这些货币在他家里只能压在箱底，以备不时之需，绝不会增值；印刷技术和经营谋略是富兰克林经多年辛苦实践所得，但当他受雇于人之时，这些无形的财富并未给他本人带来过多少实惠。如今，货币与生产经营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金钱变成了资本，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解放，生产技术和经营谋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这些便为富兰克林在印刷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大展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富兰克林从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他十分喜爱的印刷业，经过了整整10年的艰苦磨练才终于从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触景生情，他不禁回想起了在波士顿买到的那只令人沮丧的哨子，在纽约看到的一双双冷漠空虚的眼睛，以及在费城所遭遇的一次次挫折。至此，这一切都变成了过去，富兰克林不再是为金钱所驱使的奴隶，他已经成为自由地支配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

命运似乎已经注定富兰克林会在费城印刷业的残酷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经过多年的磨练和艰苦努力，他已经具备了多方面的能力和才干，不仅是一个精通印刷业务的技工，而且还是个经营有方的商人，善于交际的活动家和文笔流畅优美的作家。自从开办了自己的印刷所以来，他就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班，一直工作到深夜，安排好第二天的业务才去休息。他陆续添置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根据实际需要自己设计制造了一些设备，其性能和质量一点都不比他在伦敦印刷厂里看到的那些设备差。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他的印刷所的管理水平即使在英国也算得上是一流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先进的设备和管理方式逐渐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富兰克林以高超的技术，公平的价格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并以优质、守时的服务承揽到了大宗政府公文的印刷业务，而他的主要竞争者——凯默和布雷德福的生意则日益冷落下来，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富兰克林简直干得太出色了，同行中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精明的人，以至于他的出资人和合作者梅雷迪斯日益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

酒是一种通过刺激神经改变人的情绪和知觉的液体，在社交场合适度地喝一点，可以使人产生轻松兴奋的感觉，增加快乐的气氛。但是如果毫无节制地狂饮或借酒浇愁，则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使人丧失理智和事业心，因此酗酒常被人视为走向堕落的标志。富兰克林对酗酒向来深恶痛绝，当年在波士顿时就曾用“多古德夫人”的笔名对贪杯者进行过无情的指责，在伦敦时他以“喝水的美洲人”的形象教育了那些以啤酒当饭的工友们。但是，他未能使少年挚友柯林斯恢复清醒的理智，也没能使现在的合伙人真正地摆脱酒的困扰。梅雷迪斯是个好人，确切地说是个好农民，他向往的是广阔的田野，肥壮的牛羊和炊烟袅袅、充满天伦之乐的农舍。是老爹撵着他到城里来的，

30岁出头了仍是一个一无所长的光棍汉，对印刷技术始终是似懂非懂，时作生意更是一窍不通。由于富兰克林在业务上包揽了一切，高枕无忧的他对印刷所逐渐失去了兴趣，重新拿起了酒瓶。对此，富兰克林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但梅雷迪斯已经听不进去了，他所关心的只是向富兰克林索取利润中属于他的那一部分，然后把钱全部带到酒馆去，沉湎于狂饮、豪赌和嫖娼狎妓之中，很快就欠下了一堆债务。向一个不明事理的醉汉讲做人的道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无奈之中富兰克林不得不向梅雷迪斯摊牌了。经协商决定，富兰克林一次性退还梅雷迪斯的股金，还替他偿还了欠酒店、高利贷者的70多镑债务，同时送给他30镑购买土地的本钱和一副新马鞍。富兰克林在共读会朋友的赞助下凑齐了这笔巨款。1730年7月14日，梅雷迪斯骑马奔向北卡罗来纳辽阔的原野，圆了快活的农民梦。就这样，富兰克林名正言顺地成了印刷厂的独立经营者，他的事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个身心健全的人，不仅受理智和意志的控制，同时也会拥有热情与冲动。那些道貌岸然的修道士们喋喋不休地诅咒情感，把它斥为万恶之源，似乎忘记了情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必然产物，缺乏感情会使人平庸，而情感衰退则会使任何一个天才黯然失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强烈的情感是一种幸福，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建立起一种适当的和谐。

青年富兰克林就是一个理智与情感和谐的人。他专心致力于开创自己的事业，兴趣高雅，心胸开阔，同时也在热切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向往美满的婚姻。可能是由于工作太忙，他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女性，他的巨大魅力几乎完全淹没在印刷所和共读会的男人圈子里了。也可能是初恋留下的印象太深，他经常不由自主地走进那扇熟悉的大门，去探望并慷慨地接济那对患难母女。他曾一遍遍告诫自己德伯拉是自己的妹妹，但不知不觉之中仍把她看作情人。热情的戈弗雷太太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二房东，特意叫侄女来这里玩，并安排他们俩在一起吃饭、聊天，希望有朝一日富兰克林能成为自己的侄女女婿。这是一个苗条活泼的纯情少女，富兰克林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但绝不是当年对里德小姐的那种无法遏制的爱慕之情。在戈弗雷太太的精心策划下，富兰克林终于向姑娘家求婚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二次求婚，不是用鲜花，而是以讨价还价的口吻提出要求得100英镑的陪嫁，以帮助他付清印刷所所欠的债务。富兰克林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姑娘家人的反感，也使戈弗雷太太感到很恼火，一怒之下，阖家搬出了这幢楼房，那位姑娘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就这样，富兰克林的第二次恋爱以闪电般的速度结束了，他的感情生活出现了一片空白，迷茫之中时常感到百无聊赖，年轻人强烈的情欲便随之勃然亢奋。这一时期，他曾与几个沦落风尘的女子有过一夜风流（他在伦敦时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图一时的欢愉，释放一下体内无法控制的过剩能量。好在他还没有糊涂到把性欲与爱情混淆起来的程度，事过之后他常常扪心自问，谴责自己违背了自定道德规范的第12条款，并决心痛改前非。

戈弗雷一家搬走了，原先那些堆得满满当当的铺面和居室一下子成了空荡荡的仓库，往日热气腾腾、饭菜飘香的厨房也变得冷冷清清。但是，富兰克林已经不再需要与他人同住了，他不仅创立起了自己的产业，也想尽早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温馨的家。

18世纪的人在婚姻问题是讲求实际的，一般首先要考虑物质生活上的需要，主要包括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单纯从爱情角度决定婚姻大事的情况

并不多见。富兰克林在初恋受挫之后也变得现实多了，他希望把自己的婚姻建筑在有助于事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但在当时，印刷业并不是一个容易生财的行当，尤其是在文化不够昌盛的费城，从事这一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有钱人家是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前途莫测的印刷业主的，况且富兰克林还拖欠着二些债务。但是，心气极高的富兰克林决不甘心在婚姻问题上草率行事，屈尊俯就。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读书、交友等繁忙的事务之中，试图以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忘掉初恋情人，可这一切努力都没能奏效，那一袭长裙，绰约的风姿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时常在他眼前晃动，化作缕缕情丝日夜缠绕着他，剪不断，理还乱。富兰克林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爱情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

在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之后，富兰克林终于下定了决心，勇敢地走向了那扇熟悉的大门，再一次向德伯拉提出了结婚的请求。

1730年9月1日，这对苦恋了六年之久的有情人终于结为眷属。历史上不乏巧合之事：美国开国三杰华盛顿、杰斐逊以及本书的主人公富兰克林娶的都是再婚女子。所不同的是，前两位伟人的妻子都是已经丧夫且非常富有的寡妇，而富兰克林所娶的则是一位其合法丈夫也许还健在又没有办理离婚手续的平民女子。但是，这一结合却是和谐美满的，富兰克林才华横溢，博学多闻，具有强烈的创业精神和进取心，并且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远大的志向，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材。而德伯拉则品貌端庄，头脑清醒，办事细致认真，善于持家理财，是富兰克林的好帮手和贤内助。这一婚姻持续了几十年，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的考验而从未出现过裂痕。

## 第五章和衷共济

人们应该认识到：生命中存在着一股清泉，从中涌出了所有的美德和仁慈，它也许就像古老的传说中能使人青春长驻的甘露一样。

埃利诺·罗斯福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而富兰克林却拥有一个比海洋、天空更为广博宽阔的胸怀。

为了生存，他单枪匹马独闯世界，殚精竭虑，惨淡经营，在经受了许许多多磨难之后，终于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或许是从祖辈那里继承了正直善良、悲天悯人等秉性；或许是由于他自小闯荡江湖，目睹并亲身体会了世间的人情百态和沧桑变化，并善于开动脑筋，进行认真思考；因此，他对于社会问题一向十分敏感，具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更难能可贵的是，身处生活的重压之下，他并没有因忙于生计而自甘沉沦。在艰苦的自学生涯中，他获得了巨大的乐趣，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并运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去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在为自己谋出路的同时，富兰克林也投入到了为公众谋福利的不朽事业中去了，从中他必将获得更大的幸福和永恒的声誉，这当然是以后的事情。眼前这位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既无巨大的声望又无显赫的权势，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德才学识和组织能力，率领一批热血青年，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攀登之路上奋发向上，孜孜以求。

前面已提到，在 1727 年那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还在为凯默工作的富兰克林创建了一个叫做“共读会”的组织。加入这一组织的早期成员都是富兰克林的好友，其中有：为人诚恳，喜欢读书的农家子弟休·梅雷迪斯；公证所契约誊写员，温和善良的中年诗人约瑟夫·布赖恩特纳尔；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哈德里象限仪的发明者、玻璃匠托马斯·戈弗雷等。共读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会员读书学习，切磋交流，共同研究探讨社会、自然等方面的问题。富兰克林为共读会制定了组织章程，这个章程显然参照了波士顿的科顿·马瑟创立的邻里互济会的体制，只是比其更为科学完善，它使共读会充满生机地维持了 30 年之久。共读会是全美洲第一所最好的研究哲学、道德和政治的业余学校，而且又是在教友会等宗教组织之外自发形成的互助互利、同舟共济的群众性世俗团体，从创建之日起，富兰克林就成了该组织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为了实现共读会的宗旨，必须保持该团体在组织上的纯洁性和学术活动上的严肃性。为此，富兰克林对加入共读会的人员总数作了严格规定，并对每次活动的内容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安排。同时还规定，新成员入会时还要举行一个颇为庄严的仪式，宣誓热爱众生，追求真理。富兰克林还提出了 20 多个有关人道、伦理、生活和社会的问题供会员们进行研究探讨，以期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剔除谬误，发现真理。他提出的主要问题大致如下：

1. 在最近阅读的作品中，你是否碰到了有关作者的值得或适于传达给共读会的知识，尤其是有关历史、道德、伦理、诗歌、医学、游记和手工艺等方面的？
2. 你是否听说最近有人在事业中失败了，其原因是什么？
3. 你是否听说谁近来生意兴隆，他采取了什么方法？
4. 你近来是否看到或听说由于酗酒、鲁莽、暴躁、不道德和愚蠢行为造成的不幸后

果？

5. 你是否有由于节制、谨慎、温和或其它美德产生的令人高兴的结局？
6. 你知道近来有哪些年轻新手自立门户了吗？共读会通过什么方式鼓励了他？
7. 近来是否有人低毁你的名誉？为了维护你的名誉共读会能做些什么？
8. 你和你的伙伴近来是否患病或负伤？使用什么药物进行治疗，效果如何？
9. 你希望得到某人的友谊吗？共读会或某一成员能否为你介绍？
10. 你近来是否听说哪位成员的品格受到诋毁，你是如何为之辩护的？
11. 共读会或其成员能以何种方式对你体面的计划有所帮助？

.....

每周星期五的晚上是共读会规定的聚会日。每到这时，一伙儿富有才华、意气风发而又明达事理的小人物便围坐在一起，时而洗耳恭听，潜心思索，时而热烈争论，各抒己见，体现出一股好学上进的精神和蓬勃的朝气。聚会地点最初选在一个小酒店里，后来又改在罗伯特·戈雷斯先生的书房中。聚会大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按照共读会章程：“每个人围绕道德、政治或自然科学中的观点，依次提出一个或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每三个月写一篇文章，当众宣读，题目自选；争论须在一位主席的指导下进行；开展辩论的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出于争论的癖好，或争强好胜的心理；为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一切专断的陈述和针锋相对的争议都被禁止，违反者被课以一笔小小的罚金。”这些规定大部被自觉地遵守了。他们举办的聚会场面常常十分热烈精彩，而且形式也时常更新，妙趣横生。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的日子里，他们时常把活动地点转移到户外，或者在隐秘幽深、枝叶扶疏的林荫深处，或者在清澈见底、潺潺流动的小河旁。有时还独出心裁，举行远足、野餐或篝火晚会。与此相得益彰的是，他们讨论的内容也丰富而深刻，不仅具有大胆的创新精神，而且包罗万象，发人深思，其中许多问题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宾夕法尼亚发行纸币的问题上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当时，宾夕法尼亚流通的纸币总共才有两万多镑，纸币奇缺成了阻碍商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要求多印纸币的呼声。但由于担心多印纸币会导致货币贬值，这一要求遭到了有钱人的强烈反对，共读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适度地发行纸币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久，富兰克林撰写的题名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书的问世了。他在书中引证了1723年宾夕法尼亚发行纸币推动了商业兴起这一实例，有力地支持了增印纸币的主张。同时，他还对交换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必须撇开贵金属，寻找另外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既然贸易就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量是最正确的。”他还认为：宾夕法尼亚虽然没有众多的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保证金，但它拥有巨大的土地资源，“正如以贵金属作保证金发行的票据是货币一样，以土地作保证金发行的票据实际上就是土地的货币化”。这样，富兰克林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阐明了被经济学家们弄得玄之又玄的经济学原理，不仅说服当局最终做出发行纸币的决定，并且把印制纸币的业务也托付给他，他的印刷所因此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共读会的这一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从而声名大振，富兰克林也因此在学习领域崭露头角。他的真知的见不仅受到

同时代专家们的重视，也得到 19 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高度赞赏，马克思曾经说道，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富兰克林的卓越才干和组织能力是共读会得以生存发展的巨大凝聚力，而共读会别开生面、卓有成效的活动则赋予富兰克林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对人生和社会等诸方面的问题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生活也变得更加有意义了。在共读活动中，会员们交流了思想，传播了友谊，增长了才干。知识的清泉从每个人的生命中汨汨流出，奔腾着汇入浩瀚无垠的海洋。随着共读会知名度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入这一组织。为了保证共读活动健康发展下去，富兰克林主张其成员仍控制在 12 名之内，但每个会员可以组织分会进行活动，以便使更多的年轻人得到提高，并更广泛地了解民意。这样，共读会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扩展了，它成了启迪人们心智的钥匙，培养优秀人才的学校，同时也是各界人士议论政治、针砭时弊的公共场所。

共读会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富兰克林也成了宾夕法尼亚小有名气的人物。但偏偏就在这时，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1731 年冬春之交，一个男婴在富兰克林家中出生了，取名为威廉·富兰克林（爱称威尔）。此时富兰克林与德伯拉结婚才刚刚半年，种种流言当然会沸沸扬扬，不胫而走。“鼓满风帆的船和隆起肚子的孕妇是人间公认最美的两样东西”，这是日后富兰克林借自己著作中主人公之口说出的一句精彩的格言。但是，为什么在孩子出生前竟没有一人有幸目睹德伯拉身怀六甲的风采呢？威廉生于几月几日？其生母是不是德伯拉？孩子出生后为什么没有去教堂接受洗礼？这件事当属富兰克林最清楚，可他为什么却对此守口如瓶呢？

外面风雨满城，家中却异常平静。小生命的降临为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喜庆祥和的气氛。德伯拉（现在叫德伯拉·富兰克林）在经管新开张的文具店的同时，十分精心地照料着小威尔，尽心尽责地履行了一个母亲的全部职责。里德老太太干脆把制作药剂的工作台搬到了威尔的小床前，以便能随时照管这个精力充沛的小调皮蛋。富兰克林更是对儿子舐犊情深，工作再忙，他也要抽出时间与儿子多呆上一会儿，或者为儿子制作一两件小玩具，或者教儿子咿呀学语，体验一下初为人父的滋味，无论听到什么样的传言，他始终不置一词，我行我素。

关于小威廉的真实身世早已无据可考了，当代人对此事大致有两种推测：其一，在与德伯拉结婚之前，富兰克林曾与一位名叫芭芭拉的妙龄女子有染，并珠胎暗结。为了自己终身的福祉，也是考虑到丈夫的前程，德伯拉理智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并承担起了作母亲的义务。其二，富兰克林与德伯拉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同居了，孩子确系德伯拉所孕。但由于担心未办理离婚手续的前夫罗杰斯突然出现会使德伯拉背上淫妇和重婚双重罪名，因此他们有意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让孩子以私生子的身份出现，以便从法理上大大减轻可能出现的对德伯拉的指控。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推测，富兰克林在这件事上似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既然太阳本身也有黑点，世俗生活中出现某些阴暗面就在所难免了。好在通过这次理智的婚姻选择，富兰克林身上的那些无理性的冲动开始平息下来。小威廉在爱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了，富兰克林家中温馨甜蜜的生活气



氛也日渐浓烈。翌年 10 月 20 日，次子弗朗西斯·福尔杰·富兰克林降生，一周后，富兰克林夫妇把活泼可爱的小家伙抱到圣公会基督教堂接受了洗礼。至此，围绕小威廉身世之谜出现的流言蜚语早已烟消云散，富兰克林夫妇的婚姻基础在和谐美满的生活中已完全确立起来。德伯拉永远甩掉了灰色的直筒围裙，穿起了与邻家少妇们同样艳丽的服装，以富兰克林太太的身份掌管起了全部家务，富兰克林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愈是睿智的人，愈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冷静的头脑；凡大智大勇者，其德行也必定修炼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在走过磋砣的人生之路后，富兰克林开始深刻感受到人生旅途中道德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巨大力量。他认识到：节制要比让欲火燃烧更好，良好的道德不仅是维护人们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使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打算：要克服掉不良的偏好和习惯，排除各种诱惑，使自己的道德水准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在经过认真周密的思索研究之后，富兰克林制订了一个“美德计划”，其中包括 13 条道德戒律，并附有相应的箴言以准确地表达每一条款的含义。其内容如下：

1. 节制：不暴饮暴食。
2. 缄默：不说与人与己不利的话，不作无益闲聊。
3. 秩序：何处放何物，何时干何事，要井然有序。
4. 决断：当断则断，要做就做好。
5. 节俭：钱要花在于人于己有益之处，切忌浪费。
6. 勤勉：珍惜时间，时时做有益之事，不搞无谓之举。
7. 真诚：思想纯洁正直，说话实在，不欺骗他人。
8. 公正：做有益于人的事，不损害他人。
9. 中庸：不走极端，别人有损于你时要宽容克制。
10. 清洁：保持身体、衣着和居所洁净。
11. 镇静：勿因普通小事或难免之事而惊慌失措。
12. 贞洁：除为了健康和延嗣等原因，少行房事，以免损害健康和他人的安宁和声誉。
13. 谦逊：效法耶稣和苏格拉底。

这些经过反复推敲拟就的道德戒律是富兰克林从伦敦返回北美时制订的四条行动方案的具体体现，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完全达到这些标准，为此他还采取了两项切实可行的措施。第一，按照上述道德戒律的排列次序一项一项去做，而不是每项同时进行。他认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分散精力，而且一项习惯形成之后，有可能促成另一项习惯的养成。例如，“节制”可以使人保持头脑清醒，办事有条理，不受外界的干扰和诱惑，如这一习惯确立了，要想保持“缄默”就容易多了。第二，富兰克林专门做了一个小本子，用以记录自己遵守道德戒律的情况，如果哪一天违反了哪一条戒律，便在相应的表格中画上一个黑点，以此检查督促自己在道德修养上不断进步。在这个记录本的扉页上，富兰克林抄录了西塞罗的一段名言以自勉：

“啊，哲学，你是生活中的向导，你是德行的寻求者，你是恶行的排除者，遵从你的行为准则好好地度过一日，胜于罪恶的百年！”

后来，富兰克林对这些道德戒律又做了认真研究，发现并弄懂了许多重要的人生哲理，他打算就此编写一部题名为《道德艺术》的书，用以鞭策自己，训戒后人。但由于事务冗杂，这件事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对此他感到十

分遗憾，直至耄耋之年写回忆录时他还提到了这一宏大计划。令富兰克林感到欣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检查督促。他发现自己的毛病逐渐减少了，许多良好的道德品质已经溶入了他日常的言谈举止之中，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习惯的一部分，再往后就无需使用这种小册子了。富兰克林十分重视自己的“美德计划”，认为它在自己的一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自传》中把这二体会告诉了他的子孙后代们，他写道，他本人“正是由于这一小小的计划才得以终生幸福……‘节制’使他健康长寿；‘勤勉’、‘节俭’使他境遇顺随、家境殷实，而这方面的全部知识又使他成了一个用的公民，并在学者中享有一定声誉；‘真诚’和‘公正’使他备受国家信任，委任他种种体面的职务；而全部德行的综合影响（尽管他尚未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使他脾性谦和，谈吐可意，与之为友者众多，甚至年轻朋友也愿意与他交往”。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加入了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纲领的团体——共济会。由于该组织具有秘密结社和非宗教的性质，所以关于他参加该组织的具体时间和活动内容均无详细记载，但从他给母亲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与该组织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还出任过共济会的首领。共济会成员必须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并信奉灵魂不灭说的成年男子，其纲领中有强调道德、慈善以及遵守当地法律等内容。这些与富兰克林当时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并无原则性区别，因而参加共济会是富兰克林依靠团体的力量实施其自订计划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另外一个基点。

在这净化灵魂的炼狱里，富兰克林正在自强不息地努力着、拼搏着——与相知相爱的妻子同舟共济，与共读会的友人们苦苦探索，与共济会的兄弟们患难与共。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知识才华迅速地增长，道德情操和威望也与日俱增，由一个寄人篱下的穷苦雇工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的业主，进而成为当地受人尊重的知名人士，而他的印刷所也由于赢得了良好的信誉和越来越多的客户而生意兴隆，财运亨通。

北美印刷业的发展在殖民地时期是举步维艰的。铅字的供应受到了英国的严格控制，印刷书报所用的纸张油墨等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宗主国，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北美印刷业的技术进步。凯默的印刷厂只能印制一点传单、历书、小册子和初级读物。布雷德福要幸运一些，因为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官方承印人的身份，承揽了政府法规、议会选票、官方文告和议会记录等有利可图的印刷业务，尽管他印得十分糟糕。他还利用身兼邮政局长一职的便利，让邮差发送他承印的官方报纸《美洲信使周报》。富兰克林对这两位同行的优势和弱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决定创办一份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以此为契机在印刷业界展开新一轮角逐，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在赶走了富兰克林之后，凯默的印刷所也与先进的技术和经营手段失之交臂。虽然富兰克林创下的家底仍能使印刷所维持一段时间，但其生产和经营已陷入了无序状态，危机也日趋表面化。富兰克林筹办报纸的秘密被前来谋职未果的乔治·韦布泄露了出去，一心想另辟发财捷径的凯默不惜借款购得机器设备，抢先创办了一份名为《世界艺术和科技导报及宾夕法尼亚新闻》的报纸。比起布雷德福那份呆板单调的官方报纸《信使》来说，凯默的这份报纸的可读性和趣味性都要强一些，它设有新闻短讯，百科知识和诗歌散文等多个版面，内容和形式比较活泼丰富。可惜的是，凯默本人并不具备办报的才能，他也没有得力的撰稿人和编辑，只是靠临时拼凑或抄袭别人的稿件

勉强地维持着这份报纸。富兰克林因条件尚不成熟决定暂不独立办报，为了与凯默的报纸相抗衡并揭露其小人嘴脸，他以“爱管闲事的人”为笔名为《信使》报投了大量的稿件，几乎篇篇都被布雷德福选用了。“爱管闲事的人”以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入木三分地揭露嘲弄了凯默式的“怪诞的蠢人”，说他“自愿地忍受着巨大的疲劳去寻找虚幻中的秘密宝藏”，“深更半夜离开他的妻子和温暖的被窝（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或下雹，只要是在关键时刻），去费力地找寻他们决不可能找到的东西”，“他的大衣粗陋硬旧，衬衣是土布制的，他的胡子大概有七天没刮了”，“他的尽善尽美的德性使得他应该公正地被尊为他的国家的光荣”。生性暴戾偏狭的凯默被激怒了，他在自己的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用最粗鲁的语言回敬“爱管闲事的人”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没有人愿听疯狗的狂吠和叫驴的嘶鸣，凯默的报纸失去了读者，他的印刷所因此而债台高筑。当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之时，凯默不得不把报纸卖给了富兰克林，把印刷所卖给了自己手下的一个雇员戴维·哈里。新主人把厂子迁到了巴巴多斯，并雇用了他的老主人凯默先生。后来听说凯默一年之后死于气短胸闷，死时他那浓密杂乱的长胡子已经多日没有清理了。

在凯默退出费城印刷界后，“爱管闲事的人”就销声匿迹了，富兰克林开始正式筹办他自己的报纸。1729年10月2日，富兰克林创办的《宾夕法尼亚报》问世了。在办报方面，富兰克林具有一些非常有利的条件。早年他曾协助哥哥詹姆斯办过《新英格兰报》，他本人又是一位文笔犀利，思维敏锐的作家和技艺精湛的印刷业主，因此，他可以同时兼任报纸的编辑、撰稿人、印刷商和发行人。另外，他还有共读会的一大帮朋友在各方面给以鼎力协助。这份报纸一问世就不同凡响，表现出一些独特的风格：印刷精致，版面活泼新颖，文字优美流畅，内容丰富多彩，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很快，这份新报纸就夺走了布雷德福的《信使》报的大部分读者。

富兰克林对于办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宾夕法尼亚报》的创刊词中写道：“一个报纸作者（依据学者们的意见）应该能够通晓多方面的语言，应该能自如地运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清楚明白地写作或表述问题；他应该能畅谈陆海战事、宫闱秘闻、民族习俗。这种造诣深厚的人在世界上的这个偏远地区是十分少有的。”富兰克林就是这种造诣深厚的人，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报纸。而且还使它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越办越出色。面对《宾夕法尼亚报》的有力竞争，布雷德福恨得咬牙切齿，他利用所掌握的邮政局长的权力，禁止邮差投递富兰克林的报纸。对此富兰克林略施小计：用小费买通了邮差，让他们秘密为自己服务，从而保证了每周一期的报纸得以及时送到读者手中。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总督、议员和各级官吏，都为费城有了这样一份出色的报纸而感到欣喜和自豪，他们毫不掩饰对这份报纸的偏爱，年轻有为的办报人富兰克林的名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

客观地说，《宾夕法尼亚报》完全可以与伦敦赫赫有名的《观察者》相提并论。该报一直延续了18年，是现在的《星期六晚邮报》的前身。

## 第六章费城新星

费城第一次繁荣兴盛始自建埠之初。当时这座城市被誉为威廉·佩恩的“兄弟和睦之城”。一百年之后，随着革命黄金时代，即富兰克林时代的到来，这个城市的建设达到了顶峰。

尼尔·R·彼尔斯

离家出走的学徒工本杰明·富兰克林历尽艰辛来到费城时，威廉·佩恩建埠之初的第一次繁荣兴盛早已悄然离去，而革命的黄金时代尚未到来。他做梦也未曾想到：费城的第二个繁荣期竟会以他本人的姓氏命名。在他准备开办自己的印刷所之前，他按照当时文人的时尚为自己撰写了一个墓志铭，假如日后他在事业上未取得那么宏伟的成就的话，他的墓碑上或许会刻下这些字样：

这里躺着印刷工本·富兰克林，  
如同一本没有书页的旧书皮，  
封面的字样和金箔已荡然无存，  
它为书囊提供了茶饭。  
但他的作品将永不消失，  
编者的修改润色，  
将会再次让它重现。

富兰克林以书籍比喻自己的人生之旅可谓寓意深邃。的确，富兰克林的一生都与书紧密相连。更形象地说，他的一生就是一本书，起初是一张没有书页的书皮，日积月累，书页逐渐充实加厚，而后在封面印上烫金的大字和醒目的标题，成为一本从内涵到装帧都令人爱不释手的精美书籍。不分地域、国界和肤色的人们在拜读这部出自大手笔的经典名作时，都会大开眼界，获益匪浅，要想揭开富兰克林成名成家的奥秘并不太难，只要认真地阅读这部书，了解他一生一世与书本结下的不解之缘，答案就依稀可见了。

在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殖民地时代，北美恐怕很难找到比富兰克林读书更多的人了。从印刷工、出版商、政界人士，直到成为费城一颗耀眼的新星，他每时每刻都在与书本打交道，读书、写书、印书、售书，成了他早期生涯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富兰克林的记忆里，他似乎天生就能读懂所见到的每一本书，因为在襁褓中时，父母就一边忙着活计，一边耐心地教他说话识字。遗憾的是，他未能受到系统的正规教育，顽童时的两年读书岁月短暂而仓促。他那渊博的学识是从长年的广闻博记、勤学苦读中得来的。但是由于生活所累，他既没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年轻时也没有足够的钱买书。他的读书时间是见缝插针、一点一滴地积聚起来的，并长期坚持下来，锲而不舍。为了提高读书的效率，他卓有成效地把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人物集合在共读会里，交流读书体会，探讨学术问题，后来（1743年），他又将美洲颇有名望的学者精英汇聚在一起，组织了北美第一个学术团体“美洲哲学学会”，从事医学、植物学、地理学、数学以及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开了美洲学术研究之先河。为了使与自己经历相似的人们都能够尽情地享受读书的乐趣，他把共读会成员的书籍收集起

来，进行分类编目整理，供大家借阅，后来又筹款购书。1731年，他终于建立了北美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向那些渴望学习的人们洞开了通向知识宝库的大门，他也因此而被誉为北美的“图书馆之父”。

富兰克林传奇式的一生确实与书息息相关。书籍就像神话传说中的一盏神灯，照亮了他前进的方向，引导他从偏僻黑暗的角落一步步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从荆棘丛生、茹毛饮血的荒蛮之地奔向无限广阔的知识海洋。富兰克林渊博的才学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来自于读书，而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驰名世界的作家、思想家则与他编写的那部《穷理查历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1732年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年里，他创办的图书馆已经正常运作，效果极佳。《宾夕法尼亚报》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给他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还使他得以参与南卡罗来纳和罗得艾兰等地的报纸业务。另外，他还以安东尼·阿夫特威特、西莉亚·辛格尔等笔名为《宾夕法尼亚报》写了一批稿件，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是，富兰克林并不满足，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使他可以从世界的任何地方汲取智慧，攻克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种种不解之谜，并给予人类以有益的忠告。富兰克林认为，这一行为的结果首先应对社会有利，同时也能为自己带来显著的效益。在这一年的岁末，他终于从以“穷理查”的名义编写的历书中找到了这一表达方式。

历书，即排列月、日、节气等供查考的书，主要用来计算日期，有人还用它来解释星象，甚至预测天气和凶吉祸福。历书的边角有空白处，当时的出版人经常插印上一些食谱、小诗、箴言和趣闻等，供人浏览消遣，也可留出一些空白用来记事。在殖民地时代，历书是发行量最大的书，即使是没有文化的人家也少不了它。一本畅销的历书可以使编印者一夜走红，财运亨通。布雷德福和凯默都曾编印过历书，前者版面上的空白地太大，而后者则从中印满了谁也看不懂的诗词。经过精心创意和周密策划，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历书》于1732年12月19日正式付梓了，每册售价5便士。新历书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两周内加印了三次，每册售价很快就上涨到10便士，但仍是洛阳纸贵，供不应求。

“理查·桑德斯”这个名字可能是从被富兰克林视为慈父的老商人德纳姆的记帐簿上找到的，也可能是在茫茫人海中信手拈来，总之，他是一个在人群中随处可见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构人物。

但是，“理查”从一出场就显得那样自然纯朴，真实可信，简直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的化身。他那幽默实在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人生哲理似乎具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很快就抓住了千万读者的心。

在开场白中，“理查”以一种质朴坦诚的口吻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存在：“为了使大家喜欢我，在此我直言相告，除了为公益之外，我写历书别无所图，但是，这样做将是不诚实的。如今的人实在太聪明了，任何伪装也无济于事。实际情况是，我非常贫穷，而我那贤惠的妻子又十分粗暴。她说，当她坐在那儿纺纱时，我却在呆呆地数星星，这使她无法忍受。她威胁说，如果我再不利用我的书和工具做点对家庭有利的事就将烧掉它们。出版商分给我相当可观的利润，因而我也就开始满足我妻子的愿望。”第二年，理查赚了钱，日子越过越红火，还给妻子买了漂亮的服装和新鞋，他本人也开始注意服饰和仪表。但很快二人就产生了新的矛盾，理查责怪妻子因富裕而变得

疏懒，妻子则指责男性愚昧无知，夫妻俩陷入了无休止的口角之中。这场夫妻论战旷日持久，涉及的问题包罗万象，林林总总，其实都是富兰克林借“理查”之口向世人阐述自己多年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处世哲学，话语虽十分简练，却字字珠玉，发人深省。

“理查”很快就成为整个费城以及宾夕法尼亚街谈巷议的热点人物，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穷理查”。他那坎坷无定的身世牵动着千千万万善良人敏感的神经，他那引人入胜、内涵深邃的珠连妙语也成为劝诫人们回心向善，积极进取的警句格言。“穷理查”的境遇时常变化，夫妻间的口角和调笑也不断出现，从而更增添了人们阅读的兴趣。就这样，历书年复一年不间断地出版，形成了有始无终的长篇系列，最后汇集成一部脍炙人口的世界名作。

生活是千变万化的，富兰克林在体验事业成功的喜悦之时，有时也必须承受生活给予他的痛苦的打击。1736年，他年仅4岁的小儿子福尔杰因患天花高烧不退而夭折。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富兰克林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不能相信儿子就这样悄然离去了。德伯拉悲恸欲绝，无力地坐在福尔杰的棺材旁边，期待着小儿子能起死回生。在教堂后面的一片不大的墓地上，一些亲友聚集在这里，为福尔杰举行了葬礼。泥土渐渐地把那个已获得了解脱的生命覆盖起来，这是人们难以避免的归宿。“从尘埃而来，化灰烬而去……”，这些自古以来就在葬礼上吟咏的诗句深深地震撼着富兰克林的心扉。“理查”夫妇以富有哲理性的诗句寄托了他们无限的哀思：

色雷斯婴孩走入生活，  
迎候的双亲哀伤悲叹；  
色雷斯婴孩被死神夺去，  
送葬的双亲则欢欣宽慰。

希腊和罗马对此予以嘲讽，  
你们全然是色雷斯人的蛮昧；  
但若细细琢磨你们鄙视的习俗，  
色雷斯人的蛮昧可能会令智者增识。

痛失爱子的打击使富兰克林夫妇懂得了人生的短暂和宝贵，变得更加珍惜自己的家庭和夫妻生活了。他们互相宽慰体贴，相敬如宾，慢慢地从悲伤哀痛中摆脱出来。1743年8月31日，他们的宝贝女儿萨拉（爱称萨莉）出生了，总算弥合了他们心灵深处的那块暗伤和缺憾。面对把女儿视若掌上明珠的夫人，“理查”以快活的语调谆谆告诫：“勤快的母亲养活出懒惰的女儿”，“维护好一把钳子会培养好两个孩子”。

1745年，垂垂老矣的乔赛亚·富兰克林终其天年，他最小的儿子以其独特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辛劳一生的父亲。于是，“穷理查”的历书中又增添了一些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闲适的生活和懒散的生活是两回事”；“合适即得体：谁见过系白绸围裙的铁匠”；“井枯了之后我们方知水之珍贵”。这些似乎是老富兰克林为儿孙们留下的最后的教诲。

富兰克林在编织“穷理查”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的同时，煞费苦心地从古往今来的世界各个民族中收集了许许多多俗谚格言，主要是一些有关勤奋和节俭的教诲，经整理后巧妙地汇入历书之中，以飨读者。经“穷理查”之

口说出的劝善之言收到了异乎寻常的巨大效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理查”说道：“不知者不为过”；“切莫吝惜牧师的圣酒，切勿珍惜面包师的布丁”；“人不占有财富，是财富占有人”；“贪婪与幸福从未谋面，它们怎么会相识”；“贫穷者企求部分，奢侈者企求很多，而贪婪者则企求全部”；“饿鬼不会嫌面包不好”；“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非为了吃饭”；“傻瓜才会让医生作自己的继承人”；“愚人心在口中，智者口在心里”；“喝酒快者付帐慢”；“完全赞同你的人不值得称赞”；“不进则退”；“谎言有一条腿，而真理则有两条”；“否定自己是为了提高自己”；“崇拜是无知之女”；“最破的轮子噪音最大”；“写作要有文采，说话力求通俗”；“时间会治愈一切疾病”。这些民谚格言通俗易懂，便于记忆，且令人回味无穷，它们随着《穷理查历书》流传到了世界的许多地区。

“贫穷的理查”由于节俭勤奋终于在1748年变成了《发迹的穷理查》，但人们对他的热情一如既往，有增无减。这套历书编纂出版了25年之久，直至1757年，富兰克林受托赴伦敦为北美的权利进行交涉，才忍痛结束了历书的编纂工作。但此时，该书早已风靡欧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在欧洲，各家报纸纷纷予以转载，读者踊跃。特别是西欧一些国家，处处可以见到印刷在张贴画上的理查的格言，各界人士竞相购买不同译本的历书，作为馈赠亲友的有意义的礼品。在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穷理查历书》早已家喻户晓，成为千家万户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和生活必需品。

《穷理查历书》不仅给富兰克林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还使他和费城居民获得了不少经济上的实惠。由于该书劝阻人们不要购买无用的奢侈品，经济界人士认为，它对于促进本地区财富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世界各地对历书巨大的需求量促使富兰克林的印刷业务迅速扩展，这不仅为他创造出了丰厚的利润，还使他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由于印刷历书需要大量纸张（这种优质的纸张原先主要依赖进口），富兰克林创办了几家生产新闻纸的造纸厂，合伙人中有他早先的伙伴——从北卡罗来纳返回费城的休·梅雷迪斯和那位不慎泄露了办报机密的肄业大学生韦布，他们与富兰克林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富兰克林提供资金和部分造纸原料，他们则向他提供优质的纸张和一部分利润。富兰克林在太太的店铺增设了收购破布、废纸的业务，作为造纸原料的来源之一。在富兰克林的收支帐目中，进项的数额在急剧上升。

“理查”的名声飞出了费城，相邻的特拉华、新泽西和马里兰等地的出版业纷纷向富兰克林敞开了大门，众星捧月般地把推到了出版巨头的位置上。富兰克林在印刷出版业声誉鹊起，实力大增，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争相阅读这位费城骄子的书刊和报纸。如日中天的事业为富兰克林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他再也不会为生计而操劳奔波了。当他的主要合伙人戴维·霍尔先生到来后（1743年），印刷所的事务就全部委托给他代理，富兰克林无需事必躬亲了，他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从事为公众服务的事业，他的生命已经越来越多地属于那些爱戴他和被他所爱的人们。

“理查”的妙言绝句出自于富兰克林那支匠心独具、犀利无比的神来之笔，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秘书。这一年他刚好30周岁，而立之年的他把立足点从私人事业逐渐转向为公众谋利益的公共事业上来。这是富兰克林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开始步入社会上层，跻身于宦海沉浮、江湖险恶，他将会何去何从？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在盘根错节、尔虞我诈的官场上逢场作戏，随波逐流，甚或与那些贪

赃枉法、营私舞弊之徒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呢？还是保持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忧国忧民的良知良能，为公众利益和人类的进步而奋勇拼争？历史在注视着他。

秘书的工作薪水并不多，但责任重大。富兰克林很快就在议会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声誉和威望，并逐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工作不仅使他得以承揽了全部政府公文和法律文件的印刷出版业务，还使他有机会更广泛地与政府要员和政界人士接触，极大地扩展了他的社会活动领域。当然，官场中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反对他和令他不快的事情，但富兰克林对此采取了一种十分达观的态度，既不为之烦恼，也很少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他认为：“对于敌对行为，与其烦恼、报复或僵待，不如慎重转移感情为好，其益处自不待言。”例如，当他得知有位议员坚决反对他翌年继续任秘书时，他并没有愠怒不安，而是设法与他接近，以改变这位议员对自己的偏见。他托人捎信向这位议员借一本很珍贵的书（他知道此人确有其书），看过之后又将读书体会和表示感谢的短信与书一同奉还。这位议员发现富兰克林具有不计前嫌的气度和出众的才华，遂转变了态度，主张秘书一职非富兰克林莫属。富兰克林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秘书这一位置上工作了16年之久，直至他被选入议会为止。

由于富兰克林办事机敏干练，为人正直公道，因此赢得了总督的信任，也博得了民众的好感。1737年，他被任命为费城邮政局长，敢代了因玩忽职守、账目混乱而被解职的安德鲁·布雷德福。富兰克林上任伊始就对邮政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不仅使各项业务工作井然有序，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设了新的邮政项目，开拓疏通了邮路，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邮政联系，形成了以费城为中心的邮政网络，并设法加强与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邮政联系。这一系列整顿措施收到了显著效果，不仅方便了广大市民，也使邮政局的利润逐年递增。当然，局长一职为富兰克林本人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发行书刊、报纸和广告等方面。1737年10月27日，《宾夕法尼亚报》刊载了一则官方消息：“费城邮政局迁至市场街B·富兰克林处营业。”邮局就设在家中，印刷所刚印出的还飘着油墨气味的报刊马上就被邮局的差役们分送到各个报刊网点，再送到读者手中。这二快捷便利的服务方式促进了读者数目的激增，在不长的时间里，《宾夕法尼亚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数量都有了大幅度增长。当上了局长的富兰克林还不计前嫌地为老对头布雷德福发送报纸，直至两年后邮政副总监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下令禁止为止（原因是布雷德福的账目长期混乱不清）。

此时期的富兰克林已经承担起了许多重要的使命，但他一向精力旺盛，富有事业心，从未因责任过重而感到疲乏困顿。他刚来费城时几乎一无所有，经过奋力挣扎拼搏才从社会的底层脱颖而出，在这一过程中，他已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费城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他也在改变着费城的面貌，而费城的再度兴盛也把他一步步推上了辉煌的顶点。在富兰克林为费城人开创许许多多不朽业绩之时，他成了费城政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火灾对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威胁是难以估量的。费城是一座火灾频发的城市，但当局的消防工作却存在着致命的漏洞：防范不严和灭火措施不得力。富兰克林组织共读会成员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他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城镇防火》。作者以一位



阅历颇深的长者的身份向居民讲述了火灾的起因，危害以及消防灭火的方法和重要性。在他的鼓动和组织下，一支 30 人组成的志愿灭火团体建立起来，消防人员配备了各种灭火工具：皮桶、口袋、绳索和装运物件的篮子等，实行轮流值班制度，常备不懈。不久，费城就建起了数支联合消防队，至此，费城的消防工作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城市治安是长期困扰费城居民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根据当地惯例，无论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家徒四壁的贫妇，每年都要向政府交纳 6 先令的治安费。于是，警官职业成了令人向往的肥缺。但由于无章可循和管理不善，费城的治安工作徒有虚名，警官中混入了许多素质低下的无赖之徒，整天以酗酒聊天打发时光。他们醉入梦乡之际便成了盗贼罪犯猖獗之时，针对这一状况，富兰克林在共读会里提出建议：挑选一批合格人员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特别要加强夜间执勤；居民按财产多少交纳治安费。这一建议得到了会员们的一致赞同，并以共读会的名义向当局正式提出。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项建议终于以法律的形式得以实施。

18 世纪 30—40 年代，北美殖民地兴起了史无前例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史称“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这是此前曾席卷欧洲的宗教热潮向北美的转移和继续。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的运动，它沉重打击了殖民地的官方社会，扩大了宗教信仰自由，促进了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它也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沟通和加强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所有这些都为日后美国的独立运动作了精神准备。

“大觉醒”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英国圣公会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从 1739 年开始在北美各地巡回布道，反响巨大，但唯有费城教友派掌门人把他视作路人，不让他登临讲坛。肩负神圣使命的怀特菲尔德不为所动，毅然在露天广场上宣讲传教。他把“灵魂自由”作为一面旗帜，把陈腐的宗教教义变成一种民主主义理论。他宣称：他要为一切人的得救而祈祷，而上帝的拯救将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人们可以直接与上帝交往而得其恩泽。他正义凛然地痛斥宗教专制和暴虐，反对官方教会的繁琐仪式和教义，主张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突出人的理性。他那口若悬河、声如洪钟的演说似乎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和使金石为开的至诚，微言大义，发人深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聆听他的教诲。千千万万宗教意识已经淡化了的费城居民又恢复了往日的虔敬和热诚，到教堂作礼拜的人明显增多了。每天晚上，优美感人的圣歌声从各家各户中传出，缭绕不绝。

生来就崇尚自然并成为自然宠儿的富兰克林向来不曾被传教士的布道吸引过，波士顿浓郁厚重的新教气氛和老父诚挚坚定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把他塑造成清教徒。费城教友派的宽容平等精神则使他学会了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心灵之光的启示，他们家在教堂里的两个固定包厢很少得到他的光顾。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富兰克林在广场上聆听了怀特菲尔德的演说，一下子就被这位牧师非凡的气质、美妙的嗓音和极具摄服力的演说内容所深深打动，很快两人就结成了莫逆之交，这位牧师也被邀请到他的家中居住。藉此机会，富兰克林经常向怀特菲尔德请教有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牧师侃侃而谈，其虔诚而又开明的思想主张使富兰克林为之折服。有一次，怀特菲尔德提出要为佐治亚失去父母的孩子们修建一所孤儿院，富兰克林认为在经济状况较好的费城建院更为合适，故不打算资助这一计划。但当他听了牧师为此计划而做的募捐演说时被深深感动了，遂改变了主张。关于此事，他的自传中有

如下记载：“随着他娓娓讲述，我的心软了，决定把铜钱献出；等他讲到另一激动人心之处，我为原来的想法感到十分羞愧，又决定把银元捐献出来；而他的结束语讲得是那么精彩绝伦，于是我倾其所有，金币、银币和铜币全部掏出，放进募捐盘。”

信奉自然神论者的富兰克林为“大觉醒”运动的这位杰出领袖印刷出版了布道集，又与当地头面人物们通过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修建了一座堪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相媲美的宏伟壮观的教堂，以供怀特菲尔德和任何宗教教派的教士传教之用。为了管理好这座大教堂，各个教派的代表共同组建了一个托管委员会，富兰克林虽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但由于他热心倡导并参与了教堂的修建工作，也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怀特菲尔德的思想和演说感动并启发了千千万万的北美人，但却未能使他的密友和支持者富兰克林皈依他的教派。富兰克林仍坚持认为：上帝的作用在于创造宇宙和人类，世界既然已经造就，上帝就退而不再干预自然进程和人类行为。他所信赖和依靠的是自己的智慧、毅力、勇气和才能，毋需上帝和天使的庇护和襄助。不过，富兰克林确实从怀特菲尔德身上学到了为人类自由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和充满激情、富有理性感召力的演讲才能，这些对于他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政治活动是大有裨益的。

就这样，这位年轻机敏的印刷工在勤奋艰苦的工作、学习和创造中更加成熟起来，开始步入他生活中的一个辉煌时期。他利用自己一点一滴积聚起来的知识、能力和财富，为费城人民做出了许许多多不朽的业绩：创建了北美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组织了北美第一个哲学会、创办了第一流的报纸、杂志以及消防队、专职警察机构、医院和民兵自卫组织，并在邮政和路政建设事业中大放异彩。尽管公务缠身，他在写作和科学研究方面仍取得了不少成果，那部风靡世界的名作《穷理查历书》和他亲手研制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新式火炉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富兰克林以其在费城作出的卓越成就而声名大振，费城也因富兰克林创造性的贡献而再度崛起。在逐年出版的《穷理查历书》中，他用诙谐幽默的文笔揭示了穷小子发迹史上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秘，通过言简意赅的格言成语阐述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哲学家所追求的人生真谛。“穷理查”率先走出了一条成才致富之路，千千万万的费城人不仅身受其益，而且纷纷仿而效之。于是，费城便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理查大军”、前进的脚步声中开始腾飞。

## 第七章天堂盗火

富兰克林理所应当，然是那个时期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他的才智包罗万象……他永无休止地思索，盯住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

卡罗尔·卡尔金斯

电为何物？自然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电就是有电荷存在和电荷变化的现象，电荷则是物体或构成物体的质点所带的正电或负电。带异种电荷的物体相吸引，带同种电荷的物体相排斥，电荷的移动形成电流。

这些电学理论如今已是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可是在富兰克林以前的时代，电却使得地球上的亿万生灵备感困惑惊惧，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激励着一代代矢志于科学事业的学者为解开电磁之谜而苦苦探索，殚精竭虑，耗尽毕生所学。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古希腊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了造福于人类，他毅然违抗众神之父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而他本人却因此而历尽磨难，忍受了比死亡更为可怕的痛苦。

富兰克林就是从天堂盗火的第二个普罗米修斯（康德语）。探险者的勇气、学问家的见识、工匠的技艺、诗人的热忱和贤哲的思辨精神——这些发明家所必备的素质，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富兰克林从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自然科学。他勤奋好学，敏于思索，遇事总喜欢追根求源，而且心灵手巧，常常无师自通。他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对机械、化工、天文、地质、生物、医学和光学等学科都有浓厚的兴趣。但由于生活的担子过于沉重，使得他不可能坐在实验室里潜心从事研究工作，然而，这并没有泯灭他对科学事业的钟爱。他时常把遇到的各种有趣现象和疑难问题记在脑子里或笔记本上，一有机会就动脑动手，搞一些有意义的发明创造。例如：儿时发明的调色板式的游泳加速器；在凯默印刷所制造的铜版印刷机；《穷理查历书》中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对一种无名腹痛病因的探讨，以及曾经被广泛推广使用的“富兰克林火炉”的发明，等等。这虽然都是些零散的小发明创造，但却有效地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也处处显示出富兰克林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巨大潜质。如今，富兰克林的个人事业如日中天，家境已十分殷实，还有戴维·霍尔等几个理想的经济合作伙伴为他分忧，他已经可以把生意上的事情托付于他人，把更多的时间和财力都投入到科学事业中去，创建他朝思暮想的私人实验室，进行他所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有关电学方面的研究和实验耗费了他许多精力，并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早在公元前 600 年友右，古希腊的哲学家就发现，摩擦过的琥珀能够吸引细小的物体，这说明，人类对电和磁的认识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电和磁的系统研究却是 17 世纪以后的事情。近代电学科学的起源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有密切关系。他的《论磁石》一书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区分出了电的吸引和磁的吸引，认为电和磁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还发现，除了琥珀之外，还有许多材料可以通过摩擦而产生静电，但也有的物质是不能通过摩擦而使之带电的。吉尔伯特的实验使电学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当时的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有两种电，一种是“玻璃电”，另一种是“树脂电”。电荷之间存在着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现象。经摩擦产生的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将电荷传递给原来不带电的物

体。不仅如此，当一个物体接近带电物体而并不与之接触时，也可以使该物体电感应而产生带电现象，即静电现象。不久，欧洲人发明了摩擦发电的机械。荷兰科学家彼得·F·米森布鲁克在莱顿发明了最早的蓄电池，后来被称为莱顿电瓶，终于使无法驾驭的电有了容身之处。富兰克林的实验室里就摆着两只最新样式的莱顿瓶。

1746年夏天，富兰克林重返波士顿，探望寡居的老母亲，祭拜已辞世一周年的父亲。宅门上的蓝色圆球门标依然是那么醒目，家中早已修葺一新，摆上了考究的家具，但由于没有了堆积如山的皂烛，给富兰克林平添了几分陌生感。于是他漫步街头去追寻孩提旧梦，不想一下子被来自英格兰的阿奇伯尔·彭斯彭博士精彩的魔术表演吸引住了。

彭斯彭的所谓魔术其实是最简单不过的电学实验：他用摩擦生电的玻璃棒使彩色的纸屑翩翩起舞，用简陋的发电装置发出绚丽夺目的火花，当场击毙活蹦乱跳的母鸡，点燃远处的酒精……。一个个惊险的节目令围观者为之振奋，不断爆发出热烈的喝彩声和惊叹声。面对此番情景，富兰克林当然不会像这些孤陋寡闻的乡下人那样躁动不安，但却被电的巨大魅力深深摄服了，并使他产生了许多疑问和联想，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玻璃电”与“树脂电”有何区别？电火花和闪雷是否是一种东西？电能为人类所利用吗？

问号是开启科学之门的一把钥匙。带着这些思考，他与彭斯彭先生做了彻夜长谈，并花大价钱买下了博士所有的电学实验仪器和表演道具。儿子的这一举动使老母亲困惑不已，她知道儿子早已过了搞恶作剧的年龄，不会跟着这位“江湖术士”走火入魔，可为什么他对变戏法产生了这么大的兴趣呢？面对老母亲的重重疑虑，富兰克林耐心地对她解释道：“电是一种神奇的天赐之火，有了它人间会像天堂一样充满光明。”

富兰克林把刚刚落成的新居布置得既新颖又方便舒适。楼上是家人和亲友的起居室，楼下除厨房、餐厅外，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共场所：临街的特大房间是邮局办公室；摆着棕色写字台和半圈软椅的那一间是印刷所的办公室；朝北避阳的书房里四面排满了书架，各种门类的书籍琳琅满目，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向阳的那个最大的房间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里面盛着五颜六色的粉末，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机械、仪器、工具和一些栩栩如生动植物标本，这里就是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富兰克林实验室。

富兰克林如法炮制了彭斯彭的魔术，观众有他的家庭成员、共读会和哲学会的成员，还有其他亲朋好友以及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都对那美丽的电光和它产生的神奇的力量惊叹不已，并认为这一研究必是前途无量，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持富兰克林的工作。共读会的老朋友和哲学会的专家们经常聚在一起，与他共同研究电的奥秘。技术纯熟的银匠辛恩设计出一台机器，大大减轻了摩擦玻璃的劳动强度。失业大学生金纳斯利充当了电学实验记录员和仪器保管维修工作。富兰克林的研究工作还得到了学术界要人的关心帮助，费城图书馆的购书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彼得·柯林森时常给他邮寄一些电学方面最新的图书资料和仪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探索，富兰克林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电不是经由摩擦产生的，而是通过摩擦集中起来的，它是物质中的一个元素。某些科学家提出的电分为玻璃电和树脂电的“二流体理论”是不科学的。电是单一物质。每个物体都具有一定的电，摩擦只能使电从一个物体转到另一个物

体上，它的总电量保持不变，得到电的物体带阳性电（+），失去电的物体带阴性电（-）。这样，富兰克林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正电与负电概念的人，从而为电荷守恒定律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认真研究，富兰克林正确地解释了前人发明的莱顿瓶的原理，并使“富兰克林板”——即锡板之间有玻璃片的平面电容器得以问世。

鉴于富兰克林在电学研究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名字被国际物理学界命名为公认的电量单位——若一个电荷位于真空中，在距离它1厘米处有一个带同种电的点电荷，当它们之间的相斥力为1达因时，则该电荷的电量规定为1富兰克林。1富兰克林等于现在通行的电量单位 $1/3 \cdot 10^{-9}$ 库仑。

不辞劳苦的实验使电学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自然的奥秘被富兰克林一个个揭开了，使他沉浸在一连串成功的喜悦之中。不过富兰克林并没有因取得了巨大成绩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在给柯林森先生的信中，他抒发了一个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和虚怀若谷的气度，他写道：“……在进行这些实验时，我们建立了多少很快就被自己发现不得不摧毁的美妙体系啊！假如没有发现电的其他用途，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即它能够有助于使一个骄傲的人变得谦虚……”

谦虚的富兰克林似乎永远也不会满足，他总感到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等待他去探索解决，但是他却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缺少时间。作为商人，他的工厂和店铺需要他去操持经营；作为议会秘书，他必须自始至终地旁听议员们冗长的争论，写出详实的记录和经得起推敲的议案；还有正在创建中的学校、医院以及邮政局的大量事务等等，都需要他去筹划决策，当他把这一切处理完毕之后，他的时间和精力已经几乎消耗殆尽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思忖再三，富兰克林断然作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决定。1748年1月，他与工长霍尔先生达成了一个合作经营协议：由霍尔全权管理印刷厂的一切业务，每年向厂主交纳500英镑，为期18年，届时印刷厂归霍尔所有。富兰克林之所以要离开他亲手创建、如今正财源茂盛的印刷厂，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使然。作为商人和业主，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起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并过上了舒适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但在政界，他不过是一名只有参与权没有表决权的见习生，还没有获得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权力。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他感到自己只是一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孩子，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方能获取大海深处的瑰宝奉献给自己的同胞。而只有退出商界，他才会有充足的精力为公众服务，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挚爱的科学研究事业。

此时，他仍然牢记着“穷理查”的那句至理名言：“若不想死后被遗忘，或者写些值得读的东西，或者做些值得写的事情。”

市场街的那栋小楼不知不觉地变得狭小拥挤了，前来办理印刷、邮政业务和拜访富兰克林的人如潮如涌，不断增加的实验仪器和书籍改变了房主最初设计的格局，他的实验室已经没有插针之地了。于是，在瑞斯大街和第二大街的交汇处，一座气派而实用的楼房拔地而起，成了富兰克林在费城的另一座新居。“穷理查”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搬家三次，如遭火灾”，而他的人物原型此时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我现在有望免除自己愿意承担的以外的其他事务，并且享受我视为最为幸福的东西：读书、研究、实验，以及同乐意将其友谊或交情惠赐于我的那些睿智而高尚的人们广泛地交谈的闲暇”。这一次富兰克林搬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邮局和印刷所办公室留在

了原处，把穿梭不息的人流和嘈杂的噪音也留在了那边。在这里，实验仪器和机械设备各得其所，图书资料排列得井井有序。女儿的琴声是那样悦耳动听，使作父亲的也常常禁不住引吭高歌，并在回肠荡气、飘渺优雅的音乐世界里不断地产生出遐想、灵感和创造的冲动。日夜埋头于实验室和阅读的富兰克林开始发福了，饱满的天庭，宽阔的面颊，一抹长发飘逸在脑后，超人的智慧和辛勤的探索已在他的额头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儒雅的风度简直令人想象不出他曾经是个扎着皮围裙的小学徒和推着板车踽踽独行的小业主，看起来倒更像一位出身名门的绅士和超然物外的学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探索，富兰克林对电流与闪雷的相同点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1749年11月7日的一个记录中明确写道：“（1）发光。（2）光的颜色。（3）方向弯曲。（4）移动迅捷。（5）金属传导。（6）爆开时有噼啪声或杂响。（7）在水中或在冰里能够维持下来。（8）旁开其通过的物体。（9）毙杀动物。（10）融化金属。（11）引着易燃物。（12）硫磺味道。”在他看来，所有结论都确凿无误，惟有一点由于缺乏证据而难以定论，即电流受尖头的吸引，而闪雷有这种性质吗？富兰克林心想：“既然电流与闪雷在所有能够比较的特征上都相同，难道它们在这一点上就不相同吗？进行这项实验吧！”勤奋执著的科学家决心通过亲手做的实验来揭示这一奥秘。

富兰克林决定进行这一重大实验并不仅仅出于好奇心，他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一科学论题，以便让真理造福于人类。因为关于“尖头物体能吸走或发出电火花”的说法曾使他浮想联翩，由此产生了制造避雷针的念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如果证明事情确实如此的话，那么，是否可以把这一知识用于为人类服务，以便保护房屋、教堂、船舶等免遭雷击呢？其办法是在这些建筑物的最高部分安装一个形尖如针的铁条，该铁条应镀金以防锈，在铁条的底部连以铁丝，从建筑物的外面通到地面，或绕着船上的支桅索而下，从船边延伸入水。”

避雷针的设计又使他突发奇想，制订了一个测试含闪雷的云是否带电的别出心裁的方案：在高耸的塔楼顶部设置一个绝缘的岗楼，将一个尖头铁棍弯曲着向上伸出门外，引一根铁棍入地面或接触水面，当雷云经过时铁棍会从云中把电火引过来，站在岗楼上的人此时可能会带电并发出电火花，“如果认为人有危险（我不这样认为），就让他站在岗楼的地板上并用一个一端固定在铅皮顶上的线圈不时地靠近铁棍，他用蜡手柄握住它”。这一方案表明，富兰克林当时对雷电的理解虽已处在时代的前列，但仍有缺陷，所以他并不清楚这项实验会有多么大的风险。

抑制不住的冲动使富兰克林在这一年圣诞节的前两天做了一次实验，他原想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创造出一个奇迹，不想却差点酿成一场惨剧。

在实验中，富兰克林准备用从两只大玻璃缸中引出的电杀死一只火鸡，当他“一只手在联接着的顶部电线上，另一只手握住与两个缸体表面都相连着的一根链子”时，突然窜出一道耀眼的电火，同时发出了如同放爆竹一样的巨大响声，富兰克林应声倒地，整个身子在剧烈地颤抖，握着链子的手蜡缩成鸡爪状，双目紧闭，面无血色。十几分钟之后，富兰克林才清醒过来，他慢慢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周围的人：他似乎见到了上帝。

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而科学家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们能从错误和失败之中揭示出鲜为人知的真理的奥秘。从这次挫折中富兰克林得出了一个结论：串联起来的足够多的电瓶可以释放出如同闪雷那样巨大的电

流。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让闪雷自己来证明：我就在剧烈地放电！

1751年10月，富兰克林被选入费城参议院，同时，他正在为创建一所新的学院和新的医院而日夜奔忙，越来越多的公务占去了他大量宝贵的时间，科研和实验只能安排在公务之外的间隙时间里进行。忙碌之余，富兰克林时常挂念远在波士顿的老母亲，由于公务缠身他无法回乡探亲，便时常向家中写信，以表达对老人家的思念和安慰。在这些信中，富兰克林总是以轻松愉快的笔调谈论自己、太太和子女，讲述家庭琐事和邻里趣闻，避而不谈他在科学实验中所遇到的危险和困难，以免使老人操心费神。在圣诞节到来之前，他又给母亲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我自己，眼下过得十分惬意，感谢上帝的慈悲，我的身体还可以。我读书多，骑马少，做别人的事多，做自己的事少，一有闲暇就休息，高兴时就找朋友，年复一年。最终的时刻终将会来临，到那时我但愿能听到这样的话：‘他活着对大家有益’，而不是‘他死时很富有’。”

母亲的回信不多，由于年迈体衰，她写信时手抖得很厉害。她在一封信中告诉富兰克林，她对儿孙们的一切都感到满意放心，除了想去见见丈夫以外，她现在已别无所求了。富兰克林知道母亲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深知，老人晚年的幸福几乎都与儿女们生活和事业上的圆满连在一起，所以他更加努力地进行他的试验，真心地希望母亲能够把成功的喜讯带给父亲，以弥补一下他17岁负气离家出走给父母造成的不安和痛苦。

一段时间以来，富兰克林一直在试图验证他的关于闪雷与电的性质相同这一假设，他正在寻找一座高的建筑物，以便能从天空的云层中引下电流，实现他的这一实验。1752年的6月，闷热的夏季到来了，天空经常阴云密布，雷雨交集。望着变幻莫测的天空，富兰克林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忽然，他想起了儿时放的那只蓝色的大风筝，蓦地，一个大胆的想法闯入了他的脑际：借助一只普通的风筝就可以便利地进入带雷的云区，从而完成他期待已久的实验。于是，他立即与21岁的儿子威廉一起动手，精心制作了一只大风筝——两根木条拼装成风筝十字形的骨架，上面蒙上一块丝绸，便形成了它的身躯和两翼。然后，他们在风筝的上端固定了一根尖头的金属丝，在风筝的末端绑上一把金属钥匙。

一天，天色阴沉，电闪雷鸣，富兰克林和威廉把风筝升入天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父子俩焦急地观察着，却没有发现任何带电的迹象。忽然，一团乌云飘来，富兰克林猛然间发现：风筝线尾端的麻绳纤维相互排斥地耸立起来，就像悬垂在普通的导体上一样。他感到一阵狂喜，下意识地伸手指向钥匙，结果受到了强烈的电震。大雨很快自天而降，当雨水打湿了麻绳时，他看到了美丽异常的电火花。

实验成功了，人类可以自豪地宣布：闪雷与电是同一物质。富兰克林高兴得难以自持。但为了进一步研究整理这一研究成果，让这一消息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另一个原因是他公务繁忙），富兰克林父子把这一秘密一直保持到了10月份。10月19日，富兰克林关于电风筝实验的第一篇报道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了，对费城电风筝实验的细节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根据电风筝实验的结论，富兰克林开始考虑他的下一个研究计划了——发明避雷针。在1753年的《穷理查历书》中，富兰克林畅谈了他关于避雷针的构想。他写道：“准备一根小铁棒，但要有一定长度，一端伸入潮湿的地下三至四英尺，另一端要高出建筑物顶端六至八英尺。在铁棒的上端绑上一

英尺普通编织针那么大的铜丝，磨出一个尖头。铁棒可以用一些小锁环固定在房屋上。如果房屋或谷仓是长形的，可以在两侧各竖上一根带尖头的铁棒，用一根金属线连接起来。一幢这样装置的房子就不会被雷电所击毁。闪电被尖头吸引通过金属线进入地面而不会损坏任何物品。同样，在船的桅杆顶端安装尖头铁棒，从铁棒底部接出一根金属线顺桅索延伸至水中，船只也会免遭雷电伤害。”

大约在同一时期，富兰克林还搞了另一项雷电实验：将一根削尖的铁棒固定在烟囱顶端向上伸出九英尺，从铁棒底部伸出一根金属线穿过屋顶下的玻璃管，并通过楼梯引下来与铁矛连接，在楼梯上将金属线分开，每头各系一只小铃铛，再用丝线在铃铛之间悬起一只小铜球，每当雷云经过时铜球就会摆动并敲响铃铛，而上方引出的电火花又可以给电瓶充电。这一实验再度证明了闪电就是电以及尖端吸引和放电的原理，并且证明可以利用这一原理使人类避免遭受雷电的袭击。富兰克林把这种装置安装在宾夕法尼亚学院和政府大厦的尖塔上，这大概就是富兰克林发明并实际使用的最早的避雷针了。当他邀请人们前来参观避雷针时，人们对这一重大发明惊叹不已。但有一位肥胖的阔太太对此却大惑不解：“这么一根尖铁棒能有什么用呢？”富兰克林彬彬有礼地回答道：“夫人，新生的婴儿又有什么用呢？”周围响起了一片友好的笑声。

科学事业的进步取决于科学家的辛勤劳动和他们无私的奉献精神。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而富兰克林则是这一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的前进的步伐是那么果敢坚定，义无反顾，使得那些嫉妒成性和吹毛求疵的人们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自叹弗如。起初，伦敦皇家学会对于来自混沌初开之地费城的报道根本不予理睬，1750年圣诞前夕那次致命的“电火鸡”实验只引起了一些人轻蔑的嘲笑，尽管柯林森先生竭力推荐也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因此富兰克林将自己关于实验的记录和总结进行了整理，以《关于电荷的观察实验》为题于1751年4月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成果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关注，并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后来，法国人马斯—弗朗索瓦·德阿里巴赫德和德·洛等人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了富兰克林的研究结果。事已至此，伦敦皇家学会才开始以审慎的目光研究这位北美学者不时传来的信息，电风筝实验成功后，富兰克林撰写的《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的论文终于在同年底得到皇家学会的认可。其时在巴黎、伦敦等地进行的类似的电学实验以及在高层建筑上安装避雷针等类似的实验已不能再视为创举，因为按照富兰克林公诸于世的研究报告，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使其再现。对于伦敦皇家学会曾表现出的轻蔑冷淡，富兰克林毫不介意，他坚信事实胜于雄辩，与其把精力用在为自己表白辩解上，还不如投入到新的研究和实验中去。伦敦皇家学会终于被富兰克林的成就所震撼，于1753年11月30日将该学会的最高奖励——戈弗雷·科普利奖章授予富兰克林。1756年4月29日，又通过了接纳他为学会会员的决议。这位曾经以“多古德夫人”的笔名为不能上大学而自我解嘲的小学生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先后授予这位文坛骄子和科技奇才荣誉文学硕士学位，自学成才的富兰克林终于堂而皇之地跻身于科学的圣殿之中。

荣誉和奖励接踵而至，但却难以排遣富兰克林内心的歉疚和遗憾，他的母亲在电风筝实验取得成功之前就与世长辞了，未能听到这一连串的喜悦，无法用它们去慰藉老父的在天之灵。两位老人家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一定会



翘首企盼，遥祝儿子的事业圆满成功。

## 第八章政坛精英

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然而，精英论没有必要排斥低层的个人升入社会的上层，恰恰相反，精英论允许社会上有一定的变动，非精英可以变为精英。

托马斯·戴伊

哈蒙·齐格勒

弃商从政，这是老乔赛亚·富兰克林十分向往而又无法问津的事情。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皂烛商人有着极高的政治颖悟力，又有为公众服务的热情，可惜的是繁重的家庭负担埋没了他的政治才华。他曾发誓让小儿子服务于教会以弥补自己的缺憾，却又因付不起学费等现实问题而改变了初衷。本杰明·富兰克林完全凭自己的才干和实力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出了一条生路，而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极大地宽慰了老父那颗拳拳爱子之心。父亲欣喜之余仍希望儿子能够多做一些社会工作，少沾染一些商场上的铜臭气。受过良好家教的母亲也十分关心儿子的处事为人，常常用颤巍巍的手给儿子写信，叮嘱他要洁身自好，与人为善，为更多的人谋取福利。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富兰克林顺从了二老的心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无私地奉献给了生养他的这片热土，他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都将远远超过父母对他的期望。

当富兰克林的生命之舟在茫茫商海中扬帆疾驶之时，善于把握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的舵手果断地把航船转到了政治仕途这条暗礁密布、充满凶险的艰难航线上来，将人生的座标定位在为尽可能多的人谋利益这一焦点上。“我来在世间，不是为了抑制自己的天赋，而是为了重建人类，并轻声呼唤人类感悟其自身的伟大。”一位文坛巨匠如是说。

作为一个十分关心政治的人，富兰克林对费城、宾夕法尼亚及其母国的代议制度有较深刻的理解。在当时，他对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是比较赞赏的，而对宾夕法尼亚的现行体制则颇为不满。1701年，宾夕法尼亚业主威廉·佩恩在议会的压力下颁布了《特权特许状》，该特许状规定殖民地议会握有立法权，总督为最高行政首脑，参事会被剥夺了作为议会上院的地位和立法权，其权力仅限于与总督构成殖民地的最高法院。在这种体制下，业主成了统而不治的“虚君”，总督则成为英王在殖民地的最高代表，享有执行英王旨令、实施议会法律，监督宗教活动、负责本地防务、召集解散议会和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等等大权。富兰克林认为，这些授权使得总督的权力急剧膨胀，有产生暴政的趋向。他认为，议会应该是殖民地的最高权力机关，除了受选民意志的限制外，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实体或个人凌驾其上。富兰克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使宾夕法尼亚议会取得与英国议会下院同等的地位与权力，限制总督的权力。但富兰克林十分清楚：这一计划牵涉到方方面面，对于刚刚迈入议会门槛的他来说，要想在短期内实现这一计划比登天还难。但富兰克林并没有知难而退，他认为自己虽不能很快就根除现行体制中的这些弊端，但却可以从具体的工作做起，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革一步步向着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的目标迈进。

共读会的热心成员们就如何改进现行制度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致，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当地居民的政治文化素养比较低下。要想改进完善现行体制就必须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养，要达到这一点，首先要从

文化教育入手。富兰克林也是这么想的，他早就看到：哈佛大学是麻萨诸塞的骄傲，耶鲁大学使康涅狄格远近闻名，威廉·玛丽学院为弗吉尼亚增添了光彩，而费城呢，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但在高等教育领域仍然是一片空白，甚至连一所像样的中学也没有。富兰克林认为，教育乃是社会生活延续的工具，普通的心智必须用教育加以提高、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又是提高人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手段，惟有人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地保障政府的公正廉洁，促进政治体制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改进完善。

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由富兰克林执笔、写作出版了一个题名为《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之建议》的小册子。在这部小册子中，终生为未受过正规教育而遗憾的富兰克林为千千万万北美青少年的受教育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他首先指出：在北美的早期移民中，许多人在欧洲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他们的后裔中，教育问题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愚昧和无知意味着蜕化和衰亡。现在是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他建议：“应该让一些有闲暇和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人去建立和指导学院。……这些参与建校的人们应当经常访问学院，鼓励支持年轻人，赞助支持教师们，并尽力用一切手段提高本计划的有效性和声誉，……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学生们，以爱抚和仁慈对待之，当他们举止典雅并经过严格的学业考核而最终进入社会时，热忱地团结他们，给予一切方便使他们有所建树……”在论述了教育的重要性、校舍建设和办学方针等重要问题之后，富兰克林还根据自己的见解畅谈了学校的教育方式和课程设置等具体问题，他指出：“关于他们的学业，如果能教给他们一切有用的知识和一切增加本人光彩的东西，那再好不过了。但技艺需要长期的锤炼，而学生学习的时间则有限，因此建议他们学习那些可能是最为有用和最能增加自己光彩的内容。”据此，他要求学生以下几门知识和技巧给以特别的关注：书法、绘图，数学、记账、外语、天文学原理、写作和演说等等。在此，富兰克林还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各种有用的知识都可以通过阅读历史而获得。“的确，爱好阅读好的历史书会把所有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和刚毅的美及人类各种美好而有益的操行深深地印入青年人的脑海之中。”在论及教育的目的这一重要问题时，富兰克林虽然谈得不多，其构想却十分深刻。他认为，教育除了可以培养为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材外，它还有如下作用：“应经常教导和培养的那种仁爱的心胸，这表现在寻找并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人民服务 and 尽义务，这种心胸即所谓良好的教养和基础。”

戴维·霍尔以最快的速度 and 最高的质量印制了《建议》一书，并通过邮政局将这本小册子在社会上广泛散发。一时间，办学兴教成了各界人士饭后茶余的热门话题，引起了广大公众的普遍关注。当社会舆论的焦点集中到教育问题上时，富兰克林及其朋友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运动——这一方式曾在建立消防队、治安警察、孤儿院和大教堂的过程中屡试不爽，这次他们决定再使用一次。结果，他们很快就募集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1749年11月13日，由费城各界推举出的24位受托管理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成立了，首席检察官弗朗西斯先生以其铁面无私和公正廉洁被委以监督学校财政收支的重任，富兰克林则因其在筹划办学的运动中功绩卓著而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

有了钱，又有了办学的组织领导机构，问题就算解决了一大半，富兰克

林等人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工作。首先由他主持制订了一部学校管理章程，章程在委员会通过后，便开始租赁校舍，聘任教师。就在同一年，即 1749 年年底，学校正式开课了。在当时，学校开学成了殖民地的一件大事，很快，入学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这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却也给办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校舍严重不足，而建设新校舍所需的巨大投入又是人们力所不及的。就在这个关口，似乎是上帝的旨意，富兰克林等人发现了一套现成的校舍——一所闲置不用的教堂，即前面所提到为怀特菲尔德先生布道所修建的那所大教堂。

怀特菲尔德曾经成功地唤起了北美人民的宗教觉醒，可惜的是，此后再也没有比他更为出色的传教士莅临费城了，虔诚的教徒们或者在家里或者在各自教派的小教堂里作礼拜，那座宏伟的大教堂自建成以后一直派不上用场，教堂也没有任何进项，教堂管委会因无力偿还地租和债务而陷入困境，一筹莫展。身兼教堂和学校双重管理职责的富兰克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教堂管委会把房产转交给学校方面，后者负责分期偿还其债务，并且根据初建时的宗旨，把当中的正厅留给偶尔前来布道的传教士使用。两厢高大的厅堂改建成两层结构，上下各隔出多间房子作为校舍，并为穷苦孩子设立一所免费学校，同时还购置了一些地皮，以供建校使用。所有操心费神的大事，例如改建教堂、筹措资金、购置物资和监督工程等等，均由富兰克林承担下来，并且完成得十分圆满。后来总督给学校颁发了执照，学校评议会归殖民地政府管辖，英王、业主和宾夕法尼亚议会又分别给以捐赠和拨款，学校终于在 1751 年 1 月正式创建，这就是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多少年来，它为宾夕法尼亚和全美国培养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专业人材。

兴教办学不仅能够促进宾夕法尼亚经济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与殖民地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这一关系到人们未来和前途的大事有密切联系；富兰克林在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上辛勤操劳，尽心尽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他的威望有了进一步提高，以致于每当费城发生了什么大事或要办哪些重要事情，人们常常会首先探询富兰克林的态度和意向，他们往往会问：富兰克林知道这件事吗？他对此抱什么态度？尽管富兰克林并非沽名钓誉、好大喜功之辈，但由于人民的拥戴和推崇，他已在不知不觉之中扮演了公众领袖的角色。这样一来他就更加繁忙了，虽然他总是设法抽空去进行他所热爱的科学实验和哲学研究，但是他的时间和生命已经越来越多地为公共事务所占据了。

有病到医院看医生，这在 18 世纪上半期的西欧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然而此时的宾夕法尼亚却还没有一座标准化的医院。不同的移民团体和印第安部落医治病痛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去教堂祈祷，有的找私人医生就诊，有的使用祖传秘方，有的则求诸于江湖术士和巫医神汉，葡萄酒被当作最好的兴奋剂，烟草被认为具有治疗痛风、寒热以及醒酒、解乏、疏通人体毛孔和血脉等神奇功能。倘若生了疟疾之类的传染病，除了放血、清肠之外，似乎只能将病人隔离开来，任其自生自灭了。所有这一切使得医学专家托马斯·邦德先生忧心如焚。

邦德是美洲哲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曾在巴黎就读，后来一直在费城开办诊所，有着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虽然他对于社会事务和民众心理尚缺乏深入的了解。为了使更多的人免遭病痛的蹂躏折磨，他以饱满的热情单枪匹马地开展募捐活动，为建立宾夕法尼亚医院而四

处奔走游说，但收效甚微。穷苦人认为，到医院看病是有钱人的事情，自己既没有这个福份，也没有这个能力；富有者则不甘心自己掏腰包让他人渔利；而更多的人并不是不希望建立一所为公众服务的医院，他们是担心钱财使用不当会白白流失；许多人甚至公开表示，如果富兰克林不出面，他们对这件事就不抱有信心。在屡屡碰壁之后，邦德先生终于幡然醒悟，弄清了广大民众的心理，于是他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了老朋友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虽不是一位医学家，但他与医学却有着一种不解之缘：作为一位出版商，他曾印刷出版过不少医学书籍；作为一位涉猎极为广泛的自然科学家，他对医学的某些领域有过深入的探索，并卓有成绩。例如，为了减轻哥哥约翰的病痛，他设计发明了医学史上第一个具有伸缩性的导尿管；为了使小儿子弗朗西斯的悲剧不再重演，他论证了接种牛痘对预防天花的效用，并呼吁家长们及时地为自己的子女接种；他还曾研究过西印度群岛流行的一种无名腹绞痛的病因，解决了当时医学领域的一个难题。他所研究的这些医学课题都是他当时亲眼目睹的给人类造成痛苦的普通病症。这说明，富兰克林虽不是一位医学家，却对医道及其宗旨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具有一种悲天悯人、愿为天下人解除痛苦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当邦德对他畅谈了建立医院的重要性和筹建方案时，得到了他巨大无私的支持。

富兰克林身体力行，带头慷慨解囊，捐款 25 英镑。接着，他召开了一个公民大会，向与会者公布了邦德建立医院的计划，用极具说服力的语言解释了建立医院的重要性及其将给民众带来的好处，并要求与会者向全体居民进行宣传动员，以促进这一公益事业地完成。另外，富兰克林还在《宾夕法尼亚报》上发表文章，做进一步的宣传鼓动。不久，他们就陆续收到了不少捐款。但一段时间之后，捐款的数额日益减少。这使富兰克林认识到，有必要得到议会的支持，否则，民众的热情将不会持久。于是，富兰克林亲自起草了一份有关建立医院的议案，于 1751 年 1 月 23 日递交给议会审议。出于他的意料，该议案在议会中遇到了很大阻力，主要是农村议员对此计划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一事业只有利于城市居民，因此应由市民出资兴办。针对这一局面，富兰克林采取了有效的对策。一方面，他在议会中广泛游说，说明医院是为所有的人（包括穷人、富人、费城人和外地人）服务的，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采取了一项颇为“狡猾”的计谋：在游说议员时，他要求议会拨款 2000 镑，条件是民间也将捐献相同的数额；在向人民募捐时则许诺：民众每捐一份款项议会也会拨出同等的款项。这一谋略效果极佳，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同时激起了议会和民间两方面的热情和积极性，最后的结果是：获得的款项大大超过了建立医院所需的数额。资金初步到位之后，医院便破土动工了。1755 年 5 月，一所美观实用的医院大楼在费城的云杉街和松树街之间的第八大街落成了，它的基石上镌刻着富兰克林撰写的优美的铭文：

在耶稣诞生之第 1755 年

在乔治二世仁慈的统治下

（因为他为其人民寻求幸福）

在繁荣昌盛的费城

（因他的人民有为公众服务之精神）

这座建筑

是由政府及许多私人慷慨捐助  
为拯救那些处于疾病和痛苦之中的生灵  
而虔诚地建造的  
愿仁慈的上帝  
祝福这项事业

富兰克林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人民对他的人道主义义举给予的崇高奖赏。但一生以拯救斯民为己任的富兰克林对此却显得极为大度，虚怀若谷，他一再把功劳推在建立医院的首倡者邦德先生身上，在其《自传》中还特意注明：“人们把这一功劳归在我的身上，其实是朋友托马斯·邦德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在为医院筹资的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为了确保筹资成功，富兰克林不仅向公众和议员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充分运用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和道德感召力，而且还动用了某些“狡猾的”伎俩，颇有些“马基雅弗利主义”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味道。但由于他动机纯正，目的高尚，成效甚佳，还从未有哪个人指责他使用了“阴谋诡计”。或许历史的玄妙就在于此，历史学家们往往喜欢以其建树和功德品评精英人物，而对其采取的某些有悖于常规的行为方式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放之次位。

富兰克林是在45岁那一年（1751年）正式当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的，儿子威廉也就是从这时起接替了他的议会秘书一职。在天赋和禀性方面，威廉与父亲一样聪慧机敏，正直刚毅，精力过人，但可能由于是在长辈的爱抚和顺意之中成长起来的缘故，他的性格中多了几分守成和清高的气质。就在这一年，宾夕法尼亚人获悉乔治二世批准了英国议会关于把重罪犯遣送到北美去的法案，顿时，北美各界群情激昂，人民都对这一无耻的举动感到愤愤不平。诚然，布衣百姓和政坛精英有时会拥有同样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但在表现形式和处事态度上却往往大相径庭。前者易于冲动激奋，无所畏惧，后者则冷静沉稳，富于妥协和灵活性，而在这冷静沉稳之中常常孕含着某些更令人生畏的东西。

议会推举富兰克林起草一个关于拒绝接受英国罪犯的法案。威廉担心因此会得罪殖民当局，劝父亲三思而行。但富兰克林不为所动，他决心要为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尊严而疾呼呐喊。于是，他用那支辛辣幽默的笔写了一篇极具讽刺意味而又不失恭敬的文章，刊登在《宾夕法尼亚报》上。他在开篇这样写道：“为了改善和充实美洲，不列颠政府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将重罪犯送往殖民地的决定。毋庸置疑，这会为北美注入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正是大英帝国的繁荣富裕才滋生出了如此之多的在鸿蒙初辟的北美不曾问世的特殊材料组成的特殊的人。北美人认为，这种母亲般的关怀要求孝顺子女般的感恩，至少要求提供某种补偿。在殖民地许多省份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存在许多有毒的爬行动物，我们称之为响尾蛇。它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重犯，每当碰到它们，我们便根据最古老的法律将其处死。但因这是血腥的法律，可能太残酷了，无论这些生灵对我们多么有害，如果能改变气候，它们或许能改变本性。对此我谦卑地提议将这种残酷的死刑改为流放。……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送到不列颠，细心安置在圣詹姆斯公园、斯普林公园和伦敦周围的消遣场所，安置在贵族的别墅里，特别安置在首相、贸易大臣及国会议员们的花园中，因为我们对他们最为感恩戴德。尽管把响尾蛇运往不列颠要冒

很大风险，但这并不会比把罪犯运往美洲更为困难。”

富兰克林在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双向的“公平交易”之后，又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了由此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他指出：“试想一下，这将会是一种何等可怕景象：家庭被强盗闯入，商店被盗窃，旅途遭抢劫，儿子随时因堕落而上绞架，女儿因放荡而感染梅毒，妻子被刺杀或丈夫被割断喉管，孩子的头颅被斧子击碎，这就是殖民地所得到的改善和充实。而我们送往不列颠的响尾蛇不论多么有害，都能被它们良好的榜样作用所抵消。原来诚挚朴实的英格兰绅士由于熟悉了这些爬行动物，学会了爬行，钻营、垂涎和扭动，并不失时机地毒害妨碍它们前进的任何人。……这是一项公正的贸易，也是对恩惠的回答。……然而这项贸易，像所有的贸易一样，祖国比我们得到更大的好处，它将不必冒同样的不便和风险，而坐收同样大的利益。因为响尾蛇在企图造成危害之前会发出警告，而犯人却不会；响尾蛇有一个漫长的冬眠期，而犯人却没有。”

就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美洲绅士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回击了可敬可畏的大英帝国的神圣法令，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倨傲抗上的精神和对母国深深的不满，这与历来谦和宽厚的富兰克林简直判若两人。受过高等教育而颇为自负的威廉为父亲这篇构思独特、胆略过人而又不失风雅的文章所深深折服了，他真正体味到了手中这支笔的份量到底有多么重。后来，富兰克林协助起草了一个关于禁止向宾夕法尼亚遣送重罪犯的法令，被议会正式通过了，他所描绘的那幅可怕的图景终于未能在宾夕法尼亚大地上出现。据查，这可能是富兰克林参与撰写的最早的反对殖民宗主国的法律文件。

自从富兰克林成为议员之后，众议院的事情增加了不少，议员们都感到格外忙碌。议会充分发挥了立法机关的职能，提高了办事效率，制订了许多深得民心的法令，办了不少顺乎民意的实事。富兰克林就是具有如此之大的神通，无论他在何时何地，都能够激励和感染所有的人，带动他们一道投入到紧张有益的工作中去。他就像一座上足了发条的钟，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奔忙着。议会在通过了关于办学校、建医院、反对重罪犯遣送美洲等重要法令之后，又开始讨论富兰克林提出的关于修建马路的议案了。

当年去过费城的人都禁不住为这座城市开拓者的精心设计和建设而赞叹不已：整座城市坐落在两河之间的开阔平原上，以宾夕法尼亚广场为中心，呈棋盘状向四周辐射，道路宽阔笔直，纵横交错，政府区、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排列有序，城市建筑鳞次栉比，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一遇雨雪天气，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街道变成了河流，广场成了一片充斥着垃圾污泥的黑色沼泽，令行人望而怯步，苦不堪言。

富兰克林走南闯北见识过不少城市的街道，且不说伦敦那车水马龙、充满王者之象的林荫大道，就连波士顿那条铺着碎石子的街道也要比费城的道路强出许多倍。道路不畅不仅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不便，不利于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大大损害了整个城市的形象。于是，富兰克林又开始为修建街道一事而苦心筹划。他不断写文章，向各界人士呼吁，终于募得了一笔资金，对某些重要路段进行了改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资金太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他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议会。1757年，他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城市铺路的议案。经过一番努力，议案最终被批准，通过征税的方式筹得了大量资金，全部用于费城街道的改造工程。

改建后的费城街道外观和质量都大为改进。由石头铺成的路面平整坚

实，大街的两旁建有阴沟以便排水，窄小街道的排水沟设在路基之下。另外，还采取了有效措施以维持街道清洁和夜间照明。每户居民每年交6便士卫生费，雇佣一批清道夫，每天清晨打扫路面，这不仅大大改善了城市的卫生面貌，还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受到已故的克里夫顿先生家门口竖立的一种带玻璃罩的长明灯的启发，富兰克林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路灯：用平板玻璃作外罩，在上方装一个抽烟的小筒，下方留一个空隙，以便让空气流入，使黑烟冒出。这是一种即实用又很经济的路灯，灯罩可以长时间保持清洁，如破损可随时更换。安装上这种路灯之后，费城的马路即使在夜间也可以畅通无阻了。

道路通，百业兴。18世纪中叶的费城以交通发达，市容美观、经济文化事业繁荣著称于北美，招来了商贾，吸引了移民，方便了人们的社交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着费城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富兰克林本人的事业也大获其益：他的印刷所（现为霍尔先生管理）客户盈门，业务量大增：《宾夕法尼亚报》的订户数量急剧上升；作为邮政局长（1753年他被任命为全殖民地的邮政副总监），他每年从邮政业务中上交的利润逐年递增，而这一切都使他的个人财富迅速增加，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建功立业的雄心。

作为政治家的富兰克林兴趣十分广泛，精力也相当充沛，在这一不太长的时期里，他为费城以及宾夕法尼亚人民办了许多件实事：为了保卫英属北美殖民地边境免遭英国的宿敌西班牙和法国人的骚扰，富兰克林倡导并组织了费城民兵自卫团，这支武装力量在保卫殖民地社会安宁和边防安全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火灾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并杜绝火灾隐患，富兰克林于1752年4月发起组建了火灾保险公司，这在当时的北美是一个创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集中了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投资赢利，大大改善了消防队的装备，使投保人在遭受火灾后能及时得到补偿。他还在1753年从费城出发的美洲首次远航北极的探险活动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51年10月，议会有条件地通过了富兰克林拟订的一个关于发行纸币的法案，在宾夕法尼亚境内发行纸币20000镑，对该地区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投身于政坛的最初年代里，富兰克林出手不凡，崭露头角，显示出了一个职业政治家高超的领导艺术、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他孜孜以求的是北美人民的富裕、祥和、民主和自由，而这些在殖民地时代却显得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总督、业主、保守主义者以及英国内阁和王室，在他通往理想目标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在年复一年的政治生涯里，他必然会被深深地卷入到这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冲突之中，等待着他的的是更加棘手的难题和更为严峻的考验。要想冲破这道道难关，实现自己美好的人生理想，富兰克林所需具备的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宽厚仁慈，普罗米修斯的正义忠勇，苏格拉底的智慧和谦恭，而且多少还要有一点马基雅弗利的韬晦和谋略。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切在富兰克林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外，他还拥有某些前人所不可能具备的有利条件——近代科学所赋予他的理智的头脑、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方式以及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因而，他总是能以一种超前的意识和主动乐观的姿态去迎接命运的挑战，以最为有效的方法克服重重困难，推动事业的进步。他在任议会秘书时就已经发挥议员的作用了，成为议员后不久便能在议会辩论中左右局势，从而成为当然的议会领袖。命



运似乎已经注定，富兰克林必将成就一番大事业，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机遇而已。

## 第九章保卫边疆

对于美国人来说，从一开始，发现和成长就是同义词。旧世界的国家都熟悉自身的国土、边界、地形和资源。当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何处，发现他们必须依靠什么进行工作时，他们就预期自己的国家能够不断成长。

丹尼尔·布尔斯丁

祖国，顾名思义，是人们自己的国家，是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子子孙孙安身立命的场所，也是他们世代代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的疆域。然而在殖民地时期，“祖国”这一概念是含混不清、难以界定的。

北美东海岸 13 个殖民地上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因此他们把大英帝国看作自己的祖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富兰克林当时也怀有这种信念。他们把大洋彼岸的英伦三岛视为自己的父母之邦，而英国则把散落在北美各地的民众视为自己的子民。就像波士顿米尔克大街那个有蓝色圆球门标的家一样，十几个未成年的子女围绕在父母的膝下快乐地生活，一旦长大成人便各奔东西，自立门户，但依旧眷恋着生养了自己的父母双亲。所不同的是，原来的大家庭变成了十几个小家庭，这些小家庭又不断地派生出更多的小家庭，彼此在经济和社交上的往来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淡漠，虽然他们仍然具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

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北美人来说，他们对远隔重洋的母国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祖辈那种血肉相连的依依深情转变为一种崇敬和神圣的追忆和赞叹。相反，他们对于脚下养育着自己的这片沃土却有着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利害关系，并由此而滋生出一种新的深厚情感，但是他们还不能准确地称谓它，也一时无法断定：这种情感与依恋母国，二者之间到底孰轻孰重？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仍处在变动不定之中——移民的迁徙、商业的拓展、西进的浪潮、对外征战以及强邻的侵扰，使得他们的疆域不断地延伸、扩展、变形。每块殖民地几乎都是以一个或数个居民稠密区向四周辐射而成，它们的边缘地带大都是政府力量达不到的荒蛮之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只有强悍的印第安人和盗马贼频频出没，再加上英国殖民政策的限制，各个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受到了阻隔。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布尔斯丁所说，18 世纪“美国人并非生活在一个疆域里，而是生活在无数界限不清的孤岛上，整个美洲大陆都笼罩在半明半暗的状态之中，经常处于已知与一无所知之间”。但富兰克林是个例外，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走南闯北，通过经商、从政和进行研究，对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状况已经了如指掌。他十分清醒地看到，要想使北美早日繁荣富强起来，首先必须清除北美各殖民地的这种分散孤立状态，使之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构想在他初次与印第安人打交道时就已经萌生了。

印第安人曾经是欧洲移民的恩人。

1620 年，102 名遭受宗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帆船驶抵北美东海岸，漂泊了好几天才找到了落脚点——一座被印第安人遗弃的村落，这里前有天然良港，后有一大片沃土，山林葱翠，溪水潺潺，是一个理想的定居之所。谁知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初来乍到的移民由于缺衣少食、饥寒交迫，于当年就死去了一半。在这危难之际，勤劳善良的印第安人向他们伸出了救援之手，给他们送来了许多食品，还教给他们如何种植玉米、养

麦和捕鱼、打猎，才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第二年秋天，获得了丰收的英国移民用打来的猎物、自种的南瓜、红薯、玉米大摆宴席，以酬谢印第安人和上帝的恩典，而前来作客的印第安人则带来了鹿肉，火鸡。大家欢聚一堂，尽情娱乐，白天摔跤、赛跑、射箭、吃喝，晚上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由此而产生了北美特有的民间节日感恩节。

从感恩节的发端来看，移居北美的欧洲移民理应对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感恩戴德，友好相处，但后来发生的事却令人不寒而栗。潮水般涌来的欧洲移民在开发美洲，寻求自己理想乐土的过程中，把印第安人看成了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视为寇仇，他们使用各种野蛮卑鄙的伎俩来对付古朴雄厚的印第安人：欺诈、不平等交换、驱逐、公开抢劫，甚至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忠厚耿直的印第安人万万没有想到；以现代文明自居的欧洲白种人竟然如此寡廉鲜耻，凶残暴虐，他们被深深激怒了。向来以血亲复仇作为惩恶扬善之手段的印第安人开始了以牙还牙的反抗斗争，以保卫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神圣土地和弱小的民族。在富兰克林生活的那个时代，感恩节虽然年年过，可与印第安人的摩擦却延绵不断，而印第安人的反抗斗争又常常被英国的宿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所利用，成为困扰英属殖民地的一件棘手的大事。英王任命的总督和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谁也找不到一个在北美实现长治久安的好办法。

凭着对北美局势的全面了解和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4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就预感到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从那时起他对北美殖民地的安全问题就有了一种全面的考虑，他是个费城人，可想到的是宾夕法尼亚、北美13个殖民地以及大英帝国的整体利益。1747年11月17日，他发表了自己撰写的小册子《明显的事实》和《关于宾夕法尼亚和费城目前形势的忧思》，针对法国私掠船的猖獗活动以及法国人煽动印第安人向宾夕法尼亚进行挑衅的事实，指出，即将发生的战争是全方位的，我们的敌人可能会从特拉华湾溯流而上，也可能从西部边境长驱而入，中心城市免不了会遭到突然袭击。可是费城人对这一严重的形势却视而不见，毫无防范，市民们以为印第安人首先光顾的地方应该是生产农作物的种植场，乡下人认为印第安人最热衷于洗劫城市，富有的商人认为筹办防务是掌权者的事情，于己无关，而掌权的教友派人士则僵死地遵奉其教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富兰克林力图使人们看清这样一种残酷的事实：费城既无军事要塞，又无自卫武装，如果遭受到突然袭击，除了束手待毙外别无选择。为了进一步唤起人们对防务问题的警觉和重视，富兰克林叙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艘航船即将沉没了，但水手们却拒绝为它排水，因为甲板上有一个他们憎恶的人，排水虽能使自己得救，也会救下那个人。”讲到这里，这位温文儒雅的哲人用一种惊心动魄的语言慨叹道：“难道全殖民地不是一体的吗？”“城乡的中产阶级，农场主和小商人们，为我们切身的利益，迅速行动起来吧。……我们至少有6000个有战斗能力的人，其中不少是会使用火药武器的，许多人曾是猎手和射手，十分坚强勇敢。”

这些小册子犹如警钟长鸣，震动了每一个费城人的心，激起了他们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的热情和勇气。富兰克林趁热打铁，与当地的头面人物们进行了广泛的磋商，终于使教友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不反对防御性的自卫战争的主张，虽然其中仍有一部分人表示，他们不会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态支持组建民兵，因为他们必须维护该教派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此后很少再

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成立民兵组织了，于是，创建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这一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富兰克林的肩上。

虽然富兰克林从未介入过军事方面的事务，但他在组织发动民众方面却十分老练，这一次他又做了周密的安排。首先召开了一次秘密决策会议，与会者大多数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商人。富兰克林再次向他们阐述了组建民兵对殖民地的重要意义，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拟定的组建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他们纷纷签字表示赞同。两天之后，他们又在罗伯特咖啡厅召开了一次大会，参加者主要是费城的显贵和头面人物。由于事先已做了广泛的宣传动员，他们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大会后没几天，前来报名的志愿者就达到千人以上。不久，组建民兵的热潮席卷了整个宾夕法尼亚，志愿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已超过了万人。他们用自备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按英国军队的编制组成许多连队，推选出各级军官，定期集中起来进行军事训练。

由于富兰克林在创建民兵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民兵指挥官们一致推举他出任上校指挥官。但富兰克林并未被这一象征着权威和尊严的头衔所诱惑，他认为自己并不合适，婉言谢绝了这一任命，并推荐行伍出身的劳伦斯先生出任此职，这一要求最终得到了认可。倒是儿子的军衔最终超过了父亲，在优裕生活中长大的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总感到和平环境缺乏刺激，也不利于自己的成长，立誓要投笔从戎，到军界施展才华。1746年夏天，他获准加入宾夕法尼亚民兵，出任少尉排长。望子成龙的富兰克林旋即向伦敦的挚友、著名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订购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专门记述公元前3世纪布匿战争的著作《波莱皮尤斯》，用来作为儿子的军事教科书，期望他能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建功立业，成为一名如同古代名将汉尼拔或者西庇阿那样的骁勇战将。令人遗憾的是威廉的这次军旅生涯十分短暂，预期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大规模入侵没有发生，他只在加拿大边界参加过一次不起眼的战斗。

只有保卫家乡的热情和献身精神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入侵之敌必经的港口、关卡等险要之处设立火力猛烈的军事防线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战争的破坏力压缩到最低限度。为了解决购置城防所必需的大炮问题，富兰克林在掌权者中折冲樽俎，四处游说，终于使恪守和平教义的教友派对军事之事缄口藏舌。实际上，他们的沉默就是对防卫事务的最大支持。议会和参事会最后通过了关于拨款和发行彩票筹集城防资金的决定。

人们空前的爱国热情使资金筹集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从波士顿购买的39门大炮如期运至，威风凛凛地屹立在新建的炮台上。充满爱国热情的民众手中有了重武器，组成了一道令入侵者望而生畏的钢铁长城。但是，在法国私掠船时常出没的河口地带还缺少重炮扼守，而城防经费已经告罄了。富兰克林突然想起：纽约有不少大炮。于是，他立即协同四位特派员前往纽约向总督克林顿先生求援。

乔治·克林顿是个性情豪放，善于交际的汉子，办事一向很爽快。但这一次他却十分谨慎小心，一口回绝了借炮的请求，理由很简单——纽约的城防全靠这些大炮支撑门面。富兰克林虽然心中不快，却不露声色，依旧谈笑风生。在晚间举行的宴会上，他按照当地人的习俗不断地向克林顿先生敬酒，赞颂他在当政期间建立的功绩。当看到克林顿略带醉意之后，才婉转地谈起借炮的事。处于亢奋状态的克林顿的态度开始缓和下来，答应可以出借6门大炮。几杯酒下肚之后，又把数字改为10门。最后，他答应借给费城民兵

18 门能够发射 18 磅重炮弹的大炮。事情的结局使富兰克林大喜过望，从不贪杯的他破天荒地喝了几大杯马德拉白葡萄酒，沉醉在极度的喜悦之中。不久之后，在通往特拉华湾的河口地带耸立起了 18 尊大炮，它们像 18 位钢铁巨人忠实地驻守在炮位上，使入侵之敌闻风丧胆。

从组建费城民兵武装开始，富兰克林就从印第安人问题引起了对殖民地利益的通盘考虑，并萌生了把殖民地联合为一体的宏大构想。当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是错综复杂的。从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从属关系看，分为三种类型：王家殖民地（其总督由英国国王直接任命）、业主殖民地（其总督由殖民地业主指派，但须受英国法律约束）和自治殖民地（其总督由民选产生，但须按英王颁布的特许状行事）。从自然地理、经济特色和经济制度来看，英属北美殖民地可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区域（即所谓“三区结构”）：北部土地贫瘠狭窄，但沿海地带靠近贸易要道，有天然良港，适合于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小农经济比较发达；南部土地辽阔肥沃，气候温润，适宜于大面积种植农作物，这里盛行着一种野蛮落后的经济制度——种植园奴隶制；中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介乎前二者之间，以小农经济为主，也存在一些大种植园。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差异和互补性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交流，但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和通讯手段极为落后，特别是英国对北美实行苛刻的殖民主义政策，千方百计阻碍殖民地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得各殖民地之间的交流受到了巨大限制。特别是在政治上，13 个殖民地之间的交往很少，它们之间的联系还不如与母国更为直接一些。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而且一遇紧急情况（特别是战争），其后果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此时，英属北美殖民地边疆地区的危机已经日益加剧了：法国人在占据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后迅速向东扩张。以势不可挡之势占据了大片英国人觊觎已久的土地，并向英属各殖民地进逼渗透。

但是，在瓜分狂潮席卷北美洲的过程当中，欧洲列强及其移民也遭遇到了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一般来说，当时的北美印第安人大部分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阶段，分散流动的氏族部落是其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单位，他们大都是熟练的猎手和渔民，也有许多定居的农民。北美印第安人正直、善良、坚毅，热爱亲人，忠实于朋友，彼此间充满真挚的感情。但他们又是勇敢无畏的战士，对敌人疾恶如仇，宁愿战死沙场也不做侵略者的奴隶。正是基于这种对善与恶的纯朴认识和热爱亲人家园的炽热情感，他们对白人入侵者进行了殊死的抗争。但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种抵抗往往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白人殖民者，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古老的种族和美好的家园正面临着空前可怕的危机。于是，许多印第安部落开始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以抗击掌握着先进科技和杀人武器的白种人的进犯，其中尤以易洛魁人的六部落联盟最为典型。在 17 世纪末期，为了对付英法的扩张，操易洛魁语的英霍克人、卡尤加入、奥农达加人、奥内达人、塞内卡尔人结成联盟。18 世纪上期，图斯卡罗拉人的加入使之成为六部落联盟。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联盟形式为族、村首领公共会议，每部落有一票表决权，实行全体一致的裁决。他们有效地控制着从奥尔巴尼到大湖区的通道，既阻碍着法国人向东扩展，也遏制了英国人向西迁徙。依靠着联盟的力量，易洛魁人坚强地维系着祖上传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英国和法国势力范围的交叉地带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

障。面对这样一个处于危境之中的坚强质朴的民族，富兰克林既充满同情心，又怀有深深的敬意，同时，易洛魁人结成部落联盟一事又使他浮想联翩：“六个愚昧的野蛮人部落都能制订出一个关于联盟的计划，并坚持执行了若干年，表现出一种持久的稳定性。可是对10个或12个英属殖民地来说，这样的联盟却不能建立，岂非咄咄怪事。更何况这种联盟对于它们来说更为必要和有利，而且也不能设想它们缺乏对利害关系的共同认识。”

在这一时期，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威胁来自法国殖民者，他们不断向东扩张，无休止地侵吞蚕食英属殖民地的土地。为了达到击败英国，称霸美洲的目的，法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了狡猾的“怀柔”政策，不仅派出大批官方和民间的代表频频与印第安人接触，对他们进行安抚和拉拢，而且还使用重金贿赂、高价收买和空口许诺等手段，笼络各印第安部落的首长，煽动仇英情绪，挑唆他们向东袭击骚扰英国人的居住区，制造英属殖民地的边疆危机。法国人的这一策略收到了显著效果，除了一向以法国人为宿敌的易洛魁六部落等少数印第安人外，其他大部分印第安部落都视英国人为仇敌，在法国人的支持怂恿下不断对英国人进行袭扰抢劫。他们用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枪支弹药武装起来，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神出鬼没地袭击英国人的商队、畜群和移民点，一有机会就闯入英国人的居民区，烧杀掳掠，肆意蹂躏，甚至以剥取死者的头皮炫耀取乐。印第安人的袭击事件频频发生，在边疆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等殖民地深受其害，许多西部移民点纷纷东撤，当地居民不断向各殖民地政府和英国当局呼吁求救。但由于西部地区辽阔空旷，印第安人来去无踪，现有的民兵武装已显得势单力薄，鞭长莫及了。

在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问题上，英属北美殖民地内部历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这一争论由来已久，而且各方的观点大相径庭。

在英国殖民当局眼中，印第安人是魔鬼的信徒，是无法同化的野蛮人和异类，主张用残酷无情的暴力手段将他们砍尽杀绝，或者把他们驱逐到远离文明世界的荒蛮之地，任其自生自灭。对于当局的这一主张富兰克林向来嗤之以鼻。他不仅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对印第安民族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敬意，而且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英勇善战的印第安人依靠以牢固的血缘关系结成的部落（部落联盟）和顽强的繁衍能力必将生生不息，是难以斩尽杀绝的。而且，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环境、神出鬼没的战术和从文明人那里得到的近代化武器所进行的英勇反抗，也是白种人难以消受的。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对印第安人的看法是同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相一致的。他们认为印第安人的原始信仰与他们的教义有许多相通之处，既然基督圣明的灵光将会照亮每一个人，其中也必然包括印第安人。他们对边疆地区惨遭印第安人蹂躏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一味消极地对印第安人实行安抚收买政策。费城民兵武装建立起来之后，教友派把持的议会拒绝再为城防事务增拨款项，却异常大方地向印第安人赠款，希望用大笔的金钱来“笼络感情，增进友谊”，化干戈为玉帛。富兰克林心中明白：贿赂的方法只能奏效一时，不可能长久，印第安人在接受了法国人的重贿之后胃口会越来越大，而费城的财政状况却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使教友派的怀柔政策难以为继。财政状况恶化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混乱无序所引起的。由于地租和地价不断增值，费城的大业主们个个腰缠万贯，财大气粗，但他们却拒绝交纳任何捐税。议会一再要求业主们照章纳税，为对付印第安人做出贡

献，却遭到了断然拒绝，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争论。业主们声称：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并不是土地所有者引起的，真正的麻烦是教友派的和平主义政策使费城和宾夕法尼亚毫无防御力量。而教友会教徒们则反唇相讥，把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土地占有者的贪婪和残忍。

在一片无休无止的攻讦责骂声中，富兰克林冷静地倾听着，思忖着，他希望能从各种不同的声音中找到一种切实可行并能大多数人们所接受的行动方案。他既不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大亨，也不是把持着立法、行政大权的议长、总督，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议会成员。但是，他具有科学的思辩精神和准确公允的判断能力，经过多年勤奋务实的公职生涯在民众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因此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了一种健康向上的强大力量。他既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私保守，也反对教友派头面人物的狂热偏狭，更反对极端的殖民者所鼓吹的种族灭绝政策。他要求议会采取有效的军事防御措施，同时对印第安人实行宽舒友好的和解政策，他还要求业主们履行公民义务，照章纳税，为费城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他还多次向总督汉密尔顿进言，希望他能主动地与弗吉尼亚、马里兰等殖民地联络，共同商讨联合防务等问题，打击真正的敌人法国佬，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宁。这一时期，富兰克林脑海中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不是一个相互隔绝的孤岛，而是北美东部沿海地带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大片美丽富饶的沃土。

自以为是的汉密尔顿总督把富兰克林的建议当作了耳旁风，倒是弗吉尼亚总督罗伯特·丁威迪捷足先登，于1753年9月初，在弗吉尼亚北部盛产苹果的温彻斯特镇与印第安人六部落联盟进行了谈判，达成一项实现和解的协议。这一举动为宾夕法尼亚等地与印第安人六部落签订类似的条约铺平了道路。参加这次会议的弗吉尼亚议长威廉·费尔法克斯在丁威迪总督的授意下，立即派人给宾夕法尼亚总督汉密尔顿送来了一封急信，说明印第安人六部落已同意在回归途中经过卡莱尔镇时可以与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商谈和平协议。汉密尔顿双手紧捏着这封信，就像已经抓住了和平的曙光，生怕它再从手中溜掉。他正苦于找不到一种既不用向业主征税、又能安抚印第安人的方法呢，此时总算是有了希望。谈判人选很快敲定，在排除了极端的教友派分子和业主的代言人之后，在议会中以稳健公允、卓有见地而著称的富兰克林成了最佳人选，另外还有议长艾萨克·诺里斯和参事会秘书理查德·彼得等。由于总督不便亲自出马（因为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在温彻斯特没有接见印第安人），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他亲自拨出800英镑巨款用来购买赠送给印第安人的礼品。

9月22日，富兰克林等三名特派员策马上路了，满载礼品的马车队紧随其后，在坎伯兰谷地沿着拓荒者的足迹，在难以辨认的崎岖小道上蹒跚而行。骑在马背上举目远眺，西部风光尽收眼底，一望无际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上长满了色泽斑斓的杂草野花，树木稀疏，人迹罕至，广袤空旷，远方是青翠的群山和茂密的原始森林，与东部沿海繁华喧闹的城市相比恍若两个世界。富兰克林又一次深深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是多么壮阔美丽，他想：如果与印第安人无休止地争夺下去，这些地区迟早会被凶恶狡诈的法国人占领，其后果不堪设想，谁知道法国人蚕食鲸吞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啊！无论如何也要与印第安人结为盟友，阻止住法国人东进的步伐。

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富兰克林一行终于来到了卡莱尔镇。印第安人已经先期到达了，总共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六部落联盟的首领们以及一批精

壮的男人、女人和若干名儿童。印第安人的临时居所是几座长方形的榆树皮大棚屋，他们以家庭为单位分别居住，就像在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一样。不久，特拉华、迈阿密等地的代表陆续赶至，与印第安人的谈判正式开始了。

富兰克林是第一次面对面地与有组织的印第安人团体直接打交道，他意外地发现，易洛魁人不仅勇武善战，粗犷豪放，而且在举办会议、进行外交活动和宗教活动等方面也是行家里手，并且充满了原始古朴的智慧和极其独特的风格。印第安人虽然对白种人送给他们的礼品很感兴趣（如衣服、鞋帽、布匹和各种食品，特别是火药、皮革和酒等），但是，他们更重视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尤其敬重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为之而献身的烈士们，在对土地和先烈的英灵进行祭奠之前是不能进行任何重大事情的。所以这次会晤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对先前在对法作战中牺牲的印第安武士们进行祭奠，各殖民地的特派代表都应邀出席了这一重大活动。易洛魁人的首领们从各殖民地送来的礼物中挑选出一大批精品，摆放在象征烈士英灵的墓前，而后，英属殖民地的代表和易洛魁部落首领郑重地宣读了祭词。这种充满原始宗教色彩的庄严仪式使富兰克林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感到：北美的印第安人此时正处在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叉点上，他们身上仍保存着人类伦理道德中某些最传统的东西——淳朴向善，忠诚守信，爱憎分明，崇拜先贤故土，重视血缘亲情，所有这些比起那些见利忘义、以怨报德、背信弃义的现代文明人不知要纯洁高尚多少倍。富兰克林进一步感受到，印第安人的确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同情的古老民族，决不能把他们推向敌人一方，一定要争取谈判的成功。

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部落联盟的首领看出了来者的诚意，表示要捐弃前嫌，与英属地区政府友好相处，条件是对方不得再侵占他们的领地，并要求对方保证今后不再进行欺诈性的不平等贸易。他们还表示希望得到更多的诸如皮革、火药、枪支之类的物品，以抵抗法国人在俄亥俄方面的进攻。宾夕法尼亚等地的代表们在慷慨爽直的印第安人面前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们替业主们检讨了过去大肆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错误，并全部接受了印第安人提出的条件。为了表示痛改前非的诚意，代表们临时决定再购买一批礼品赠送给新盟友，并按照印第安人的习俗，献上精美绚丽的贝壳佩带，以象征双方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

29日晚，谈判终于结束了，一大车品质上乘的朗姆酒被运来。迫不及待的印第安人立即围绕在篝火旁开怀畅饮，酒至酣处便举起火把，敲响鹿皮鼓，载歌载舞地狂欢起来。他们拼命扭动着身躯，做出一系列复杂而富有战斗气息的动作，并发出节奏感极强的吟唱。但甘淳浓烈的烧酒很快就使得他们无法自持，悦耳的歌声变成了一阵阵阴森恐怖的呼嚎和叫嚣，动人的舞姿也成了挑逗性的追逐和野蛮的殴斗。火光下，裸露着胸膛的印第安男女老少叫骂厮打成一团，活脱脱一副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可怕的地狱场景。

富兰克林隔着窗户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他的确又发现了印第安人的另外一面——头脑简单，安贫守旧，喜怒于色，酗酒滋事。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假如上帝真的想灭绝这些野蛮人，为文明人腾出地方的话，那么，酒很可能是他规定采用的手段。酒已把早先居住在海岸地带的部落给毁灭了。”

卡莱尔谈判是宾夕法尼亚与印第安人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争斗之后，双方冷静地坐下来，平等地进行了以近代法律为依据



的正式谈判，开始了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的尝试。卡莱尔谈判在富兰克林个人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他在谈判中所显示出来的特殊本领（如谈判技巧和策略、进行斡旋和达成妥协的能力、对所负使命的充分理解，以及在远离决策中心的复杂环境中对所赋权力的灵活运用等等）对谈判的圆满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卡莱尔谈判是富兰克林杰出外交生涯的起点。

## 第十章奥尔巴尼会议

1754年英法战争期间，在富兰克林的参与下，北部及大西洋中部殖民地的代表曾在奥尔巴尼集会，制定了一个各殖民地仅在形式上隶属于英国的同盟方案。

A·B·叶菲莫夫

奥尔巴尼是纽约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城市，临哈德逊河深水航道北端的口岸。当年亨利·哈德逊先生乘“半月”号溯流而上时，最后就停泊在这附近的浅滩上。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莽莽荒原，草丛中偶尔出没几只羚羊和麋鹿，人迹罕至，天地鸿荒。后来，一些来自欧洲低地国家的移民在这里建立起了第一个居民点，称之为奥兰治堡。他们不仅用辛勤的汗水开拓出了一个美丽的家园，还把母国最雍荣华贵的名花郁金香的种子撒播在了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每年5月郁金香盛开的时节，这里的居民都要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1664年奥兰治堡降英后改名为奥尔巴尼。随着英国人对北美殖民的移民步伐日益加快，这座城市的战略地位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这里翻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就可以径直到达与加拿大相连的大湖地区，是与法国殖民者和印第安易洛魁六部落联盟居住地相衔接的军事重镇。

1754年5月，富兰克林接到了总督汉密尔顿的通知：立即赴奥尔巴尼出席会议。富兰克林的使命是代表宾夕法尼亚参加由英国商务大臣倡导、由纽约总督主持的各殖民地防务会议，同时还要同易洛魁六部落联盟谈判，商讨联合反击法国人进攻等重大事宜。汉密尔顿由于在议会与业主的斗争中左右为难，已对政治感到了厌倦，向英王递交了辞职书，因此把参加奥尔巴尼会议的重任交给了在卡莱尔谈判中表现十分出色的富兰克林以及议长诺里斯和参事会的代表理查德·彼得。

卡莱尔谈判仅仅是宾夕法尼亚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一次外交接触，它所影响的区域和时段都是极其有限的。奥尔巴尼会议则不可同日而语。这次会议对北美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当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美国建国史和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富兰克林则是这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一位人物。富兰克林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总督交给他的公差，而是带着一份“必将载入史册”的计划——殖民地联合计划——走入会场的。这份计划关系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前途和命运，其言词虽然温和，富有建设性，但它带来的后果却具有难以估量的革命意义，必将在这次会议中，乃至在整个北美殖民地产生巨大的震动。富兰克林的名字也将随之而超越宾夕法尼亚和北美，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这样一份重要的计划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富兰克林对北美殖民地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经过多年苦心研究思考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早在1751年，富兰克林在给友人彼得·柯林森的一封信中就提出了一个实现英属北美殖民地联合的方案。富兰克林在这封信中指出：各殖民地的联合已经“势在必行”，但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实施，“由各殖民地自愿参加的联盟比由英国议会强行拼凑起来的联盟更好，因为自愿的联盟不仅实行起来不特别困难，而且很容易根据经验和形势对它加以改进”。关于建立联盟的细节，富兰克林的构想是：联盟应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由殖民地自发形成，并用他们自己的经费实施这一计划。根据史料分析，这是富兰克林提出的建立殖民地联盟的第一个尝试性的计划。

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富兰克林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人口增长及向各地殖民的几点意见》的文章，详细论证了生存手段与人口增长的关系这一复杂的人口学问题，其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充足的空间对于保证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人们：各殖民地应立即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阻止法国人东进的企图，巩固扩张英属北美的疆域，以维护自身的繁荣发展。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就对法国划定殖民地的边界对英国是多么重要！它应该怎样小心翼翼地保留住足够的空间，因为人口的增长太依赖于空间了。”

论文写完后，富兰克林把手稿寄给了哲学会的部分会员，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文章中某些激进言辞显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有人指出，“扩张”一词显然会引起法国人的警觉，为本来就十分紧张的英法关系火上浇油。也有人认为：文章对英国政府的北美政策流露出一种傲慢不恭的态度，例如，富兰克林在文中写道：“英国不应过分限制其殖民地的制造业。明智的好母亲不会这样干。……削弱了孩子即削弱了全家。”这些言论显然是对政府政策的批判和否定，定会招致英国政府的怨恨。也有人认为，由于各殖民地的利益有很大差别，谁也不会主动奉献出本属于自己的那份权力和利益而结成联盟，因为有了联盟就等于多了一个主人，要多尽一份义务。在众说纷纭之中，这篇文章暂时被束之高阁，但富兰克林关于生存空间和殖民地联盟的观念业已形成，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了。

1753年的卡莱尔谈判更坚定了富兰克林建立殖民地联盟的信念。此次谈判给富兰克林最深刻的印象是亲眼目睹了六个易洛魁部落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巨大力量。散居在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已被英国殖民者赶尽杀绝了，密西西比河流域分散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欧洲人的杀戮驱逐面前也已濒临绝境，唯独易洛魁六部落结成的“永世联盟”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不仅保留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和氏族制度，而且顽强地据守着自己的神圣领地。“连六个野蛮人的部落为了自身的生存都能够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联合，难道具有近代科技知识和高度文明的欧洲移民就不能这样做吗？”有鉴于此，富兰克林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广泛宣传殖民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在奔赴奥尔巴尼之前，他还特意在他主编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刊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漫画：一条由八段身子连接起来的蛇，自北向南分别以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等字首标出，其标题为：“不联合即死亡”。

前往奥尔巴尼的行程至少有200英里，沿途地形复杂，道路坎坷，富兰克林一行时而坐马车，时而乘船，艰难地向前行进。路途中，富兰克林一直在诘问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殖民地联合的计划是否合乎时宜？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措辞才能使联合计划获得各殖民地的赞同和英王的认可？暮春的风温暖而流畅，在无遮无拦的旷野中轻轻地飘来荡去，梳理着富兰克林纷繁杂乱的思绪。在艰难的长途跋涉中，在沿途那些简陋的小客栈里，富兰克林一直在冥思苦想，反复琢磨。他对自己早先形成的殖民地联合的构想做了认真的总结，又对其中某些关键性的词句进行了推敲与修改，终于草拟出一份详实的计划。但他认为这一计划仍不够成熟，遂称之为《对联合北美殖民地计划的简单构想》。

奥尔巴尼会议原定于6月14日召开，但除了东道主纽约的代表之外，只有麻萨诸塞、马里兰和新罕布什尔的代表如期赴约，富兰克林一行17日才匆

匆赶到，六部落联盟的代表不知何故也姗姗来迟。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此时正全力以赴地组织对俄亥俄地区的远征，无暇参加这次会议。他对远征军年仅 22 岁的指挥官乔治·华盛顿的关心远远超出了对谈判的兴趣。地处哈德逊河与特拉华河之间、远离西部边境的新泽西，对商务大臣的邀请也无动于衷。而新英格兰的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的代表却不请自到，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主动精神。

6 月 19 日上午，会议在奥尔巴尼市政府的会议厅正式开幕了。纽约总督詹姆斯·德兰西宣读了致词，并宣布了会议日程：由全体代表推举出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为总督推敲起草一份对印第安人的讲话稿，经全体代表修改通过后，由总督代表各殖民地向印第安人致词，并赠送礼品、钱币等以示慰问，最后与印第安人六部落缔结永远友好的盟约——这是会议的最终目的。

富兰克林有幸躲开了为总督起草讲稿的苦差。就在写作班子闭门造车而其他代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与各殖民地人士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发现各地同仁们与他一样，更为关注的是联合行动和共同防务等问题。于是，他与其他代表在会议的第 6 天采取了断然行动，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认为实现殖民地的联合是完全必要的，即任命一个由各地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富兰克林也在其列），起草有关建立殖民地联盟的文件。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开始离开了会议的原订议题，转入了关于殖民地联合问题的大讨论，而在这一讨论中，起草联合计划的委员会成了会议的中心。由于富兰克林对联合问题已做了多年的探索，这次又是有备而来，代表们对他的方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关于未来联盟体制等许多问题都要他出面来阐释。面对代表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富兰克林显得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一一进行了详细的答复。他那条理清晰的思路和不同凡响的谈吐使得与会代表们茅塞顿开，大为折服。无形之中，富兰克林已经取代了会议主席德兰西的位置，成了奥尔巴尼会议真正的主宰。面对这位神采奕奕、满腹经纶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兰西不禁自惭形秽，悻悻地返回自己的房间，埋头温习那篇对印第安人的发言稿去了。

29 日，即会议的第 11 天，全体代表聆听总督先生对印第安人六部落首领的讲话，会议又转到了英国商务大臣规定的中心议题上。这简直是一场闹剧。总督用夸大其词的口吻高度赞扬了卡莱尔会议后六部落联盟完全信守了诺言，后又改用委婉的语气示意印第安人应该固守在自己的防御体系之内，不要再分散流动地游离于领地之外的区域。毋庸置疑，这里所说的分散流动意味着印第安人超出了规定的活动范围，造成了对英国居民区的侵扰，实际上等于说六部落联盟没有遵守在卡莱尔许下的诺言。印第安人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讲话结束后，总督毕恭毕敬地向印第安人献上了用作纪念的贝壳币，并宣布了各殖民地所赠送的冗长的礼品清单。印第安人代表亨德里克受之无愧地接过礼品清单随手放在一旁，然后左手举起一枚精美的贝壳币，右手拿起一截枯树枝，用他那沙哑粗犷的嗓音致答词：“在我们的居住区，左边是法国人，右边是你们。问我们为什么分散居住，这倒要先问问你们。”他把枯枝随手一扔，又狠狠地踢了一脚，说道，“这些年来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弃之如敝屣。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人已经在我们的领地上安营扎寨，使我们忍无可忍，不得不进行反击。法国人呢？”他用力晃了晃手中的贝壳，

“他们用这个来引诱我们，买我们的皮毛，卖给我们枪支弹药，还有上好的烈性烧酒，这些都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不过我们并没有被法国人迷惑住，他们是我们的宿敌，我们从来没有向法国人出卖过一寸土地。你们对我们的同胞是如此残酷无情，可是在法国人的进攻面前却显得那么软弱无能。”亨德里克的口气越来越强硬了，答谢词变成了严厉的指责：“看看法国人，他们是男子汉，处处设防、步步为营，但是我们羞于启齿，你们全都像娘儿们，一丝不挂地敞开自己，毫不防卫。英国人，不要再教诲我们了，我们的祖先早就教会了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还是先管好你们自己的事情吧！”

总督用华丽的辞藻堆砌起来的讲话像耳旁风一样没有给人留下丝毫印象，而易洛魁首领声情并茂的即兴发言却像重锤击来，极大地震撼了与会者的心灵，尤其是那句铿锵有力的结束语，一下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处。“是啊，先管好自己的事情，”富兰克林心想，“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抗击步步进犯的法国人。”

在与印第安人进行谈判的同时，关于联合计划的讨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由于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殖民地联合的重大意义，所以其他代表也向大会提交了一些联合计划。但经委员会和代表们分析研究，认为还是富兰克林的方案最为完善稳妥，遂要求他以他的《简单构想》计划为蓝本，吸收其他代表计划中的某些合理成分，重新起草一份联合计划，提交会议讨论，7月9日下午，富兰克林没有参加会议，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对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直至第二天凌晨。10日上午，他向全体代表宣读了刚刚拟就的草案。根据这一方案，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应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由英王任命和支持的联邦总理进行治理；各殖民地的代表在各自的议会开会，推选出代表组成联邦大参政会，作为联邦的权力机构；联邦政府应享有征税和组建、装备军队等权力。这是一个具有创见性和科学性的联合计划，第一次提出了在北美实行“联邦制”和“代议制”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虽然“由英王任命和支持”等字眼在现代人看来似乎过于保守，但是，富兰克林提出在北美建立联邦制度的构想却是极具远见和富有政治勇气的。并且也是完全符合北美实际情况的（这一点30多年之后被美国的历史所证实了）。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这一计划草案，并决定：将这一联合计划送交给各殖民地议会讨论表决，以期早日实施。

奥尔巴尼会议结束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终于与易洛魁人签订了友好盟约，英国商务大臣的目的达到了，易洛魁人的首领们也兴高采烈地载着丰厚的礼品扬长而去。但是，奥尔巴尼会议是以富兰克林的殖民地联盟方案而载入史册的，不管这一方案最终能否成功，这次会议都将在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史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北美人民从分散走向联合，最终跨入民族独立富强的光明坦途的一个不朽的里程碑。在这繁花似锦、树影婆娑的仲夏时节，富兰克林怀着一种成功的喜悦离开了奥尔巴尼。

奥尔巴尼会议之后，富兰克林并没有急于返回费城，他在新英格兰和纽约等地逗留了一个时期，四处游说、巡访、通信，一切都是为了使联盟计划得到各地议会的认可。没想到事与愿违，等待着他的的是一个极坏的消息——没有一个殖民地议会通过这个方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各个议会都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计划中的‘特权’太多；英国又认为它过于‘民主’，商务大臣因而并不赞同，也不向国王呈送，以使其批准。”尤其令富兰克林难以忍受的是，宾夕法尼亚议会竟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以微弱多数否决了这

个方案。由此可见，在当时各殖民地相互设防和割据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削弱自身的权力去扶植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机构。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地方割据的局面像一块巨大的幕布遮住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很难一下子看清楚建立联邦与他们切身利益之间的利害关系。事情的结局给富兰克林高涨的政治热情泼了一大瓢冷水，令他的心绪一度十分低落沮丧，但同时也使他恍然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一项重大的事业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最终达到圆满的结局。

富兰克林的联合计划最终难产了，但在它的诱发下，形形色色的联合计划应运而生。虽然这些计划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形成气候，但它们说明，人们的注意力和政治热情已经开始转移到这一重大问题上，更多的人开始从殖民地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思考问题。很显然，奥尔巴尼精神已经在民众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结出了累累果实。但是，联合计划的失败毕竟给富兰克林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许多年之后，当他回忆这次会议的情景时仍然感慨万千：“那些因为不喜欢我的计划而提出的不同理由和相反理由反而使我感到，这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对于大洋两岸的人来说都大有裨益。如果实现了这种联合，殖民地早就强盛得足以保卫自己，无须从祖国调兵遣将了。自然，随之而来的向美洲征税的借口以及由此引起的血淋淋的争斗也都可以避免了。”

奥尔巴尼方案虽未能实现，但富兰克林建立殖民地联盟的雄心壮志却并没有混灭。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与那些反对这一计划的势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富兰克林在奥尔巴尼会议后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有关殖民地联合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并对某些关系到殖民地利益和前途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在这一过程中，他认真翻阅了同时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深受震动和启发。1755年，他给麻萨诸塞总督威廉·雪莉写了三封信，就有关殖民地联合问题与他进行了严肃的争论，该信还涉及到当前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深深不满。

富兰克林在信中指出：“剥夺殖民地人民对大参事会的选择权，没有殖民地代表的英国议会通过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都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在全面处理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事务时，特别是要加重他们的负担时，就非常有必要考虑他们可能有或应该有的想法或言论。……殖民地居民比远隔重洋的英国议会能更好地判断他们需要或担负得起多少钱。”他还指出：无代表即不纳税是英国人的权利，没有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代表的英国议会强行向北美征税的办法“像是在敌对国强征特别税”。“尽管我们无权决定征收或使用这些附属税款，但我们并不埋怨。但要支付沉重的直接税，我们仍没有决定、评价或使用的份儿，并且我们知道这些税是多余和无法负担的，这对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来新大陆定居开荒、为祖国扩展疆域、繁荣贸易、到头来竟不能相信自己已丧失不列颠天生权利的英国人来说，真是太残酷了。”富兰克林还严厉抨击了英国限制北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最后，富兰克林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如果古德温暗沙在岸边露出了水面，英国因而得到了一片一个国家那么大的土地，现在那里住上了英国居民，难道仅仅因为原住地的商人或者鞋匠觉得向他们出售鞋子或其他产品更能获利就剥夺他们自己制鞋或在同一口岸出售自己产品的权利吗？即使这块土地是用政府财产买的，这样做就对吗？如果不列颠另外获取的土地所需的费用和劳动力都是移民自己担负

的，这样的剥夺似乎不是更不合理吗？如果不允许新土地上的人民在制订此类税收法令的议会中拥有自己的议员，他们面临的困难不是更大吗？”

这些话语虽仍比较婉转含蓄，温良谦恭，但暗中却孕藏着一种巨大的反抗精神，包含了某些此时风靡欧洲必将影响北美历史进程的革命原则，例如：关于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关于平等和自治的观念、自然权利学说、人民主权学说，等等。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原则已在富兰克林脑海中扎下了根，为他所深深领悟并广为宣传。这种情况表明，经过了漫长的殖民地统治时期，北美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悄然兴起，这股巨大的暗流正在逐渐地酝酿，积聚，汇涌，终有一天，它会冲垮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统治的重重樊篱。

## 第十一章 出师不利

1755年秋天，英国情形之窘迫个人触目惊心。法军已在宾夕法尼亚击溃了布雷多克将军率领的英军……英国到处弥漫着悲观论调和失败气氛。

戴维·罗伯兹

就在大英帝国及其所属的北美殖民地频频派遣高级官员，企图用贿赂和谈判等手段换取和平的时候，早已对北美殖民地垂涎三尺的法国人已经不宣而战，悄悄开始了军事行动。为了控制并最终夺取富裕辽阔的俄亥俄地区，他们组织了许多远征军，并联络了一部分印第安人部落，沿俄亥俄河迅速向前推进，在该河沿岸修筑工事，建立军事基地，设置哨所，一直推进到了俄亥俄上游地区。同时，他们还在安大略湖装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随时准备顺河而下，为地面部队提供援助。面对法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势，英国人也迅速做出反应，各殖民地开始着手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其中尤以弗吉尼亚的行动最为迅速。1754年春天，弗吉尼亚总督丁威迪派出一支300人的远征军前往俄亥俄流域，试图阻止法国人的侵略势头，其指挥官便是后来威震天下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此时，这位殖民地的上校军官年仅22周岁，却果敢老练，勇武过人，他率领着一支临时组建、装备简陋的地方武装在俄亥俄地区与武装到牙齿的法国正规军和勇猛凶悍的印第安武士进行了殊死的战斗，首战告捷，但在困苦堡一役中遭到优势敌军的重重围困，虽给予敌人以重创，但终因寡不敌众而遭败绩。这次远征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标志着英法争霸世界的新一轮竞争已拉开了序幕，在北美、欧洲以及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事，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中。

1755年春天，刚刚平静了一冬天的北美大地上又燃起了战争的烽烟。困苦堡的失败和法国人在俄亥俄地区步步进逼的态势引起了英国王室的不安和高度关注。经过一番周密谋划，他们决定在北美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控制更多的北美土地，彻底击溃自己的老对手——法国人，登上世界殖民霸主的宝座。英国政府雄心勃勃，为达到这一宏大目的，他们不惜动用巨额国库开支，集中了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大量军用物资，调集了大批精兵良将，并委任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爱德华·布雷多克少将为这支部队的大元帅，负责整个作战行动。不久，布雷多克率领两个团的精锐部队在一支皇家海军舰队的护送下开到了北美大陆。

正在纽约逗留的富兰克林听到英国政府派兵到北美参战的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一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对殖民地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顷刻间便取代了奥尔巴尼计划受挫后产生的巨大失落感。他早已不是那个扎着皮围裙的血气方刚的、为一件事情或一句话而耿耿于怀和愤懑不平的学徒工了。生活的磨砺，岁月的蹉跎和学识的增长早已使他的思想情操升华到了一个崇高的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天下为己任。在富兰克林心目中，此时此刻的当务之急是要打败法国人，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以确保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稳定和繁荣，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全社会的财富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在纽约期间，富兰克林与新上任的宾夕法尼亚总督罗伯特·亨特·莫里斯不期而遇。富兰克林与莫里斯是老熟人，过去曾有过较密切的交往，所以见面以后无话不谈。莫里斯是个能言善辩，心气极高的人，但心胸有些偏狭，



固执己见。他对前任总督辞职一事感到百般不解，认为总督如同一家之长，无论遇到什么不利情况，只要坚持不懈地按既定方针去办，总会如愿以偿的。所以他以试探性的口气询问富兰克林：“我在费城还会遇到汉密尔顿先生那样的麻烦吗？”富兰克林回答说：“正相反，只要你不与议会作对，你将事事顺随。”莫里斯十分欣喜，赶紧又问道：“请告诉我，应怎样避免这些争论？你知道我喜欢争论，这对我是一大乐事。但出于对你的尊重，我答应将尽可能避免争论。”这正中富兰克林下怀，他知道，要想使宾夕法尼亚的事情办得顺利，经济繁荣，政治安定，议会与总督之间的通力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的话只能相互掣肘，从而一事无成。于是富兰克林向莫里斯阐述了自己对总督与议会关系的见解，并开诚布公地向他指出：“争辩、诘难、驳倒别人，只能得计于一时，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因为这会失去别人的好感，而这对于一个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汉密尔顿先生便是前车之鉴。”

大约在见到莫里斯一两个月后，富兰克林接到了费城议会要他速归的急信。富兰克林比谁都清楚，这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战略战术水平的高下，而且是两大世界强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全面较量，单靠远道而来的少数正规军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要有各殖民地民兵武装的密切配合，更需要各地提供充足的军用物资和经费来支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北美殖民地的情况并不容乐观。虽说这里的经济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人口分散、地域辽阔，交通落后、资金长期匮乏，再加上各地区之间以及北美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要想协调一致地行动，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调集各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是有相当困难的。富兰克林知道：这是另一场艰巨的战斗，大量复杂的工作正在等待着他呢。富兰克林似乎天生就有一个习惯：喜欢迎接挑战。他不愿意在安逸清静、无所事事之中虚度时光，即使是充满了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他也不屑一顾。他喜欢过一种充实、富有新意和创造精神，甚至有几分冒险性的生活，因此，越是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越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不可抑制的冲动。在接到议会的急信后，他即刻便踏上了奔赴费城的归途。

英国远征军司令布雷多克少将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职业军人，南征北战数十年，立下赫赫战功，虽已年届六旬，却依旧不减当年风采，庄严凝重的外貌和高大魁伟的身躯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他本已到了颐享天年的时候，但终生恪守的职业信条驱使他临危受命，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美战场。经过 50 多天的海上旅行，布雷多克率领的两团精兵强将于 2 月份在弗吉尼亚的汉普敦威风凛凛地登陆了。展现在北美人眼前的是一支纪律严明、军容威武的欧洲职业军队。行进在队伍最前列的是布雷多克等高级军官，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腰挎战刀，肩头和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各式军标和徽章，肃穆庄重，八面威风，一副气吞山河的架势。紧随其后的是精锐的步兵团，士兵们全副武装，排着整齐的方阵，昂首阔步地行进着。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军旗猎猎，战马萧萧，鼓乐齐鸣，刺刀和枪械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此情此景使千千万万北美人感慨万千，他们暗暗惊叹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样一支军队前进的步伐呢？

英国人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从新英格兰等地向北向西出击，把法国人从安大略湖和伊利湖之间的尼亚加拉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境内赶出去，并收复俄亥俄流域。为了配合布雷多克的作战行动，北部和东部沿海

地区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和议会开始了紧张的动员、集资、筹款和征兵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表面上看，人人都希望英军打赢这场战争。可是，当事情一触及到本地区或个人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就开始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流露出狭隘的地方主义或个人主义情绪。例如：武装起来的民兵可以为保卫本乡本土浴血奋战，却拒绝为其他殖民地打仗；各地议会可以为在本地区作战的英军提供充足的给养，却不愿在本土以外的作战行动中进行配合；业主们希望军队保护他们领地的安全，却不愿出钱资助在其他地区进行的军事行动；普通居民并不反对把自己的物品借给军方使用（如马匹、车辆等），但条件是必须得到足够的保证金。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急于与法军主力决战的布雷多克将军一筹莫展，他需要大批民兵武装的协同行动，更需要各个殖民地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但他所需要的这一切都没有到位。情急之中，他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决定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召开一次各殖民地领导人参加的协商会议，以便统一部署任务，协调行动。

富兰克林从纽约返回费城后，发现新总督莫里斯早已把他的忠告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维护业主利益的态度甚至比其前任还要强硬，为此他不惜对议会工作横加干涉，层层设障，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攻击议会的主张，甚至使用了一些十分粗俗苛刻的语言。为了捍卫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和议会的尊严，富兰克林回到议会后就参与了这场与总督的斗争，他被邀请参加了各个委员会，受托起草各种文件，对总督的讲话和信函逐一进行了答辩和批驳，行文中也时常夹杂着一些尖刻的言词。宾夕法尼亚的总督之所以如此坚决地维护业主的利益，与该殖民地的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宾夕法尼亚属于业主殖民地，根据法规，其总督须由业主指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总督是业主在殖民地利益的代理人，严格受制于业主，必须照业主的意志行事。

对法战争开始后，麻萨诸塞政府打算对克朗波西特地区发动一次军事进攻，以配合布雷多克对俄亥俄地区的远征。但由于该殖民地的财政状况很糟糕，遂派遣乔赛亚·昆西火速赶往费城，向宾夕法尼亚议会紧急求援。昆西考虑到富兰克林是波士顿人，与自己有同乡之谊，又是有影响的议会成员，所以他首先找到了富兰克林，请求他给予帮助。富兰克林一向是从北美殖民地整体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他认为麻萨诸塞的军事行动是整个英属北美地区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应该给予有力的援助，于是立即向议会转达了麻萨诸塞的请求。经过认真讨论和表决，议会通过了一个向麻萨诸塞出借 10000 英镑用以购买粮食的决议。事情本来进行得非常顺利，谁知又在总督那里遇到了麻烦。莫里斯表示：可以考虑签署这项法案，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同时附加上一个条款，即免除向业主征收财产税。面对这种趁火打劫的卑鄙伎俩，富兰克林简直怒不可遏，他坚定地表示：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但怎样才能解决援助麻萨诸塞的经费问题呢？经过一番苦心思索，富兰克林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根据某项法律条文，由议会贷款处支钱发行一笔证券。该证券应在一年内支付，利息为 5%，用现有的纸币贷款利息和部分消费税收入作为基金。这样处理既简便易行，又无需征得总督的同意。由于该证券有充足的基金作保证，因此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信誉，上市后很快被销售一空。昆西先生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满载着大笔资金和感激之情返回了波士顿。莫里斯的预谋未能得逞，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嘲弄，悻悻地离开了费城，前往亚历山德里亚出席布雷多克将召集的会议去了。

4月中旬，亚历山德里亚会议开幕了。参加会议的有英国远征军的布雷多克将军、凯佩尔海军准将以及来自五个殖民地的总督，他们是：弗吉尼亚的丁威迪，麻萨诸塞的雪莉，纽约的德兰西，马里兰的夏普和宾夕法尼亚的莫里斯。会议上宣读了英国政府对布雷多克将军的委任状以及英王对他的指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布署这次战争的作战计划和协商各殖民地所应承担的物资供应问题。在讨论物资供应问题时，布雷多克对目前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责各殖民地目光短浅，没有全局观念，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筹集物资和经费，给远征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各位总督诚惶诚恐地聆听着将军的训斥，唯有了威迪颇为得意，因为弗吉尼亚及其民兵部队受到了将军的高度赞赏，年轻的华盛顿上校被任命为将军的副官，侍从左右，这无异于给他的脸上增添了光彩。而教友派居主导地位的宾夕法尼亚则受到了布雷多克的无情奚落。教友派在英国境内就一直受到歧视，布雷多克尤其对该派反对战争的教义深感厌恶，认为这与他终生所从事的高尚职业是相悖的，并因此而断定该殖民地会成为这次远征中的一大障碍。在落实完物资供应问题后，布雷多克将军向会议详细通报了他的远征计划，然后便宣布会议结束。

由一名英军少将主持召开的亚历山德里亚会议与通过了殖民地联合方案的奥尔巴尼会议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这次殖民地首脑联席会议确实为各殖民地之间的联合行动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被认为是美国革命前最接近殖民地联盟的一次会议。虽然信奉和平主义的宾夕法尼亚在会议中受到了冷落，但它所承诺担负的义务其实并不比弗吉尼亚殖民地少，而且，它还将派出自己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为这次军事行动服务。

布雷多克将军对宾夕法尼亚的强烈不满情绪使该殖民地的总督和议会都感到坐立不安，他们认为，将军谴责他们不愿为防务出力无异于说他们背叛国家事业，因此，他们极希望能排除将军的这一偏见，为宾夕法尼亚挽回丢失的荣誉和尊严。但是，莫里斯总督已经领略了将军的威严，绝不愿再去当替罪羊，教友派们也由于知道将军厌恶他们的教义而退避三舍。于是，他们决定派遣办事稳健、人缘极好的富兰克林前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富兰克林欣然从命，不过他觉得自己最好不以议会成员的身份去晋谒将军，以免引起他的反感和疑心，他应以邮政副总监的身份前往，理由是为布雷多克安排一种与今后要经常打交道的各地总督联络的最迅速稳妥的办法。议会完全赞同富兰克林的这一巧妙安排，并决定为其提供一切费用。

富兰克林在儿子威廉的陪同下上路了，风尘仆仆直奔马里兰，他们在弗雷德里克敦见到了布雷多克将军。富兰克林父子在这里住了下来，每天设法与将军见面，一起进餐、交谈，以便消除他对宾夕法尼亚人的偏见。富兰克林告诉布雷多克将军，在他到达北美之前，宾夕法尼亚议会为防务一事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花费了不少钱财，并且现在仍愿意随时随地为将军效力。同时，他还把自己为布雷多克设计的一套与各地总督联络的最佳方法做了详细介绍。此时，布雷多克正在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派往各地征集车辆马匹的人返回，情绪很烦乱，无心与人深谈，但还是被富兰克林父子的一片诚心和卓越才华深深打动了，遂与富兰克林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并详细介绍了此次军事行动的细节。他告诉富兰克林：此行的首要目标是拿下法军的战略要塞迪凯纳堡，然后“还要向尼亚加拉挺进，占领尼亚加拉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弗隆特纳克，只要季节允许的话”。他十分自信地说：“我想我办得到，因为在迪凯纳只消花费三四天的时间，此后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去尼亚加拉

了。”听了将军的一番豪言壮语，富兰克林也被这胜利的前景所深深感染了，但冷静下来后他也隐隐约约感到，这位来自英国的将军似乎对北美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土著居民神出鬼没的战法缺乏足够的了解，而这种轻率的进攻曾经葬送过不少欧洲殖民者的军队。于是，他真诚而委婉地向布雷多克进了一言：“我军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最优秀的指挥官，我相信此行定会马到成功的。在我看来，阻碍你们行动的唯一危险是印第安人的伏击，他们对这套战法早已驾轻就熟了，而我军在行军时，由于队形拉得过长，其侧翼将完全暴露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攻击之下。”富兰克林的一席忠告只引起了将军轻蔑的一笑，他回答道：“的确，这些野蛮人对你们那些毫无经验的美洲民兵来说是可怕的瘟疫，但对于英王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却如同草芥，无足挂齿。”富兰克林意识到同一位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争论军事问题似乎有失恭敬，弄不好会引起将军的反感从而影响此次的使命，于是就默不作声了。

派往各地去的人陆续返回了弗雷德里克敦，他们向布雷多克报告说只征集到 25 辆运输车辆，而且许多车辆已经破旧不堪了。这一情况使布雷多克深感意外，失望之余他愤怒地宣布：远征已成为泡影，因为运输军队的军需辎重至少需要 150 辆车。面对束手无策、气急败坏的布雷多克，富兰克林冷静地劝他不要着急，并胸有成竹地告诉他宾夕法尼亚有的是运货马车，而且当地充满爱国热情的居民肯定会鼎力相助的。听了富兰克林的话，布雷多克对宾夕法尼亚的一切怨恨和偏见顷刻间便烟消云散了，他紧紧拉住富兰克林的手，要求他务必完成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使命。于是，在商定了付给车主的报酬之后，富兰克林父子带着将军的命令和钱款启程返回了宾夕法尼亚。

在兰开斯特、坎伯兰和约克等地，富兰克林父子就征集运输工具一事对居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并四处张贴布告，宣布：凡征用的马匹、车辆和驮鞍等物均付给相应的租金，若有丢失则照价赔偿，随军驭手也将得到合理的报酬。为了保卫边疆地区的安全，人们出借运输工具的积极热情相当高涨，但他们并不认识布雷多克将军，因此要求必须由富兰克林本人为赔偿开具付款保证书才行。富兰克林照办了，为他们一一开具了保证书，连同预付租金一同交到车马主人的手中。仅过了短短的两个星期，150 多辆马车就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英军大本营。另外，富兰克林还送来了专门为军官们准备的 20 多匹良种马，每匹马还驮着一个大礼品袋，袋内装有饼干、腌肉、调料、茶叶，烧酒等一大宗上好的食品，这些物资都来自宾夕法尼亚各界人士的捐赠。为了募集这些军用物品，富兰克林不仅花光了布雷多克交给他的 800 英镑，自己还垫付了不下 1000 镑钱款。英军将士们万分感激地收下了这份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厚礼，布雷多克则高度赞扬了富兰克林的办事效率和爱国热情，他还表示：希望由宾夕法尼亚继续负责远征军的军需供应等事宜。

6 月上旬，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开始了。英军的各路人马在坎伯兰集中后奉命出发，随行前往的还有华盛顿率领的几百名弗吉尼亚民兵以及克罗根带领的 100 多名印第安武士。按照英国军方的部署，这次行动的主攻目标是迪凯纳堡。

布雷多克确实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官，有着 40 多年从军经验，带兵有方，指挥果断，他所统率的军队以纪律严明、作战勇猛而著称。但是，布雷多克的经验仅仅限于在欧洲统率雇佣兵作战，缺乏在北美环境中与地方武装和印第安部落协同作战的经验，对北美的风土人情也不甚了解。而且他还傲气十足，惯于纸上谈兵，墨守成规，又固执己见，听不得不同意见，这

正是他的致命弱点所在。

远征军行进路线上的地形十分复杂，到处是河流、沟壑、丛林和山地，路况糟糕透顶，还不时有敌对的印第安人来袭。但由于部队携带着大批辎重，行军速度慢得惊人。针对这种情况，华盛顿立即面陈布雷多克，要求部队精简装备，轻装上阵，尽快向前推进。这一合理要求未被布雷多克采纳。同时，他还不听从华盛顿的劝告，对部队中的印第安武士轻蔑无礼，粗暴武断，大大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结果进军刚刚开始，印第安人就纷纷离去。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个不幸的事——华盛顿突然病倒了。这支失去了印第安人帮助和华盛顿辅佐的军队犹如盲人瞎马，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缓缓地行进着。危险正逐渐向他们逼近。

7月9日中午，部队渡过莫诺加希尔河，进入了一片茂密险峻的山林。下午2时左右，他们遭到了一支数目不详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的突然袭击。由于布雷多克不听劝阻，坚持沿用英国传统的作战方式——线形战术进行反攻，结果使密集的队形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网面前，很快就伤亡过半，布雷多克也身负重伤，几天后不治身亡。他在临终前睁大了双眼，断断续续地喊道：“谁能想到如此结果呢！”

这次战斗失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美各个殖民地，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人们不禁产生了一个深深的疑问：我们过去是否把大英帝国及其军队估计得过于强大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母国提供的军事保护不仅威力有限，常常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并且，这种保护往往会给北美人带来一些难以忍受的屈辱。于是，各个殖民地纷纷组建或扩充自己的民兵武装，并有意识地加强了殖民地间的联络，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这片生养自己的沃土，这就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北美殖民地自治和联合的历史进程。

这次战役中还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情况：未来独立运动中两位最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在这次联合军事行动中登场了，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在对法国人的战争中，华盛顿虽然遭受了几次失败，但北美人民通过几年的观察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位弗吉尼亚青年身上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他讲求实际，头脑冷静，果敢坚毅，充满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力挽狂澜的勇气，在血与火的洗礼和磨炼中，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火性青年成长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和钢铁意志的杰出军事领导人，命运注定他必将成为高悬在殖民统治者头上的一把铿锵作响的利剑。

而富兰克林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是商人，曾白手起家创建了殷实的家业；他是科学家，在许多科研领域均有建树，电学方面的发明创造更具有世界性的声誉；他是文学家，代表作《穷理查历书》以新颖活泼的形式和脍炙人口的语言风靡欧美，给人以无穷的启迪；他是政治思想家，第一个提出了殖民地自治的思想，主张殖民地联合的奥尔巴尼方案也是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在这次对法战争中，他又显示出外交家和战略家的杰出才华。总之，富兰克林在各方面的造诣均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宾夕法尼亚以及整个北美洲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必将成为未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栋梁之材。

## 第十二章民兵上校

为保卫家乡，击退印第安人的进攻，沿着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肯塔基边界上的俄亥俄河形成了一条警戒线。他们是家乡的近卫步兵，也就是说，当他们自愿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是士兵；当他们选择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士兵。

约瑟夫·多德里奇

英国远征军的惨败助长了法国人的嚣张气焰，他们在几乎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向东推进了大约 100 英里。法国人还成功地利用了印第安人各部落之间的矛盾，离间了他们的关系。易洛魁六部落联盟已徒有其表，许多印第安武士投靠了法国人，变成了他们的向导和帮凶；没加入联盟的其它部落对六部落在与英国居民签订和约时所取得的大宗礼品分外眼红，还对六部落首領在奥尔巴尼会议上与宾夕法尼亚人达成了土地交易感到极为愤慨。于是，一些好斗的印第安部落开始对英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进行疯狂的报复，当地居民的房屋被烧毁，农作物被破坏，财产被劫掠，妻子儿女被掳走或者被剥去头皮。此时，西部地区狼烟四起，一片残破，人们已经无法确定英属殖民地的西部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场边疆危机也蔓延到了宾夕法尼亚境内。在法国人的怂恿下，一向与宾夕法尼亚友好相处的印第安德拉瓦尔部落开始对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发动武装袭击，流血事件频频发生，使这一带的许多德意志人和爱尔兰人的小村庄惨遭蹂躏，成千的人被杀害，有的村庄甚至被斩尽杀绝了，整个边疆地区处在一片恐慌之中。大批边疆居民不堪忍受这一突如其来的灾祸，纷纷逃离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园，涌入费城，向殖民地议会和行政当局紧急求援。边疆居民们愤怒地谴责在议会居支配地位的教友派议员，认为正是他们反对一切战争的教义和不抵抗政策造成了边疆地区的无防御状态。同时，他们也猛烈抨击了宾夕法尼亚的业主，指出，由于他们在西部进行了贪婪野蛮的扩张，从而激怒了印第安人，才导致了今天的灾祸。边疆地区空前的危机和难民潮的出现也在宾夕法尼亚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危机，议会内部、议会与总督和业主之间又爆发了新的斗争。

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代业主威廉·佩恩是一位虔诚的教友派教徒，但他的后代们已经离经叛道，成了新教的忠实信仰者。他们依靠与英国王室的密切联系，通过其代理人——总督控制着殖民地的行政大权，并凌驾于议会之上，对殖民地的立法工作横加干预。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教徒虽然在居民中的比重日益下降，但他们在议会中却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凭借手中的立法大权，特别是财政权，试图更多地掌握对殖民地事务的决定权，以便为殖民地有产者谋取更多的利益。由于他们控制着总督的“钱袋”（根据法律，总督的薪金由议会发给），所以他们便以此为武器与总督和业主的特权进行抗争。由于他们在利益和信仰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双方的斗争便年复一年地持续了下来，并且愈演愈烈。而这场边疆危机则使双方的矛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在这场斗争中，富兰克林本人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他虽然不是教友派教徒，但与教友派议员们关系一直比较融洽，他尊重他们质朴虔诚的道德观念，并对业主和总督对议会事务的干涉表示强烈的不满，因而深受总督和业主们的嫉恨。但富兰克林认为，此时正值国难当头，并不是大肆攻击业

主和总督的时候，应尽力避免内耗，一致对外。富兰克林的这一立场受到了某些教友派极端分子的强烈谴责。面对种种诽谤和误解，富兰克林感到忿忿不平，但他不为所动。他认为，在这一危机时刻，各方人士都应从大局着眼，捐弃前嫌，暂时搁置争论，共商保卫边疆的大计，以维护殖民地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富兰克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务之急是立即制订一部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民兵法。他认为：这既是解决边疆危机的一个有力措施，同时，由于此事关系到全体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和安全，有助于各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和解或妥协，因此，这也是解决内部政治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

制定民兵法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于是很快就有了关于建立民兵武装的法案。该法案旨在通过合法的征税和征兵，即让有产者出钱，青壮年服兵役，来保卫宾夕法尼亚辽阔的疆域。但其制定者万万没有想到，这部法案触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受到了猛烈的批评甚至咒骂。鉴于殖民地目前的危机，教友派教徒们作出了让步，同意缴纳防务税款，但许多极端的教友派分子仍然拒绝服兵役。总督对建立地方武装和筹款一事表示赞同，但提出了一个极为无理的要求：建议在法案中所说“所有财产，不论动产还是不动产，都要征税，业主不得例外”一句话中改动一词，即把“不得例外”改为“可以例外”，并表示，如果议会不接受这一要求就不批准该法案。各方面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于是便都把希望寄托在以稳幢公正著称的富兰克林身上。富兰克林按照自己一贯的办事风格对法案条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即征税征兵等）未作实质性的让步。这一下富兰克林触犯了众怒。正在伦敦的业主托马斯·佩恩陆续收到了包括总督在内的许多宾夕法尼亚头面人物的来信，他们严厉谴责了富兰克林犯下的种种“罪行”，并予以痛斥。莫里斯总督抨击富兰克林在征税问题上“顽固不化”，是一个“不可通融的地狱守护神”；参事会的理查德·彼得斯先生指责他蔑视参事会和总督，想操纵殖民地的立法大权；而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史密斯先生则揭发他与教友派过往甚密，搞幕后交易。一时间，谣言和诽谤铺天盖地而来，使富兰克林感到不知所措。对于富兰克林来说，1775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军事失利（他本人在这次战事中还承受了不少经济损失），又遇到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但事情还不只这些，就在这一年，他个人的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德伯拉·富兰克林夫人最近一个时期心绪坏极了。屈指算来，她与富兰克林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相守已有30多个年头，她对才华出众、功成名就而又善解人意的丈夫一直非常满意，但她最为留恋的还是他们初创家业的那段时光。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精力旺盛，热情奔放，充满了青春的朝气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他们和衷共济、相濡以沫，勤勤恳恳地工作、学习、创造，小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当时，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家里，夫妻俩并肩劳作，日夜相守，共同支撑着这个温馨祥和的家。德伯拉虽说对丈夫从事的事业并不完全理解，但她总是相信丈夫所做的都是堂堂正正的大事，并且是一定能有所成就的。自从不再掌管文具店和印刷所的事务，特别是家中雇用了手脚麻利、勤劳忠厚的仆人以后，她便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了出来，不再为生计而操劳，生活已变得像一泓平静的秋水那样舒缓宁静。然而，在舒适之中她却开始感到缺了些什么，毋庸置疑，丈夫陪伴她的时间

太少了。

其实，自从富兰克林担任议会秘书以来，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就急剧增多了，并逐渐占据了他的大部分生活时间。不过那时德伯拉也十分忙碌，没有多少闲暇缠绵于儿女之情。但自从脱离了紧张繁重的劳动，特别是儿女们长大成人之后，她突然感到自己老了：浓密的秀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白晰红润的面庞开始变得松弛，出现了皱纹，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她的腰围和臀围也在不断地增大。每当镜子忠实地把这些形象展现在她眼前时，一种人生苦短、老之将至的可怕感觉便开始频频地在她脑海中萦回。令人纳闷的是，日夜为公务而奔波、吃尽人间甘苦的富兰克林却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容光焕发，除了身段略显发福之外，从精神到体力丝毫也看不出一点老的迹象。繁多冗杂的公务迫使他常年在外操劳，即便回到家中也是人来客往，门庭若市，而德伯拉则往往在无形之中被置于圈子之外，这使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特别是每当富兰克林身边出现了年轻貌美的女人身影时，她的心理常常涌出一种剧烈难忍的酸楚。

大约有半年多了，德伯拉总感到胸闷心悸，体内似乎积郁着一股排解不出的无名火气，夜间常常重复地做一个恶梦：她大吵大闹，丈夫无动于衷，在丈夫身后恍恍惚惚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从梦中惊醒后，大汗淋漓，四肢冰凉，心脏在隐隐作痛。从出席奥尔巴尼会议到协助布雷多克远征这个时期，富兰克林常常在外不归，是不是有个女人勾住了他的魂？德伯拉不禁疑窦丛生，于是，她开始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审视他的每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终于，她从接连寄来的几封署名为“凯瑟琳·雷”的来信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娟秀的字体，陌生的地址，隐隐约约还能嗅到一股脂粉的幽香。凭直觉就知道写信者是一位从未露过面的年轻女子。这位神秘的女士是谁？为什么接二连三地给丈夫来信？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德伯拉急切地想揭开这些谜底。但是，她绝不是那种偷拆丈夫信件窥测隐私的庸俗女人，她希望丈夫能光明正大地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哪怕是那种令人不能接受的坏消息。一天晚上，劳累了几天的富兰克林兴冲冲地赶回家。他原想好好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享受一下妻子为他准备的可口的饭菜和两人世界的天伦之乐，谁料想迎接他的却是妻子那张阴云密布的冷冰冰的面孔。妻子怎么啦？是她身体不舒服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富兰克林赶紧询问，但德伯拉毫不理睬，眼神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恨，家中的气氛沉闷到了极点。富兰克林满腹狐疑，但又不便发作。当德伯拉把凯瑟琳的几封信摆到他面前时，他先是感到了一阵慌乱，看完信后便沉思不语。过了好一会儿，富兰克林轻轻地叹了口气，把妻子拉到桌旁坐下，向她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凯瑟琳·雷的父亲西蒙·雷是布洛克艾兰的一位著名富商和社会活动家，母亲德伯拉·格林出身于当地的一个最有名望的家族。凯瑟琳小姐时年23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长得恬静妖媚，气质高雅，而且聪明异常，谈吐不凡，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富兰克林在一次外出办理公务的途中与凯瑟琳小姐邂逅相遇。二人似乎前生有缘，一接触就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便结下了一段如梦如幻、难解难分的浪漫情缘。凯瑟琳非常佩服富兰克林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博学多闻的才智和虚怀若谷、雍容大度的宽阔胸襟，甚至连他那坎坷不平的经历也具有有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奇色彩。在她眼中，富兰克林是天底下最具有男子气度的人物。而富兰克林则被凯瑟琳小姐明白事理、温柔敦厚和谈吐不凡的女性魅力所深深吸引，认为她是最值得任何一个男人追求和信



赖的红颜知己。可能是由于旅行路线一致，两人遂结伴作了一次长途旅游。他们走了许多地方，或者在幽深的林间小径上款款漫步，共同欣赏原始森林的奇特美景；或者在碧蓝的海水中游泳嬉戏，追寻那时起时伏的海浪和五颜六色的贝壳、珊瑚；或者围坐在青火旁促膝交谈，仰望星光灿烂的夜空，脑海中产生出无限的遐思。临别时，两人已经难舍难分了。大概就在这时候，富兰克林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凯瑟琳倾诉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凯瑟琳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但她心里确实洋溢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甜蜜和幸福。

他们原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会随着这次浪漫之旅的结束而中断，谁知分别才几日，双方就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无名的躁动和强烈的思念之情。特别是凯瑟琳，她感到没有接受富兰克林的求爱是一种极大的失礼，是对人类最真挚的情感的亵渎。于是她立即写了一封充满柔情蜜意的长信，向富兰克林坦诚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接到这封散发着女性青春气息的沉甸甸的来信，富兰克林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到凯瑟琳的身边。但是，富兰克林毕竟不是初登情场的毛头小伙子了，岁月蹉跎，世事沧桑，使得他在感情问题上比凯瑟琳看得更高，也更具有理智。在耽搁了一些时日之后，他用一种热情而不失分寸的笔触给凯瑟琳写了一封回信。信的开头描述了分别时自己的心境，以表白对凯瑟琳的一片真情。“得知你已安全到家，一帆风顺，我很高兴。那天，看着你乘坐一叶小舟在汹涌的海面上漂荡而去，我的心一直悬在空中。真不忍心让你这样离去。……当时我站在岸边，目送着你消失在茫茫海面上，直到戴上眼镜也看不到为止。我从心底为你祈祷，祝福你平安抵达。直到晚间，看到天空已经晴朗，我们一致认为你已平安到家，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太为你担心了。”写到这里，富兰克林笔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了自己的家庭和对它的深深眷恋。“我猛然想起了我的家庭，企盼早日回到那充满温情的怀抱。离家愈近，思乡之情就愈发强烈。……当我拥抱我那年老的妻子和孩子们时是多么幸福和亲切！阿，感谢上帝。”富兰克林真不愧为是驾驭语言的大师，他既抒发了自己最纯真的感情，又有意识地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对自己，也对他所钟爱的年轻女友轻轻地敲响了警钟。他知道，爱情有时就像一瓶浓烈的美酒，细细地品酌能给人以刻骨铭心的享受，而无度地豪饮则会给人们带来灾祸，甚至终生的遗憾，从而葬送掉人世间最神圣的情感。

听着富兰克林娓娓道来，德伯拉的一腔怒火逐渐消失了，她不禁被富兰克林坦荡赤诚的胸襟和凯瑟琳的一片痴情所深深打动，一个劲地埋怨富兰克林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险些酿成夫妻间的龃龉和猜忌。富兰克林对她说：“我并不是不想说明原委，只是想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方式，因为我害怕同时伤了商位善良女人的心。”

事情至此，笼罩在家庭上空的阴云已经全部消散了。思忖再三，富兰克林提笔给凯瑟琳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他用活泼奔放的语言描绘了自己的近况，并详细地询问了凯瑟琳近来的生活细节，并就某些生活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这封信写得洒脱自如，情趣盎然，似乎表达了某个浅显易懂的人生哲理，并以一种明确无误的语言告诉凯瑟琳：德伯拉是自己相伴终生的发妻，而凯瑟琳则是他心心相印、永世难忘的异性朋友。

“你在信中间我正在做什么事情，如何做的，是否得到大家的喜爱，我是如何使他们这么爱戴我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感谢上帝，我觉得一如既往。我仍

然在体验和享受一个有节制的男子所希望的生活和乐趣，由于上帝的恩惠，我享受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快乐。……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承认（你不必忌妒）现在爱我的人更多了，因为自从见到你以后，我能够为国家和军队做出一些贡献，他们感激我，因而爱戴我。……但享受这种爱意就不能要求实惠。有点幽默，是吗？

“我非常关心你的情况，分别后你是否一直住在（布洛克艾兰）修道院中，还是去了别处。沃德家的姑娘们都好吗，有结婚的吗，B先生和L先生现在如何，你此时的心境好吗？或许，我不该这么问，我将不再如你所说的那样妄加推测。如果真的要推测，就应知道人们想问的关于我的最奇怪的问题是什么，即你告诉我不久前一位女士向你提过的这个问题。

“对于你信中关于施爱给情人的慎重决定我十分高兴。但如果让我对你献殷勤我却不赞成这么做。我可能会搞恶作剧，说你知道的太多，给你讲那个磨坊主和女孩的古老传说。随信把你爱的歌曲寄上，还有你的西班牙文信和译本。我尊重那位西班牙绅士，因为他爱你，这表明他情趣高雅并具有判断能力。但你必须忘掉他，希望一位年轻富有的绅士能得到你的青睐。

“你的线放得真长，大约5022码吧。几乎能从罗得艾兰到这里。我希望能握住这一端把你拉过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你会极力挣断它。爱情和友谊之线更为长久牢固，过去它曾把我从更远的地方拉过来。甚至能促使我从英国回到费城。我想，总有一天会有这么一股强大的动力吸引你走出那个小岛。

“我很喜欢你送给我的赛马。人们都说这是一匹纯种马，但我不知这里是否有像它的马。你做的乳酪味道妙不可言，特别是其中的一种，朋友们都品尝了，并说赛过他们吃过的任何一种英国乳酪。富兰克林夫人对于一位年轻女士能如此关心她上了年纪的丈夫并送来礼品而备感自豪。一到吃饭时我们就谈论起你。她肯定你极为聪明，是个当家理财的好手，并说要把我作为一份遗产赠给你。但我却不能这么做，我希望你找到更好的心上人，所以希望我的夫人能健康长寿。与她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如果她有什么缺点的话我也已经习惯了……确实，我感到你们俩都是完美无缺的。她愿意我爱你，就像你愿意得到我的爱一样，我们应共同祝愿这位年长的女士健康长寿，晚年安乐。

“又及，萨莉说：‘爸爸，我爱凯蒂小姐。’无论你收到没收到我的信，我都希望每次邮班都能带来你的信，如果我的要求不过分的话。”

接到富兰克林的这封信后，凯瑟琳小姐的情绪一度十分忧郁消沉，她于9月下旬寄来的一封信中如实地反映了这种心态。10月16日，富兰克林于百忙之中给她写了一封回信。从该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富兰克林对凯瑟琳的感情依旧是那样深沉执着，但为了女友能得到真正幸福安宁的生活，他理智地以一位长者的身份对她提出了忠告：“一切量力而行，切勿贪求。做个安分的小女孩，经常颂读教义，做礼拜，直到嫁给一个好丈夫，然后安心于家庭生活，相夫教子，空余时间可以悠闲地打打惠斯特牌，做做祈祷或演算数学题。你必须勤劳节俭，学会加法，增加你丈夫的财产；学会减法，节约所有不必要的开支；使用乘法，你会成为一位能干的女主人。还有除法，借用我对保罗兄弟说的话：‘生活中不要用除法。’”

反复阅读了这封来信后，凯瑟琳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了她人生中最认真的一次思考。几天之后，她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她知道，富兰克林给她指出的是通往幸福生活的一条现实之路，她将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但

她也十分清楚，无论走到哪里，富兰克林都是她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令人难忘的男子。在她的眼中，富兰克林不仅仅是一位才华横溢、卓有建树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和官员，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她以及整个人类最亲密真诚的朋友，人们可以与他亲密交往，开诚布公地攀谈，从而获取丰富的社会知识、做人的道理和奋发向上的动力，以及无穷无尽的生活乐趣。他那亲切深邃的目光将深深地铭刻在凯瑟琳小姐的心头，永世不忘，他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在家庭风波平息之后，富兰克林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政治斗争的急流中去了。他坚信，无论边疆地区的危机严重到何等程度，总会找到适当的办法恢复那里的秩序的。一段时间以来，西部边疆的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混乱状况愈演愈烈，使善良的教友派教徒和顽固的业主们都感到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宁。他们意识到：如果再任凭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他们的统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局面，富兰克林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遂立即草拟了一份新的《民兵法》。由于该法案注意不涉及教友派人士参加与否和业主是否纳税等敏感的问题，因此于11月25日得到议会的通过，并最终为总督批准。这部法律规定：经总督和总司令同意，宾夕法尼亚的自由民能够合法地把自己组成连队并选举军官，再由连队军官推举团队的军官，全体军官可以制订有约束力的军事法规，等等。新颁布的《民兵法》的意义在于，它使宾夕法尼亚在不违背英王旨意和不超越殖民地权限的前提下，有了一支合法的地方武装力量，它不必接受宗主国的统一指挥调遣，甚至不必依赖宗主国的资助，而是根据本地的实际需要决定征兵的数额、服务的期限、待遇，以及合理地调配部署兵力，等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较少地受制于宗主国，为宾夕法尼亚的切身利益服务。

为了能够招募到足够的青壮年入伍，富兰克林又展开了凌厉的宣传攻势。他为《宾夕法尼亚报》写了一篇题为《X、Y、Z关于宾夕法尼亚现状的对话》，列举出了他所能收集到的一切反对建立民兵的言论，然后逐一进行分析批驳，以便澄清人们在建立民兵组织问题上的糊涂认识，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论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征兵工作在城镇中得以顺利进行。但是，这一工作在遥远的边陲地区却遇到了不少麻烦，而那里恰恰是最需要派兵驻防的关键地区。于是，当局决定派遣得力的官员到敌人骚扰最严重的西北地区，在那里招兵买马，整顿防务，维护当地的安全和社会秩序。派谁去完成这一重要艰巨的使命呢？莫里斯总督经过反复权衡也没从自己的心腹中找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最后只好让经常与他作对的富兰克林去承担这一重任。但他对于富兰克林一直猜忌重重，于是又派遣前任总督、参事会成员詹姆斯·汉密尔顿随同前往，以便对富兰克林的行动进行严密的监控。

岁末年初，富兰克林一行顶着刺骨的寒风出发了。前面有艰苦的工作和各种难以预测的困难在等待着他，身旁还有心怀叵测、老奸巨滑的汉密尔顿的严密监督和掣肘，富兰克林上路时的心情是沉重而郁闷的。幸好有儿子在身旁陪伴，他才感到心里踏实了几分。威廉曾担任过地方民团的上尉，这一次充任父亲的助手，忠心耿耿地侍从于鞍前马后，帮助处理各种事务，显得得心应手。望着儿子那坚实的臂膀和日渐成熟起来的面容，富兰克林逐渐忘却了征途的艰辛和官场上的种种烦恼。由于富兰克林德高望重，能够秉公办事，所以很快就赢得了随行人员的信任，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使汉密尔顿

的小人伎俩毫无用武之地。

来到西北边睡后，富兰克林对这里的形势做了一番周密的调查，结果令他极为震惊：如果不赶快设防的话，法国人和印第安人随时可以从这里长驱直入，对宾夕法尼亚的内地和中心城市构成致命的威胁。富兰克林认为，必须立即在北起伊斯顿，经由北安普敦、伯利恒，南至雷丁一线层层设防，建立起一条年固的军事防御体系，以遏制敌人可能发动的大规模攻势。

在伊斯顿，劫后余生的难民们都拥挤在几座大房子里，战战兢兢地打发着时光，他们缺医少药，弹尽粮绝，已经濒临绝境了。当局派遣官员的到来使他们仿佛遇到了救星，纷纷要求尽快地把他们武装起来，保卫家园的热情空前地高涨。经过一番宣传鼓动，富兰克林等人没费多大劲就招募了大约 200 名精壮男子，组建起了一支民兵连队。接着又动员当地群众立即挖壕筑堡，修建防御工事，以打击入侵之敌，保卫自己的居民点。10 天以后，伊斯顿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变，高垒深壕、层层工事构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防线，足以令入侵者胆战心惊，新建成的邮路则可以把敌人入侵的警报随时传向内地。不久以后，当地人民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富兰克林认为，惨遭法国人蹂躏的纳登赫脱是建立军事要塞的合适地点，为了向那里进军，他率民兵队伍集结于伯利恒。伯利恒是由德意志的摩拉维亚教徒们于 1741 年建立的一个移民城镇，以传说中的耶稣诞生地伯利恒命名。在这里，富兰克林一行向居民们发了救济物品，进行了备战宣传，并建筑了一批牢固的防御工事。以前，富兰克林就对摩拉维亚教略有耳闻，很感兴趣。借此机会，他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对这里的民俗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察，所见所闻都记在了日后在巴黎撰写的《自传》当中。

“我发现他们是为公共生后而工作的，在公共餐桌上吃饭，在集体宿舍里睡眠。在宿舍天花板的附近有一排气孔，我断定这些小孔对流通空气十分适宜。在他们的教堂里，我听到了小提琴、双簧管、长笛等乐器伴着风琴演奏的优美的音乐。他们依男女老幼分组进行布道，这显然与我们的习惯不同。……我去听的是给孩子们布道。他们进教堂后依次坐在长凳上。男孩们由一名教师（青年男子）引导，女孩们由一位青年女子引导。演讲听起来既亲切又熟悉，很适合他们的接受能力，好像是在哄着他们去做善事。”

富兰克林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对于任何一种宗教的祈祷仪式都缺乏足够的热情，他更为注重的是对于人类社会起重大作用的各种宗教的内容。他非常欣赏摩拉维亚教徒用赞美诗描述耶稣生平和受难经过的做法，以优美的圣歌加以解释、补充甚至代替布道词和祈祷文，那动听和谐的音乐使得这位音乐爱好者如醉如痴。《啊，小镇伯利恒》，这首每日必唱的圣歌坚定了摩拉维亚教徒们的信仰，规范了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藐视等级特权，强调人人平等，按《圣经》原则过灵修生活，拒服兵役和担任公职，男女婚姻取决于管理他们的长者的裁决，如若意见不统一则借助抽签方式加以确定。对此，富兰克林表示不能理解。“我说，如果配偶不由双方共同选择，有些人便可能很不幸福。可谈论上述情况的人答复道，‘就是你让当事人亲自选择的话，也会有人不幸福的。’这一事实我的确无法否定。”事实就是这样，即便在婚姻自主的年代，有情人也未必能成眷属，而成为眷属者则未必都是有情人。

尤其令富兰克林惊叹不已的是伯利恒人采取的严密的防御措施。他们集体宿舍的周围全都围上了坚固的栅栏，窗户和门的旁边堆放了大量的石块，

还自费购置了大量枪支弹药，每个战士的床头都摆着一件战斗武器。在伯利恒，几乎每个青年男子都是神枪手，而青年女子大都是掷石兵。富兰克林原以为摩拉维亚教徒会像教友派激进分子那样拒绝拿起武器，反对战争，谁知这里的准备工作却做得这样出色。对此，主教斯潘根贝格先生做了自圆其说的解释：“我们的教义和议会法令不外乎是要使现实社会和精神境界更加美好和完善。危难当头，我们只有保全了上帝赋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生命，才能以高尚的品德和规矩的行为去实现教义中的崇高理想。”从主教振振有词的言谈之中，富兰克林对宗教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宗教是人们对自然和上帝的信仰与崇拜，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各种宗教及其流派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作用。无论何种宗教都是以神圣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而现实社会却不可能与其教义并行不悖，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要么态度僵硬，无视社会现实，一味地转向自我，被时代甩在后面，要么采取妥协开明的态度，更多地与世俗精神相融合。教友派顽固分子选择了前者，而摩拉维亚教徒们选择的却是后者。但富兰克林认为，无论作何种选择，都不如作一个自然神论者来得自由洒脱，可以用科学的精神观察认识无穷无尽的自然、宇宙和现实世界，用人类最纯朴的热情和理性的态度去追求人世间的真善美，而无须受那些一成不变的教义和僵死的仪式的层层束缚。

在伯利恒驻防期间，富兰克林向周围的几座村镇派遣了一部分民兵，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军事要塞，同时还招募了一部分青壮年男子入伍。而后他率领余部来到军事要塞纳登赫脱。这里最近刚刚遭到印第安人洗劫，杳无人迹，遍地狼藉。富兰克林知道，这里的战略地位极其险要，万一失守，伯利恒等地将很难保住。所以一进入纳登赫脱他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首先从附近残破的锯木厂中弄来了几堆木板，搭起了一批简陋的木屋，以便把部队在这孤寂荒凉、寒风刺骨的地方安顿下来，同时还派出十几个人把被法国人屠杀的村民们的尸体全部掩埋好。第二天，他们开始着手建立军事要塞。富兰克林对这里的地形进行了仔细的勘察，画了一幅要塞构建图：该要塞方圆 450 英尺，四周全部用木栅栏围住，其中设有一座炮台、一眼水井、许多射击阵地、简易军营以及军需品物资仓库。

富兰克林率领士兵们昼夜不停地砍伐大树，先是锯成圆木，再削成一根根尖桩，把它们连在一起深深地埋于地下，筑成了一道高达 12 英尺的坚固的栅栏墙，栅栏之外被伐净的树林地区则构成了一大片无遮无拦的开阔地带，完全暴露在守塞将士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任何敌人也难以逾越的死亡地带。富兰克林干练的办事作风、卓越的才华和公正无私的精神给将士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致推举富兰克林为民兵部队的上校指挥官，而富兰克林却谦虚地把这一职务委托给了来自新英格兰的军人克拉彭先生。但边疆人民忘不了富兰克林为保卫当地的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请功信雪片般地飞到了费城。不知是由于军情紧急还是被民众的热情所打动，莫里斯总督于 2 月 24 日正式任命富兰克林为上校军官。

值此英法战争屋战方酣之际，在边关地区最需要军事援助的危机时刻，富兰克林临危受命，勇赴边陲。他办事果敢干练，卓有成效地缓解了边疆危机，再一次成为北美殖民地传奇式的风云人物，从而名传海内，声誉鹊起。民兵上校，这是对富兰克林近年来艰难军旅生涯的最高奖赏，是对他超群出众的政治领导艺术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肯定，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一片真挚深厚的爱戴之情。年届五旬的富兰克林依靠其勤奋、广智、果敢和天

赋使自己的事业又一次走向辉煌。

1756年2月，富兰克林结束了这次远征，，凯旋返回费城，受到了各届人士的热烈欢迎。2月底，他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检阅了由1200名费城民兵战士组成的团队，当整齐雄壮的队伍从他面前通过时，年轻威武的战士们一齐向他们敬爱的上校指挥官行注目礼。仪式结束后，民兵将士们执意把他一直护送到家门口，临别时还鸣放礼炮表示敬意。结果轰鸣的炮声把富兰克林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碎了，着实让他心疼了好几天。

3月17日，富兰克林应邀前往弗吉尼亚，费城民兵又大张旗鼓地前来送行。一路上，他们骑着战马簇拥在富兰克林身旁，并把手中的利剑高举过头顶，据说这是只有王室成员才能享受到的礼遇。面对民兵们的这一做法，富兰克林未做什么表示，心里却感到十分不悦。他一向不喜欢铺张炫耀、招摇过市，也担心这些举动会招致政敌们的非议。有了这两次经历后，他决心以后再也不给人机会做这种事情了。

4月2日，在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北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院校之一的威廉·玛丽学院授予富兰克林荣誉文科硕士学位，这是他获得第三个荣誉学位了。4月10日，海港城市诺福克又把荣誉市民的称号授予了这位费城的骄子。大约就是在这—时期，富兰克林见到了比他的儿子威廉还年轻一岁的乔治·华盛顿先生，据说两人第一次会面就谈及了关于殖民地联合的问题。

4月29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伦敦皇家学会推选富兰克林为该会的正式会员。从此，这个由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团体中增添了一位来自北美殖民地的特殊成员。

6月4日，六名备受孤立的教友派强硬分子主动退出了宾夕法尼亚议会，这使得议会中力量对比的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教友派议员在议会中所占比重下降到了1/3，从此失去了对议会的绝对支配权。为了控制议会，总督和业主们希望把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是为了利用富兰克林在议会和民众中的威望，一向对富兰克林心怀不满的莫里斯总督说服议会任命富兰克林为将军，率领一支部队前去攻打迪凯纳要塞。但这一任命由于英国官方代表的阻挠未能生效。

8月份，莫里斯总督因执行业主指令不力被丹尼上校所取代。丹尼先生在伦敦时就对富兰克林的事迹和名望有所耳闻，佩恩家族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地位也希望这位新总督能得到富兰克林的支持，于是，新总督上任伊始便想方设法笼络富兰克林。在庆祝总督就职的晚宴上，丹尼先生满面春风地把本应在1753年11月颁发给富兰克林的戈弗雷·科普利奖章佩戴在富兰克林的胸前，用非常华丽夸张的语言对富兰克林的业绩大加称颂，并表示希望双方建立起相互信任、真诚合作的友好关系。面对总督大人的恭维吹捧，富兰克林显得彬彬有礼、不卑不亢。他心里十分清楚：宾夕法尼亚的总督是业主们挑选任命的，他们只有秉承业主的旨意办事才能得以继任，是不可能与殖民地议会建立起真正友好的合作关系的。

笼罩在富兰克林头上的光环越多，人们对他的期望值越高，他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严冬过后，西部边疆地带的屠杀和蹂躏又开始了，并呈现出一种不断恶化的趋势。新任英国远征军司令劳登勋爵已年愈花甲，是一位办事优柔寡断、拖泥带水的无能将军，他的作战计划朝令夕改，杂乱无章，致使边疆危机日甚一日。军事上的不断失利使得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对联合行动丧失了信心，更热衷于建立各自的防御体系，以求自保。自从教友派强硬分

子退出议会以来，宾夕法尼亚议会内部在防务问题上逐渐取得了共识，但在征税和拨款的具体数额问题上，议会与总督之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态度强硬。1756 年底，总督要求为下一年度拨款 12.5 万镑，而议会只同意拨 10 万镑，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转年 1 月，总督断然否决了这一决议，并决定将该法案副本转交英王以求裁决，而劳登勋爵则威胁说将不派兵驻守该殖民地边境，试图以此压迫议会作出让步。但议会不为所动，并决定派诺里斯议长和富兰克林前去伦敦陈述理由。富兰克林欣然从命，而诺里斯先生则以年事已高为由婉言推辞了。议会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因此威廉便辞去了公职，以随从人员的身份陪同父亲一同前往。4 月 4 日，富兰克林父子在友人们的簇拥下离开费城去纽约转乘赴英国的轮船。

从英国派往北美殖民地的文官武将大多是些三至四流的劣等角色，而宾夕法尼亚这次派赴伦敦的使者却是一位世界一流并必将名噪天下的学者和政治家。

## 第十三章勇斗业主

佩恩家族是很有实力的地主，拥有土地既不希望被征税，也不希望被人们不交租就占住，这种活动突破了比较简单的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间的对立，为所有派别提供了施展谋略与对付谋略的机会。

R·C·西蒙斯

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而富兰克林对待时间却是那样“斤斤计较”，分秒心争，他曾以“穷理查”之口谆谆告诫人们：“你热爱生命吗？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这是富兰克林一生对科学和人类进步事业孜孜以求、拼搏进取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之所以在许多领域中卓有建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从纽约赴伦敦的航程中，富兰克林除了睡觉以外很少有真正的闲暇时间。他时刻都在认真地思考问题。为了更有把握地战胜业主，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他和威廉几乎每天都要商讨这次交涉所采取的策略、方式以及许多细节问题，对许多可能遇到的麻烦和困难也做了全面的预测，并设计了多种解决方案和对策。通过严密的论证，他们愈发感到真理在殖民地议会一边，因此大大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

湛蓝的海水，晴朗的天空，飘泊不定、如梦如幻的五彩云霞以及自然界中那些变幻莫测、瑰丽壮美的景观，引起了富兰克林的无限遐思和童贞般的好奇心，他情不自禁地做起了早年横跨大洋航行时所做过的事情：观测天象和潮汐的变化，研究沿途所见到的风土人情和有趣的海洋生物，时而还跳入碧蓝深邃的大海，在清冽的海水中尽情地嬉戏畅游……此时此刻，富兰克林已经完全恢复了对大自然的那份留恋和痴迷，同时也更增加了他对人生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于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涌遍了他的全身。

在这次旅行中，富兰克林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工作——为他下一年的历书撰写序言。由于是在旅行途中，富兰克林的手头没有任何有关的书籍和可供查询的资料，整篇序言完全是依靠他那超人的记忆力、出色的写作才能和饱满的创作激情，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的。也许正固为如此，该文的语言才那样通俗犀利、清新隽永，其内容则精练深邃，发人深省。文章于7月7日写成，它告诉人们：“穷理查”的格言在学问家们那里遭到了冷遇，却得到了下层民众的青睐，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老爹在市场上作了一次令人叫绝的演说，其中所有的精粹之处竟完全选自《穷理查历书》。富兰克林的这篇序言就是亚伯拉罕老爹的演说，其主要内容是一些关于教诲人们如何节俭致富的警句格言，可以说是“穷理查”的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富兰克林对原来的有关格言进行了精选，又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使之更加合理完善，脍炙人口，同时又充实进了一批先前没有采用过的民谚。文章写成后，富兰克林把它交给朋友们审阅，以便收集修改意见，不料却受到了高度的赞赏和关注，友人们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不能让它与那些已经过时的旧历书一起被埋没掉，而应该作为单行本发行，于是次年春天，富兰克林的外甥本杰明·梅科姆把它在波士顿公开出版了。首版时定名为《亚伯拉罕老爹的演说》，后又改为《致富之路》。这本教导人们走勤劳节俭的致富之路的书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风靡欧美和世界各地，为大众所津津乐道，至此，深受读者喜爱的理查终于要向人们道别了。自从脱离了印刷业务



以来，富兰克林已经完全被卷入到了政治生活的风风雨雨之中，并且愈陷愈深，不可自拔。如今他又要奔赴远离费城的异地他乡，去履行一个艰巨而前途未卜的使命，因此不得不忍痛停止理查历书的编纂工作。25年来，他之所以年复一年地编纂这套历书并乐此不疲，主要是由于他可以借助这种生动活泼的形式，随心所欲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怀，阐释作人的道理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以启迪民智，净化社会风气和人的灵魂，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还可以讥讽隐喻，鞭挞时弊，唤起民众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风气的开比，从中，他可以体验到无穷无尽的人生乐趣。如今，就要与这位相伴了多年的亲密伴侣分手了，遥望茫茫海大，富兰克林的心底不禁涌出一种怅惘悲凉的感觉。

伦敦之行是富兰克林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他告别了苦心经营了25年之久的历书编纂工作，也告别了他所十分熟悉的社会工作和生活氛围，在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开始了他漫长的外交生涯。

177年7月26日，富兰克林一行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了英国。

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私交不多，而巨大多只有书信往来而从未谋过面。但由于他们情趣相投、坦诚相见，富兰克林的言行和人格又是那样温文尔雅，富有魅力，因此他们早已由一般的交往转变成了真正志同道合的挚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富兰克林一踏上伦敦的土地，就深深感受到了这种热烈而质朴的友好气氛。

彼得·柯林森，伦敦皇家学会成员、商人和费城图书馆的购书人，早已热切地恭候多时了。他把富兰克林父子接刊家中，于当晚设宴为远方来客接风洗尘，并真诚地要求他们在家中留宿，直至租到合适的房子为止。富兰克林未作寒暄就向柯林森通报了自己在电学研究领域中的新进展。柯林森很快就为富兰克林的赤诚之情和卓越才华所深深吸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威廉·斯特拉恩，伦敦著名的经典著作出版商，早在创立美洲哲学会中富兰克林就与他开始了频繁的书信交往和业务联系。斯特拉恩于富兰克林到达的次日便登门造访，双方就有关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斯特拉恩被富兰克林诙谐幽默的谈吐和机智敏捷的思维折服了，在日后写给富兰克林太太的信中，他称她的丈夫是“我从未见过的在各方面如此完全合我心意的人”，并称她的儿子“是我所认识的美洲最有魅力的年轻绅士之一”。后来，斯特拉恩曾试探性地向富兰克林提出要把女儿嫁给威廉，得到的却是令他失望的答复：威廉已经同家乡的伊丽莎白·唐斯小姐订了终生。但14年之久的友谊并未因此而中断，斯特拉恩是富兰克林出使伦敦期间的忠实的顾问和助手，他们之间的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深厚。

詹姆斯·拉尔夫的出现使富兰克林又想起了青年时代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18岁的人是多么单纯幼稚，仅凭着一个海市蜃楼般的诺言就敢漂洋过海来到人地生疏的伦敦。在那个被圣诞老人遗忘了的圣诞节里，是乐观豪爽的拉尔夫重新燃起了他生活下去的情心和勇气。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富兰克林在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了拉尔夫无私的帮助，而且由于他的点拨，在诗坛上潦倒落魄的拉尔夫才走上了散文创作的道路。虽然他们之间也有过荒唐的举动，但岁月已经使这些往事烟消云散了。转瞬之间32年过去了，拉尔夫已经成为英国蜚声文坛的散文家和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之一。当他听到费城的原配妻子忧郁而死，女儿和外孙们生活尚好的消息后，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流露

出了难以掩饰的愧疚、痛苦又有几分欣慰的复杂表情。往事如烟，韶华不再，昔日的恩恩怨怨早已消解冰释，谁也不会再去纠缠那段琐屑的陈年旧账。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这位来自社会底层、靠个人奋斗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英国作家仍与富兰克林保持着一致：对那些倚仗权势、门第和恩宠而高高在上的世袭特权阶层有着一种出自本能的厌恶和傲慢不恭。拉尔夫很快就成了向业主特权进行挑战的战斗行列中的一员。

有这些坚定的盟友鼎力相助，富兰克林对完成使命的前景又充满了乐观自信。他没有顾得上去游览古都的名胜古迹，也未重游旧地寻觅当年伦敦打工生涯的足迹，在与几位知心朋友亲切会面之后，便在斯特兰德区克雷文街3号（后改为36号）安顿下来，为向当局进行申诉做准备工作。他计划在一年内就结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打赢这场关系到殖民地人民权利和尊严的笔墨官司，尽早返回北美那片充满勃勃生机的热土和费城温馨的家。

就在等待枢密大臣约见的时候，富兰克林拜访了约瑟·福瑟吉尔博士。此人是英国最早描述冠状动脉硬化及白喉症状的医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富兰克林私交甚笃，在富兰克林出版《关于电荷的观察实验》一书和费城教友派退出议会等许多事务中助过他一臂之力。当福瑟吉尔得知宾夕法尼亚议会状告总督的消息后感到很惊愕，再三告诫富兰克林冤家宜解不宜结，佩恩家族毕竟是伦敦的名门望族，总督对他们的袒护是很有来头的，不如先与业主私下接触一下，也许会找到稳妥的解决途径，不至于使双方因僵持不下而丢了颜面。富兰克林被这一番劝说打动了，于是决定双管齐下，与业主和官方同时进行交涉，尽早解决这一由来已久的纷争。

由柯林森的安排，英国枢密大臣格兰维尔勋爵接见了富兰克林，其经过见于富兰克林写给诺里斯议长的详细报告。格兰维尔是个刚愎自用、盛气凌人的大官僚，根本未把殖民地议会的辩护人放在眼里，坚持认为国王给予总督的指令就是法律，总督是代表国王的意志行使权力的。他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在立法机构中国王是殖民地的立法人，英王陛下的训令下达到那里即成为法律。”根据格兰维尔的这一逻辑，宾夕法尼亚起诉总督就等于与国王作对，这无异于是在宣布议会必定败诉。请熟英国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富兰克林对枢密大臣的无理和无知感到既愤怒又惊讶，他强压住心头怒火耐心地解释道：“根据我们的宪章，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法律是由各个殖民地议会制定的。”它的确要经过国王的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不能废止或改动。正如议会没有国王的批准不能制定永久性法律那样，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也不能为他们制定法律。”富兰克林彬彬有礼、言之有据的辩解改变不了枢密大臣的傲慢与偏见，初次会晤不欢而散。

与业主的会见是由福瑟吉尔博士安排于8月中旬进行的，其详情记录在富兰克林《自传》的“补篇”中。会晤地点选在了业主的春季花园，这里一年四季草木葱翠、繁花似锦，还有奇山异石和淙淙的溪流，风景十分优雅秀丽。慈眉善目、举止高雅的业主托马斯·佩恩先生非常客气地把富兰克林让进客厅就坐，并诚恳地表示愿意就某些问题做出合理的让步。会晤开始时气氛显得相当和谐融洽。富兰克林把议会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陈述，然后双方逐一进行磋商讨论。交谈了一段时间后富兰克林发现，托马斯·佩恩其实是一位城府颇深的政坛老手，他在某些次要问题上作出一种和解的姿态，但在实质性问题却寸利必夺，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一向蔑视权贵的富兰克林当然不会被业主的威严所吓倒，更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他坚定地据理力争，

于是会晤中出现了争执。看到和解无望，双方遂决定由富兰克林把申诉内容写成书面文件，以供业主酌情考虑。与业主的首次交锋在托马斯·佩恩一连串温文尔雅的外交辞令中结束了，但富兰克林从业主那张虚伪的面孔上看到了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初入花园时那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了。

几天之后，富兰克林撰写的书面文件送到了春季花园。当富兰克林再次前来会晤时，托马斯·佩恩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脸面板得铁青，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粗暴口吻指责这个文件写得过于宠统粗俗，让人抓不着要领。他还告诉富兰克林：他已把此事委托给律师费迪南德·约翰·帕里斯全权处理，以后有事可直接与这位先生联系。富兰克林心里明白，业主之所以发这么大的火，说明这份文件击中了他的要害，对其特权和财产构成了威胁。他之所以说文件太“宠统”是因为文件写得逻辑条理，论证严谨，使他无隙可乘；而所谓的“粗俗”则是由于行文中未称呼他为“宾夕法尼亚真正和绝对的业主”，似乎有蔑视业主之嫌。面对业主的丑恶面目，富兰克林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他郑重地告诉托马斯·佩恩：他是代表宾夕法尼亚议会前来进行正式交涉的，除了业主们以外，绝不会与任何代理人（包括律师）之类的人物接触。双方意见相左，僵持不下。最后，托马斯·佩恩将文件转交给了检察长，征求他的意见。文件在检察长那里一压就是一年，如同石沉大海，富兰克林再三催促也得不到答复。

过度的劳累和焦急的等待使得年过半百的富兰克林终于病倒了。起先是患上了重感冒，长时间高烧不退，身体极为虚弱。后来又出现了剧烈的头痛症状，一发作就是十几个小时，脑袋疼得像炸裂了一般，甚至有时还昏迷不醒。在他病重期间，忠实的友人福瑟吉尔大夫时刻守候在他的身旁，进行了精心的治疗，给他服用了大量的金鸡纳树皮做的药和汤，有时还把玻璃器皿扣在他的脑后以减轻痛苦。房东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大大也给了富兰克林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儿子威廉（此时正在中级殿堂学校学习律师业务）则跑前跑后，为他的饮食起居而忙忙碌碌，使得他感到十分舒适亲切。两个月后，他才逐渐摆脱了病魔的困扰，但体力和精神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恢复。

在养病期间，暂时脱离了喧闹政坛的富兰克林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有时这种情绪竟会使他焦虑不安，夜不能寐。于是，他经常动笔给妻子和女儿写信。在这些信中，他很少提及公务，所谈论的大都是些与家庭有关的琐事。他时常询问家中的日常生活情况，关心妻子的健康和女儿的学业，有时也用很大的篇幅谈到自己的病情，但总是显得很轻松乐观，生怕让家人担忧。病情好转之后，富兰克林经常到户外活动，有时也去商店转转，一方面是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和生活节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家人购买一些她们所喜欢的物品。在12月初的一封信中，他对妻子写到：“为你买了一件非常时髦的深红色缎面的外套，为萨莉买了一块黑色的绸子。”在次年2月初的一封信中，他则以一种鉴赏家的口吻描述了他刚刚寄回北美的两箱精美礼物：“一些用于装水果和奶油点心的瓜状和花瓣状的盘子；一个有精美图案的碗，是该城附近出产的；几个咖啡杯，也产自该地；一个普通的伍斯特碗，还有各类瓷器，体现出各种不同的技艺；一个破旧的修理过的瓷盆，尚未变形，颜色奇特。同一箱子里还装有四把银勺，样式新颖却奇丑无比；一把去苹果心的工具，另一种工具是把大茺菁制成小茺菁用的；六块粗布制成的花纹整齐的早餐布——铺在茶桌上……箱里还有一个小篮子，是史蒂文森夫人送给萨莉的礼品，她的女儿送给你一双她亲手织的袜带……我把这些物

件作为珍品寄回去是由于其造型独特，并不是说它们有多大价值。”此后，富兰克林又陆陆续续把买到的各种物品寄回到宾夕法尼亚，其种类繁多多样，既有极普通的生活用品，也有精美的装饰品，还有许多书籍和学习用具。

在业主和有关当局对宾夕法尼亚的申诉久拖不决的日子里，富兰克林并没有消极地观望等待，他一方面积极奔走活动，另一方面则利用这一闲暇时间，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让人从北美运来了一部分研究和实验用的工具和仪器，在英国又陆续购置了一些更为先进的仪器设备，就在斯特兰德区克雷文3号的家中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特殊的一段研究生涯。由于他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所研究的课题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其中成果较为显著的有以下项目：用电流治疗风瘫患者；设计了一种既经济又很奇特的时钟，后经友人詹姆斯·弗格森先生改进已可以投入使用；与儿子威廉在剑桥大学做蒸发试验；对普通家用烟囱进行改装，安装一个滑动的金属板作通风装置，可以甲较少的燃料获得较多的热量。另外，这期间他还为哈佛大学购买了电学仪器，并亲自进行安装调试。富兰克林出色的研究工作和高尚的人品在英国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大家都十分尊重这位毕生为人类科学事业勤勤恳恳工作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759年2月12日，圣安德斯大学授予富兰克林法学博士学位。这是他有生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头衔，因此感到异常兴奋宽慰。同年9至10月间，爱丁堡市、格拉斯哥市和圣·亚当斯自治市又先后授予他行动自由权。

1759年，富兰克林与业主之间的斗争由于宾夕法尼亚政坛发生的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是年4月，为了支持七年战争，宾夕法尼亚议会说服总督丹尼批准了一项对业主的土地征税10万英镑的法案。这一法案的出台影响极大，因为它意味着对业主的财产也可以像对平民百姓的一样征税了。事情发生后，丹尼先生担心会遭到业主的指控而重蹈其前任的覆辙，因此主动离职加入了英国陆军，这一征税法案被送往英国请求英王的批准。围绕这个问题，富兰克林与业主之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

佩恩家族对这一征税法案恨之入骨，决心不让它得到国王的批准。他们通过内阁向国王请愿，指责该法案“违背了自然赋予的正义、英国的法律和皇家的特权”。业主们还专门聘请了几位律师为他们的利益进行辩护。1760年6月，英国内阁举行了听证会，请双方面陈理由，以供当局裁决。富兰克林与业主及其律师们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业主的律师认为：这一法案旨在加重业主财产的负担，减轻平民的负担，如果强制执行的话，势必会使业主受制于财产评估人而遭到破产。而富兰克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该法案绝无此意，而且也不会出现这种后果。他认为，财产评估人都是诚实可靠的绅士，都曾经庄重地宣过誓，所以应该相信他们是能够秉公办事的。同时，富兰克林还严肃指出了废止这项法案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现在已经发行了10万英镑纸币以供王室所用，这些纸币如今已经在民间广泛流通，如果废止这项法案，纸币就会作废，那么将对该地区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同时，王室的信誉也会大大降低。听到这里，参加听证会的一些重要人士坐不住了。王室法律顾问曼斯菲尔德先生站了起来，他把富兰克林领进旁边的一间密室，郑重地询问他执行该法案是否真的不致损害业主财产，富兰克林做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把业主的首席律师帕里斯叫来，经过一番磋商，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对业主未经测量的土地不予征税，对他们测量过的土地征收的税额不得高于其它同类土地的税额。几日之后，该法案被国王批准

了。

这场历时三年之久的斗争最后终于以殖民地议会的胜利宣告结束了。该征税法案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向业主征收了多少税款。而在于议会终于获得了长期以来所努力争取的权利——对全地区所有的财产征税，业主封建性的免税权被剥夺了。宾夕法尼亚议会非常重视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认为富兰克林为本殖民地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护了民间流通的纸币的信誉和当地的经济。此时，完成了使命的富兰克林应该返回费城了，但他却迟迟没有动身，因为英法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通往北美的航路上充满了危险，况且，他认为自己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需要办。

## 第十四章乐不思蜀

英国景物最大的迷人之处，在于浸透其间的道德之美。这种美感在人们心中唤起的联想是：秩序、安祥、宁静与持重，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和自古尊崇的风习。这里的每件事物似乎都是在和平环境下长期孕育而成的。

华盛顿·欧文

富兰克林是个责任心和使命感极强的人，但绝非偏执的工作狂。工作之余，他还有许多其它的兴趣和追求。他之所以能够欣然接受议会的差遣出使伦敦，除了认为自己对这一事关殖民地权利的重大使命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外，还有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的想法。若干年的政坛生涯也使他感到极度的疲惫，这里面既有获得胜利时的喜悦，也有遭受挫折后的烦恼。他多么渴望能摆脱复杂的政治斗争稍事休整一下，在一种充满浓郁文化氛围的高雅环境中轻松地呼吸一下自然洁净的空气，享受人生的种种乐趣，并继续从事他所挚爱的各项科学实验。但所有这些在费城是根本办不到的，他已经成了政坛上引人注目的关键人物，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把希望和责任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这就使他无形之中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里，无论怎样挣扎也难以摆脱出来。在他看来，只有在远离费城的大洋彼岸才能找到这种恬静安逸的生活。富兰克林早年曾到过伦敦，虽然那是命运对他开的一个大玩笑，但他仍对这座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深的眷恋：宏伟壮丽的现代化建筑，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和田园风光，皇家图书馆中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的图书杂志，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那些博学多才的文人雅士，无不给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事隔30余年之后，富兰克林突然对伦敦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思念之情，此时派遣他出使英国真可谓是天意！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富兰克林旅居英国期间，一方面坚持与业主进行不懈的斗争，捍卫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工作，并四处拜访各界学者，追寻民族文化，游览名胜古迹……这些有益的社会活动不仅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头脑和思想，同时还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甚至使他有些乐不思蜀。

1758年夏天，富兰克林忙里偷闲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远足。旨在了却自己长期以来萦绕在心头的一个愿望——回故里寻根祭祖。富兰克林先来到韦灵伯勒，花费一番周折找到了大伯父托马斯的女儿玛丽·费舍尔夫人。玛丽一家早年就迁出了家乡，但她仍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从未谋过面的堂弟，并敞开心扉向他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祖先们的事情。玛丽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富兰克林洗耳恭听，胸中涌动着一股从未有过的神秘圣洁的感觉，尤其使富兰克林感到兴奋不已的是玛丽竟然清楚地记得父亲乔赛亚阖家奔赴新大陆时的情形。随后，富兰克林在儿子威廉和仆人比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埃克顿拜谒祖地先人。他们一行在故里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缓缓行走，寻寻觅觅。终于，他们在绿草如茵、林木繁茂的田野间找到了家族的故居。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祖地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有先人传下来的那幢宽大的石头房屋依然坚固地耸立在那里，给富兰克林留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今，它已经变换了主人，成了一所寄宿学校，那块曾经养育了富兰克林家族几代人的不大的份地也已转到了大庄园主伊斯特德先生之手。富兰克林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在教堂找到了家族的户口登记簿，仔细查阅了两个

世纪来祖先们的出生、婚姻和死亡记录。而后他们在教区长的引导下拜祭了家族的墓地。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昔日烟火兴旺的墓地早已成为一片掩映在葛藤野草之中的荒冢，碑石参差不齐，东倒西歪，长满了厚厚的青苔。古道热肠的教区长弄来了刷子和清水，把墓碑洗净，富兰克林吩咐比利认真地把碑文一一抄下……站在故去的先人面前，富兰克林的心绪一时极难平静，他任凭思维的翅膀驰骋翱翔，恍如进入了幻境。冥冥之中，他仿佛看到先人们站在不远的一座高地上，正在用一种深邃殷切的目光审视着自己，是期待？还是疑惑？富兰克林禁不住从心底说道：“你们所开创的业绩必将在我的身上延续下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1759年3月，富兰克林和威廉又去苏格兰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久居嘈杂的闹市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乍一接触大自然那亘古永恒、清醇爽朗的空气，顿时能使人产生出一种心旷神怡、荣辱皆忘的惬意感觉。苏格兰高地景色如画，气候温润，广阔无垠的天然牧场上繁花锦簇，草木葱翠，远方的羊群如同朵朵白云在苍茫的天地间轻轻浮动，随风还能隐隐约约听到阵阵优美动人的风笛声，余音袅袅，如怨如诉，使游人置身于古朴典雅的田园牧歌式的地方风情之中。而海滨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情景，这里的海岸地带宽阔平坦，有一望无际的金色沙滩、色泽斑斓的贝壳和晶莹剔透、形状各异的卵石，海水碧蓝舒缓，清澈见底，乘小船划至近海，还能观赏到美丽的珊瑚礁和各种奇特的海洋生物。海洋的博大雄浑和神秘莫测又一次唤起了富兰克林对大自然的一种近似膜拜的崇敬心理。

但是，最使富兰克林流连忘返的还是苏格兰的人文景观和这山明水清，钟灵毓秀的环境中孕育出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文化名人，在这里，他有幸结识了他们：著名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不久后出任某大学名誉校长，并出版了有关苏格兰历史的大部头著作；著名学者亚当·斯密，此时正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讲授文学、逻辑学和哲学，15年后他发表了闻名于世的经济学专著《国富论》，从而成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戴维“休谟，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此时是爱丁堡“辩护人图书馆的管理人，著有六卷本巨著《英格兰史》；还有著名的化学家约翰·卡伦先生和医学家亚历山大·迪克爵士，等等。富兰克林与这些著名学者亲密地促膝交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富兰克林接受了正式颁发给他的荣誉法学博士证书。在参观该校医院时，医生向他征询了对正在发烧的学生卡德罗斯的治疗意见，他提出的治疗方案被医生采纳，并收到了奇效，以致若干年后，卡德罗斯仍然认为是富兰克林拯救了他的生命。

在这次旅行期间，富兰克林还被授予了爱丁堡市荣誉市民和商会会员的称号，这使他感到了意外的惊喜，因为很久以来他就对这座古城怀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之情。于是，他非常认真地参观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高大华丽的现代化建筑，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街道，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的大商店，依稀可见的中世纪教堂、修道院和古城址的遗存，都增加了他对这座城市的亲切和认同感，但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市中心那座著名的古城堡。该城堡始建于公元7世纪，经过数百年的扩建成为一座坚不可摧、令人畏惧的巨大城堡，它的三面有峭壁环绕，一面临陡坡，地势十分险要，巍峨挺拔直冲云霄。这是历代苏格兰国王的城堡，在它的身上记载着一个国家重要的兴衰史，古炮台上一尊尊乌黑的大炮昂首挺胸指向远方，昭示着一种誓死捍卫尊严和

独立的不屈民族之魂。望着眼前这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富兰克林不由想起了在西部边疆与民兵们共同修建的木栅栏——那座后来被法国人攻陷的简陋要塞，他深深地感悟道：暂时的失利算得了什么，只要保持住不屈的气节，一个民族就决不会从地球上消亡，而会顽强地生存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林。这座沉睡的古城堡使富兰克林又想起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所以尽管好客的朋友们再三挽留，他还是于10月份动身返回了伦敦的寓所。苏格兰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使富兰克林迷恋至深，久久难以忘怀，在结束这次愉快的旅行之后，他动情地写道：“我觉得我们度过了人生旅途中曾有过的最为幸福的六个星期。我们在这里发现这么多令人愉快和富有意义的社交活动，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以致于我相信，苏格兰将是我选择安度余生的地方，其它地方最亲密的关系也吸引不了我。”

住在玛格丽特·史蒂文森太太家里，富兰克林父子感觉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舒适自在，从来不必为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而操心劳神。女房东性格开朗，谈吐风雅，待人热情诚恳，体贴入微，如同亲人一般。每当尊贵的房客要进入社交场合，她都要精心为他们设计选择衣装服饰，甚至亲手为他们梳妆打扮。熟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向不修边幅的富兰克林的衣着变得日益考究起来，特别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他总是身着质地优良、做工精细的礼服，头戴式样新颖的假发或礼帽，俨然一副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房东的女儿玛丽·史蒂文森小姐是一位容颜姣好、富有教养的大家闺秀，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波莉，一看到她富兰克林总会想起自己的女儿。他曾经试图鼓动儿子向玛丽求婚，但威廉却由于与唐斯小姐有约在先未敢应允。温柔敦厚而又十分敏感的玛丽小姐对此事似乎有所觉察，在富兰克林父子赴苏格兰旅行之前突然离开了克雷文街的老宅，住到附近一个独自老妇人的寓所里去了。每当她回家探望母亲时，总要与富兰克林就自然和社会方面的一些有趣问题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可就是不与威廉单独相处。玛丽搬走后，富兰克林感到生活中似乎缺少了某些东西，时常思念德伯拉母女，于是便经常给家人写信，倾诉离别思念之情，并且寄去一些在美洲很难见到的物品：精美的餐具、瓷器、时髦新颖的服装和饰物，各种书籍文具，甚至还托人捎去了一架据说是英国制琴世家精制的大键琴。的确，富兰克林此时很富有，这不仅仅是指物质方面，也表现在精神上。但是，他并不奢侈也不吝啬。只要他认为有价值，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一掷千金，但在不该花费的地方，他总是处处精打细算甚至斤斤计较，此时他仍然保持着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记账习惯，哪怕是一笔很小的花销也要记录下来。对家人和朋友，他常常显得十分大度，而对于自己的饮食穿戴却并不怎么在意。在他的眼中，宫廷王侯的盛饌珍馐与山野村夫的粗茶淡饭并无本质性的区别，吞食下去都是胃肠的填充物；达官贵人的绫罗锦缎与平民百姓的麻衫布衣也没有天壤之别，同样可以遮体御寒。即使在感情的流露和宣泄方面，他也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分寸。他的一言一行可以让每一个他所喜爱的人感受到一种真诚的友善、亲密和关怀，但绝无轻佻狎昵之举，对那些他所厌恶的人，则能够以礼相待，或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在这些方面，威廉的确不如他的父亲。

1760年初，与业主的斗争进入最后的阶段，富兰克林正在抓紧时间做各方面的工作，力图在即将召开的听证会上给业主以致命的一击。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富兰克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当上了祖父。

事情来得唐突，却并不算大意外。在富兰克林眼中，威廉少年英俊，侷



风流，不仅在相貌、体魄和才华等方面都与他有几分相像，而且在感情早熟这一点上与青年时代的自己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时常担心儿子会在这方面走弯路。在费城时，威廉结识了伊丽莎白·唐斯小姐，并认为找到了理想的生活伴侣。唐斯是个性格内向、小家碧玉式的温顺女性，富兰克林感到两人在秉性情趣方面的差异太大，遂劝说威廉从长计议，不要草率从事。但处在热恋之中的儿子却一意孤行，与姑娘海誓山盟，私订了终身。来到伦敦后，思念情人切切的威廉不断向费城发出一封卿卿我我、缠缠绵绵的情书，但唐斯小姐的回信却全无这些华丽动人的辞藻，她所关心的是一些极为现实的问题，几乎在每一封信中她都要再三叮咛威廉保重身体，注意饮食和安全，表达不出多少痴情浪漫的格调。在威廉看来，唐斯小姐已经变成了一个庸俗透顶的管家婆，感情上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失落。于是，年轻人难以遏制的冲动使他与一位不知名的伦敦女子有了艳遇，并珠胎暗结生下一个男婴。不负责任的母亲拂袖而去抛弃了威廉父子，使他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当威廉把这个白白胖胖的男孩抱到富兰克林面前时，惊讶的父亲急忙询问孩子的生母是谁，威廉避而不答，只是嗫嚅不清地说道：“这的确是我的儿子，爸爸，我想你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孙子的。”富兰克林接过嗷嗷待哺的婴儿，仔细端详：弯弯的卷发，宽宽的额头，一双招人喜爱的大眼睛蔚蓝而深邃，这使他想起了弗朗西斯·福尔杰那漂亮的小脸蛋，屈指算来这个孩子已该 27 周岁了，可他已经病魔永远定格在那个可爱的年龄上了。想到这里，富兰克林的眼睛湿润了，此时躺在他怀里的孩子仿佛就是弗朗西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想：无论作父母的有多么荒唐，这孩子是清清白白来到人世的，应该让他享有与其他儿童一样的权利和幸福。富兰克林把孙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似乎想使他尽情地享受祖父的温暖和慈爱。

威廉知道父亲已经原谅了自己，于是如实地吐露了真情。这个孩子取名为威廉·坦普尔，很快就成了这个大家庭中最受欢迎的一员。在经历了这场人生的悲喜剧之后，威廉悟出了一条做人的道理：苟且偷欢只能获得一时的愉悦，却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不幸。真正的爱情不仅仅有花前月下的盟誓，更重要的是，相爱的双方都应该真正地承担起维系家庭幸福的实际责任。他突然意识到唐斯小姐身上的可爱之处，他真的很需要一个“管家婆”与他共同营造起一个温馨可靠的家。他忧心如焚，归心似箭。

在对业主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威廉就提出立即返回费城，但富兰克林没有同意，他考虑的比较多。当时英法争霸战争正在世界各地全面展开，在没有可靠护航的条件下远航危险性是很大的，新降生的小孙子坦普尔也经不起长途旅行的颠簸，况且，他在英国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办完（其中包括与英国友人就科学研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探讨），而伦敦的朋友们也希望这位博学而谦恭的老伙计留下来。另外，宾夕法尼亚议会也不希望他立即返回北美，议长诺里斯先生派人专程前来送函，任命他为宾夕法尼亚驻英国的官方代表，继续就征税、防务等问题与殖民地当局交涉。就这样，富兰克林在英国滞留下来，一住又是两年。这期间，他实际上扮演了美洲非官方代表的角色。

客居他乡使富兰克林的生活节奏变得平缓多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他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喜欢认真深入地思考问题，而伦理学则是他经常光顾的一个领域。还是在小儿子弗朗西斯接受洗礼之时，他就曾萌生过写一部道德艺术著作的念头，但因公私事务缠身，一直无暇动笔。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坎坷岁月，他对人生和伦理问题悟出了更多的道理，而多年编纂《理查历书》也使他积累了大量的有关素材，特别是威廉把私生子带回家后，他又开始认真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写一部著作，专门论述人与道德这一古老永恒的主题。为此，他动手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设计好了写作计划和提纲。但事与愿违，这部酝酿已久的大作终因发生了更为紧迫的事情而耽搁了下来。此时，英法战争又有了新的进展，在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皮特的领导下，英军顺利地攻占了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进而又把法国人赶出了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此时，英国朝野上下都在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究竟应该兼并整个加拿大，还是只保留瓜德罗普岛（一个重要的产糖地区）。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却被那些目光短浅的商人和政客们搅乱了。许多重商主义者认为，加拿大是寒冷的荒原，还有漫长的边疆地带，必将成为母国沉重的财政负担。另一些人士则宣称：把法国人驱逐出加拿大势必会促使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面对种种奇谈怪论，富兰克林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于1760年5月在伦敦出版了《大不列颠的利益：关于她的殖民地以及加拿大与瓜德罗普岛占领地的思考》一书。在这部著述中，富兰克林深刻地阐发了他的帝国观：加拿大必须归英国统辖，因为这里是英帝国的西部边疆，占据它就可以保证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安全利益：只有占据更为广阔的空间，英帝国的人口才会剧增，其富裕、力量和成就才会迅速增长。

在这里，值得引起后人注意的似乎并不是富兰克林新颖却并不算激进的帝国观，而是他从另一个角度对大英帝国发出的严重警告。富兰克林在驳斥占有加拿大会使北美独立的观点时，排除了在北美会出现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母国的可能性，但他同时指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的，即英国政府不对北美实施暴政和压迫。富兰克林以一种预言家式的口吻写道：“当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联盟时，我指的是在这种前提下，即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压迫。在人民拥有而又可能失掉财产，享受权利而又可能受到威胁的国家里，一般来说人民会当顺民，甚至忍气吞声而不会于危及全殖民地的事，如果政府宽容公正，重要的民事和宗教权利都有保障，那么，这个国家的臣民自然会尽职尽责，服从命令。无风不起浪。”在这里，富兰克林虽然没有直接去论证北美人民脱离英国独立的现实可能性，但他却从自身的真实感受中揭示出了一个真理：宗主国的暴政和压迫必然会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满，当这种不满情绪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便会联合起来反抗自己的母国，甚至走向独立。这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如果英国统治当局有所觉悟和节制的话，宗主国与北美之间在七年战争之后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麻烦，北美的独立运动也不会来得那么迅疾猛烈。

在旅居伦敦的后两年，富兰克林在工作、写作和旅行之余仍潜心进行他所钟爱的科学实验。他研究的科学领域极为广泛，化学、物理、气象、医学、地质学和音乐等都是他涉猎的对象。他就像一只采集百花酿蜜的蜜蜂，凡是他认为与人类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他都想探究一番，一旦找到了比较确切的答案，他往往又把眼光转向下一个目标。在这期间，他与剑桥大学的约翰·哈德利教授共同研究了乙醚挥发的问题，并就挥发制冷在工业上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与亚历山大·迪克爵士交流了改装家庭壁炉和烟囱的方法；他与亚历山大·切莫尔研究了东北向暴风雨的起源问题；与约翰·巴斯克维尔共同研究了一种新的活字印刷术；与威廉·赫伯登共同探讨了天花

的问题，并为其撰写的关于医治天花的著作写了序言，等等。十分有趣的是，富兰克林还依据理查德·帕克里奇发明乐杯的原理，制造出一种音色柔和、深邃的乐器，并为之取名为“玻璃琴”。该乐器问世后在欧洲风靡一时。富兰克林也因发明了玻璃琴而长期在音乐界享有盛誉。由于富兰克林在科学研究事业上执著追求并做出了非凡成就，1760年12月8日，他获得了在英国皇家学会委员会理事会的席位，并于1765年、1766年和1772年连续三次获得这一殊荣。

1761年夏末时节，富兰克林与威廉同行，访问了欧洲西部的荷兰和比利时。这次历时一个月的访问完全是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进行的，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在享有“西欧首都”之称的布鲁塞尔，他为这里的古老文化内涵和宏伟壮观的建筑艺术所深深倾倒。在“北方的佛罗伦萨”根特市，他或者驻足在欧洲的古建筑群面煎，或者仰望13世纪巍峨挺拔的哥特式大教堂，久久不愿离去，比真正的基督徒还要诚惶诚恐。在绘画之都布鲁日，他仔细浏览了前人留下的绘画艺术瑰宝，并被15世纪造型各异的桥梁和那些装饰在建筑表面的栩栩如生的金色雕像深深吸引住了。但最使他流连忘返的还是号称风车之国的荷兰，那迎风转动的高大古老的风车，那开满缤纷馥郁的美丽花卉的低洼地，还有风光绮丽的绿色公园海牙，到处繁花似锦，芳草如毡，清流潺潺，具有一种难以描绘的世外桃源的风韵。就像游览苏格兰时一样，富兰克林此时又产生了一种飘飘如仙、恍若梦境的虚幻感觉，他真希望能永远生活在这个“欧洲最大、最美丽的村庄”之中。

国王乔治二世因病去世了。富兰克林接到了请他返回伦敦参加新国王加冕典礼的通知，于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结束了旅行，踏上了回归的路途。乔治二世去世后，由于其子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已先他死去，因而王位由其孙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继承，称乔治三世，时年仅22周岁。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在议会广场南侧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隆重举行。面对新登基的君主，富兰克林心里充满了希望，认为他是一位“高尚、慷慨的青年国王”，并为自己能站在国王面前而兴奋不已。此时他想起了父亲生前经常引述的所罗门的一句箴言：“凡孜孜不倦，埋头于事业者，将站立在国王面前，而不与小人为伍。”前人的预言真的成了现实。但还有一件事他却没来得及细想：此时端坐在他面前的国王在行将来临的历史大潮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种惬意充实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762年上半年，这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应该回国了。他清楚地看到：七年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大洋两岸的情况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自己出访英国的使命已经结束，如果长期这样悠闲下去，即使生活得再舒适自己也会心烦意躁的。就在这时，他接受了牛津大学的热情邀请，于4月底访问了这座历史悠久、声誉日隆的著名学府，并接受了民法博士的荣誉称号。同时，儿子威廉也被该校授予艺术硕士学位。此行结束后，富兰克林便着手做返回家乡的准备工作了。听说这一消息后，朋友们都感到十分愕然，竭尽全力予以挽留，斯特拉恩甚至想用结儿女亲家的方式留住富兰克林的心（两年前他就曾提出他的儿子与富兰克林女儿订婚的请求）。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富兰克林此时去意已决。他知道，虽然在这里也能从事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但自己事业的根基毕竟在大洋彼岸，长期生活在英国并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幸福。

就这样，富兰克林于8月24日毅然踏上了回归北美的航船。面对前来送行的朋友们，他的心情一时变得极为复杂：此次伦敦之行圆满地结束了，他

何时才能重返这美丽的国度，与友人们再次愉快地相聚，时间老人还能给予他这种机会吗？想到这里，一种怅惘失落的情绪不禁油然而生，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将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就如同感到像离开这个世界走向下一个世界一样，离别之忧、旅途的担心和未来的憧憬，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同时冲击着脑海，使我感到十分脆弱。”

两个月后，富兰克林回到了北美费城的家。

## 第十五章议会议长

你本人的理智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的神谕，而你应负的责任不在于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而在于决定的诚实性。

托马斯·杰斐逊

一个分离五年之久的家庭又团圆了，全家的每一个人都为这一重聚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富兰克林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或许在某些人看来，这个家还算不上富丽华贵，但它毕竟是富兰克林亲手所营建，里面居住着他日夜思念的亲人——多年朝夕相伴、患难与共的妻子和已出落得楚楚动人的女儿萨拉。威廉则为与久别的情人伊丽莎白·唐斯小姐相聚而兴奋不已，一回到北美就忙于筹办婚事，没几天就匆匆忙忙举行了婚礼，携带新娘欢度蜜月去了。但是，全家人中感到最幸福、最欣慰的还要算德拉伯·富兰克林。

自从富兰克林父子返回费城以后，德伯拉·富兰克林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喜气洋洋，乐不可支，精力也旺盛得多了，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固然，丈夫和儿子的安全归来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宽慰和喜悦，使长期以来一直悬在她心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况且，他们还带回了那么多她从未见过的珍贵礼物。但是，最使她感到惊喜的还是她终于见到了可爱的小孙子威廉·坦普尔。看到孙子的第一眼就使她完全相信了丈夫在信中的描述：蓝蓝的眼睛，弯弯的卷发，活泼乖巧，与她早年夭折的小儿子弗朗西斯·福尔杰几乎一模一样。当年，她未能挽回那个幼小脆弱的生命，这件事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个弥补内心缺憾的机会，因此把所有的母爱都加倍地倾注在这个小生命的身上。德伯拉为小坦普尔专门收拾出了一个房间，把它布置得舒适又漂亮，用富兰克林的话说，“就像诗人但丁构思的充满了鲜花和阳光的天国一样”。她在这里亲自照料自己的小孙子，服侍他的饮食起居，甚至与他一同嬉戏玩耍。每当这时，这座沉寂了多年的宅第就仿佛变成了一座充满了欢歌笑语的儿童乐园。在这含饴弄孙的快乐日子里，德伯拉终于在晚年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这是一种人类所共有的天伦之乐，哪怕再苦再累，只要听到孙子那还不太连贯、充满稚气的话语，或看到他憨态可掬、蹒跚学步的身影，她的眉头就会舒展开来，所有的劳累和痛苦也就一扫而光。当然，欣喜之余她也没有忘记履行对威廉许下的诺言：对儿媳暂时保密，以免伤了她的自尊心。

伦敦之行不辱使命，富兰克林受到了宾夕法尼亚各界人士的尊重和称道，威信大增，就连殖民当局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在他长期滞留在大洋彼岸时，他的同胞们仍然非常信任地推举他为议会议员，殖民当局也让他继续担任北美邮政副总督之职。他的老搭档威廉·亨特于1761年去世后，根据他的推荐，空缺由弗吉尼亚的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先生接任，这位富兰克林的老相识心甘情愿地挑起了这个本属于两个人的工作重担。

但是，在业主与殖民地民众之间的天平上，统治当局的砝码总是会向业主一方倾斜的。英国王室任命宾夕法尼亚第一代业主的孙子约翰·佩恩出任宾夕法尼亚总督，以此作为对不得已向业主征税的一种补偿。但令某些人不解的是，就在富兰克林返回北美的前夕，威廉·富兰克林突然被任命为新泽西的总督。很显然，英国当局是想笼络在北美和英国都有巨大影响力的富兰

克林，以此来遏制他对总督和业主们咄咄逼人的攻势。但当局的如意算盘肯定是会落空的，富兰克林既不会被权力所腐蚀，也不会向任何恶势力屈服，因为他的心早已经与北美殖民地人民紧密连在一起了。

但是在与业主的激烈斗争中，富兰克林也确实树立了不少政敌，并招致了他们极大的怨恨，因此这些人总是想方设法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诽谤。当他们看到富兰克林父子从英国给家人和亲友带回不少珍贵罕见的物品时，便恶毒污蔑富兰克林父子在出使期间生活奢侈豪华，挥霍侵吞了大量公款。一时间谣言四起，使富兰克林父子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富兰克林早年养成的记账习惯帮了他的忙。2月中旬，富兰克林把在伦敦生活期间的详细开支账目提交给了议会。经过议会的严格审查，确认富兰克林只使用了议会拨给他的公款(共1500镑)中的714镑10先令6便士，账目清楚了，毫无纰漏，每一笔花销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结论说明，富兰克林在出使期间不仅没有铺张浪费，反而处处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他从事科学实验、旅行和购买礼品等所花费的都是私款。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政敌们的卑鄙伎俩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不仅自己出乖露丑，还无意之中使广大民众清楚地看到了富兰克林公私分明、清正廉洁的高尚风格，就连曾对富兰克林经常记账的举动颇有烦言的威廉也转变了态度，对父亲的这一良好习惯和先见之明称道不已。

七年战争终于结束了，北美又恢复了她特有的宁静。达官贵人们又开始了狂欢宴饮，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可以高枕无忧地尽情享乐了，并且为争夺新的利益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斗争。但富兰克林却不是这样。他首先想到的是战争留下来的累累创伤，同时也看到帝国版图空前扩大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他所负责的邮政工作所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进入近代文明社会后，邮政已经成为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部门，人们传递信息、寄送物品、办理汇兑和发行报刊等都有赖于这一部门工作的正常运转。但富兰克林对于邮政事业的理解还不仅仅局限于这一方面，他的目光要更为深邃敏锐。富兰克林把邮政事业看作实现自己远大政治抱负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认为邮政是使北美各个殖民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相互沟通交流并进一步发展的纽带和桥梁，邮路的发展畅通和高效优质服务，可以有效地促使各地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所以可以在事实上实现奥尔巴尼计划所勾勒出的北美联合的美好理想。因此，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开始着手安排纽约与蒙特利尔、魁北克等地的邮政业务，并设法增加邮政项目，大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从1763年4月开始，他对北美各地的邮局进行了长时间的巡察，目的就在于亲临现场指导工作，以促进北美邮政网络的发展完善。

长达1600英里的实地考察和现场办公开始时正值春季，新婚不久的威廉夫妇陪同精力旺盛的老父亲走过了南方一些艰难曲折的地段。他们乘坐着带有皮顶篷的马车，沿着由印第安人小道加宽而成的土路疾速行驶，经历数日颠簸来到了北卡罗来纳的伊丽莎白城。热情的东道主设盛大的晚宴迎接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父子。威廉夫妇显然更为适应这种热烈隆重的场合，他们不停地穿梭于显贵要人们中间，频频举杯致敬，谈吐风趣优雅，成了整个宴会的焦点。而富兰克林则稳稳地端坐在宽大舒适的坐椅上，微笑着与每一位贵宾亲切交谈，偶尔举一举手中的酒杯表示敬意，但始终滴酒不沾。在威廉斯堡，富兰克林见到了自己的新同事福克斯克罗夫特先生，两人共同磋商了发展北美邮政业的方针大计，并制订出了一个简要的实施规划。临别时，福克

斯科罗夫特先生给他配备了一辆由六匹马拉的豪华马车。这辆宽敞舒适的马车大大缓解了旅途的颠簸劳顿，也加快了行进的速度，很快就经过了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和特拉华北部，来到了威廉的督府所在地珀斯安博伊。在这里，新任总督威廉立即就被冗杂的公务缠住了身，富兰克林只好只身继续前行，耐不住旅途孤寂的富兰克林给费城的太太发去了一封急信，要求让女儿萨拉前来陪伴他走完剩下的路程。德伯拉欣然应允，于是，萨拉像一只快活鸟一样飞到了父亲的身旁。父女俩在纽约汇合后继续北上，一路上，大篷车里不断传出他们的欢歌笑语。

在从康涅狄格进入罗得艾兰境内时，由于道路崎岖狭窄，他们不得不弃车乘马而行，擅长骑术的富兰克林也许是太累了，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了伤。就在富兰克林遭受了巨大创痛的时候，他的旧日女友凯瑟琳给了他热情的帮助和宽慰。凯瑟琳早已嫁给了富有教养的绅士威廉·格林先生，两人伉俪情深，生活得十分和睦，已生育了两个孩子。凯瑟琳·格林把富兰克林接到自己家中，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父女俩在格林夫妇家整整逗留了一个星期，萨拉被凯瑟琳善良的心和柔美的外貌深深吸引住了，真想多住几日，但父亲却以公务紧急为由执意上了路，在格林夫妇依依不舍的送别中又踏上了北上的路途。下一个阶段的旅途顺利而惬意，他们经过了普罗维斯登，波士顿等地，最终到达了新罕布什尔。当他们返回费城时已是深秋时节了。

对于像富兰克林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在经过长期的艰辛旅行之后，理应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以消除疲劳，恢复元气。可是，边疆地区骤然爆发的印第安人危机使他的良心和灵魂都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并把他深深地卷入了殖民地内部斗争的风暴之中。

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了，北美各地出现了和平的曙光，但是印第安人的处境却每况愈下，在死亡线上苦苦地挣扎。正如《美国早期史》的作者西蒙斯先生指出的那样：“七年战争中的第三方印第安人日益认识到，殖民者的胜利改变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甚至可能意味着灾难。印第安人不再能依靠巧妙的外交手段维护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的安全了，而以前，这种手段可以使他们从两个对立的欧洲大国中得到盟友和保证，原先，欧洲人每年都要送给印第安人礼品，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向他们做出承诺，有时还供应廉价商品。如今，依附于一个强大吝啬的帝国，这些惯例可能要消失了。”事情不仅仅如此，欧洲人的某些做法还把印第安人逼上了绝路：即将撤离的法国人不断煽动印第安人的仇英情绪，而英国人则肆无忌惮地向西推进，以武力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惨遭蹂躏的印第安人意识到，入侵者的目的是要夺取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将他们置于无以为生的死地。于是，即使是原来与英国人友好的印第安部落也开始躁动不安了。他们或者单独行动，或者团结在渥太华部落酋长庞蒂亚克的周围，在漫长广袤的边境地带向英国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不仅攻击英国的军事要塞，而且还血洗了没有设防的居民点。在边疆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和混乱。英国人气愤地称这场骚乱为“庞蒂亚克阴谋”，孰不知正是他们自己背信弃义、以怨报德的举动才导致了事态的恶化。于是，在边疆地区出现了一股白人极端主义分子狂杀滥捕印第安人的狂潮，他们用比野蛮人更野蛮的手段对千千万万无辜的印第安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种族大清洗。发生在兰开斯特县的惨案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兰开斯特县位于宾夕法尼亚东南地区，这里居住着印第安人的一个支系

——科内斯托加印第安人。这是一个爱好和平、热情好客的部落，在英国人首次来到宾夕法尼亚时，他们的信使曾经携带着玉米、鹿肉和毛皮等礼物前去欢迎慰问，并与第一代业主威廉·佩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他们与当地的白人居民友好和睦地居住在一起。但就是这些安分守己的和平居民竟然成了白人暴徒们肆意发泄怨恨的目标。1763年圣诞节的前后，一批狂热的苏格兰移民分两次洗劫了科内斯托加的居住地，用斧头和火枪将他们残酷地杀死，男女老幼竟无一人幸免。血案发生后，新任总督约翰·佩恩置若罔闻，只是象征性地发布了一张追捕凶犯的告示就不了了之。当局的这种纵容姑息态度更助长了暴徒们的嚣张气焰，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无辜者的鲜血使得一切良知尚未泯灭的人们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也深深震撼了富兰克林那颗善良的心，理智告诉他，无论事情是怎样引发的，屠杀事件的本质就是暴乱，是对秩序和法律的肆意践踏，必须给予强烈的谴责和坚决制止。于是他冲破阻力和干扰，于1764年1月发表了题为《近来兰开斯特县惨案纪实》的文章，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顾了自创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以来科内斯托加加入与白人移民和睦相处的历史，对于那些滥杀无辜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最严厉的鞭笞。他写道：“有人竟用这样的话掩饰其极为邪恶的行径（听到这些，令我感到羞耻）：‘边疆居民是由于其亲友在最近的战争中被印第安人杀死而愤怒的。’这也许是实情，但是，这尽管可以成为他们进入森林搜寻印第安人进行报复的理由，却并不能证明他们转向殖民地的腹地去杀害自己的朋友这种行为是正当的。如果一个印第安人伤害了我，我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复仇吗？……那些可怜的老翁老妪们做了什么，那些少男少女做了什么，一岁的孩子、吃奶的婴儿做了什么，竟招致被枪杀斧砍？！他们是死在父母的怀抱里啊！在欧洲，任何开化的民族都做不出这些事情，难道我们来到北美是为了学习野蛮人的行为吗？但是，即使是野蛮人也只反对他的敌人而不对抗他的朋友。”

这篇热情而动人的文章使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了解了事实真相，使许多一时糊涂的人恢复了理智，同时也使那些凶残的暴徒们名誉扫地，因此，富兰克林触怒了某些有权势的人，其中包括总督约翰·佩恩先生。这位心胸狭窄的业主后代竟然用一种极为残酷的方式给富兰克林的文章以回击：悬赏收购印第安人的头皮。这种野蛮卑鄙的行为导致了局势进一步恶化，一时间暴乱四起，血雨腥风笼罩了宾夕法尼亚全境。2月初，一群疯狂的武装暴徒向费城汹汹而来，色厉内荏的总督先生竟被吓得六神无主，不得不屈尊向德高望重的富兰克林求助。为了确保费城的安全，富兰克林把个人的恩怨置于脑后，出面组织了一个协会，动员了几百个志愿人员参加城市保卫工作。当暴徒们兵临城下时，他又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前去谈判，终于使他们不战而退。费城得救了。

七年战争的结束不仅未给印第安人带来任何好处，也没有给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居民送来福音。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英国政府就开始酝酿要对北美执行更加严厉的统治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北美进行高度的控制和压榨。1764年3月，英王的宠臣乔治·格伦维尔宣布要对殖民地严厉征税并控制其贸易，在内阁正在拟议的各项压榨性法案中包括有一项印花税法。虽然这些事情仍在筹划之中，但却引起了富兰克林的高度警觉和关注，并立即从中看到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于是，他坦诚地对英国的新殖民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严肃地指出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的巨大危险。他在给英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尖锐地说道：“我们在你手中就像陶工手中的陶土一样，仅有一



点不同的是：陶工不可能浪费陶土而不使自己受损失，因此我认为，你们不可能伤害我们而不使自己同样地或更多地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安全保障。我们在你们那里很少有什么利益，西部印第安人要比我们这些北美殖民地人重要得多。基本生活品以外的其他一切我们必须依赖你们的制造业，因此，你们用税收从我们这里取走的，将损失在与我们的贸易之中。一只猫只能提供一张皮，你们想得到一张整皮，但假如你们先从上面割下皮条，那么，付出代价的将是你们自己”。这是发自殖民地人民内心深处的呼声，是一种义正辞严的警告，也是一位预言家在灾难即将来临之前发出的神秘咒语。

但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仍然对英国及其君主怀有一种难以摆脱的眷恋之情。他在伦敦参加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时就对这位年轻的国王抱有好感，回到北美之后，尽管目睹了英国政府的政策给殖民地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但他如同大多数北美白人居民一样，依然对英王抱有一种非常崇敬的心理。他在给英国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你对我们贤明的年轻君主担忧，担心政治集团会使他屈服，使他的统治不稳。相反，我认为他的品德和意志，他想使其臣民得到幸福的真诚的意识，会使他的政策坚定不移，并得到那些挑选来为他服务的忠实朋友们的支持。当人们看到政策稳定，集团将会如晨雾般在旭日中消失，土崩瓦解，剩下的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空。”基于这种信念，他和议会中的一些重要成员们认为：宾夕法尼亚由英王直接治理要比由业主统治强得多，因此应该把宾夕法尼亚由业主殖民地改为王家殖民地。于是，议会与业主、总督之间的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暴乱结束后不久，议会通过了一部《民兵法案》和《资金法案》，但都遭到了佩恩总督的否决，他要求由他亲自掌管民兵的指挥权，并坚持在《资金法案》中明确列入英国内阁 1760 年时规定的内容，即“凡业主来经测量的土地不准征税，而对他们测量过的土地征收的税额不得高于其它同类土地的税额。”对此议会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应根据宾夕法尼亚的具体情况由议会决定税收问题，不必拘泥于过去的规定。但议会的决议一再遭到总督的否决。总督蛮横无理的态度终于彻底激怒了议会，使得大部分议员丧失了对他的尊重。1764 年 3 月 24 日，议会通过了决议，决定将征求选民意见，以决定是否起草一份请愿书，要求英王陛下“将本地人民置于他的直接保护和治理之下”。4 月 12 日，富兰克林公开散发了自己写的题名为《对目前公共事务之局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把宾夕法尼亚出现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其政治体制。他尖锐地指出：“我认为原因在于根本之中，在于我们的宪法之中，因此，这是一个业主政府之本质的问题，只要业主政府继续存在，就会产生不良后果。”

围绕着业主殖民地的存废问题，宾夕法尼亚社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分裂为两大政治派别。保守派主张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的旧体制；而改革派则认为业主的统治是一种罪恶，应该对宾夕法尼亚的旧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变业主殖民地为王家殖民地。斗争愈演愈烈。5 月份，议会重新开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改制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互不相让。在这次会议期间，年迈的艾萨克·诺里斯辞去了议长一职；经议会讨论，5 月 26 日，富兰克林被一致推举为新任议长。富兰克林担任议长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仅仅在 5 月底议会闭会前的几天和 9 月中旬作为议长主持了会议。10 月，宾夕法尼亚大选结束后，议会终于根据民意起草了一份致英王的请愿书，要求英王“将宾夕法尼亚置于他的直接治理和庇护之下”。为了

能顺利地实现这一重大的变革，议会于10月26日决定，派遣富有威望和谈判经验的富兰克林赴英国递交请愿书，并代表宾夕法尼亚处理与殖民地事务有关的其他问题。议会很快就贷了一笔款项，共1100英镑，作为富兰克林在英期间的生活和活动经费。但富兰克林只接受了其中的500英镑，因为他知道，宾夕法尼亚的经济状况不太景气，财政一直亏空，同时他认为，自己最多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圆满完成使命。德伯拉为丈夫又要远行而颇有怨言，并拒绝让女儿萨拉随同前往，因为她担心女儿一旦到了英国就会成为斯特拉恩先生家的儿媳，再想见到女儿可就不容易了。但她还是同意了富兰克林的请求：让小孙子陪伴爷爷漂洋过海，以减轻他在旅途中的孤寂和烦恼。临行之前，富兰克林于11月5日写了一篇题为《对最近抗议的评论》的文章，一方面对政敌们的攻击做了答复，另一方面以这种书面形式向爱戴他的亲人和朋友们郑重告别。文章的结尾写道：“我即将离别（可能是最后的离别）我挚爱的这片土地了，我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历程。永别了：祝愿我的朋友们万事如意，而且我也原谅我的敌人。”11月7日，富兰克林在朋友们的簇拥下与妻子依依惜别了。德伯拉此时的心情虽然很难平静，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聚散离别已经使她变得十分坚强豁达，她相信，最多过上半年，丈夫就会携带着小坦普尔平安返回，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温馨祥和的家，况且，那幢宽敞漂亮的新居已经破土动工了，这是富兰克林花费许多时日亲手设计的杰作，因此他肯定会在完成使命后立即动身返航的。此时他们都未曾料到，夫妻间的此次离别竟是那样长久，并终成永诀。

## 第十六章印花税法

我希望本国拥有的对殖民地的最高权力能够以最有力的语言予以维护，并使之延伸到立法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控制他们的贸易，限制他们的制造业，并且行使任何权力，但就是不可以未经他们的同意就从他们口袋里拿钱。

威廉·皮特

当牛顿时代尚未终结而爱迪生时代还很遥远的时候，身处美洲的富兰克林不可能及时详细地知道母国所发生的事情。他煞费苦心研究的电学的实用范围还很狭小，有关远距离电讯传递等重大课题尚未提上科学家们的研究日程。他只能依靠随风漂泊的帆船和奋蹄疾奔的马匹来获取信息，而那些迟到的邮件和报刊则往往使新闻变成了故事；若再迟，甚至会成为历史。

七年战争结束后，身处费城的富兰克林目睹了北美动荡不安的局势：持续不断的骚乱，庞蒂亚克战争，捉襟见肘的财政，以及宾夕法尼亚冥顽不化的业主与议会间的激烈斗争等等，都使他深感忧虑。但他认为这些都是殖民地自身的问题，是因地方政府治理不善和英国政府用人不当所造成的，如果年轻有力的乔治三世了解了事实真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肯定会采取措施给以妥善处理的。但当他接近了帝国统治的权力中枢，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国王的近臣和内阁时，他才逐渐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幼稚了。他原打算几个月就完成了的事情竟被拖了10年之久仍无着落。不过到那时，形势的发展已使他完全放弃了任何和平解决殖民地危机的希望。

长达一个月的航行和阴冷潮湿的冬季使富兰克林一到伦敦就患上了重感冒，头剧烈地疼痛，咳嗽不止，直到来年的1月份才逐渐痊愈。又回到了史蒂文森太太那舒适温馨的家，又处在亲朋好友们的友谊和关照之中，但富兰克林此时已无暇去细细地品味这里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了。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他必须全力以赴地去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为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和利益而奋力抗争。因此，此次英国之行富兰克林更多地是在扮演一个反抗暴政和殖民压迫的自由斗士的角色，虽然他从来都没有失去儒雅谦和的绅士风度。

富兰克林的到来受到了英国友人们的热烈欢迎，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同他代表殖民地议会进行请愿活动。他的同事理查德·杰克逊（自富兰克林返美后他一直作为使节留守英国，此时已成为英国下院议员）认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行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根据他的分析，业主统治宾夕法尼亚的时日不会太长久了，英王将来会从业主手中把它赎买回来，对它实行与其他殖民地同样形式的管理。所以他主张与其立即解决这一问题，不如暂时将它搁置起来，静待其自然发生变化。富兰克林对于杰克逊的主张嗤之以鼻，仍然坚持执行宾夕法尼亚议会的决议，立即向内閣递交了请愿书，争取事情能得到及早解决。但请愿书递送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直到1765年底内閣才给了一个闪烁其辞的法律性的答复：国王无权在业主与人民之间插手。显而易见，这一答复是令人失望的，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当年富兰克林第一次状告总督时，枢密大臣格兰维尔曾大言不惭地当面向他宣称“在立法机构中国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英王陛下的训令传达到那里，即成为那块土地上的法律”。如今他们又出尔反尔，说国王无此权力，这显然是一种偏袒业主的敷衍行为。对此富兰克林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四处游说，力争有一个圆

满的结局。

就在富兰克林为宾夕法尼亚改制问题而出使英国的前后，北美的情况急转直下——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剧烈的冲突，富兰克林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正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从17世纪初叶英国在詹姆斯敦建立第一个永久性的居民点起，英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起13个殖民地。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漂洋过海来到这块新大陆，在这里共同劳动、生息、繁衍。经过100多年的辛勤耕耘，大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被开垦出来了，北美各地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北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南部的种植园农业经济蒸蒸日上，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随着生产贸易的发展和交通邮政事业的进步，原来彼此隔绝的各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了，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等大城市相继出现，成了北美的政治经济中心，统一的北美民族市场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北美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殖民地际”大学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了。

由于北美殖民地2/3的人口来自英伦三岛，因此，北美人始终对英国怀有一种天然的依恋之情，但是，英国政府对此却从未给予过应有的关注和珍惜。他们认为，建立殖民地的唯一目的是索取而不是给予，殖民地是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它应该为宗主国源源不断地奉献上它所有的财富和忠诚，而决不能有丝毫的讨价还价和抱怨的情绪。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阻碍北美经济的正常发展，采取一系列措施，禁止北美与别国直接通商，严格限制在北美发展工业，以保证英国商品在北美市场的倾销。久而久之，在对母国依恋的情感下面，一股分离主义情绪的暗流在北美悄然滋生起来。但是，在1763年以前，由于英国要利用北美殖民地打击法国在北美的势力，并没有严格执行上述限制性措施，因此，北美殖民地的经济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它与宗主国之间还维系着比较稳定的领属关系。

但在1763年，情况发生了突变。英法战争结束了，英国在殖民争霸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于是它便腾出手来，开始执行严厉限制殖民地经济的政策，大肆对北美进行压迫和榨取。

1763年，英国加强了制裁北美走私业的措施，派出大量军舰到北美海岸游荡，稽查走私，从而使北美的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迅速陷于萧条。同时，英国政府还颁布法令，禁止殖民地居民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以保护英国毛皮商人的利益，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希望到西部去谋求发展的广大农民，种植园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英国当局似乎仍嫌不足，1764年以后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税法，例如，1764年的《糖税法》和1765年的《印花税法》等等，强行向北美人民征收重税，巧取豪夺，以满足英国国内的需要。在这些苛捐杂税中要数《印花税法》对北美人民的打击最为沉重。

1765年3月22日，《印花税法》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经由国王签署颁布，于同年11月生效。该税法规定，殖民地上所有的印刷品，包括商业执照、契约、法律文书、报纸、历书、扑克牌和借款单据等，都必须在缴纳税

金（必须是硬币）后帖上“税资付讫”的印花，否则予以重罚。这是有史以来英国对殖民地进行的范围最为广泛的一次横征暴敛，不仅给北美人民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因此引起了空前剧烈的反抗。

在《印花税法》尚在拟议中时，富兰克林就对它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不仅认为这项税收对于北美人民来说是过于沉重了，而且担心这一法令的实施会危及北美的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事业，从而侵犯人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但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富兰克林最初是从法律的角度公开反对《印花税法》的。1765年2月，内阁组织了一次有各殖民地代理人参加的会议，富兰克林在会上向当局严正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北美人民是愿意为防务等事情出钱的，但向他们征税必须首先取得他们的同意，即由他们的代表在自己的议会里决定他们需要付出的款项，就像以前所做的那样。否则，印花税就是一个不能代表他们的立法机关强加给他们的税，这显然不符合法律程序，说得严重些是对北美人民权利的侵犯。但是，目光短浅的统治者眼下只是想尽快弄到钱，对殖民地代理人的呼声置若罔闻。现任首相格伦维尔以不容商榷的口吻告诉他们：鉴于战争期间各殖民地议会对承担战争费用持消极态度，《印花税法》必须由英国议会批准后实施，并警告北美人不要指望通过“骚乱”从政府这里得到让步。

首相先生傲慢不恭的态度不仅深深地激怒了富兰克林，也引起了英国议会中某些开明人士的不满。法案在下院付诸讨论时，议员杰克逊对该法案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而艾萨克·巴里则站了出来，为北美人民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他用一种发聋振聩的雄辩声音说道：“他们在你们的关怀下迁移，不，是你们的压迫驱使他们移居美洲的，他们逃离你们的暴政来到这个尚未开垦的荒凉之地。他们在你们的恩惠下生息繁荣！不，他们是在你们的不闻不问之中成长发展的。他们受到了你们的武力保护！不，是他们高举起臂膀保护了你们；在艰苦卓绝的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他们英勇无畏，百折不挠，这个国度的边疆浸透了鲜血，而它的内地却不得不把仅有的积蓄送给你们作为酬报。”在这个义正辞严的演说中，巴里先生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在自由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北美人民，把他们称作“自由之子”。正是这个响亮的名字后来激励了成千上万个北美人士为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而英勇战斗。从内心来说，富兰克林是十分厌恶并坚决抵制《印花税法》的，但事情的发展使他清楚地看到，要想阻止《印花税法》的出台已经毫无可能了，所以他认为，与其侈谈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如切切实实地做几件能对该法案造成的恶果起消弥作用的实事。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向当局提出了几项缓解危机的措施，并努力促使当局采纳，其中包括废除禁止在殖民地发行纸币的法令和由各殖民地指派当地居民担任征税官，这后一项措施很快就得到了格伦维尔的认可，这也是这位首相大人对殖民地采取的一种和解性措施。于是，富兰克林郑重地向内阁推荐了他的老朋友、深孚众望的约翰·休斯先生出任宾夕法尼亚的征税官。这一推荐得到了内阁的批准。英国1763年以来所采取的各项强制性法令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和掠夺，极大地影响了北美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各个阶层人士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而更加深了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印花税法》的出台则大大加宽了这一裂痕，使民族矛盾骤然激化，由此导致了反英运动的大规模爆发，而这一运动首先是以反《印花税法》为中心展开的。北美各界人士纷纷集会，他们认为《印花说

法》不仅损害了北美人民的经济利益，也严重侵犯了北美人民的权利和尊严，英国国会不与殖民地协商就强行征税是一种暴政，因此他们提出了“要自由，不要印花税”的战斗口号，对《印花税法》等强制性法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反英运动中，北美涌现出了许多反英秘密组织，如自由之子社、通讯委员会等等，在动员和组织运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自由之子社的大力推动下，1765年10月，九个殖民地的代表在纽约召开了反印花税法大会，会上宣布：英国国会中没有北美的代表，北美人民没有向英国纳税的义务。会议以后，一个响亮的口号响遍了北美大地——“无代表即不纳税”，这本是英国人在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提出的政治口号，现在为北美革命人民所利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北美的下层群众还采取革命暴力的手段来反对英国的暴政。他们捣毁税务局，击沉税务缉查艇，将税吏从家中拖出来，浑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游街示众。许多明智的征税官（如宾夕法尼亚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尔）纷纷主动宣布：辞去这一“可耻的”职务。

激烈的革命风暴甚至波及到了富兰克林家人的身上。如上所述，富兰克林是坚决反对印花税法的，但由于关山阻隔，通讯不便，北美人不可能及时全面地了解他在英国的所作所为，只能偶尔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而他的政敌们则乘机大造舆论，编出了“富兰克林向格伦维尔建议征收印花税和推荐证税官，并因此而受到了重用”之类的谎言，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富兰克林的亲友进行人身攻击，就连富兰克林刚刚竣工的新居前也出现了抗议者的身影，甚至有传言说要放火烧掉富兰克林的家。威廉夫妇闻讯匆忙赶来，要接走全家人暂避风头。但德伯拉只同意萨拉跟哥哥走，自己坚决拒绝搬出寓所。她坚信，丈夫是绝对做不出任何有辱使命的缺德事来的，谎言早晚会不攻自破，她将在这幢新居里等候丈夫光荣归来。况且她还相信：丈夫在费城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无奈之余，威廉只好请舅舅和表兄前来陪伴母亲，并为他们配备了自卫的武器。为了不使丈夫分心担忧，德伯拉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并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写道：“我们把一个房间改装成弹药库，还尽可能在楼上做好了防御准备。”

殖民地个别人对待富兰克林家人的过激行为使他感到痛心疾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为维护北美人民权利和尊严而斗争的决心。但是，富兰克林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不喜欢哗众取宠，用浮夸的方式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而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步骤最终达到废除《印花税法》的目的。为此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191工作。首先，他积极地与英国政界那些反对《印花税法》的政治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力图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反对《印花税法》的政治同盟。富兰克林频繁地进行社交活动，向政治家们宣传《印花税法》在法律上存在的漏洞，它给英国和北美在经济上带来的损害和政治上造成的巨大麻烦。他还充分地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评论，详细分析了《印花税法》对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巨大危害性和废除它的必要性以及北美人民抵制该法的坚定决心。在他的积极游说和宣传鼓动下，英国政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印花税法》的强大政治势力，富兰克林由于其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和巨大的社会威望而成为这些人中的头面人物。与此同时，由于格伦维尔采取顽固坚持错误方针的死硬立场，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他的反对派——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辉格党人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评，他的姐夫——老政治家皮特也与之公开

分裂，就连一直宠信他的国王乔治三世也对他感到厌倦了，认为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这位一度权倾朝野的政客很快就成了英王的替罪羔羊，于7月10日在一片嘘声当中被迫辞职，由罗金厄姆侯爵上台组阁。此后，富兰克林又通过他的好友——时任罗金厄姆私人秘书的埃德蒙·伯克对新内阁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在这期间，他与罗金厄姆侯爵初达特默斯勋爵共进过晚餐，与著名政治家凯斯姆勋爵进行了会谈，还登门拜访过老政治家皮特，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关于这些谈话的详细内容现在已很难考察了，但在保存下来的富兰克林这个时期的一些手稿中记载了谈话的主要观点，在谈及《印花税法》时他写道：“自由民应由其代表征税。美洲人热爱自由，他们认为他们应享有很多权利。他们害怕惩戒。（他们将说）这像是在一个被占领国里那样筹资。不错，他们应该捐献，但只有用正当的方式要求，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提供。现在他们热爱不列颠，热爱英国人民，喜爱英国的习俗、风尚、书籍和商品。但对这一切的反感将随之而生。贸易上受到损害将超过税收的利益。他们将日益顽强地节俭下去。”由此可以看出，在富兰克林眼中，维护殖民地人民权利的问题要比废除印花税更为重要，因为印花税的存废问题是暂时的，但人民理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则是永恒的。

12月初和1月中旬，国会开会讨论有关印花税法的问题。格伦维尔及其拥护者坚决反对修改他们所制定的殖民地政策。而内阁的发言人伯克则代表内阁及其盟友发言，主张立即废除印花税，以缓解与北美的矛盾，这一主张得到了老皮特的有力支持。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后者的意见逐渐占据了上风，格伦维尔的政策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

为了缓解印花税问题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在罗金厄姆首相的授意下，下院于1766年2月举行了一次听证会，请各方代表就《印花税法》问题陈述各自的意见和观点，以期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这次会议上，最有权威性的北美人士富兰克林理所当然成了关注的焦点，各派人士争先恐后地向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敏感的问题。而富兰克林则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一个表达北美人民意志的好机会，因此他有备而来，侃侃而谈，不仅巧妙地答复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类疑难问题，还借机阐述了北美人民对《印花税法》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他向人们分析了《印花税法》在法律上的不合理性以及给殖民地和宗主国带来的灾难：它不仅侵害了北美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还加深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并必将对英国的长远利益造成巨大损害。他还重申了“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表明了北美人民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富兰克林胸有成竹，慷慨陈词，那滔滔不绝的后语和雄辩的嗓音使得他的同情者们感到欢欣鼓舞，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以格伦维尔为首的反对派却显得理屈词穷，如坐针毡。

答辩之中，一位与会者站出来，婉转地提出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睿智机敏的富兰克林立即给以答复，他的回答方式看似十分温和含蓄，实质上却是坚定坦率的，充分表达了北美人民坚定不移的斗争意志：

问：“你能否提出一种美洲人不太反对或者根本不反对的方法来修改这项法令？”

答：“必须承认，我已经考虑出了一项修正案，如果你们愿意通过它，印花税就可以保留，而美洲人也会安静下来。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修正，只有一字之差。”

问：“嗯，你指的是什么？”

答：“我要提的那个修正是那个从一千七百六十五年起的税法生效的条款，只要将一



读作二就行了，这样，该法令的其余条款均可保留不变。我相信它不会使任何美洲人感到不安的。”

富兰克林废除《印花税法》的主张不仅得到了北美各殖民地的热烈欢迎，在英国社会内部也引起了剧烈反响，对英国政府的决策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令许多人困惑不解的是，对富兰克林的支持还来自一向主张对北美经济实行限制政策的商界。这是因为由《印花税法》所引起的对英贸易抵制使英国的制造商、批发商、船主和零售商们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仅仅数月损失就达到了数十万英镑，他们当然不会对此熟视无睹。于是，他们成了富兰克林反对《印花税法》的坚强盟友，不断对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

局势的发展使罗金厄姆内阁认识到废除《印花税法》已经是势在必行了。就在那次听证会结束一个星期以后，部分议员提出了一项旨在废除《印花税法》的法案，并很快得到了国会两院的同意。3月8日，英王乔治三世正式签署了这一法案。

消息传来之后，北美各地又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都为废除这一被富兰克林称为“灾难之母”的法令而欢欣鼓舞。反对《印花税法》的斗争胜利后，许多人声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功，还有些人把功劳归于“英明贤良”的君主乔治三世，而有的历史学家则声称：功劳非英国商人集团莫属。的确，英国的商人集团在废除《印花税法》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之所以反对这一法令是由于北美人民抵制英货的运动深深触动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真正的英雄应该属于那些参加反印花税斗争的北美各阶层人士，正是由于他们为维护殖民地权利和尊严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使得包括商人集团在内的英国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感受到了殖民地危机的严重性，因此加入了反《印花税法》的斗争行列。在这一运动中，富兰克林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既表达了北美人民的正义呼声，也联合了英国社会内部反印花税的政治势力，为运动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反印花税斗争的胜利使北美的大多数人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富兰克林的内心深处却产生了几分忧虑和迷惘，因为这场斗争对他的帝国观发生了很大的触动。此时，富兰克林开始对是否能够建立他所设想的帝国联合体发生了怀疑，他感到：现在构建这种联合体似乎为时已晚，因为北美洲已经度过了它的幼年阶段走向成熟了。

## 第十七章美洲绅士

中庸之道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品德，身为绅士者必须（应当设想绅士是新来到英格兰这块土地的人，因而处处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熟谙此道，因为没有别的品德比它更能显示人的身份。

理查德·布拉斯韦特

《印花税法》虽然废除了，但英国政府并未承认该税法违宪或带有专横的性质。反之，许多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仍然对殖民地抱强硬态度，坚称英国国会在大英帝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然北美诸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它们就必须接受其立法制约。前首相格伦维尔甚至认为英国国会拥有完全的统治权，而征税则是统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种象征。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抵制英货运动沉重打击了英国的商业利益，并进而威胁到了宗主国的统治权力，所以，英国政府才不得不废除《印花税法》。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废除该税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维护殖民宗主国的根本利益和统治权力，英国政府在废除印花税的同时还通过了一个《公告令》，宣称英国国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该有制定具有足够效力和合法性的法律和法规的充分权力和权威，以制约殖民地和美洲人，大不列颠国王的臣民”。这一法令在上院通过时只有五张反对票，这说明英国统治集团在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问题上的根本立场是极其相近的。

当时，北美人民还沉浸在废除印花税所带来的胜利喜悦之中，对《公告令》枯燥的词句并未做认真的思索和体味，但富兰克林却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从中深刻认识到：英国政府实行侵犯北美人民权利和尊严的歧视性政策的企图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认为，在各殖民地经济日益繁荣和议会的自治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要它们承认英国国会有权控制北美的立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特别是英国政府企图以此来控制理应属于殖民地议会的财政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倾向。因为如果殖民地议会失去了财政权，它们对殖民地的总督和政治生活也就没有了控制和约束的能力，从而不能有效地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北美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斗争取得的民主权利毁之一旦，他苦苦追求的理想帝国的合理构架也将土崩瓦解，大英帝国将逐步走向专制，甚至会引发革命而导致毁灭。富兰克林比任何北美人士都更早、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印花税法》废止前回答下院咨询时，他就曾尖锐地指出：“如果派军队去强制执行法律的话，他们在那儿即使碰不到革命也会引发革命的。”

显然，此时的富兰克林还不具备同时期的某些北美政治家（如亨利和萨缪尔·亚当斯等）那种强烈的革命精神，当他们已经投身于激进的反英革命运动中时，而富兰克林还是一位忠实于英王的“正统的”政治家。作为北美上层有产阶层中的重要成员，他不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遭遇一场激烈的革命风暴，他非常珍惜已取得的一切，并深信，经过这一代人诚实辛勤的劳动，北美会建设得更好，人们会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幸福。诚然，现行体制中存在不少不平等和不民主的因素，需要革除，革命能够铲除这些弊端，但也会使人们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因诉诸暴力而丧失千万条宝贵的生命，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他认为，不如通过和平的方式促使英国当局改弦易辙，逐步达到改革现状之目的。富兰克林早先也是一位容易冲动的热血青年，

但如今他已年届六旬了，他所希望的是能够做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步步向着既定目标迈进，实现他多年构建并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在他的心目中，英国仍是可敬可爱的母亲，他为她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高度进步的近代文明而感到自豪，况且他还是大英帝国的北美邮政副总监，宾夕法尼亚驻英代理人，废除印花税后，乔治亚、新泽西和麻萨诸塞殖民地又先后委托他为代理人。自己的身份和肩头的责任使他深深感到：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不能凭个人的喜怒好恶行事，更不能偏激冒进，挺而走险。因此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的行为极为谨慎，力求中庸温和，避免激烈偏狭，尽量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才能，缓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调节分歧，减轻冲突，在温文尔雅而又机智灵活的社交活动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益。

在《印花税法》被废除之后，富兰克林曾向宾夕法尼亚议会发出一封信函，要求尽快返回北美。但议会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为由要求他再留任一年，这使他颇感失望。在 1766 年 6 月至 8 月比较闲暇的日子里，酷爱科学研究和大自然的富兰克林与已成为王室御医好友的约翰·普林格尔博士到德意志境内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希望能在绚丽多姿的自然风光中调整一下十分疲惫的身体和神经。

他们在久负盛名的疗养胜地皮尔蒙德做了近一个月的温泉疗养，并游览了英王领地汉诺威地区。在这期间，他和普林格尔同时被选为在哥丁根的德国皇家科学学会的成员，并出席了在哥丁根召开的会议。在这里，富兰克林走访了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与科学家们就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访问汉诺威皇家医院时，富兰克林对该院的一种叫做脉冲瓶的新装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院长约翰·弗里德里奇·哈特曼博士当即批准赠送给他一个作为研究之用。这大概是他此行在科学考察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收获。

德意志之行结束后，富兰克林一身轻松地返回了伦敦，此时他诧异地发现英国政府又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撤销了《印花税法》的罗金厄姆内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国王不满而倒台了，老政治家威廉·皮特（此时被封为查塔姆伯爵）受命再度出山担任首相。

老皮特向来以精明果敢而闻名政坛，但他此时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上台后不久便被严重的痛风病弄垮了，无法正常地处理政务。这种情况使得这届内阁从一开始就像一艘失去了舵手的航船，在险风恶浪中漂忽不定，从而为老谋深算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左右朝政提供了便利。这位机敏强硬的政坛老手曾经是《印花税法》的有力支持者，如今他又利用首相不能理事的机会把英国的政治航向引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

汤森德一向不对北美抱友善的态度，时时都在想方设法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和榨取。从 1767 年 5 月起，英国政府连续颁布了几项由汤森德提出的条例：《中止纽约议会条例》宣布临时解散纽约州议会，直到该议会遵守《驻营条例》，按时缴纳特别税，承担英国驻军给养时为止；另外两个条例则是为征税而制定的，规定在殖民地港口直接征收玻璃、铅、颜料、纸张和茶叶税，用以支持殖民地的王家官吏的薪俸，同时规定英国在美洲设立税收机构，增派官吏稽查税务，税吏有权进入殖民地的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品和走私货物。1767 年 9 月，汤森德因“积劳成疾”而病故，皮特内阁不久也被格拉夫顿内阁取代，但他精心策划制定的《汤森德条例》仍然有效，

并把大英帝国及其北美殖民地引入了一场巨大灾难的深渊。

《汤森德条例》一出台，富兰克林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决定，它未征得北美人民的同意就直接向他们征税，这是对法律的违背和公开践踏，而它用征来的税作为支付英国驻殖民地官吏的薪俸，其目的是要让他们可以不依靠殖民地议会而统治殖民地，这显然是对殖民地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肆意侵犯。这一严重的错误肯定会招致北美人民的普遍抵制，从而加大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已十分明显的裂痕，这不仅损害了北美洲的利益，而且必将极大地损害英国的根本利益，使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富兰克林对这一错误的条例公开进行了批评，并积极活动，试图阻止它的实施。他于4月1日给凯姆斯爵士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坦率的信，信中虽然重申了北美洲对英国及其君主的忠诚，但同时尖锐地指出了《汤森德条例》的巨大危险性和破坏性。他写道：北美洲“将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摆脱可能是强加于她的束缚，也许还会把这种束缚转移到施加束缚者的身上。与此同时，每一个压迫行动都将激怒他们的情绪，使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商业利润大大减少，甚至有可能全部丧失，并将推动他们的最后反抗；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撒满了自由的种子，并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根除它们。但是，那里的人们如今仍对不列颠满怀尊敬和爱戴，只要能细心地维护，友好谨慎地对待他们的权利，就可以不费力地长期统治他们，而不必动用武力或付出巨大开支。然而我看不到这里有实现这种行动所必需的足够的智慧”。

然而，就在富兰克林对英国政府不明智的统治方式表示不满和抱怨的时候，北美人民却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展开了反对《汤森德条例》的革命斗争。他们认为这一条例是英国精心策划的长期压迫北美人民的重要步骤，如果不加以严厉制止，则英国在殖民地的暴政会愈演愈烈。1768年，麻萨诸塞议会联合弗吉尼亚议会共同向各地发出了一个《通告令》，呼吁各个殖民地团结御侮，共同进行抗议活动，坚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很快，各个殖民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不进口英货的风潮。在一些海港城市，在“自由之子社”的领导下，商人们积极进行违反《汤森德条例》的贸易。而各个乡镇的妇女们则在“自由之女社”的组织指导下，公开纺纱织布，鼓励人们穿自制的布衣，抵制进口英国的布匹衣料。她们还进行了不进口茶叶的活动，有些地方的妇女还公开焚毁了自己储存的英国茶叶。城市工匠们也坚决支持不进口运动，并狠狠打击个别贪婪商贩违背不进口协议的商业活动，把其中的罪大恶极者抓起来游街示众。为了抵御英军的武力镇压，一些地区的议会还以防范印第安人为名，号召居民们拿起武器，严阵以待。弗吉尼亚议会的代表们在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抵制英货协会，宣称“任何人如通过演说或者著文，维护或者坚持除本殖民地协会以外任何人或团体有权利或权力向本地居民强派或者征税者，均应被视为国王陛下殖民地的敌人”。虽然抵制英货运动遭到了一些见利忘义的贪婪商人的严重破坏，但仍使英国对北美的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据统计，1768—1769年，英国输入北美的贸易总额由136.3万英镑锐减至50.4万英镑。就连对北美持强硬态度的格拉夫顿内阁也感到英国为《汤森德条例》付出的代价太大，开始考虑废除这一条例的问题了。

北美发生新的反英浪潮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英国。对此富兰克林早已有所预见，并能够充分地理解，认为这是一场维护殖民地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战斗，必须予以支持。于是，他于1768年1月在《伦敦记事》上发表了题为

《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满意的原因》的文章，明确阐述了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他尖锐地指出：“汤森德法显然是为在美洲维持王国政府的官吏而筹款的，以便于他们能够独立于美洲的议会之外，因此美洲人认为这不仅是不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向他们征税，而且是要把他们置于英国的专制统治之下，……这些英国商人不满足于垄断我们的事业，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向我们宣布，他们有权向我们征税，任意征税，不论是内部税还是外部税。如果我们不顺从这种苛求，就要剥夺我们的立法权和自由权。”接着，富兰克林以一种婉转幽默的语气表达了对北美人民抵制英货运动的赞扬和支持：“现在该用我们所能运用的最好的方式照顾我们自己了。按照庄严的决议和协约联合起来，尽可能不给这些新官找麻烦，办法就是不用英货，因为他们要对这些货物征收官税。让我们携手一致，不用他们那些华而不实的贵东西，我们应俭朴地生活，努力生产自己的东西”。

在这篇文章中，富兰克林虽然表示了对英王的忠诚，并且由于编辑的删改而使文章失去了原有的锐利锋芒，但他还是向人们发出了一个震撼心灵的呼声：美洲人的事情应该由美洲人自己来决定！他写道：“英国的领土仅限于大不列颠岛。毫无疑问，英国的立法机构只应该裁决与这块领土有关的福利事业，有关爱尔兰领土内的事情应由爱尔兰立法机构裁定，有关美洲领土内的事情应由美洲的立法机构来裁决。”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随着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实行的歧视性政策不断升级，富兰克林所采取的对策和立场也在不断转化，由尽力缓解宗主国与北美的矛盾转化为公开反对英国的错误政策。逐渐地，英国政府和政界要人们对富兰克林的态度已变得不那么尊敬友善了，他们甚至扬言要罢免富兰克林已担任了多年的北美邮政副总监的职务。连富兰克林这样温文尔雅、一贯奉行中庸之道的美洲绅士都难以与英国当局建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可见在美洲问题上，英国当局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面对日益加剧的北美危机，英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采取强硬政策的格拉夫顿内阁遭到了反对派的一致猛烈攻击，在四面楚歌声中被迫于1770年1月倒台，“国王之友”诺思勋爵受命出面组阁，以缓解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但是紧张的局势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剧，终于酿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血案。

1770年3月5日，驻波士顿的英军与当地群众发生了冲突，英军竟残忍地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四人，打伤多人，造成了流血的波士顿惨案。这一事件的发生震动了整个北美洲，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爆发革命之势。

就在波士顿惨案发生的同一天，诺思首相把一个关于部分废除《汤森德条例》的法案提交到国会讨论，并最终获得了通过。此时，诺思当然不可能接到波士顿惨案发生的消息，但他似乎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不祥之兆，他希望通过废除这个令人厌恶的条例，缓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摆脱掉危机的阴影。但是为了保持宗主国的尊严，表示英国有权向北美殖民地征税。也是出于对英王意愿的顺从，该法案把茶税保留了下来。

就这样，一场风暴平息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富兰克林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将会看到大英帝国的一场悲剧——北美殖民地与母国分裂。在这场反对《汤森德条例》的斗争中，富兰克林逐渐对自己过去的帝国观感到厌倦了，认为它只不过是一

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他曾经耗费了许多精力，希望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构建出一个理想的帝国联合体。结果却适得其反，北美的分离主义倾向日趋严重，他所奉行的中庸调和道路越走越窄，而他本人也被深深地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不可自拔。他在这个时期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越是对这个问题思索，我越坚信，没有中间原则可以完全坚持。我的意思是，不可能以明白易懂的论点来坚持中间原则。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过两个极端来进行的：国会拥有权力我们制定一切法律，或者国会无权为我们制定任何法律。我认为，相比较而言，后者的论据更多，也更有分量。如果这一原则成立，各殖民地从此就变成了许多独立的州，只服从一个国王，就像英格兰和苏格兰从前的联合那样。……这样一种类似苏格兰式的联合对于整体有利还是不利呢？”显然，富兰克林认为这是有利的，尽管他对于它的实现还没有信心。

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和复杂艰巨的斗争形势给富兰克林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也不会为敌人所征服，他总是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为维护北美人民神圣的自由权利而日夜操劳，艰苦奋斗。但与此同时，这位时代的骄子一刻也没有丧失对人类、自然和科学事业的眷恋之情。他充分利用了一切工作的间隙时间，或者开展学术研究，或者埋头书案，奋笔疾书，如果稍有闲暇便去旅行，尽享大自然那灿烂多姿、壮丽奇妙的美景。当然，他从事这些活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利用这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放松一下高度紧张疲惫的身体和神经，以便以更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去。他已经习惯于每年作一次长途旅行了，如果这一规律被打破，他往往会感到身体不适，脾胃不爽，精神甚至也会萎靡不振。因而科学研究、写作和旅行一直是富兰克林的三大爱好和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不仅能够持之以恒，而且长期乐此不疲，即使在反对《汤森德条例》的斗争紧张进行的日子中也从未中断过。笔者现将他从1767年至1773年间在这方面进行的一些活动简要摘录如下：

1767年8月—10月，富兰克林同普林格尔到法国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对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宏伟壮丽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所深深折服。其间，他被引见给法王路易十五，并会见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如：德阿里巴赫德、弗朗索瓦·魁奈和米拉波侯爵等。

1768年1月，在《伦敦记事》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1768年前美洲不满的原因》，表达了自己反对《汤森德条例》的基本政治观点。

1769年1月，他再次当选为美洲哲学会主席，以其威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组织会员们就各个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使这一学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学术团体。

2月，他的《关于电荷的观察与实验》一书的第四版发行了。该书增补了近年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内容不仅涉及电学，还涉及到物理学、医学、地质学、天文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该书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

1771年7月末至8月中旬，富兰克林在坐落于退福德的一所乡间别墅里撰写了那部后来脍炙人口的《富兰克林自传》的第一部分，形象生动地记述了他早年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奋斗经历。

1771年8月25日至11月30日，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作了他在英期间为时最长的一次旅行。他与爱尔兰的朝臣派和爱国派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

谈，但他的感情是倾向于爱国派的，因为他发现他们是北美人的真正朋友。他对这里壮美的山川景致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状况深感忧虑。

1772年6月初访问了英格兰西北部。

8月16日，入选法国皇家科学院。当他得知该院仅有外国院士八人时，为自己能进入这个“世界第一的科学院”而感到兴奋不已。

8月21—27日，为军械器材部起草了一份关于从闪电下保护军用火药库的皇家学会报告书，后来被官方采纳。

1773年夏天，《富兰克林文集》在巴黎出版。

10月，为《英国国教祈祷书节本》作序。

这一年，富兰克林还进行了两个重要的科研项目：感冒发生的原因和预防办法；油对于平息海面波涛的作用。

## 第十八章茶叶危机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并且证明在原则问题上波士顿人是不可侮的，一部分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于12月18日夜登上轮船，……把茶叶倒入大海。这决不是暴民的鲁莽行为，而是一批有头脑、有决心、严肃而可敬的公民所采取的考虑周到而又坚决的行动。

华盛顿·欧文

茶叶！谁曾想到这种普普通通的商品会变得如此敏感玄妙，竟能引发一场巨大的革命浪潮。

北美人酷爱饮茶，茶叶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但在北美却不能生产。富兰克林对茶更是情有独钟。他热爱生活，结交广泛，但对于烟酒一类的社交媒介物却并不感兴趣，平日里烟酒不沾。在接人待物时，他和太太对客人的最高礼遇便是献上一杯香泽四溢的茶。在他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中，茶叶更是须臾不可缺少。无论在他杂乱拥挤的书桌上，还是在堆满了仪器和什物的实验室里，或是在旅途的下榻之处，他的身边总会有清茶相伴。清新馥郁的茶水能表达他对友人的深情厚谊，也体现了他那坦荡的襟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每当那翠嫩的香茗与心中的绿洲相互映衬，他便会产生一种宠辱皆忘、身心泰然的感觉，甚至达到超凡脱俗，物我两忘的境地。尤其是喝着太太亲手为他端上来的香茶，更会使他感到沁人心脾，悠然忘俗。但是，他已经整整八个年头没有品尝过太太为他煮的茶了。德伯拉太太已明显地衰老了。她在反印花税风潮中替丈夫蒙受了不白之冤，打那儿以后就时常感到心绞痛，气短乏力，严重时甚至会卧床不起。但是，丈夫和儿子都不在身边，她必须以孱弱的身体独自支撑起这个久已冷落了的家庭。1766年，富兰克林与戴维·霍尔先生合作经营印刷所的合同（为期18年）期满中止后，他们失去了一大笔固定收入，这使得德伯拉深感忧虑。幸亏丈夫还维持着邮政副总监的职务，又相继被委托为麻萨诸塞、乔治亚等殖民地的代理人，再加上他与儿子经营的俄亥俄公司的土地投机生意的进项，才算维持住了比较富裕的家庭生活。但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使德伯拉对丈夫的前途常常感到忧心忡忡。病痛和钱财对于德伯拉来说还算不了什么，最使她难以承受的还是久别亲人所产生的那种强烈的孤独和失落感。儿子远在新泽西作官，可爱的小孙子但普尔随同丈夫去了英国后就像在地球上消失了一样，真真苦了这位舐犊情深的老祖母。女儿萨拉也有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女婿理查德·贝奇年长她六岁，是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成功的商人，这虽使德拉伯感到了几分宽慰，但当她看到女婿携着身披洁白婚纱的女儿款款远去时，心中仍然不免充满了酸楚，若有所失。就在这一时期，反英运动在北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抵制英货大潮的冲击下，德伯拉也开始拒绝使用英国商品，其中包括她所深深喜爱的茶叶，即使这影响到了她的日常生活，给她接人待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她仍坚持这样做。虽然她还不能完全理解这里面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但她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而且，富兰克林在来信时曾不止一次地叮嘱过她：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有损北美人民利益的事情。她牢牢地记住了丈夫的嘱托。

同样，富兰克林也在日夜思念着北美的亲人，他曾经多次要求离任回国，但都未能得到许可。值此动乱之秋，母国与殖民地之间麻烦丛生，危机四伏，局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剧变，有许许多多异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处



理，这些都是关系到北美人民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事务，绝非一般人所能胜任。况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使过上三年五载也难以见到分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回国的行期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了，因为，北美实在难以再找到一位像他这样既有崇高威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又有丰富的学识和高超机敏的社交能力的人物来。因此，无论他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情绪有多么强烈，他们还是被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阻隔在浩瀚无垠的大洋两岸。

伦敦毕竟不同于北美，人们在这里很难嗅到革命前夜所特有的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一切都处在英王及其内阁的严密控制之下。诺思内阁是乔治三世继位以来找到的最符合他心意的内阁。诺思先生对国王忠贞不贰，是王权最驯服的工具，在重大问题上始终与国王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尽管他表面上温文儒雅，在某些敏感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但他在内心深处始终坚信：既然北美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北美就应该拥有一切主权，包括征税和驻兵等权力，反对英国政府和法令的一切言行都是大逆不道的。为了贯彻他的这一思想主张，他把北美事务完全委托给态度强硬的美洲事务大臣希尔斯伯勒去办理。希尔斯伯勒是个刚愎自用、蛮横顽固的守旧人物，他主张继续对北美实行高压政策，不但维持茶税的征收，而且应该对反英运动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但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激起了北美人民更激烈的反抗，抵制英货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而且给英国的商业贸易也造成了巨大损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企业和贸易界更是怨声载道。

希尔斯伯勒的利令智昏还表现在他对待富兰克林的态度上。此时的北美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整体，但它们之间的的确确存在许多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经过了在新大陆上 100 多年的共同生活和劳动，13 个英属殖民地已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在对法国人、西班牙人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特别是在反对英国殖民压迫的正义斗争中，它们在政治上也日益紧密地联合起来。在这一过程里，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逐渐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作为对这一事实的一种反映，北美出现了许多代表民族意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过去，他曾经用重大的发明创造造福于人类，并以幽默深邃的哲理和思想启迪民智，唤醒了千千万万北美民众。如今在大洋彼岸，他又以超群绝伦的才智、卓有成效的社交活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北美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权利而苦苦奋斗，赢得了北美同胞们的尊重和信任。实际上，他早已在扮演北美驻英国总代理人的角色了。他虽然多年居住在英国，却是一个真正的美洲人，凡是与北美利益有关的事情都会引起他的关注，并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干预。为了能圆满完成身负的艰巨使命，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广泛结交，不仅与北美各地保持着频繁的联系，而且与英国各界人士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的外交策略和方法是灵活多样的，但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坚定地维护北美人民的权益和尊严。

当然，富兰克林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因事务繁杂而完全中断他的学术研究，也没有放下手中那杆犀利的笔。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他时常利用点滴的休息时间写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品文和随笔，对英国的殖民地政策进行严厉的批判，敦促英国政府尽快予以纠正。他曾经在《公共广告者》上匿名发表了三篇寓言，用一种美洲式的幽默对英国内阁的错误政策做了辛辣

无情的嘲讽。其中一篇关于农夫和牛的寓言既令人捧腹，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他写道：“一群牛为一个农夫长期默默地劳作，生产出大量的牛奶、黄油和奶酪。但这位农夫太贪得无厌了，不仅苛扣牛赖以生存的青草，甚至还把青草全部割下卖掉。他让牛忍饥挨饿，同时却希望它们和以前一样源源不断地供给他牛奶。牛们终于被他的无理举动激怒了，于是它们决定以后互相喂奶。”阅读过这篇寓言的人在笑过之后都会深刻地体味到，它是在警告当局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否则会激起北美人民更激烈的反抗，并因此而丧失掉他们的既得利益。

正因为如此，富兰克林成了希尔斯伯勒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恶毒的打击陷害，以图维护宗主国的权威，对北美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希尔斯伯勒先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故意辱慢富兰克林，对富兰克林的几次拜访表现得傲慢不恭，蛮不讲理，甚至拒不承认富兰克林是麻萨诸塞殖民地的代理人。看到这一招未能奏效后，他又跳到了前台，对富兰克林要求废除茶税等主张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攻击谩骂。但在几次会谈中，希尔斯伯勒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谈判高手。富兰克林言行温和，但意志坚定，能言善辩，善于突破虚幻的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用幽默犀利的语言直逼对手的弱点，使其陷入被动和无法防范的境地。几个回合后希尔斯伯勒就仓皇地败下阵来。于是他又变换手法，采取了规避不见的策略，不仅自己拒不与富兰克林会见，还要求其他政界要员也这样做。这一缺乏绅士风度的做法是极不得人心的，使希尔斯伯勒遭到了广泛的谴责，从而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而富兰克林则乘机反守为攻，广泛联络各界人士，对希尔斯伯勒粗暴武断的办事作风及其所推行的危害极大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终于迫使他于1772年8月辞去了美洲事务大臣的职务。

继任的美洲事务大臣是以稳健温和而著称的达特默斯伯爵。达特默斯在政治上属于罗金厄姆派，待人和善慈祥，一向主张奉行温和中庸路线，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美洲人的朋友。富兰克林对达特默斯也抱有不少幻想，希望他能够审时度势，放弃错误的美洲政策，取消茶税，以宽容大度的姿态缓解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因此在达特默斯上任的初期，富兰克林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善，在许多问题上尽量与他合作，避免做那些可能让他为难的事情。不幸的是，达特默斯虽然温和宽厚，有长者之风，他与富兰克林的关系起初也很和谐，但是，他更忠于王室，顺从首相，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在原则性问题上对北美做出重大让步。另外，诺思首相由于其好友希尔斯伯勒惨败于富兰克林手下而耿耿于怀，开始公开对富兰克林采取敌视态度。富兰克林向内阁递交殖民地的请愿书时遭到了强烈的指责和蔑视，后来，内阁僚们干脆躲避或者公开拒绝接受北美人士递交的请愿书，决定继续对殖民地实行压榨性政策，维持茶税。久而久之，北美人民对这位美洲事务大臣和内阁完全丧失了尊重和信任，他们不再向英国内阁请愿了，而是直接向英王本人请愿。此时，英国国王似乎已经成了连接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唯一纽带。同北美人民一样，富兰克林也不再对达特默斯伯爵和内阁抱有希望了，事态的发展更加强了他的那个信念：如果不立即改弦更张的话，大英帝国将会失去广阔富饶的北美洲。

就在这一时期，哈钦森事件突然发生了，它把富兰克林深深地卷入到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心，并促使这位温文尔雅的北美绅士与英国政府彻底决裂。而英国内阁和朝野的那些与北美为敌的政客们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愤恨的

机会。

就在达特默斯就任美洲事务大臣这年的初冬，富兰克林得到了一宗现任麻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及其内弟安德鲁·奥利弗在1767年至1769年间写给当时的英国政府要员、银行家威廉·惠特利先生的信件。写信时哈钦森是该殖民地总督，奥利弗则为总督秘书，都是北美的“一些最有身份的人物”。由于他们二人在印花税风潮当中受到了北美人民运动的冲击，住宅也遭到某些激进分子的围困或毁坏，因此他们对北美人民及其反英运动怀有刻骨的仇恨，希望英国予以严厉的惩处和镇压。他们在这些信件中就流露出这种极端的仇恨心理。他们公然要求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严加管束，防患于未然，甚至提出建议：派遣军队前来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用武力恢复这里的秩序。他们还要求剥夺殖民地议会的官吏任免权，王室所任命的总督、法官等官吏的薪金不再由议会发放，以免受到殖民地人的要挟。他们还对北美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怀有一种深深的畏惧心理，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哈钦森在一封信中狂妄地叫嚣：“必须果断地从英语中删去‘自由’一词。”

关于富兰克林是如何获得这些信件的，现在已很难考证，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信件提供者保守秘密，所以对于信件提供者的姓名和他获得信件的手段始终守口如瓶。这些信件的内容使富兰克林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认为这不仅是对北美人民的背叛，也是对大英帝国长远利益的背叛。富兰克林认为必须尽快地把这一卑劣的行径告诉北美的朋友们，揭穿这一用心险恶并可能危害英国和北美利益的罪恶阴谋。当然，对于传阅这些信件是否合适富兰克林最初也是有过犹豫的，但思量再三，他确信这样做并无不得体之处。因为从实质上讲，这些信件已经不属于私信了，它们是一些公职人员写给另一些公职人员的，内容涉及的是公共事务，并旨在促成某种公共政策，所以可以把它们交给“另一些可能与他们试图促成的公共政策有关的公职人员”。而且，收信人惠特利先生去世后，这些信件并未列入其遗产清单，他的友人们已把它们广泛传阅，许多政界人士都看过这些信，造成了很大影响。经过一番斟酌，富兰克林决定把这些信件转交给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一个可靠的成员，要求他在特定的范围内传阅后马上完璧归赵。

富兰克林当时认为，他的同胞们在看到了这些信后至少会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并非是英国人一手造成的；北美人中的一些败类暗中进行的挑拨离间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为了破坏北美人民的自由幸福的生活，不惜背叛北美人民的利益，企图借英国人之手剥夺北美人民的天赋权利。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内阁是受了这些奸佞小人的蒙蔽才干了蠢事。富兰克林希望北美人一旦了解了事实真相就会集中力量同这些危害北美和大英帝国长远利益的无耻之徒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与母国实现和解，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分歧。

可见，富兰克林此时仍对英国怀有感情和幻想，希望尽量缓解矛盾，消弭分歧，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导致双方的彻底决裂。他认为这样一种结局对于双方都是极为不利的，北美人民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压制，而英国则有可能因此而失去她的北美殖民地。富兰克林的这种温和态度从他这一时期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在1773年3月9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心须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人民保持冷静。我们如果进行反抗，我们的敌人将求之不得，他们会名正言顺地增派军队到这里来，将我们置于更严厉的控制之下。”

5月5日，富兰克林与达特默斯进行了一次会晤。当时，英国国会与殖民地议会就殖民地权利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麻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发表了一个激进的声明，宣布在立法上独立于英国国会。达特默斯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时举棋不定，遂征求富兰克林的意见。富兰克林告诉他：“最为妥善的处理办法是不要把它当真。……因为高压政策是不会使殖民地人民屈服的，诉诸武力更是有害无益。”他还严肃地告诫达特默斯：如果英国国会对殖民地议会采取严厉措施，“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不断地互相伤害和刺激，根本谈不上培植善意与和谐了。善意与和谐对于双方的幸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坚信：国会为增进其权威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实际上都只能削弱它，当所造成的伤害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丧失这一权威。”

尽管富兰克林在大多数场合的态度十分温和，但他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大英帝国统治的危机已经积重难返，英美两地的矛盾斗争必将由于英国内阁的顽固立场而愈演愈烈。他甚至开始意识到：他一直非常崇敬爱戴的英王在这一问题上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他仍然认为国王受到了某些人的蒙蔽。但鉴于种种原因，富兰克林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这一想法，只是在这一年7月中旬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谈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不要外传，我坦率地告诉你，近来对我们所实行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国王。他在许多事件中扮演了他的朋友所称的强硬角色。国王接受了一些错误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富兰克林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北美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英国当局不立即悬崖勒马的话。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富兰克林于1773年9月连续发表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文章——《缩小帝国要诀》和《普鲁士国王敕令》，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有利的鞭挞，向英国统治当局发出了最为严重的警告。

《缩小帝国要诀》以幽默辛辣的笔触对英国在北美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抨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国可能因此而失去北美这一严重的后果。他指出：“一个庞大的帝国如同一块大饼，其边缘部分最容易消失。为了能在姜饼烤好之后毫不费力地把它们弄碎，聪明的制饼师在烤制以前就已经把饼在某些地方半切开了。”然后，富兰克林一条一条地列举了如何才能把帝国像分割姜饼一样分裂缩小的要诀：

“你有无限的权力征税，不经他们同意就从他们的一镑中拿走一先令，这样，你不言而喻也有权处置他们其他的19先令。

“把那些勇武忠诚的海军军官训练成卑鄙可怜的海关检查员和殖民地海关官员，教会那些在战时勇敢保卫他们同胞的人在和平时期如何折磨他们的同胞。

“以保护居民为名把军队开进他们的土地，不要让军队驻守边塞防御入侵，而是摧毁这些要塞，把他们派遣到这个国家的内地，以使野蛮人可以放肆地袭掠边疆，而军队却会受到重重保护。

“赋予你在殖民地的将领非同一般和宪法中所没有的权力，使他们甚至可以不受文职官员的制约……”

这是迄今为止富兰克林公开发表的最为大胆泼辣的言论，其锋芒直接指向了那些平日里对北美殖民地及其代理人颐指气使的朝廷重臣。显然，富兰克林对这些目光短浅、暴戾恣睢的政客们早就满怀怨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公开反击了。而同期发表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敕令》

一文则把影射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英国国王。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一种“美洲式的幽默”对英王在北美采取的肆意榨取的政策进行了最猛烈的鞭笞。

《敕令》一文宣称：不列颠最早是由德意志居民所定居，至今仍是德意志的殖民地，并受到母国的军事保护，但却未曾向母国交纳过贡赋，因此，向该殖民地征税是公正合理的。该文写道，普鲁士国王据此发布命令：不列颠所有的船只都要在德国港口停泊，等待卸货、检查和纳税；禁止在不列颠生产母国所能提供的工业品，有关原料应被运往母国加工后再返销回来；母国的死囚犯将全部迁往不列颠，以改善那里的人口，等等。普鲁士国王确信不列颠不会对这些法令持有异议，因为他只是援引了不列颠对北美的有关法令，而这些法令全部不是由北美议会制定的。

这是何等辛辣的嘲讽，又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呐喊，表达出了多年来抑郁在北美人民心头的愤怒情绪。富兰克林认为，在多次呼吁、请愿和谈判毫无效果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比较特殊的刺激方式，或许能够使英国政府更多地注意到北美人民的痛苦和呼声，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取消错误的政策，从而恢复英国与北美之间的和谐关系。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历史的发展是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这两篇文章所掀起的波澜尚未平息的时候，“波士顿茶案”发生了。

《汤森德条例》被废除以后，茶税仍保留了下来，因此它便成了英国暴政的一个象征，成为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矛盾斗争的一个焦点。但英国政府似乎并未觉察到这一点，又于1773年通过了一个新的《茶叶法》，旨在挽救濒临破产的东印度公司。该法规定，东印度公司可以通过其代理商直接向北美殖民地出口茶叶，只征收轻微的税款。这样一来，该公司输入北美的茶叶价格便要比走私茶叶便宜一半左右。但英国当局仍嫌不够，又于同时期下了一道通令：禁止北美居民购买走私茶叶。更令人愤慨的是，东印度公司在输入茶叶时往往要捎带大量其他货物进口，严重扰乱了殖民地的市场。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富兰克林敏锐地意识到《茶叶法》的实施必将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这对于英美双方都是一场灾难，于是他竭力劝阻当局暂缓实施这一法令，但遭到了断然拒绝。

果然不出富兰克林所料，《茶叶法》颁布后立即引起了北美人民的普遍不满，尤其遭到了商人、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强烈反对。他们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号召广大群众立即行动起来，阻止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在北美出售，许多地方的群众社团还宣布：凡帮助东印度公司销售茶叶者一律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在纽约、费城和查尔斯敦等地，组织起来的群众拒绝为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卸货，即使茶叶已经上了岸也不得出售。来势汹涌的反抗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各个北美殖民地，各地的通讯委员会和自由之子社在组织动员民众方面显示了巨大的威力。

但波士顿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波士顿是英国茶叶输入的主要口岸，这里的保守势力比较强大，活动很猖獗。总督不顾群众的抗议，决定把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卸上岸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激情的当地群众决定采取断然行动，不让这一图谋得逞。在“走私王”汉考克和革命鼓动家萨缪尔·亚当斯等人的支持策划下，一批激进的革命者组织了一个波士顿茶党。1773年12月16日夜，月色迷蒙，海岸一片漆黑，茶党成员数十人面涂油彩，身披羽饰，乘夜色悄悄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三条茶船，把价值近两万英镑的300多箱茶叶全部倒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波士顿茶党的倾茶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斗争士气，各地的反英运动迅猛高涨起来，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继波士顿之后，新泽西、纽约、查尔斯敦等地相继发生了倾茶或烧茶事件，英国的权威已经被愤怒的北美人民置之脑后了。

英国国会认为北美茶案是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的蓄谋行动，而波士顿则是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地区，必须予以严惩，以儆效尤。在国王和诺思首相的授意下，一系列惩罚性的法令从国会出台了，英国统治集团决心把北美人民的反英斗争一举压制下去，以维护并进一步加强其殖民统治。乔治三世咬牙切齿地宣称：“局势已经无法转变了，殖民地或者投降，或者胜利。”

这样，一方面是英国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反抗英国暴政的美利坚民族，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

## 第十九章 全面分离

诺思勋爵及其阁僚们认为，由英国国会直接控制麻萨诸塞，再用军队来支持这种控制，就可以教训美洲人，使他们尊重英国国会的最高权威。但殖民地人所得到的教训是：英国国会的最高权威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代议制度和法庭的权力的终结，意呼来着陪审团审讯权的终结，也意味着丧失了他们所珍视的一切政治原则。

J·布卢姆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世界在动荡之中发生着剧烈而神奇的变化，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光怪陆离，懵懵懂懂，令人难以琢磨，无所适从。国王变得喜怒无常，颐指气使；首相和廷臣们变得唯命是从，暴戾恣睢；美洲人则变得激昂亢奋，桀骜不驯，充满了倨傲抗上的战斗豪情；富兰克林也在变，由忠于君主、热爱帝国的儒雅绅士转变成一个为北美的自由独立事业而奋勇拼搏的民族战士。

过去在费城时，他十分喜欢在黎明时起床做户外运动，或者骑马，或者散步。望着那冉冉升起的红日，他的心绪和感情也在不断地升腾舒展，仿佛感到自己的事业和北美洲的前程都如同这旭日一样蒸蒸日上，灿烂辉煌。如今，住在这喧闹嘈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都市里，想观赏日出已十分困难了。但富兰克林仍坚持每天早晨到草坪上做热身运动，呼吸一下新鲜清爽的空气，然后回到书屋做一种独特的“健身浴”，这是他一生中诸多重大发明中唯一仅供他一人享受的项目——一丝不挂，赤诚坦荡，全神贯注地端坐在书桌前，或读，或写，或念，或者冥思苦想，用赤裸的身躯直接触碰书本中的每一个字母，让这些世间最美好的符号和信息穿透自己坦荡的胸襟，去化解积郁在心灵深处的重重块垒。每当此时，他会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祛除内心的所有杂念，犹如一个历尽艰辛的朝拜者终于沐浴在上帝的灵光之中，与耶稣基督直接进行心灵的沟通，在人间天堂里自由地徜徉。傍晚，他有时喜欢到泰晤士河畔独自漫游，观赏瑰丽多彩的晚霞。但每当看到挂在天边的夕阳时，总有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哀愁涌入心底，他常常们心自问：这就是大英帝国的那轮不落的太阳吗？

富兰克林越是接近英国的权力中枢，就越认清了这个云遮雾掩之下的老大帝国的庐山真面目，从而也找到了美洲危机无法解决的某些症结。

从理论上讲，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内阁应由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或几个政党联合组成，对国会负责。国王是国家元首，但一般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只是“统而不治”的“虚君”。但在18世纪中叶，英国政坛的情况却有些反常。乔治三世与那些很少过问国事、甚至不懂英语的先辈们截然不同，他关心政治，迷恋权力，认为自己对于巩固和扩展大英帝国的利益和版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的崇高而又虚幻的使命感。但是，他却不喜欢那些具有真知灼见，讲究办事效果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他需要的是一种少几分哲理，多一些忠顺的权力部门和执行机构。于是，他积极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向内阁推荐了大批须取高薪的官员，并尽力使自己的亲信进入国会，从而最终出现了一大批听命于王室的国会成员和一个号称“国王之友”的内阁。由于他们是借助国王的恩惠和影响进入最高决策层的，所以他们在商讨和制定国家的军政要务时往往要仰国王的鼻息而行事。但是，英王虽然精通权术，具有执著的事业心，却并不真

正了解英美之间发生冲突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原因，因而盲目地对北美殖民地采取强硬粗暴的政策。可能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目的的纯洁性，以致从未怀疑过这些政策是多么糟糕，总有一天，它们会把大英帝国引入分崩离析的险境。

对于富兰克林来说，认识到这一点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因为他过去曾长期认为，英王是个公正无私、心地善良的君主，他是把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紧密联系起来的最牢固的纽带，而他此次英国之行的最初使命便是要求把宾夕法尼亚由业主殖民地改为英王直辖殖民地。时至今日，富兰克林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肤浅，国王的统治绝不会比业主的统治好到哪里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让北美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这些或许就是促使他写作那两篇脍炙人口的文章《缩小帝国要诀》和《普鲁士国王敕令》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后一篇文章，他把影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英王乔治三世，对他的统治方式和错误的殖民地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富兰克林希望用这种强刺激促使英王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从而恢复英美双方的和谐，重新赢得人民的尊敬和信赖。文章中诙谐的妙语和辛辣的讥讽得到了许多同情北美人民的英国人士的赞赏，也使那些正在进行反抗斗争的殖民地同胞们备受鼓舞。但令人遗憾的是，富兰克林的本来目的却并未实现，英王不仅没有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反而对富兰克林万分忌恨，而那些坚持强硬态度的议员和大臣们更是义愤填膺，把对殖民地人民的刻骨仇恨都集中到了富兰克林的身上，认为正是这个老奸巨滑的北美哲学家煽起了北美人狂躁和反抗的风潮，如今他竟敢攻击谩骂英明慈爱的英国君主，实属大逆不道，必须对他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

在经过一番精心的酝酿策划之后，英国统治集团决定对富兰克林下手了，其借口便是“哈钦森信件”事件。当这个恶毒的阴谋像一张巨大的黑网向富兰克林笼罩过来时，这位老练的哲人竟然毫无觉察。此前不久，富兰克林正式向皇家学会递交了为军械器材部起草的关于从闪电下保护军火仓库的报告书，他以科学家的敏锐洞察力为高大建筑物找到了躲避雷电的防护措施，却未能使自己免遭一场人为制造的突如其来的残酷打击。

哈钦森的信件寄到北美后并未像富兰克林所嘱咐的那样在特定的范围内传阅，也没有按期返回富兰克林手中，而是被人们广泛地传阅了，并被某些热心人印刷出来在更大的范围里扩散传播。哈钦森之流的丑恶嘴脸和背叛行径使得本来就躁动不安的北美人民怒火中烧，变得更加激愤狂热，抗议的浪潮风起云涌，很快就波及整个北美。麻萨诸塞殖民地做出决议，对哈钦森等人的罪恶阴谋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并坚决要求立即撤销哈钦森等人的职务。不久，各地的抗议书和请愿书就漂洋过海传到了伦敦。这一突发事件使得本已焦头烂额的英国统治当局寝食不安，也把富兰克林深深地卷入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吵之中。

此时，哈钦森信件的收信人托马斯·惠特利先生已经故去，其兄弟兼遗嘱执行人威廉·惠特利因受到这场丑闻的冲击而恼羞成怒，他回忆起海关官员约翰·坦普尔曾于1772年10月向他要求看看自己当年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件，并得到了许可，于是威廉·惠特利便指责是坦普尔拿走并传阅了这些信件。但坦普尔断然否认，两人遂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决斗，结果惠特利负了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未提到富兰克林的名字，富兰克林本来可以保持缄默，相安无事。但是，善良的恻隐之心使他没有这样做，他担心惠特



利伤好后当事双方还会进行流血的决斗，于是他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为但普尔摆脱干系，以便息事宁人。因此他在圣诞节那天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称争执双方对此事都一无所知，“我是得到这批信件并把它们寄给波士顿方面的唯一一人。惠特利先生不可能把它们转交给别人，坦普尔先生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信件从来不在他们手中”。这样一来，富兰克林就把一切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但由于他事先曾承诺为提供信件者和波士顿的收信人保守秘密，并一直严格地履行了这一诺言，所以他就成了所有矛盾的焦点，英国当局也就乘机把一切怒火和怨气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1774年1月8日，富兰克林被通知出席枢密院殖民地事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听取麻萨诸塞议会要求撤销哈钦森和奥利弗职务的请愿书。他当即与麻萨诸塞参事会的代理人、英国律师威廉·博兰进行商议，决定暂不聘请律师。然而两天后（即听证会的前一天），他才接到通知，称哈钦森的代理人伊斯雷尔·莫迪特要求请律师并得到了许可。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处在了一个很不利的位上。

1月11日，富兰克林按时出席了听证会。当他和博兰步入会议厅时，发现当局已指定现任副检察长、臭名昭著的“政府谩骂大师”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为哈钦森等人的辩护律师。韦德伯恩是个善于投机钻营、品质恶劣的势利小人，他在英国政坛上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凭着一副灵牙利齿和如簧之舌而升至高位，他一向对北美殖民地和富兰克林本人怀有一种天然的敌意，而与惠特利兄弟则打得火热。指定这样一个劣迹昭彰的人物充任哈钦森的律师，当权者们的险恶用心也是昭然若揭了，他们是想借机使富兰克林名誉扫地，彻底否定麻萨诸塞的请愿书，严厉压制北美人民的反英运动。可见，在听证会之前麻萨诸塞的请愿书就早已被英国当局否定了，而听证会只不过是走一下形式，并给那些仇恨富兰克林的人一个发泄愤恨情绪的机会而已。

宣读完了麻萨诸塞的请愿书之后，委员会要求富兰克林提供证据。富兰克林请求由博兰出面作证，但遭到了委员会的拒绝。此时富兰克林意识到自己成了听证会上唯一受攻击的目标了，于是他提出了聘请律师的要求。这样，听证会定在三周后进行。

就在等待第二次听证会召开的时候，1月20日，报纸上刊载了“波士顿茶案”发生的报道。这一消息的传来不啻是火上浇油，更增添了英国统治集团对富兰克林的憎恨，他们要把满腔的怒火都倾泻到这个北美总代言人的身上，让他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第二次听证会上，富兰克林实际上是以被告的身份被推上了审判席，因为威廉·惠特利已正式对他提出了起诉，控告他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了其兄长的信件，并非法印刷传播，从中牟利。

1月29日，听证会在枢密院会议厅里如期举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一张长桌的两旁就坐，首席的位子上坐着本次会议的主席高尔。由于没有准备多余的椅子，其余的与会者只能随意站在厅的各处，但大厅里仍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政府要员都受到了邀请，枢密院的顾问们几乎全部到会，其阵容之庞大整齐是前所未有的。开会前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但都把目光集中在两个人身上——麻萨诸塞正、副总督的辩护律师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一位地地道道的美洲绅士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伯恩站在主席右侧的桌旁，以便随时可以用手敲桌面，像一只蠢蠢欲动的凶猛猎犬那样对富兰克林虎视眈眈。会场里充满了一种战斗爆发前夕的紧张神秘气氛。

听证会开始了。首先宣读了富兰克林写给达特默斯的一封信、麻萨诸塞

的请愿书和议会决议，以及哈钦森的那些信件。然后，由富兰克林的律师、前检察长约翰·邓宁做辩护发言。邓宁指出：殖民地的请愿书和议会决议并不是法律诉讼，而是殖民地人民表示不满的证明，他们寄希望于国王的贤明和仁慈，希望能撤换总督，使殖民地的动荡得以平息，恢复和平团结的局面。这个讲话十分精彩严谨，恰中问题的要害，但却未能引起会议主持人和韦德伯恩的丝毫关注，因为他们今天的主要任务是要狠狠打击富兰克林的“嚣张气焰”，彻底败坏他的声誉，而不是听取他的辩护词。对于这一点富兰克林是有所预料的，但他却未曾估计到这场暴风雨到底会有多么猛烈。

下面轮到本次会议的真正主角韦德伯恩发言了。这哪里是什么会议辩论，分明是一种泼妇式的骂街和歇斯底里患者的大发作。韦德伯恩以最肆无忌惮的语言攻击了殖民地议会和富兰克林，实质上是对整个美利坚民族进行了恶毒的咒骂。他首先指出：今天听证会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王室有没有权力雇佣忠实可靠的官员来管理殖民地的重要问题”。他在追述了哈钦森和奥利弗在麻萨诸塞的从政经历后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懈可击的，并不是他们的请求才促使英国派兵到北美，而是殖民地议会的恶劣行径使然，而议会之所以厌恶哈钦森等人则完全是富兰克林阴谋策划的结果。接下来，这位不知疲倦的“谩骂大师”在大庭广众之下声色俱厉地历数了富兰克林的“滔天罪行”。

韦德伯恩断定：富兰克林是用“某种诈骗性的手段”得到哈钦森先生的信件的，即偷窃得来的，因此“他应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梁上君子——‘三只手’，意即小偷”。而他的这一卑鄙行动不仅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侮辱了已经故去的托马斯·惠特利先生，而且差一点断送了威廉·惠特利先生的性命。韦德伯恩接着指出，富兰克林把这些窃取来的信件寄送给北美的政治阴谋集团，唆使他们广泛传播，并肆意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致使整个殖民地出现了严重的骚动。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韦德伯恩始终板着一副狰狞的面孔，不时用手砰砰地敲击桌面，并用那双死鱼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富兰克林，就像一只饿狼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一只小羊。他告诉在场的听众们：富兰克林的真实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大美利坚共和国”，“以致他时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一个独立的外国大臣的口气”，干了许多违背法律和道德的勾当，并已经导致了许多不幸事件的发生。讲到这里，他的嗓音突然变得十分高亢尖厉：富兰克林已经使殖民地议会成了他手中的工具。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做了许多卑鄙的事情——对反对派通风报信；在政府内部挑拨离间；在国王的臣民中煽风点火，唆使他们反对国王任命的总督；希望建立一个比罗马帝国还要大的僭主政治国家，而富兰克林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垮现任总督，由他取而代之。

声色俱厉的演说终于在砰砰的敲桌声中结束了。委员会决定立即向枢密院提交报告否定麻萨诸塞议会的请愿书。虽然韦德伯恩的讲话中充满了谎言、谬误和不堪入耳的咒骂，但令人诧异的是会议主持人竟然未加以制止，反而给演说者以赞许的目光。大多数与会者对韦德伯恩的讲话不断报以近乎疯狂的欢呼和掌声，一些官僚贵族甚至高兴得忘乎所以，手舞足蹈，只有富兰克林的朋友们和个别真正的英国绅士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被韦德伯恩的恶劣表演深深震惊了，对富兰克林的处境极为同情。但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中，他们只能用沉默和对韦德伯恩的蔑视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立场。

在这近一个小时的攻讦垢骂之中，富兰克林穿着他那件带有图案的曼彻

斯特天鹅绒大氅静静地站在壁炉旁边，犹如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似乎连脸上的表情也全部凝结住了。虽然这是他第一次遇到的难堪局面，有些措手不及，但他毕竟是一位年近古稀的睿智长者，多年的公务活动已使他养成了忍辱负重，处乱不惊的脾性。早在年轻时，他就时常以“愚人的心在口中，而智者的口在心里”、“有耐心就有一切”、“迎风吐唾沫的人将弄脏自己的胡须”这样富有哲理的格言勉励自己，劝导别人。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面临突发的险情，他都能镇定自若地找出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案，用幽默深邃的微笑面对变幻莫测的世道人心，用谦和宽厚的神态缓和严峻的局势。在韦德伯恩铺天盖地而来的诽谤谩骂声中，富兰克林强压住怒火，隐忍不发，表现了一个卓越政治家所具有的豁达宽广的胸怀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非凡气度。他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轻率地进行抗辩只能招来更大的灾祸，最明智的做法是对施暴者表现出一种无畏和轻蔑——那便是无言，甚至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况且从长远看，沉默还有可能使自己在双方的对抗中逐渐转化力强者，它可以唤起众人的同情心，使人们更能看清事实真相和诬陷者的丑恶嘴脸，诚如他在事后写的《哈钦森信件短论》中所说的那样：“烂泥巴接连不断地抛在我的身上，但我并不想千方百计竭力清除它们，我相信一句民谚的正确性：一旦干了，它们就会纷纷脱落。”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韦德伯恩对富兰克林的恶毒攻击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北美为富兰克林彻底恢复了名誉。由于富兰克林长期滞留在英国，频频出入官场为缓和英美矛盾而斡旋，因此许多北美人士对他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他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影响，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而奉行中庸之道，对英国的反动政策一味妥协退让，对北美的利益不像以前那么关心。而韦德伯恩对富兰克林的肆意咒骂使得北美人改变了看法，使富兰克林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北美反英运动的领袖，成了一个为维护北美利益而遭受炼狱之火煎熬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北美人民对他更加尊敬信赖了。

听证会后第二天，富兰克林接到了解除其北美邮政副总监职务的通知。对此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突然。自从投身于社会公共事业以来，虽然他也时常考虑个人事业的成败得失，但他最关心的还是怎样为人类创造财富，为北美人民谋取福利，为了实现这一宿愿，他艰苦奋斗了大半生，虽历尽艰辛坎坷也无怨无悔，因此对于被解职一事并未感到有多么大的遗憾。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怒的是枢密院于2月7日批准了委员会的报告，这意味着英王驳回了殖民地的请愿书。面对英国统治者的这种固执愚昧态度，富兰克林感到北美与英国和解的可能性又大大缩小了，而他本人对英国国王和政府所寄予的良好希望也变得更加渺茫，因为他一贯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禁止流露不满情绪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明智的政府总是宽容地接受请愿书，哪怕它们只有少许道理。那些认为受到了统治者伤害的人有时会因为一个温和慎重的回答而认识到他们自己的错误。但是，如果抱怨成了一种罪过，希望也就变成了绝望。”

富兰克林对英国内阁、国会和国王都丧失了信心，于是迫切地希望尽快返回家乡，回到那熟悉亲切的黑土地，在温馨祥和的家庭氛围中安度桑榆暮年，尽享天伦之乐。此时，他多么渴望能喝上一杯妻子为他煮的香茶，与她同坐在家中温暖的壁炉旁静静地消磨时光呵——他们已经有整整10年没见面了！每当想到这里，一种去国怀乡和感叹人生的悲凉情怀便会涌上心头，富兰克林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用略带忧伤的笔调写道：“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仿佛就在昨日，转瞬间都老了。但我们还是应该高兴，我们大半生的生活都是幸福的。”

当富兰克林把他被撤去邮政副总监职务的消息告诉家人时，夫人和女儿的态度是明朗乐观的。她们认为，这件事除了会给英国的邮政业带来损失之外，对她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们终于又能够团聚了。只有儿子威廉的态度有些暧昧不清，他因父亲冒犯了当权者而颇有烦言。富兰克林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似乎正在与自己背道而驰，变成了一个看政府眼色行事的“朝臣”。这更加重了他尽快返家的想法，他要跟儿子好好谈一谈，希望他们父子的关系能恢复到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

但是，富兰克林还是未能离开伦敦。因为此时，大洋两岸的形势正在急转直下，作为北美殖民地事实上的总代理人，他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的恩怨和私事离开战斗的岗位，而必须忠于职守，善始善终地完成肩负的神圣使命。

“波士顿茶案”深深地激怒了英国国王及其政府，使他们暴跳如雷。因为在他们眼中，与“波士顿惨案”相比，“茶案”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前者是愤怒的英国士兵同失去理智的波士顿暴民之间的冲突；而后者则毁灭的是财产，而且是茶叶。要知道，当初英国之所以决定在废除一切商品税的同时仅仅保留了茶税，是因为他们把茶税作为一种象征，即：它象征着宗主国的尊严，表明宗主国享有在殖民地征税等特权。因此英王政府认为，“波士顿茶案”是反对英国统治的有计划的行动，必须进行严惩，遂蛮横地颁布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法令：关闭波士顿港直至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得到赔偿；取消麻萨诸塞的自治权；由英王直接任命议会议员，加强皇家总督的权力；被控在北美犯罪的英国官吏不受殖民地法院审讯；授权英军可以在北美的旅馆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中驻扎，等等。同时，任命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奇将军为麻萨诸塞总督，并调集军队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

上述法令明显地剥夺了北美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并造成了波士顿等地的经济严重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北美各个殖民地的代表于这一年的9月5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共商反英斗争大计。

自从那次听证会之后，富兰克林就很少再与内阁打交道了，但他的生活一如既往，他的心则始终与自己的故土——北美洲紧密联系在一起。此时，虽然他的思想立场还没有转变到脱离母国独立这一点上来（如同当时的绝大多数北美政治家一样），但他已经不再对英国目前的当政者抱有希望了。他此时的思想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北美人民的英勇斗争促使英国内阁发生更迭，使开明的政治集团上台执政，修正其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反英斗争的持续高涨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战争，使大洋两岸的同胞兄弟骨肉相残，生灵涂炭，出现不可收拾的人间惨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竭诚努力，既能够维护北美人民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使各个殖民地沿着团结繁荣的方向稳步发展，又不至于出现大的流血冲突，除此之外，此时他尚未提出进一步的政治设想。因此，富兰克林在英最后期间的政治活动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进行的。当然，即使在最忙碌的时期里他也没有停止他毕生最喜欢做的事情——科学研究和写作。

1774年2月12日，富兰克林与卡利斯的主教普里斯特利·普赖斯等人一起观看了戴维·哈利特先生做的“房屋防火实验”。

3月中旬，他写信给贝卡利亚，谈论了有关电学领域的新发现。几天后

还制订了一份关于“逐步废除奴隶制度”的计划。

4月10日，他给普里斯特利写信，谈论了利用沼气的问题，并做了有关的实验。

8月份，他应邀访问了查塔姆勋爵，讨论了有关美洲危机问题。他在讨论中指出：英国政府当前的殖民地政策不是从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维护部分人的利益，英国的有识之士应该发挥作用，修正错误政策，恢复英美之间的团结和睦。这一看法得到了勋爵的赞同。

9月30日，富兰克林把托马斯·潘恩先生介绍给了费城的一位友人，称他是一位“有智慧和值得尊敬的青年……希望能尽力帮助他了解情况，熟悉环境，因为美洲对于他是完全陌生的”。

11月，富兰克林写了一份题名为《打算说的话》的演说辞，冷嘲热讽地对英王的口气对局势的发展进程做了预测。虽然该文稿未公开发表，但富兰克林的预言后来都得到了证实。

在这一时期，除了与查塔姆勋爵等开明人士保持着频繁接触外，富兰克林还与另外一些英国官方人士有密切的往来。

11月份，银行家戴维·巴克利博士拜访了富兰克林，试探性地要求富兰克林提出殖民地与英国和解的初步方案。当晚富兰克林又与达特默斯的私人医生福瑟吉尔和巴克利举行了会谈，答应草拟一份和解计划。

几天后，双方再次会晤，富兰克林提出了“十七点”对话要点。他主张，在商业上，只要废除一切限制殖民地制造业的条例，北美可以宣誓在英国同外国交战时支持英国，也可以接受英国的商业垄断；在殖民地权利问题上，北美可以承诺对英国的义务，但前提条件是英国必须把立法权还给殖民地，保证和平时期不征税。他还表示要坚持捍卫殖民地人民的法律和宪章，为此不惜付出生命和一切代价。会谈中，虽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英方仍然认为从中“见到了一线光明”。

经友人牵线搭桥，富兰克林在圣诞节那天会晤了豪勋爵，向他陈述了殖民地人民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伤害。豪对此感到“震惊”，他要求富兰克林拟一份实现和解的方案。

12月18日，大陆会议的请愿书送到了伦敦，富兰克林携同博兰和阿瑟·李把它递交给达特默斯，由他转呈英王。次日，富兰克林又把请愿书的副本呈送查塔姆勋爵，并与之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勋爵赞扬了这份请愿书，并表示愿意在上院为北美殖民他讲话。

几次会晤协商之后，查塔姆勋爵于1775年1月21日向上院提交了一个关于北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该议案请求英王从波士顿撤走军队，高度赞扬了大陆会议的行动，肯定了北美人民反抗压制性法令的行为，并指出：北美人民所做的正是英国人决不会忘记做的，即捍卫英国的自由。该法案虽然获得了上院部分开明人士的高度赞赏，但却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抵制，表决结果以18票对68票遭到了否决。

但意志坚定的查塔姆勋爵并未气馁，经过一番周密认真的筹划，他又于2月1日在上院提出了一份关于实现英美和解的计划，其内容包括：英国国会有权约束各殖民地，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英王有权向殖民地派遣军队，但是，只有北美人可以北美征税，殖民地的宪章和宪法不可侵犯，并建议承认大陆会议的合法地位并使之成为常设机构，国会应该中止那些受到殖民地反对的法律，等等。查塔姆精彩雄辩的发言使包括达特默斯在内的许多人

士都深受感染，但由于遭到多数代表的激烈反对，这一方案又遭到了否决。

此后，富兰克林又与豪勋爵、巴克利和福瑟吉尔等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和磋商，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成妥协，解决日益严重的北美危机。但由于英王和内阁要员们固执己见，毫无诚意，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就在富兰克林为解决危机进行最后努力的日子里，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诺思首相已在着手做对殖民地镇压的准备，大批军队被派往大洋彼岸。英国国会则经过表决决定：全面停止新英格兰与大不列颠、爱尔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纽芬兰的渔业权也被取消了。

1775年2月下旬，富兰克林突然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妻子因病去世了。自从进入1774年秋季以来，德伯拉一直感到不适，身体似乎在迅速衰竭，她凭自己的直觉告诉儿子，如果父亲在冬天还不回来的话，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12月14日，她终于病倒了，并于19日悄然离开了人世。

得到这一噩耗后，富兰克林感到自己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必须尽快返回北美。于是，他与豪勋爵、巴克利和福瑟吉尔等人进行了礼节性的会面，此后便终止了在英国的全部使命。富兰克林在英国的最后一天是与普里斯特利先生一起度过的。普里斯特利后来回忆到，富兰克林当时虽然十分思念远方的亲人，并为夫人的去世而悲痛不已，但他考虑最多的仍是美利坚民族的命运问题，他为战争的即将爆发而感到忧心如焚，并流下了伤感的泪水。但他认为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为了避免这场战争已经竭尽了全力，并深信：北美人民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3月下旬，富兰克林乘驿车前往朴茨茅斯，在这里搭乘宾夕法尼亚邮轮返回美洲，同行的有孙子坦普尔，此时他已是一位15岁的英俊少年了，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承认。伫立在甲板上，望着渐渐模糊的英伦三岛，富兰克林不禁怆然泪下。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的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爱妻；是为了他曾深深热爱却不得不与之彻底决裂的母国；还是为了那些无法躲避战火煎熬的苦难的北美同胞？

再见了，伦敦！

## 第二十章 肇划独立

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独立的国家，并且按照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了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结束。

理查德·亨利·李

返美的海上航行一共持续了六周。和煦清爽的春风和碧波荡漾的大海很快就冲洗去了富兰克林心头的悲伤和忧愁，旅行的第二天他就开始计划在漫长的旅途中要做的事情了。起初，他动笔撰写了与英国官方进行谈判斗争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航船疾速行驶，旧大陆一天天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富兰克林思绪的翅膀又从英国转向了未来和整个人类。于是他又重操旧业，对海洋进行认真系统的科学考察，特别对墨西哥湾海流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测绘。

海上旅行是愉快充实的。但就在这次航行期间，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波士顿附近，英美双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列克星顿之战。

1775年4月18日，麻萨诸塞总督兼英军司令盖奇得知北美民兵正在距波士顿27公里的康科德征集火药和军需品，便立即秘密派遣史密斯中校率800名英军前去收缴军火，并逮捕反英运动领导人。但是，这个消息很快就被爱国分子探听到了，他们立即派人火速把这一消息传往各地。波士顿近郊的民兵们得知情报后很快就集合起来，迅速赶往康科德。当英军经一夜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来到列克星顿的时候，遭到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北美民兵的顽强抵抗。经过一番激战，英军勉强行进至康科德，但发现大部分军火已经被转移了，并立即受到民兵更为猛烈的狙击。民兵们采取散兵战术，充分利用熟悉的地形地物，埋伏在各种建筑物和树木草丛后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不一会儿工夫，英军就遭受了重大伤亡，被迫撤退。此时，战斗的警报已传遍了整个乡间，正在田里劳作的农民放下手中的耕犁，在作坊里工作的工匠们收拾好自己的工具，纷纷拿起武器，从各个地方奔向战斗的前沿，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呼啸着射向英国“龙虾兵”，打得他们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珀西勋爵率领着1000多名英军前来增援，也被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高傲自大的珀西勋爵被一颗复仇的子弹击中了胸前的铜纽扣，差一点毙命，吓得调头就跑。当这支狼狈不堪的军队仓皇撤回波士顿时，已伤亡和被俘了大约300人，而北美民兵仅仅伤亡数十人。

列克星顿的枪声是震撼大西洋两岸的一声春雷，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这一胜利大大激发了北美人民的爱国热情，北方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群众立即响应，他们纷纷拿起武器，高举义旗，前来支援波士顿人民，各路人马很快就汇合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

富兰克林是1775年5月5日到达费城的。昔日美丽繁荣、祥和太平的城市如今已经深深地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人们焦虑、躁动、惶恐，以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热烈欢迎这位年近古稀的费城骄子回到家乡——他们把美利坚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此时的富兰克林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得多，高大挺拔的躯干，四肢依然矫健灵活，虽然岁月已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风霜使他的双鬓斑白稀疏，但那红里透黑的面颊和浓密的须眉却给他增添了几分沧桑之

美，毫无老气横秋之色。他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而且透露出更多的仁慈、豁达、亲切和睿智。此时，他几乎拥有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一切东西——名利、权势和地位，早已到了功成身退、颐养天年的年龄了。但他的身上却仍然充满了坚韧不拔和锐意进取的勃勃朝气，因为他深深地感到：自己虽然已经有所作为，但作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自己还有件最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那就是民族的独立。

富兰克林回到费城的第二天就被选为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开会之前，他闭门谢客，独自呆在他 10 年前亲手营建但却是第一次走进的家中。他终于回到了这个魂牵梦萦的温存空间，这是本应属于他和德伯拉的两人世界，但她却先他而去，长眠在救世主教堂后面的墓穴里了。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她精心料理的痕迹，室内的一切都如同她在信中说的那样摆设得合情合理，令人赏心悦目，她为他亲手缝制的五麻衬衫也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衣柜里，那套印有康乃馨图案的茶具静静地摆在茶桌中央——这还是他第一次从伦敦返回时带给她的唯一礼物。事隔半个世纪了，她竟然把它保存得完好如初。睹物思人，阴阳永隔，富兰克林不禁悲从心来，哀思滚滚。

但是，此时最令富兰克林感到痛心的还是儿子威廉的境况。出乎他的意料，当北美人民的反英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和他在英国为维护北美人民的基本权益而苦苦斗争的时候，他最喜爱并视为天然知己的儿子威廉却站到了殖民压迫者的反动阵营中去了，他忠于总督职守，顽固地与殖民地人民对抗，后来竟充当了纽约保皇党联盟的主席。富兰克林对他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和严厉的批评，但威廉竟毫无悔改之意。就这样，父子俩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已荡然无存，年届古稀的父亲成了坚强的革命领袖，而处在风华正茂之年的儿子却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此两人分道扬镳，并且越走越远，这恐怕是乐天知命的富兰克林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了。

幸好女儿萨拉与他同住在一起，给了他不少精神上的慰藉。女婿理查德·贝奇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办事老成干练，深得富兰克林的赏识，这也使得富兰克林不得不佩服女儿在择偶问题上表现出的明智和慎重。特别是两个未曾见过面的小外孙——本杰明和威廉给他带来了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欢乐。他们常常在他膝前嬉戏玩闹，有时还缠着让他讲故事和他本人的所见所闻。每当这时，富兰克林的精神往往会变得像大使一样纯洁快乐，他时常与孩子们一同游乐，有时甚至高兴得忘乎所以，尽情欢笑。

不久，女友凯瑟琳·格林前来拜访，给富兰克林带来了更多的欣慰。凯瑟琳与富兰克林相识相爱已有 20 多年了，但由于富兰克林长年滞留在欧洲，他们之间的交往大多是经互通书信进行的，虽说他们经常在信中讲述自己的生活、事业和内心世界，但巾短情长，海天阻隔，他们只能惘然地追思着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忘年之恋。在这期间，凯瑟琳与富兰克林的小妹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简的孙女嫁给了凯瑟琳丈夫的一个侄儿，这一联姻更增加了她们之间的交往。如今，他们都已经步入老年，身边儿孙成群，不可能再去重温往日的恋情。但他们的心却贴得更近了，在许多人眼中，他们更像一对情同手足的亲兄妹。

亲情、友情和舐犊深情，大大缓解了因失去爱妻和儿子背叛给他造成的巨大悲伤，使他很快摆脱了心理上的阴影。在富兰克林心中，生活永远是美好和神圣的，他要集自己的毕生所学，竭尽全部才智，为他所挚爱的人们，为美利坚民族的千秋大业和美好未来，奉献出自己生命的全程。



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议会厅开幕，富兰克林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佩顿·伦道夫再度出任会议主席，他病故后（会议期间伦道夫死于脑溢血），波士顿的富商约翰·汉考克先生继任了这一职位。这时，战争已经开始了，历史赋予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承担起北美最高权力机构的责任，有效地领导和组织战争。但会议的进程表明：一部分人仍对宗主国抱有幻想和和解的希望，主张千方百计避免流血冲突，而另一部分人的独立意识则已经大大增长了，这种思想上的差距正在日益拉大，以致整个会议期间都充满了尖锐的思想交锋。

这是一个盛况空前、群英汇聚的大会，独立战争期间美国的精英人物几乎都登场了，其中有几个面孔最为引人注目：弗吉尼亚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乔治·华盛顿，他在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获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崇高的荣誉，在弗吉尼亚议会和大陆会议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智慧。他此时正值壮年（43周岁），精力充沛，刚毅果敢，威武不屈，具有一种拔山盖地的英雄本色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气度；弗吉尼亚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时年32岁，是会议中第二位最年轻的成员，以写作《英属北美权利概观》一书而闻名于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其博大精深的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的民主思想体系，在北美洲发生着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69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会议中的最年长者，这位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科学研究、文学创作、政治和外交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思想激进，德高望重，此时已成为坚决的反英斗士。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这三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终于汇聚在一起，他们要用自己那坚实有力的臂膀共同托起美利坚民族那轮冉冉上升的旭日。

作为殖民地驻英国的代理人，富兰克林详尽地向议会汇报了与英国当局进行谈判的全过程，披露了内阁和国会与北美人民为敌的顽固态度和强硬立场。代表们无不对他那锲而不舍、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对英国政府则表示了强烈的蔑视和愤怒。但是，会议中以迪金森为首的保守派仍提出了一个和解方案，要求会议毕恭毕敬地向英王请愿，实现和解。此举遭到了激进派愤怒的反对，他们主张殖民地应立即采取有力的行动，宣布北美为“自由和独立的共和国”。但会议代表们都是富有经验的成熟的政治家，他们没有喋喋不休地争吵下去，在了解了对方的观点之后，他们在加强殖民地团结的基础上对各方的立场进行了协调，会议做出的许多重大决议都充满了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

会议通过了由迪金森起草的对英王的请愿书，表示仍然效忠于英王，企求英王纠正英国议会的错误政策，与北美实现和解。会议还通过了由迪金森和杰斐逊共同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心要的通告》，该文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是完美的。我们的内部资源十分充足，而且如有必要，无疑还可以得到外援。……我们将使用敌人迫使我们拿起的武器……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万众一心，决意死为自由人，不愿活着当奴隶。”该文虽然声称北美人民尚无意脱离英国而独立，并阐明了和解的愿望，但字里行间仍表达了美利坚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预兆不祥的威胁。

这次会议期间，大陆会议开始真正行使了北美最高政权机关的职能。它发布命令：在北美全境发行纸币，筹集武器、弹药和各种战争物资，广泛招

募兵员，并成立了处理军事事务的委员会，由华盛顿出任主席。此外，大陆会议还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把新英格兰民兵整编为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这支军队的总司令。

由于富兰克林深孚众望，对美利坚民族的事业富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且多才多艺，因此大陆会议和宾夕法尼亚委托给他多项重任，前后担任过的职务多得不可胜数。虽然他已是 70 岁高龄的人了，但在履行这些职责时，他始终不敢有半点懈怠，总是能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才智和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尽心尽力，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使命。从他 1775 年 5 月至 1776 年秋赴法之前一年间的活动简历就可以看出，这位时代伟人为了推进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事业是如何鞠躬尽瘁、全力以赴的。

5 月 29 日，富兰克林被大陆会议任命为筹建邮政系统的委员会的主席，并于 7 月 26 日当选为邮政总长；他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则出任他的助手，负责审计工作。邮政工作是富兰克林的老本行，所以他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不仅恢复了正常的邮政业务，而且还开通了新的邮路。邮政总长的年薪为 1000 美元，但富兰克林分文未取，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救助军队的伤病员。

6 月份，他又受托到几个委员会工作，分别负责起草给国王的请愿书、安排北美各地的军人生产和筹划印刷纸币等事宜。

7 月 3 日，他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公安委员会主席，在议会休会期间负责地方安全保卫工作。在职期间他整天忙于训练和武装平民，曾受托设计了一种装备军队的长矛，设计并组织在河道中铺设了 17 处障碍，修建了 13 艘武装船只（其中有“大陆会议”号、“华盛顿”号和“富兰克林”号）。

7 月 12 日，大陆会议任命他负责一个新的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在继续抵制英货的同时，组织战争所需物资的进口。同时，还委托他负责处理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问题。21 日，大陆会议开会讨论建国问题，富兰克林向会议提交了他的《联邦和永久联盟条例》，这实际上是当年“奥尔巴尼计划”的翻版，但会议中的大多数代表对于接受这样激进的计划尚缺乏思想准备，因此未获通过。在 8 月份，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在宾夕法尼亚组建民团，修筑防御工事，采购各种军需品等工作。

9 月是富兰克林最忙碌的月份之一。先是受命负责一个委员会，组织秘密进口军火；接着，又受托组织美洲贸易委员会。27 日，他出席了美洲哲学会，并担任会议主席。30 日，大陆会议派遣他和另外几位同事前去同华盛顿磋商关于援助军队等问题。大约两周后，富兰克林一行到达了华盛顿的营地。这支所谓正规至实际全部是由志愿者临时组成的，按组建时的规定，士兵们不久就可以解散回家，可以说是一伙衣衫不整、装备奇缺、纪律松散、服役期限较长的乌合之众。针对这种情况，华盛顿主张组建一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装备精良和服役期限较长的新军。为此，富兰克林等人与华盛顿进行了全面周详的商讨。

就在富兰克林会晤华盛顿期间，他被选为宾夕法尼亚议会成员，不久再次被推举为大陆会议代表。11 月 17 日，大陆会议又任命他进入一个负责处理北美缴获的英货的委员会。29 日，他又被任命到一个五人委员会，旨在与英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广泛地建立联系——即处理外交事务，此乃美国国务院的前身。

1776 年初，富兰克林辞去了宾夕法尼亚议会和公安委员会中的职务，专心致力于大陆会议中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他接受了大陆会议的派遣，前

往加拿大争取法裔加拿大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援助。富兰克林率领一个使团于3月底动身前往加拿大。这是一次充满艰难困苦长途跋涉，历时一个多月，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最终无功而返，富兰克林也在旅途中大病了一场。

就在这一时期，北美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自列克星顿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大陆会议以来，北美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就在波士顿之战进行期间，北美其它地区的人民群众也纷纷拿起武器，与英国军队和亲英分子（效忠派）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南部战场，南卡罗来纳民兵在莫尔桥战役中痛歼效忠派武装，并把企图攻占查尔斯顿港口的英国舰队赶走。在加拿大战场，由理查德·蒙哥马利和班尼狄特·阿诺德率领的北美军队孤军奋战，给英军以重创，虽然最终寡不敌众而严重受挫。蒙哥马利将军也英勇阵亡，但他们的行动牵制住了相当一部分英军主力，有力地援助了其它地区的反英战争。

武装斗争愈演愈烈，已经从局部蔓延到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各个角落，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越来越明确地摆到了北美人民面前：北美人民到底在为何而战？

北美大多数革命领袖当时认为，北美采取种种经济和军事的手段与英国当局作斗争，其目的仅仅是迫使他们放弃对殖民地的压迫性政策。而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北美就应放下武器，与英国破镜重圆。北美的各界群众也抱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仍然认为英国是自己的祖国，自己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他们积极参加了反英武装斗争，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迫使英国作出让步，使北美恢复到1763年以前的小康局面。因此，在当时北美绝大多数人眼中，独立与“叛国”和“大逆不道”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个别激进分子有独立的思想，他们也不得不三缄其口，否则便会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就连激进派的领袖约翰·亚当斯当时也认为：“在人们眼中，独立是一个可怕的妖魔，它会使温厚的人变得发狂，使社会滋生出罪恶、欲望和混乱。”

但是从1776年初起，情况同以前迥然不同了。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既昏聩无能又刚愎自用，他三番五次地拒绝了北美要求和解的请愿书，并蛮横地宣布：北美处于叛乱状态。他还一再扬言：要绞死殖民地的每一个叛乱首领！秉承英王的旨意，英国政府调兵遣将，把几万精锐部队运往北美洲，对人民抗英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英军的铁蹄践踏了北美的广大城乡地区，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事实证明：英国国王决心要用屠刀把北美人民的斗争淹没在血泊当中。北美人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英军的血腥镇压必然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华盛顿统率的大陆军和各路民兵武装浴血奋战，愈战愈勇。各个地区的爱国者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推翻了顽固反动的总督及其地方议会，建立起新的革命议会和地方政权，并开始有效地履行职责。到1776年1月，这种革命议会和地方政权已经牢牢地控制了11个殖民地。英国在北美殖民统治的根基彻底动摇了，北美人民的独立意识已经苏醒。

就在这时，潘恩写的小册子《常识》发表了。

托马斯·潘恩，北美独立战争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出身于英国教友派家庭，年轻时以劳动力生，对社会贫富不均深有深刻感受，

曾写书予以抨击，并把自己的名字写成“pain”（痛苦），以示对现状的不满。因生活所迫，潘恩于1774年10月作为契约奴隶来到北美，当时在英国的富兰克林给他写了介绍信，对其才智给以高度评价，使他免遭了几年苦役，在《宾夕法尼亚》杂志担任编辑，发表过反对黑奴制度的文章。潘恩积极参与了反英运动，但他发现人们的君主制观念甚浓，他们认为英王是个“仁慈的君主”，希望由他出面来结束北美殖民地的悲惨遭遇，这一天真的幻想成了北美走向独立的一大障碍。潘恩认为：有必要把战争的真正目的告诉人们，把反英斗争纳人为独立而战的正确轨道，这就是潘恩写《常识》一书的主要目的。

《常识》一书于1776年1月发表，它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和犀利的笔触痛斥了世袭君主制的罪恶和虚伪，深刻揭露了英王乔治三世压迫剥削北美殖民地的专制暴虐，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它还告诉那些心存幻想的人们：列克星顿的枪声已经斩断了与英国和解的最后一根纽带，武力已经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在此基础上，潘恩提出了铿锵有力的口号：我们的目标是“维护人类权利，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美国”。他指出，独立可以使北美人民享受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而接受殖民统治则百害无一利。最后，潘恩还赋予北美人民一个神圣的使命——使北美成为人类自由的最后堡垒，他大声疾呼道：

“热爱自由的人们，既敢于反对暴政也敢于反对暴君的人们。站起来吧！旧大陆的每一块土地都遭到践踏和蹂躏，自由遭到驱逐，亚洲和非洲早已把它扫地出门了，欧洲对它也视同陌路，英国则向它发出警告，让它走开。啊！接受这个逃亡者，为人类提供一个避难所吧！”

《常识》的问世如同春雷炸响，震撼了整个北美大地，在短短数月时间里就销售了50万册之多，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革命“圣经”。它彻底摧毁了英王在北美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从而割断了他们对英国感情的最后一根纽带，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义无反顾地为民族权利和国家独立而战斗。

就在富兰克林从加拿大返口费城的这段时间里，筹划宣布独立的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了。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在大陆会议中宣读了他的那个振奋人心的提案。宣称：“联合殖民地是，而且有权利是自由独立的诸邦，解除对英王的一切臣属义务，因而它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联系应完全解体。”在一片要求独立的呼声中，大陆会议于6月10日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起草关于宣布独立的文件，这五位成员是：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经协商，委员会成员一致推举由学识渊博的杰斐逊充当执笔人，于是，这位年轻的弗吉尼亚绅士以气势磅礴的手笔，不借助任何文献，撰写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官方文件。初稿完成之后，杰斐逊请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进行修改。此时，富兰克林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面对如此庄严神圣的使命，他不敢有半点怠慢，抱病对文稿作了极其认真的审阅。富兰克林对杰斐逊在文中表述的自然权利学说、人民主权学说和人民革命权利学说等革命理论赞赏备至，对这位威廉·玛丽学院高材生超人的才智和文笔深感叹服，只对文稿的个别地方作了更动，目的是使文句更为言简意赅，冷静犀利。例如，他把原文中“神圣的和无可辩驳的”一句改为“不言而喻的”；把“将他们置于专断的控制下”改为“将他们置于绝对专制政治之下”；关于美洲人的请愿，杰斐逊写道，“给予的回答是一次次的伤害”，

富兰克林改为“给予的回答只是一一次又一次的伤害”，等等。类似这样的改动共有五次，人们至今还能从原稿的笔迹中清晰地辨认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富兰克林非常赞同杰斐逊在原文中对奴隶贸易的猛烈抨击，但由于大陆会议中南方种植场主代表们的强烈反对，这段精彩的文字后来被删掉了，对于这一问题，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感到深深的遗憾。

1776年7月4日，修改后的《独立宣言》被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很快，自由的钟声响遍了北美大地，它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此诞生了！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以他的如椽巨笔高度地总结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重要原则，他写道：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损害了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这段话虽然不长，却包含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许多重要革命原则。它犹如警钟长鸣，振聋发聩，为美利坚人民打破殖民枷锁、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接下来，《独立宣言》以确凿的事实列举了英王乔治三世压迫北美人民的28条严重罪行，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乔治三世的目的是想把北美人民置于他的绝对专制的暴政之下，英王政府已经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因为它侵犯了北美人民的基本权利。

基于上述分析，《独立宣言》最后向全世界宣告：“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并依照公理也应该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宣言》宣布取消对英王效忠的义务，全部断绝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关系。

尽管富兰克林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但当他接到宣言的正式文本时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异常激动，他知道，一个伟大的新国家从此正式诞生了。虽然他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也从不相信命运的作用，但他仍在心中默默地祈祷：愿上苍保佑美利坚民族的航船能顺利地冲过激流险滩，到达光明的彼岸。

但是，独立战争是一场交战双方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战争。

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它还是世界上唯一开始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具有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巨大的人力资源是这一时期英国在世界各地穷兵黩武，称王称霸的主要资本。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已经有大半个世纪，君主立宪制政权强大而稳固，它代表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利益，继续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成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维护其殖民统治的强大后盾。英国还有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其海军舰队堪称世界一流，从而大大加强了英军的战略机动能力。在北美，英军投入的兵力达9万人之多，还招募了大量外国雇佣兵以及美国内部的效忠派武装，另外，它还大力煽动黑人和印第安人参加对美军作战，并可以充分利用英国在加拿大、佛罗里达和西印度群岛等地的军事基地。

而此时的美国则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十分弱小的国家。全国的总人口还不到300万，虽然已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但经济上仍处在落后的殖民地经济状

态，兵源紧缺，物资匮乏。大陆会议的职权十分有限，它只是一个带有临时中央政府性质的松散的联盟，不可能对各州发号施令。刚刚组建的大陆军最多时只有两万多人，且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军事素质低下，军官也缺乏作战经验。总之，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美国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由于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所以在战争初期，美军采取的是防御性战略，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局面，特别是1776年6月英军主力开赴美国之后，美军在战场上的劣势便更加明显，屡遭败绩。7月，威廉·豪将军率领的英军攻克了斯塔但岛。8月下旬，英军发动长岛战役，美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华盛顿率兵撤至曼哈顿，驻扎在哈拉姆河畔。9月25日，英军又攻占了纽约城。11月，美军又接连丢失了华盛顿堡和李堡。一时间，北美大地上空乌云翻滚、阴霾密布，局势变得异常危险，扑朔迷离。

自从《独立宣言》公布之后，富兰克林在大陆会议和宾夕法尼亚的工作更加繁重忙碌。7月18日，他受命与约翰·亚当斯一起起草与外国结盟的盟约草案，以便日后进行外交谈判时使用。一个月后，他们拟定的有关报告得到了大陆会议的认可。在这期间，他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制宪会议代表，并被任命为会议主席。虽然由于大陆会议的工作太忙使他很少出席制宪会议，但在9月颁布的州宪法中仍包含了他提出的两项内容：第一，设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第二，设置一个由多数人组成的行政会议，而不设州长。

7月底，在讨论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的方案时，富兰克林明确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各州的代表数额要与该州人口数量和贡献大小成正比。8月初，他又提议：国会席位应该按照人口的比例来分配。

此时，战争形势日益恶化，英军将领威廉·豪爵士乘机向美国人递出了劝降的橄榄枝，他以老朋友的身份给富兰克林写信，表示愿意“宽恕”北美殖民地的叛乱者。此举遭到富兰克林有礼貌的拒绝和驳斥。长岛失守后，豪又通过被英军释放的美军战俘约翰·沙利文将军捎信，要求就寻找结束冲突的办法一事进行一次私人会晤。鉴于富兰克林与豪过去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大陆会议任命他为谈判代表，其使命是弄清楚对方被授予了什么权力和有什么适当的解决方案，富兰克林与约翰·亚当斯等人于9月11日在琅斯·阿姆波伊附近的斯塔腾岛上与豪进行了会谈。虽然会晤是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进行的，豪爵士的态度十分宽厚友好，但富兰克林仍然发现豪的权力仅限于在美国人屈服后宽恕他们。于是，会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就终止了。此后，战事再趋激烈，英国陆海军协同作战，对华盛顿的大陆军发动了一次次凶猛残酷的进攻，美军先是被向北赶到哈勒姆海茨，后又被赶至怀特普雷恩地区。战局的发展使美国军民陷入了空前不利的境地。

面对这种屡战屡败的险恶局势，美国决策层中的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了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开始进行紧张的外交工作，希望争取得到在殖民争霸中与英国结下宿怨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欧洲列强的援助，9月26日，大陆会议经慎重研究后决定，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富兰克林与杰斐逊（后因夫人病重未能成行）和西勒斯·迪安作为出使法国的代表。

在临行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富兰克林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务做了全面的安排。他把邮政总代理的职责委托给女婿理查德·贝奇，并要求他把“将能筹到的所有款项，大约三四千镑”作为贷款交给大陆会议，以鼓励其他人对独立事业进行捐助。他还把一只皮箱交给儿子的好友盖洛韦保管，里面存放了他多年的信件和《自传》的手稿。另外，富兰克林还写信把孙子但普尔

叫到身边，让他与自己同行，以免他受到效忠派父亲的不良影响。

10月27日，年届古稀的富兰克林带着孙子但普尔（近17岁）和外孙贝奇（7岁）悄悄地登上了一艘武装帆船“复仇”号，开始了赴法国的艰难航行。该船装载了不少靛青，以充作使团的经费，在兰伯特·威克斯的指挥下驶入了波涛滚滚的大西洋。整个航程中充满了风险和不可预测——如果船只被英国人俘获，富兰克林肯定会被以叛国罪处死。但富兰克林本人似乎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仍像以往那样每天测量气温和水温，认真观察海流。在接近法国近海时，他们还俘虏了两个形迹可疑的英国人。11月底，他们驶抵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海岸，12月3日在欧赖登陆，由陆路行进四天后到了南特，12月下旬进入巴黎。

## 第二十一章美法结盟

没有法国的帮助，美国不可能赢得独立。这是早期美国外交不可避免的事实。不管1776年的爱国志士们多么想置身于欧洲战争和外交折冲之外，但欧洲的事态发展却向他们提供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机会。

托马斯·帕特森

独立战争初期战场上的危急局面使美国革命领袖们深刻认识到：要想打败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弱小的美国必须取得欧洲各国的支持。这些革命领导人大部谙熟历史，他们知道，英国是经过数百年殖民争霸战争才一步步爬上世界霸主主座的，在这一过程中，它与欧洲列强们结下了深深的怨恨。特别是法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英法争霸战争中，双方流了无数鲜血，最终法国战败，饱受屈辱。它在印度的利益几乎全部丧失，在北美只剩下纽芬兰沿岸两个小岛和西印度几个岛屿，在南美只保留了圭亚那，而英国则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对此，法国人一直耿耿于怀，时刻梦想着对英国进行报复。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使法国感到幸灾乐祸，它希望能乘讥恢复失去的殖民地和海上贸易地位，打击英国的势力。因此在独立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纳伯爵就企图说服法王路易十六援助美国革命，他列举了这样做的好处：“第一，它会削弱英国的势力，而增加法国势力；第二，它会造成本国贸易的巨大损失，而大大地扩大我们的贸易；第三，还很可能使我们收回部分被英国夺去的美洲殖民地。”荷兰、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国家也抱大致相同的态度。

美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希望能利用欧洲列强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促进独立战争的胜利。为此，他们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派遣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和西勒斯·迪安作为出使法国的代表。后来由于杰斐逊夫人病重，又改派已在欧洲的阿瑟·李接替了杰斐逊的位置。大陆会议赋予他们的使命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竭力争取法国等欧洲列强承认美国独立，并参加对英作战或对美国提供必要的援助。

1776年12月20日，富兰克林一行到达了凡尔赛，迪恩先生亲自驾车前来迎接，而后，他们一同进入巴黎，受到了法国各界友好人士的热情款待和欢迎。

大陆会议选择富兰克林作为出使法国的代表确实是一个英明正确的举措，因为他在法国有着很高的威望。作为一个驰名世界的科学家、政论家和外交家，富兰克林早已为法国人所熟知。他的《穷理查年鉴》等著作是法国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他在电学方面的杰出发明使他成了法国科学院的院士，而他那朴实无华，独具一格的外交家风度又使得无数巴黎人为之惊叹，着迷不已。富兰克林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到达法国后就立即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很快就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法国知识界把他奉为卢梭的化身，政界要人视其为法国最可靠的国际盟友，而宫廷贵族们则为他高雅幽默，不修边幅的潦洒风度所倾倒。法国人对富兰克林的崇敬已经达到了爱屋及乌的程度，以致他的形象频频出现在各种纪念章和鼻烟壶上，他那顶舒适柔软的皮帽子也以“富兰克林帽”而闻名，在巴黎走俏一时。总之，在法国人心中，富兰克林是美利坚民族的象征，而美国革



命则成了法国人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理解。

来到巴黎后，富兰克林先在市中小住了一段时间，三个月后便把家迁到了距巴黎半英里的帕西村。他认为在这里居住可以避免闹市的喧嚣和不必要的应酬，专心致志地办理公务和读书写作，况且村里还有一所不错的小学校可供外孙贝奇就读。这是一幢宽敞明亮的房舍，坐落在一块孤立的高地上，四周有美丽的花园环绕，是一处优雅僻静的所在。富兰克林在这里过起了一种家族式的生活。外孙贝奇在寄宿学校上学，周末才回到家里。他让孙子坦普尔担任自己的秘书，处理日常工作。不久，甥孙乔纳森·威廉斯也来到这里，富兰克林委托他处理向国内运送物资等事务。新居里最常见的客人是迪女。他时常到这里汇报工作，交流情报，共同商讨外交事务，并时常在这里留宿，而阿瑟·李却极少能享受到这种殊荣，这使得他产生了很大的妒意。美国使团在帕西的办公地点设在瓦朗斯大旅店，店主唐内西安·勒·雷·德。乔蒙特先生是美国独立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坚决不收房租。他认为，富兰克林先生在这里居住已为他增色不小，再收取租金就显得不合乎情理了。说来很有趣，富兰克林迁居的本意是为了躲开城市中嘈杂的人群，但他的隐居反而更激起了巴黎公众对他的兴趣，登门造访者常常络绎不绝。

经过富兰克林等人艰苦的外交努力，美法关系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法国政府的许多援助项目陆续启动，大量军火、物资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被秘密地运送到美国，法国政府甚至允许美国的私掠船进驻法国的港口，这些举措对美国的革命事业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个人的社会声望只是外交努力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保证外交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直至1777年底之前，法国人在对待承认美国独立和与美结盟等重大问题上一直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他们十分清楚，这一举动实际上意味着对英宣战，法国对此必须权衡利弊。谨慎行事。因为此时，法国人对美国能否在这场战争中稳操胜券还毫无把握，特别是1776年和1777年美军在纽约和费城的大利使法国人的行动变得更加谨慎，他们要等到美军有了取得军事胜利的可靠保障才能做出正式决定。另外，法国此时的战略构想是：即使法国参战的话，也必须与美国和西班牙建立牢固的同盟，共同承担起对英作战的义务。但是，西班牙在这一问题上一直表现得犹豫不决，畏首畏尾，这也不能不使法国人感到顾虑重重。因此，法国政府虽然在私下里向美国提供了许多援助，但在公开场合仍采取中立立场，甚至做出一些姿态以安抚英国人。

为了促进法国等欧洲列强尽快改变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公开承认并全力支持美国独立，富兰克林认为美国使团不能无所作为，而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做出最大的努力。于是，美国使节们开始进行紧张忙碌而又灵活多样的外交努力。

在帕西村那美丽寂静的花园式别墅里，这位年过古稀的哲学家又挥动起他那杆如椽巨笔，日日夜夜伏案疾书，呕心沥血，他要为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事业而高声呐喊。他要让正义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775年5月，一篇题名为《雇佣兵的出卖》的文章在法国发表了，该文虽未署名，但从那冷嘲热讽、不拘格式的文风便可看出，其作者非富兰克林莫属。于是各报刊纷纷转载，轰动一时。文章对英国政府在国外收买雇佣兵野蛮屠杀北美军民的恶劣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普鲁士贵族为获取私利让本国青年出国充当炮灰的卑鄙嘴脸做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猛烈的鞭笞。富兰克林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让北美和各国人民看清楚英国和德意志统治阶级

的真实面目，积极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和推进美国人民的独立事业。文章中写道：“德意志的亲王们出卖人民的鲜血，因此受到欧洲的歧视和憎恨。安斯波亲王因其新兵哗变并拒绝行军而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给他们戴上脚镣，在其卫兵的协助下将他们驱赶至海边；他还亲自参加雇佣军。他由此得到了报答：当他通过每一个荷兰城市时被人民公开轰赶，并受到种种谴责。普鲁士国王要求亲王们为他们驱赶着经过其领地的人交纳人头税，其数量与他们为其牲口交纳的相等，因为这些人像牲口一样被出卖的，国王的这种幽默中包含着对那些暴君的公正谴责。”

在这一时期，富兰克林给法国和欧洲的许多报刊杂志写过文章，或者对时局和当权者的政策发表评论，或者对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及其在美国犯下的暴行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激烈的抨击。于是，他成了许多著名报刊的重要撰稿人。比如，法国的《英国与美洲事务》杂志上就刊登了他的许多文章，除了发表他这一阶段的一些新作（如《关于大不列颠和美国两国的信用基础之比较》一文）外，该杂志还转载了他早先的一些重要作品，例如：《质询》、《普鲁士国王的敕令》和《缩小帝国的要诀》等等，其中一些文章还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富兰克林是一个富有才华和魅力的外交大师，他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够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并如同磁石一般把他们牢牢地吸引在自己身旁。由于他的积极努力，来到法国不久，美国使团就通过各种途径与法国各界人士有了密切的接触，建立起了一个覆盖法国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联系网络。

富兰克林多次出席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会议，与法国学术界的朋友们切磋学术、交流经验，共同进行科学研究，与许多学者和发明家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私人友谊。在他的帮助下，一些法国学者积极向国人介绍美国各方面的情况和独立战争的进程。法国友人德·拉·罗吉夫考尔·丹维尔公爵还开始着手翻译美国各州的宪法。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学术界一直是支持美利坚民族革命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促使法国王室和政府尽快转变立场，富兰克林还设法与法国的贵族阶层建立了十分友善的关系。一般来说，法国的贵族大部具有仇英心理，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在英法战争中蒙受耻辱一直记忆犹新，希望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他们认为美国革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而法国的自由派贵族们则厌恶腐朽的封建制度，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美国独立战争抱有真挚的同情。由于贵族阶层与王室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们对美国革命的同情态度对王室和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许多贵族还慷慨解囊，向美国捐助了大量的钱款和物资，有的甚至出资组织志愿者援助美国革命，或者亲自赴美参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建立了功勋，赢得了美国人民的高度尊重。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拉法耶特。

玛利·约瑟夫·拉法耶特（1757—1834），出身于法国的名门望族，从小深受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厌恶腐朽糜烂的贵族生活，主张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后来在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是革命初期的主要政治领导人。

拉法耶特少年时代就投身军旅，立志要为民族的振兴而战。但是，他在法国的军事生涯并不顺利。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在人民正义事业的感召下，他怀着对军人荣誉的渴望和摆脱奢华荒淫的贵族生活的心情决定赴美参战。

他冲破了政府和亲友的阻拦，自己出资装备了一条船，率领一些勇敢的志愿者，渡海来到美国。富兰克林虽然以前没见过拉法耶特，但对他的身世和为人有所了解，主动给华盛顿写信推荐他，请华盛顿给他以帮助和关照。富兰克林的信起了很大作用，拉法耶特赴美后不久就被授予少将军衔，并与华盛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华盛顿邀请拉法耶特作自己的随身副官，当时他才19岁。在独立战争的许多著名战役中，拉法耶特都有英勇的战斗表现。特别是在决定美国人民命运的约克镇战役中，他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军事家的非凡才能和高尚意志品质，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华盛顿向美国推荐的许许多多志愿人员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德意志军官德·史图本男爵。史图本是一位老资格的普鲁士军人，曾在普军的总参谋部工作过，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富兰克林发现了他的军事才能，认为他在缺少军事技术人员的大陆军中必有用武之地，于是专门向华盛顿写信推荐此人。为了使史图本得到重用，富兰克林在信中故意提高了他的军衔（史图本此时只是上尉，富兰克林在信中却说他是中将副官，“参加过所有的战役”云云）。由于有富兰克林的热情推荐，史图本到美国后果然受到重用，受命出任美军视察署长官，负责训练工作。经他的努力，美军在纪律和作战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展，军事素质显著提高，受到华盛顿等美国革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美国使团在法的工作是紧张忙碌而充实的，并且极富成效，受到了美国革命领导机构和法国各界人士的赞赏。但是，在这个外人看来团结和睦的集体中也常能听到不和谐的声音，几个主要成员的关系十分微妙。

阿瑟·李是一位有能力的激进的革命者，但是他心胸狭窄偏激，缺乏宽容和合作精神，而且好搬弄是非，背后整人。西勒斯·迪安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善于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办事精明干练，讲求实效，但在工作和个人私利等问题上也有粗枝大叶之处。这两位个性迥异的美国使节好像是一对天敌，不仅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不一致，甚至连办事的方式和风格也相互看不惯，在处理公务时常常发生争吵和冲突。在这两人的矛盾斗争中，富兰克林感情的天平逐渐倒向了迪安一边。其实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富兰克林与阿瑟·李早先在英国共过事，李感情偏激，对人苛刻，他甚至曾状告富兰克林与英国人关系暧昧，所以富兰克林对他的印象一直很糟。来到法国后李仍然旧习不改。他原想大干一番以出入头地，却发现富兰克林处处高他一筹，其才华和威望都使他黯然失色，使他感到自己时时都生活在富兰克林的阴影之中。而且富兰克林很赏识并注意提携迪安，把许多重要事务交给迪安去做，迪安还可以随意出入富兰克林在帕西的宅邸，而他却很少受到邀请。特别使李感到难过的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法国的贵族阶层更愿意与富兰克林和迪安打交道，而把李冷落在一旁，就连英、法官方也看透了这一点。这一切都使李醋意顿生，甚至怒火中烧。

平心而论，在使团内部的这场矛盾斗争中，富兰克林本人也不是没有过失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有欠妥之处。首先，他过于感情用事，有意无意地冷落了阿瑟·李，对迪安则过于亲密信任，甚至对他在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失误和偏差也视而不见。其次，他任用自己的孙子和甥孙办理重要公务，这不仅于工作不利，也给他的政敌提供了攻击的把柄。第三，由于富兰克林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所以使某些英国间谍乘虚而入，并长期隐藏下来。例如，他和迪安视为知己好友的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实际上是一个受英国政

府雇佣的双重间谍，他利用关系赢得了富兰克林的信任，长期在美国使团中工作，窃取了不少机密情报，给美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富兰克林之所以在对付间谍的问题上有所“疏忽”，认真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富兰克林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善于堂堂正正地交友，却不善于识别那些假扮成朋友的阴险分子，这确实是他一个弱点。其次，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敌人和朋友混杂在一起难以辨别。例如，阿瑟·李虽然一向怀疑任何人，但他最信任的秘书却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间谍。所以，如果要对每一个人加以甄别的话，不仅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而且还会伤害许许多多善良无辜的人，弊大于利。第三，富兰克林对付间谍有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除了他认为确实应该保密的事情外，他对人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坦率态度，而这种做法至少达到了两个积极的效果，其一，使间谍们分不清真伪而无法准确地做出判断；其二，有些事情富兰克林是故意散布出去让英国（或法国）知道的，以达到他的外交意图（在推动法美结盟问题上与英法双方进行的周旋就是一例），在这方面，间谍发挥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富兰克林不愧是一个善于驾驭局势的外交大师。

但无论怎么看，美国使团成员之间的分歧都是他们的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但由于阿瑟·李心怀叵测，他企图把迪安排挤走，甚至想取代富兰克林的角色，于是采取了恶人完告状的手法，写信给大陆会议成员萨缪尔·亚当斯和理查德·亨利·李（阿瑟·李的亲兄弟），状告迪安借执行公务之饥中饱私囊，具勾亲英倾向，同时指责富兰克林也有这种嫌疑。此事引起了大陆会议的高度关注，由于情况紧急，大陆会议在未做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就对驻欧使口做了重大改组：1777年3月，理查德·亨利·李受命出使西班牙，威廉·李（阿瑟·李的另一兄弟）则出使德意志。同年底，大陆会议召迪安回国“汇报工作”，从此他便受到了冷遇。阿瑟·李仍嫌不足，继续对富兰克林恶语中伤，污蔑他“与某些抢劫有关”，妄图搬掉富兰克林这个“最后的障碍”。但是，阿瑟·李的阴谋只能得逞于一时。虽然他善于玩弄诡计，在大陆会议中有一定势力，但他却无法撼动富兰克林这棵参天大树。因为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证实，富兰克林是人类正义事业的真正卫士，在全世界具有崇高的威望，各国人民都把他看作是美国革命的代表和象征。因此，即使从权宜之计考虑，大陆会议也不会对这位圣人采取行动，况且，大陆会议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富兰克林的坚定支持者。

就在美国使团出现内部危机的时候，北美战场上的局势也突然恶化了：7月，柏高英所部英军攻取了战略重镇提康德罗加；9月26日，豪将军又攻占了费城。美国的革命事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面对这种局面，法国人忧心忡忡，人们都在焦急地观望等待，主战的呼声迅速变弱了。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富兰克林仍像往常那样神态自若，脸上总是带着安详的微笑，显露出一种坚定的必胜信念。富兰克林对北美的战局作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费城是大陆会议的所在地，它的失陷无疑给美国人民的心灵增加了创痛，但从整个战局来看，英军却从此失去了有利的态势。因为英军1777年的总体战略是各路人马在奥尔巴尼会师，将美军分割开来，而豪将军却擅自行动，南图费城，不仅未达到英军的战略意图，反而造成了英军兵力的大分散，这对于外线作战的英军来说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一恶果在北部战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柏高英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经恶战后部队的补给已十分困难，此时又失去了与豪将军的联系，陷入了美国军民的重

重围困之中，其覆灭的命运已在所难免。所以，当许多人为费城的失守而悲观痛苦时，富兰克林却另有一番见解。当一位法国政界要人告诉他费城失陷的消息时，富兰克林用一种哲学家的幽默回答道：“您弄错了，先生，是费城俘获了豪。”

果然，不久后就从北美传来了胜利的捷报：10月17日，美军取得了萨拉托加战役的伟大胜利。此役，英军将士5752人缴械投降，美方获得了一大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品。不久以后，英军又被迫撤出了提康德罗加和独立山阵地。这样，北部地区的战事基本结束，美军从此摆脱了军事上的劣势，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萨拉托加大捷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它还促进了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它大大加速了美法之间正在进行的结盟谈判，法国开始认真考虑承认美国并参加对英作战的问题了。当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经过以富兰克林为首的美国使团在外交战线上进行艰苦的努力。

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传到法国后引起了美国使团和法国官方的高度关注，他们都把这看作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立即开会商讨，研究对策。美国使团当即向法国和西班牙官方发去急信，通报了北美局势的变化。不久，法国外交官员孔公亚历山大·热拉尔亲临帕西村，带来了外交大臣韦尔热纳的祝贺，并建议美国使团重新起草关于美法结盟的建议书。富兰克林很快就亲自拟就了这份文件，派坦普尔转交给法国外交大臣。12月12日，富兰克林等人应邀与韦尔热纳进行秘密会晤。但这次会谈的结果使他们感到十分失望，法国人只是对美国人的胜利表示赞扬和祝贺，但认为在西班牙没决定介入的情况下，法国人还不能采取重大行动。五天之后，热拉尔又来到了帕西村，他告诉富兰克林，法国的政务会已经决定与美国结盟，目前暂不签订盟约仅仅是出于对西班牙的尊重，一旦赴西特使返回，情况就明朗了。对于法国人这样急于前来安抚，富兰克林心中有数：这主要是由于英国秘使温特沃斯已经抵达巴黎进行秘密活动，同时，英国还派出了卡莱尔伯爵为首的一个委员会赶赴北美，试图与美国进行和谈。

虽然法国做出打算结盟的口头承诺，但这一承诺是含糊其辞的，而已极有可能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富兰克林认为这对于美国的革命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一次萨拉托加大捷并不能确保美国最终在战争中取胜，美利坚民族急需立即得到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因此，富兰克林认为：必须向法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敦促它尽快与美国结盟。在对外交形势做了全面透彻的分析之后，他决定打一下英国牌。

柏高英在萨拉托加的投降也震动了英国朝野，并迫使英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开始向美国做出和平的试探，温特沃斯法国之行的使命便是了解美国使团的态度和动向，为达成和解进行外交斡旋。温特沃斯来到巴黎后立即与迪安进行了两次会谈。他表示，对美作战并非英国政府的本意，希望能尽快纠正这个失误，把英美关系恢复到1763年以前的状态，废除各项强制性法令，实现“陆海总休战”。他还表示，对那些帮助达成和解的美国人，英国当局将给予金钱、荣誉称号和官位等重奖。会谈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美方却摸清楚了温特沃斯的底牌。

出于外交策略上的考虑，富兰克林拒绝亲自与温特沃斯见面，并向韦尔热纳转交了一封从伦敦寄给班克罗夫特的信件，信中询问了美方是否可以接受“不完全的独立”。就在此时，巴黎传言四起，说如果法国不承认美国独

立，美英将重归干好，并共同进攻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一传言的真实性虽令许多人生疑，但对法国政府和王室仍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就在这时，12月31日，从西班牙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西班牙不同意与美国缔结同盟，法国如要介入北美冲突只能单独行动。法国政府又有些举棋不定了。于是，富兰克林决定再给法国增加一点外交压力，遂亲自与温特沃斯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在1778年元月21日举行的，温特沃斯亲自来到帕西村富兰克林的私邸，受到了东道主的热情接待，双方整整谈了两个小时之久。会谈中，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富兰克林虚与委蛇，谈论的范围漫无边际。结果，谈话虽然涉及了不少重要问题，却未达成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协议。

但这件事却在外界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在外人看来，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是不可能一无所获的。法国人感到坐立不安了，他们害怕英美一旦和解会使法国在北美的利益和已付出的努力一笔勾销。因此在会谈的第二天，国王政务会经过表决赞同与美国缔结盟约。1月8日，热拉尔来到迪安在巴黎的住所与美国使团会晤。他直截了当地询问富兰克林：法国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使美国拒绝接受英国人的和解条件？富兰克林回答道：“立即缔结一项贸易与同盟条约。”听到这里热拉尔松了一口气，他以庄严的口吻说，他有权告诉各位，国王已经决定签订这样的条约了。

签约事宜原定在2月5日进行，但由于法国全权代表热拉尔患了重感冒而推迟了一天。在出席签约仪式之前，富兰克林特意取出一件旧的曼彻斯特天鹅绒礼服穿上，随行人员对此感到大惑不解，富兰克林解释道：“这是一个小小的报复。”原来，当年富兰克林在伦敦白厅受到韦德伯恩恶毒攻击时就穿着这件衣服。在那次听证会上，富兰克林受尽了谩骂侮辱而一言未发，如今，他终于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给了韦德伯恩之流以最有力的回击。

2月6日晚间，签约仪式在巴黎法国外交部大楼中正式举行，法方代表热拉尔和美国三位使节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两项条约。第一项条约是《美法友好通商条约》，它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这意味着美国可以享受法国给予其它国家的任何优惠待遇。第二个条约是《美法同盟条约》，规定双方为共同事业而互相合作，直至美国独立获得承认，并约定：“在宣布结束战争的条约或一些条约正式地保证美国独立之前，双方保证不放下武器。”

美法通商条约和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国正式站在美国一方参加对英作战，这无疑大大地加强了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在人力、物力和财政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援助。特别是法国海军的参战弥补了美国海上力量的空白，使英国在战争中失去了制海权。法国参战在国际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后来西班牙、荷兰参加对英作战和俄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等国家打着“武装中立”的旗帜支援美国独立战争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快，独立战争变成了一场国际范围的战争，虽然各国参战的目的和性质各不相同，但各国的介入大大加强了美利坚民族的力量，使英国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处于四面受敌的窘境，并丧失了海上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最终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法同盟的缔结是美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不亚于萨拉托加大捷的伟大胜利。这与富兰克林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法国参战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体现出来的，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3月2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亲自接见了美国使团的主要成员。这一天,富兰克林没有戴假发和佩剑,他身穿棕色天鹅绒上装和白色的长裤,头发自由地披散在脑后,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腋下夹着一顶白色帽子,显得潇洒自如,风度翩翩。他们一行来到凡尔赛宫后受到了国王及其大臣们的热烈欢迎。国王随即发表演说,盛赞富兰克林等美国使节们的高尚品行,并高度评价了美法同盟条约。在场的人们对国王的演说和尊贵的美国客人报以掌声。而后,美国使节们又与王室成员亲切会面,王后安东尼特还特意请富兰克林站在她的身旁。法王路易十六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公开承认了美法同盟条约。

5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正式批准了《美法友好通商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美国与法国遂结成了坚定的盟友,而英国则成了他们的共同敌人。顷刻,美国人民举国欢庆,“美法同盟万岁”、“美利坚诸州万岁”等口号响彻全国城乡。正在福吉谷兵营的华盛顿将军听到这一消息后,兴奋地指出,美法结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是美国人民所经历的最重要的时刻之一。7月初,在人们焦急的期盼中,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载着数千名法军在孔待·德斯坦伯爵的统率下开到了美国海岸。法国军队正式介入美国独立战争了。

迪安返回美国之后,约翰·亚当斯接替了他的工作。亚当斯把家搬进了富兰克林的寓所,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进了帕西村的学校就读。不久,富兰克林接受了亚当斯和阿瑟·李的建议,不再委任其甥孙威廉斯公职。威廉斯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后来,他结婚成家返回美国,其才华和忠诚深受杰斐逊先生的赏识,被委以要职。

美法缔约后富兰克林并没有高枕无忧,整个1778年他都在为美国的独立事业而忙碌:为了与英国交换战俘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争取西班牙参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同时还为美军的物资供应等问题而日夜操劳。

这一年最能引起公众兴趣的一件事是富兰克林与伏尔泰的会见。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辞典》等学术巨著的作者伏尔泰在阔别28年后又返回巴黎,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四个月。在这一期间,大洋两岸的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多次会面,其中有两次最为引人注目。2月的一天,富兰克林亲自登门拜访了这位年迈的贤哲。伏尔泰用英语与富兰克林亲切交谈,并为坦普尔祝福,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4月29日,他们共同出席了法国科学院的会议,两位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并在众人的要求下互相亲吻拥抱,顷刻,大厅里响起了欢呼声,这是世界上两个伟大民族共同发出的声音,它经久不息,热烈而富有激情,传遍了法国,传遍了大西洋两岸。

## 第二十二章全权公使

美国独立战争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是反抗宗主国压迫和剥削的进步战争，得道多助。

黄绍湘

富兰克林出使欧洲已有两年了，在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两年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美国使团内部职责不清，从属关系混乱，三位使节在名义上地位相等，在职责和权力上没有明确的划分，这给使团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工作要么无人过问，要么人人都想插手，从而产生出许许多多本不该有的矛盾和分歧。

约翰·亚当斯曾经给大陆会议写信，对美国使团内部的这种混乱状态进行了抱怨，他认为：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能做好的话，就不必交给三个人去做。对此，富兰克林也表示关注和赞同，在给大陆会议代表的信中，他用调侃般的语言对使团中的这种状况进行了揶揄嘲讽：“我要问大陆会议为什么要在这里保留三个使节？我们有四个人，其中还有那位打算成为图斯凯尼（伊泽德）的先生，他继续留在这里，为在订约中未同他商议而大发其火……我们很快将有第五位代表，……我向你肯定，维持这批人所花费用是巨大的。……无论三个人商议拟定和调整条约条款有什么好处，在处理这里的一名外交官员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毫无好处可言。相反，谈判时意见的保密、表达意见和处理公务的一致性所具有的好处都消失了。在一个使馆里也同样，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注意和掂量，如果几个使节在处理公务表达意见时不是用同样的语言，就会贬低他们的分量。每件小事都须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否则就会引起愤怒。”

但是，对此事感到最力急切的似乎还是阿瑟·李，他不仅对使团内部这种人浮于事、互相扯皮的状况深怀不满，大张挞伐，而且公开表示他是巴黎使团行使管理全权的最佳人选。

美国驻巴黎使团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大陆会议的高度关注，决定立即改变这种局面。由于阿瑟·李及其亲信早在大陆会议代表中进行了游说，所以有一部分人主张由阿瑟·李代表美国行使在法国的外交权。这一主张得到了某些保守派人士的赞同和支持，然而却遭到了大多数代表的坚决抵制。他们认为，无论从才学、威望还是人品和资历等方面考虑，富兰克林都是承担对外事务的最适当的人选。这一主张得到法国官方的大力支持，法国驻美公使热拉尔对富兰克林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深有体验，他代表法国政府多次与大陆会议交涉，表示富兰克林是比李更能为法国人所接受的人选。经过慎重考虑，大陆会议终于在9月14日通过表决做出决定：废除联合使团，任命富兰克林为唯一驻法全权公使。

大陆会议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组织措施，给予那些热衷于搬弄是非，谋求权力的势利小人以当头棒喝；也是对富兰克林多年外交生涯的高度赞扬，对美国使团的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推动。从此，使团中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现象减少了，大家齐心合力，共同奋斗，精神面貌和工作效率都有了巨大改观。不久，大陆会议又决定召阿瑟·李、威廉·李和拉尔夫·伊泽德回国，他们虽然对这一举措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十分震怒，但事情已成定局，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两人的崇高威望又使他们无可奈何，只得垂头丧气



地返回了美国。对于他们的离去使团中竟无人感到遗憾。

自从 1778 年 2 月美法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非常迅速。法国陆海军大批开赴北美参战，美国人民在人力和物力上得到巨大的增援，军事实力和取胜的信心都大大提高了。但是，美国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法国一国参加战争，严酷的现实要求他们必须争取到更多的同盟者，以完成美利坚民族独立的大业。以富兰克林为首的美国外交使团不负众望，肩负起大陆会议赋予他们的这一艰巨使命。他们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深刻矛盾，纵横捭阖，四处奔走游说，积极开展外交攻势，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法国原想与西班牙一起与美国结盟，参加对英战争，未能如愿。但美法两国仍希望得到西班牙的支持，特别是已经对英宣战的法国更需要欧洲获得强有力的同盟者，于是美法两国为争取西班牙参战继续进行积极的活动。西班牙之所以在美国问题上行动迟缓，主要是由于它在美洲有自己的重要利益，害怕美国革命的胜利会引发庞大的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但与此同时，西班牙也非常希望从英国手中夺回直布罗陀的控制权，为此它与英国进行了多次交涉，但遭到了断然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乘虚而入，于 1779 年 6 月同西班牙缔结秘密盟约，规定法西共同对英作战，直至西班牙夺回直布罗陀海峡及其他失地为止。这样，西班牙终于被卷入这场战争之中，成了法国（实际上也是美国）的同盟者。

为了打击法西同盟，英国宣布船桅、帆布、木材、麻布、沥青、缆绳等为战争违禁品，中立国不得运输，并依仗其海军优势在海上拦截搜索各中立国的商船。这种海盗行径给许多欧洲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激起它们的强烈不满，美、法、西等国家则乘机开展外交活动，以扩大反英阵营的势力。1780 年 2 月，俄国联合丹麦、瑞典等国家组成武装中立同盟，后来普鲁士、奥地利等国也相继加入。武装中立同盟用武力保护中立国的航运，冲破了英国的海上封锁，给美国革命以有力的援助。荷兰于 1780 年 10 月宣布加入武装中立同盟，并开始与美国人协商制定友好条约，英国以此为借口于同年 12 月对荷兰宣战，这样，荷兰也变成了英国的交战国。

到这时，原本在英美两国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列强之战。对于各个参战国来讲，战争的性质有所不同：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对英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打败英国，夺取更多的殖民利益，它们所进行的是一场殖民争霸战争；至于英国，它所进行的当然是维护其殖民霸主地位和利益的反革命战争；只有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才具有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但是，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对于美国来说却是极为有利的，各国的介入使英国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极大地分散了英军的力量，削弱了其制海权，为美国和法国陆海军部队在北美进行的战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富兰克林为首的美国使团在外交战线所做出的竭诚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保证美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领域的工作是千头万绪、纷繁冗杂的，美国使团人员不仅要与各国政府和要人打交道，争取得到各国的同情、理解和大力支持，同时还要从事许多其它工作，行使一些本属于其它政府部门的职能。例如，富兰克林所做的许多工作使他实际上扮演了美国在海外的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的角色。

1779 年初，富兰克林与美国海军部门共同策划了对英国沿海地带发动联

合进攻的事宜，当时确定，海军的行动由约翰·保罗·琼斯负责，陆军则交由拉法耶特指挥。富兰克林一直是这一行动的积极推动者和支持者。因为他认为这一行动可以在军事上达到出其不意、攻敌不备的效果，并可以使英国的海军力量受到强有力的牵制。后来，拉法耶特承担的军事行动被放弃了，琼斯便于8月独自率领“快乐的理查”号等舰艇出发，他随身携带着富兰克林签署的一份指示。琼斯是一位熟悉海战的忠诚的指挥官，骁勇无比，善用智谋，在海上给英国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9月份进行的一次海战中，他率领的舰船击毁强大的英舰“塞拉皮斯”号，取得美国海军的首次重大胜利。这次战斗使富兰克林发现琼斯的军事才能，琼斯遂与富兰克林结为莫逆之交，并受到富兰克林的赏识和重用。

富兰克林的另一项海上使命是派遣私掠船从法国港口出发劫掠沿途碰到的英国商船，然后把“战利品”送到英国拍卖或者充公。富兰克林是怀着厌恶的心情执行这一公务的，他从中发现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具有残酷无情的一面，认为这有悖于人类善良的本性。但出于战争全局的考虑，他还是尽职尽责地履行了这一令他“十分头痛厌恶”的公务。

队表面上看，战争是交战国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但实际上它与双方的经济实力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近代以后的战争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独立战争伊始，大陆会议就承担起巨大的财政开支，以用于购置军火，组建军队，进行反英独立战争。但由于大陆会议只是由各个州临时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没有权力向各州征税，因此它所需的资金除了由各州提供外，主要依靠两个来源：发行纸币和国债；向外国借贷。

在向外国借贷这一方面，富兰克林发挥了旁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有人把他比作美国在海外的财政部长，此说并不夸张。富兰克林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与英国的矛盾和它们对美国的同情，也利用自己崇高的社会威望和良好的信誉，想方设法在欧洲各国筹集资金。在战争激烈进行的几年中，他频频出入凡尔赛宫廷，奔走游说于政界要人和王室成员中间，与他们进行艰苦而卓有成效的谈判和交涉。由于他和使团成员们的竭诚努力，使大量贷款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设在巴黎的银行，然后汇往美国国内，在独立战争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但是，筹款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事情，富兰克林在筹款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经济并不景气，资金匮乏是一个长期困扰他们的严重问题，他们很难真正满足美国在资金方面的巨大需求。而且，富兰克林在贷款问题上（如何时向法国人借贷？借多少？）必须遵从大陆会议的指示行事，没有多少主动权，而大陆会议的筹款指示往往都来得快，要得急，但法国政府却有自己的年度预算，他们对于美国人这种毫无规律可言的求贷方式一直很反感，这又给富兰克林的工作增大了难度。同时，许多法国政府要员认为：法国已经派出强大的陆海军部队去帮助美国人作战，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因此美国人不应再无休止地向法国讨钱讨物了。此时的富兰克林似乎生活在一种夹缝状态之中，一方面是急于弄到贷款、频频催促的大陆会议，另一方面是办事拖沓又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的法国官方，使富兰克林的筹款工作举步维艰，左右为难。他知道独立战争确实急需大量的经费和物资，他也非常希望获得大批贷款帮助自己的同胞打赢这场战争，但他认为贷款需要有一定的节制和计划性，不能毫无章法地盲目进行，

这既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也会引起盟国的不满，并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他还主张，美国人应该设法更多地利用国内的资源，减少向国外的求贷，因为用别人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在贷款工作中富兰克林还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是一位年高德邵、受人敬仰的谦谦君子 and 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贤哲，实在不愿意厚着脸皮一次次向别人借钱借物，这对于他的自尊心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流露出自己的这种伤感：“我对于长期以来从一个宫廷到另一个宫廷乞求贷款和友谊而感到羞愧，而且越是急切地请求越会被拒绝，如果不请求，人家反而会送上门来，……格言说：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尽管遇到极大的困难，心中也有不少牢骚，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富兰克林毅然把个人的尊严置于一旁，坚定地承担起为大陆会议筹集资金和物资的艰巨任务。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拖着多病的身躯，日复一日地进行紧张繁忙的社交活动，与使团的其他成员一道，同法国官方人士进行了数不清的谈判和交涉，度过了许许多多不眠之夜，为美国革命事业争取到了大批钱款和物资。1777年法国政府向美国贷款200万利弗尔，1778年美法结盟后，法国又向美国提供贷款300万利弗尔。据不完全统计，从1776年至1781年，法国援助美国近1000万利弗尔，贷款达3000万利弗尔。同时，法国还向美国提供了大批滑膛枪、大炮、弹药、帐篷、衣物和药品等。此外，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也向美国提供了贷款和物资。

虽然个人的尊严可以暂时忘却，但富兰克林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未向任何人或国家屈服过。在他的心目中，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也不能退让，无论谁企图迫使他拿原则作交易，都会遭到他的坚决抵制和愤怒的痛斥。例如，在与西班牙就结盟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西班牙提出要以获得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权作为结盟的前提条件，被富兰克林断然拒绝了。对此，富兰克林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我对这个要求只能产生厌恶。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们将会富有，我宁愿花大价钱买下他们对密西西比河的全部权利，也不愿去卖这条河中的一滴水。”

美国驻欧使团的工作是紧张忙碌的。使团成员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肩头承担着极其神圣而又艰巨的责任，因此他们不敢有半点懈怠，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日夜奔波操劳。自从阿瑟·李等害群之马回国之后，使团成员们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了，人际关系也变得更为宽松和谐，并滋生出几分人情味。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努力奋斗，互相帮助鼓励，整个使团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而富兰克林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长者和精神支柱。

平心而论，美国使团的成员虽然都具有较高的素养，但并不是人人都才华出众，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外交领域都是初出茅庐，毫无经验可言，而富兰克林却设法使他们克服了这一缺陷，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最大潜力。对此，富兰克林的做法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特长和才能委以适当的工作，在明确他们各自的职责并要求他们忠实于上级的前提下放手让他们去干。如果他们的工作作出了成绩，他会给以适当的表彰和奖赏；如果有人受到了委屈和伤害，他则会像一位慈祥而负责任的家长那样给以安慰和庇护。因此，美国使团的全体成员们团结和睦，工作配合默契，全体人员以精诚合作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努力工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779年下半年到1781年下半年，是美国独立战争战况发生巨变的一个

时期，战局跌宕起伏，变化剧烈，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吉凶难测的复杂局面。

1779年底，克林顿爵士和康沃利斯勋爵率10000英军经海路驶向查尔斯顿，于次年2月将小小的查尔斯顿围困得水泄不通。守城美军5000余人在林肯将军的统率下孤军奋战了三个月，终因寡不敌众于5月2日向英军缴械投降。这是美军自开战以来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但是，这次战役在战略上却达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效果：它迫使英国的一支主力部队滞留在南卡罗来纳，使英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力又一次被分散。

8月16日，盖茨将军率领的美军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地区再遭败绩，死伤达2000余人。

就在英军在南卡罗来纳步步进逼之时，美军则在新泽西地区频繁出击，连续取得了两次战役的胜利，迫使英军全部撤出了该地区，使战局得以大大缓解。但就在这时，美国的革命事业又突然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美军将领阿诺德叛变投敌。

本尼迪特·阿诺德是美军一员作战凶猛、勇冠三军的虎将，他以骁勇善战、独树一帜的战斗风格而闻名于世。在多次战斗中勇建奇功，威震敌胆，是华盛顿手下一员具有传奇色彩的重要将领。但是，阿诺德心胸偏狭，暴戾恣睢，而且居功自傲，私欲熏心，在金钱和女色面前常常表现得神情恍惚，丧失理智。正是这些致命的弱点后来把他引向罪恶的深渊，他投降英军，走上与美利坚民族为敌的道路。由于阿诺德精通战法，对美军的战略战术和各地的防务情况非常熟悉，所以在他的直接参与和策划下，英军对美军发动了多次强大攻势，一时间弄得美军疲于招架，险象环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但是，美国与法国等欧洲强国的结盟毕竟大大增强了美国人民的战斗实力，独立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场新的危机只不过是黎明前黑暗的一瞬。从178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军民经过艰苦的战斗逐步摆脱了失败的阴影，在南部战场取得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胜利：著名民兵领袖弗里西斯·马里恩（外号“沼泽狐”）率领的一支民兵部队在南卡罗来纳的金斯山地区痛击了英将帕特里克·弗格森为首的一支英军，歼敌400余人；1781年1月17日，格林将军率领的美军在考彭斯地区又重创了另一支英军；3月5日，美军又在吉尔福德法院附近再次痛歼英军，并将其一直追逐到海边。此后，美军终于恢复了在南卡罗来纳的控制权。

就在美国人民在战场上与英国军队进行艰苦周旋、浴血奋战之时，美国的外交人员们也在进行着另一场紧张的战斗。在富兰克林的卓越领导下，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一系列显著的成就，为美国革命及时争取到极其宝贵的外援。

1780年，国内战场上时常传来失利的坏消息，使富兰克林忧心如焚。同时，大陆会议则不断向他发来急函，要求他立即为美国筹得大笔款项，并设法得到人员物资方面的援助。

此时的富兰克林已经年过74岁了，他不顾年迈体弱，拖着久病之身四处奔走，在法国王室、政府成员和各界要人中间广泛进行活动。功夫不负有心人，富兰克林频繁的游说及其巨大的社会声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法国政府同意再提供一笔巨额贷款，以支持急需财政援助的美国革命。

在此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此时期暂时回到法国的拉法耶特将军对美国的

外交工作给予巨大的支持和帮助。1779 年上半年，拉法耶特返回法国休假。其间，他只与家人团来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便匆匆赶赴巴黎，参加了美国外交使团的工作。面对这位具有古典骑士风度和水晶般质朴坦诚的热血青年，富兰克林感到一种由衷的愉快，他从心底喜欢上这位高尚的法国贵族，而拉法耶特早就对富兰克林渊博的学识和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精神崇拜得五体投地。两人从第一次见面起就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共同为美国革命的成功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出身于显贵家庭的拉法那特利用自己对法国上层社会的深刻了解，与各方人士巧妙周旋。对于法国王室，他一再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充分阐明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及其与法国自身利益的密切关系。对于那些腐败的政府官员，他则动员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设法打通关节。最后，法国政府同意他的请求，决定向美国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在拉法耶特和富兰克林的携手努力下，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同意派出强大的远征军和海军舰队赴美作战。1780 年 7 月，在久经沙场的著名将领罗尚博的统率下，一支 6000 人的法军协同舰队一道驶抵北美。1781 年 5 月，另一支强大的法国舰队在最负盛名的海军上将德格拉塞的率领下开到北美海岸。美国人民的战斗力量空前地壮大了。

1730 年下半年至 1781 年上半年美军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以及法国远征军的到来，大大增强了美国人民的军事实力和取胜的信心，使战场上力量对比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进行战略决战的形势已经成熟。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和精心策划，美法联军最后把战略决战的地点选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约克镇位于约克河河口地带南岸的一个突出部位上，英将康沃利斯率万余重兵扼守在这里，凭借密集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为了打好这一仗，美法联军在战略和战术上做了充分的准备，集中了 18000 多名战斗人员、数百门大炮和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将这一地区团团包围起来。9 月 28 日清晨，华盛顿将军下达了总攻击令。经过 10 余天激烈残酷的战斗，英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康沃利斯将军被迫于 10 月 17 日率众投降。

约克镇战役是美国人民在独立战争中取得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经战后清点，联军共俘敌 8000 余人（其中包括海军人员 840 人），缴获大炮 250 门，各种武器上万件以及若干艘舰船。这次战役是美法联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取得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意味着英军主力在北美战场上已开始全面瓦解。自此以后，英军一蹶不振，几乎停止了重大的军事行动。虽然从战争史的角度来说，这次战役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它却足以使英国相信，用军事手段是无法征服一个团结起来反抗英国的民族的。而美国人民却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已经从中看到独立战争胜利结束的曙光，人们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景象。欣喜异常的拉法耶特在给法国宫廷的一封信中写道：“戏已经演完了，第五幕刚刚收场。”

## 第二十三章和平使者

假如说陆军的戏已经演完，海军还有几句台词，那么，即将登场的则是外交家了。

.....

《巴黎和约》证明，“美国从没输过一场战争。也没赢过一次和谈”这句话是不符合事实的。英国人当时仍占据纽约、查尔斯顿、萨凡纳、底特律和西北几个要塞，华盛顿的部队几乎无法作出新进展，英海军已恢复了对海洋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竟然获得了那么宽阔的疆域和有利的条件，确实令人意想不到。

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

在接到约克镇大捷的消息后，富兰克林感到十分兴奋，甚至有些欣喜若狂。他立即将这一消息用自己发明的印刷机印制出来，散发给各界朋友们。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的大好时机。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富兰克林与英国人接触时态度是十分谨慎的，行动也比较迟缓。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规定，未经法国赞同，美国不得单独与英国媾和。由于有这一条款的约束，富兰克林认为美国人在与英国人议和时绝不能撇开法国人擅自行动，因为这既违背双方的盟约，又有悖于他本人的道德标准。所以当一位一贯主张英美和解的英国友人向他试探性地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时，他当即回信表示：在英国与法国的争执尚未解决时，美国是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大陆会议也绝不会给他下达这种指令。其次，富兰克林对英国现内阁及其主要成员在战争中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和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在议和问题上不应对他们抱太大的幻想。他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这一态度，他指出：“至少在现任内阁存在下去的时候，或者说，当现在这个疯子挑选大臣的时候”，不应对英国人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富兰克林的态度不久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780年至1782年间，战争形势日益趋于复杂化，变得令人难以捉摸。英军虽遭受一系列重创，但仍然占据着纽约、长岛、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的大部分地区，并在缅因、尚普兰湖和大湖区布署了强大的兵力，其海军还夺取了北美战区的制海权。美法联军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无法完全控制战争的主动权，一举消灭英军主力，双方在战场上陷入对峙状态。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事也没有什么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各交战国在外交领域展开角逐，希望在谈判桌上捞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这场异常激烈复杂的外交斗争中，富兰克林愈来愈看清美法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不一致性，他认识到法国参战并不是出于对美国革命的真正同情（少数法国友人除外），而是为了夺取更多的殖民利益，美国只不过是它与英国争霸斗争中的一个砝码而已。因此富兰克林认为，美利坚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他必须立即进行有效的外交活动，在确保美国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停战。1782年初，大洋彼岸传来消息：英国内阁发生更迭，诺思辞去首相职务，曾主持废除印花税法的罗金厄姆侯爵出任首相，与富兰克林关系比较密切的谢尔本爵士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福克斯主管外交事务。面对发展变化的形势，富兰克林认为进行和平谈判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在此之前，富兰克林已经接到“邦联国会”发来指示：命令富兰克林、

约翰·杰伊、亨利·劳伦斯、杰斐逊和亚当斯共同承担对英和谈的重大使命。但是，亚当斯和杰伊当时正分别出使荷兰和西班牙，劳伦斯于1780年赴荷兰途中被英国人俘获关押，杰斐逊由于种种原因三年后才来到法国，所以，诺思内阁垮台后美英之间最初阶段的和谈实际上是由富兰克林一人进行的。

在美英和谈的曲折过程中，首先主动采取行动的是英国人。

1782年3月22日，乔尔蒙德雷爵士从英国来到美丽恬静的帕西村，秘密拜会了富兰克林。乔尔蒙德雷随身带来了谢尔本的亲笔信，富兰克林则礼貌地致以回信，双方都对和平的前景表示了良好的祝愿，遂建立起一条进行外交接触的重要渠道。

不久，谢尔本派遣的谈判代表奥斯瓦德来到帕西。奥斯瓦德是一位精明的退休商人，在美国有着广泛密切的社会关系，是英美和解的积极鼓吹者。谢尔本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说他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和谈判中的对话者。……他的思想与我完全一致”。

奥斯瓦德来到法国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协助美方保释关押在英国的亨利·劳伦斯，为此，他本人还支付了保释金中的部分款项。通过这件事，奥斯瓦德与富兰克林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两人在谈判中一直是坦诚相待的。

4月15日，富兰克林与奥斯瓦德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奥斯瓦德向美方表示：法国和美国已实现了他们的目的，英国新内阁已经决心议和。同时他还向富兰克林暗示：美国在获得独立后应就此止步，不应因支持法国的某些特别要求而损害英国的既得利益，因为英国仍有足够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两天后，富兰克林带奥斯瓦德会见了韦尔热纳。韦尔热纳说法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全面和平，并要求英国提出其和谈条件。会见结束后，奥斯瓦德告诉富兰克林：如果法国人的要价太高，英国将继续全力以赴地把战争打下去。对此富兰克林未置可否，只把这一举动看作是虚张声势的恫吓。第二天，奥斯瓦德返回英国向内阁汇报工作，随行带去一封富兰克林写给谢尔本的信，信中要求英方授予奥斯瓦德“争取全面和平的充分权力”。富兰克林告诉奥斯瓦德：只有双方都拥有这种权力，才能就一些“重要问题”预先做出决定。

富兰克林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指的是希望英国将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割让给美国。他认为，英国应该以这种方式对其在战争中给美国居民造成的严重损失作出赔偿，而且，如果“北方的威胁”解除不了，美英之间就难免不发生争端，美国就需要发展并加强与法国的同盟关系。对于富兰克林提出的这些主张美方的其他和谈代表（亚当斯和劳伦斯等人）都表示理解和赞同。

奥斯瓦德在接受了英国内阁的指示后于5月4日返回了巴黎。他告诉美方代表：英国人希望和平，福克斯已派出另一名代表与法国方面磋商和谈事宜。但只有当美国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条件并独立于法国时，英国才能同意美国独立。关于赔偿问题，英国内阁的态度比较强硬：不给美国人赔偿，而美国应该给效忠派以赔偿。这次会晤给富兰克林留下的印象是：奥斯瓦德并没有获得“充分的权力”，相反，他的权力受到了另一位英国代表的分割。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

四天以后，福克斯派遣的和谈代表托马斯·格伦维尔抵达巴黎，谈判又

继续进行，5月9日，在富兰克林的安排下，格伦维尔·韦尔热纳和富兰克林举行了会谈。格伦维尔提出了英国内阁的一项重要建议：法国归还战时夺取的英国岛屿，英国也归还它所占据的法国岛屿，在此前提下英国同意美国独立。美法两方代表认为英国此举的目的是想在谈判桌上捞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没有接受这一建议。最后，韦尔热纳答应把英方的要求转告荷兰和西班牙，征求它们的意见。会谈不欢而散。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国人又多次向富兰克林提出：如果法国坚持索取更多的利益，美国就不必再受同盟条约的束缚，而应采取单独行动。在格伦维尔看来，美国是不会真正关心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外利益的，与美法关系相比，美英之间毕竟在许多方面有着“传统的联系”。然而，富兰克林虽渴望尽早实现和平，但他仍然坚持恪守美法同盟条约，不愿在谈判中背着法国擅自采取重大行动，对于英国对其敌国分而议之的策略采取了抵制态度。

这一时期，美英之间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关于对效忠派赔偿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英方坚持美国应对效忠派在革命期间的财产损失给予补偿；而富兰克林则针锋相对，要求英国对其在美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赔偿，并指出，效忠派的财产是被各州没收的，邦联国会不可能授权议和代表谈判这类问题，况且，如果真的需要赔偿的话，也应由英国来赔偿。同时，双方还就英国代表的权限问题进行了争论。格伦维尔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同美方和谈的充分权力，而富兰克林则认为格伦维尔并不具备这种权力，英国总是把美国人看作反叛的臣民，不愿将美国作为法国的同盟国对待。他坚持要等到英国政府明确指定同美国进行和谈的全权代表，才能正式开始和谈。

就这样，美英和谈时紧时松，双方代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始终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一直到6月下旬约翰·杰伊抵达巴黎时，这种状况仍无大的改变。这种局面引起美国国内许多人的关注，也使富兰克林备受诘难，有人甚至指责他具有严重的亲法倾向，忽视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这是对富兰克林的一种严重误解，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帕特森所指出的：“虽然与其年轻的同事相比，他更信赖法国人，也更意识到法国援助的必要性，但是，富兰克林始终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无论在实质性问题或外交关系上，这位费城哲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越轨行事。”

这样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1782年7月初，英国内阁发生了重大变动：罗金厄姆爵士去世了，笃信天赋人权学说并与富兰克林私交甚好的谢尔本先生出任英国首相，福克斯辞去外交大臣一职，艾恩·菲茨赫伯特取代了格伦维尔在巴黎的职务。和谈的形势对于美方来说已经变得十分乐观了。富兰克林立即停止了手头正在进行的一切其他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和平谈判中去。

在7月9日的非正式会谈中，富兰克林向奥斯瓦德提出了一份谈判备忘录，其中有四项他称之为“必要的”条款：1. 美国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并从美国撤走全部英军；2. 划定独立诸州与效忠于英国的殖民地之间的疆界；3. 限制加拿大的边界；4. 美国有在纽芬兰沿岸捕鱼的自由。另外还有四项建设性的建议，其中包括全部割让加拿大这一内容。除了个别条款外，这项备忘录大致构成了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的基本条款，这件事表明富兰克林已经不顾



国会的指示，决定同英国人进行单独谈判了。但富兰克林并没有完全撇开法国人，他仍与法国官方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因为他知道，美国已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帮助，并且还将有求于它。

富兰克林于8月初得到英国内阁传来的消息：英国可以立即承认美国独立，但希望富兰克林取消其四项建设性建议，而以四项“必要的”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经过新一轮的交涉，英国内阁在8月29日同意在和谈前承认美国全面彻底的独立，以富兰克林的四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英国内阁同时指示奥斯瓦德，在将这一消息告诉美国人之前应再次要求他们同意把独立作为条约中的一项。

不久，富兰克林的膀胱结石病发作了，无法正常工作，在9、10两个月中，谈判工作的重担主要是由杰伊承担。杰伊和亚当斯素来对法国、西班牙存有戒心，认为它们只重视谋求自身的利益，置美国的利益于不顾，所以坚决主张完全抛开法国单独采取外交行动。由于疾病缠身，也由于在三人使团中处于少数地位，富兰克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最后阶段的和谈始于10月份，结束于11月底。谈判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几经周折，最后才达成了协议。11月30日上午，美英两国的和谈代表共同签署了美英和谈草约。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美国的疆域北邻加拿大，南部以北纬31度线为界，西至密西西比河；美国获得了在纽芬兰海面的捕鱼权；美英在密西西比河上均有航行权；还规定了双方债权人均有索回债务的权利，等等。签约仪式结束后，双方代表一同到帕西村与富兰克林共进晚餐。

美英和约使美国得到巨大好处，它承认美国完全独立，并给予这个新国家非常广阔的疆域，因此在美国国内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心：条约是在违背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的情况下背着法国人签订的，它会不会造成美法关系的恶化呢？而且美国国内急需大量的贷款，如何与法国人进行这难以启齿的交涉呢？这些难题都留给富兰克林去解决了。

事已至此，富兰克林对法国人也有一种背信弃义的歉疚感，但他还是尽最大努力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

在和约签署后，富兰克林立即致函韦尔热纳，向他通报了此事，并把草约的副本送交给他。几天以后，富兰克林又礼貌地登门拜会了韦尔热纳，向他详细介绍了和谈的情况。富兰克林的这些举动对于法国人的自尊心无疑是一种安抚，但并不能消除他们心头的怨愤。两个星期以后，当美国人向法方正式提出贷款的请求时，韦尔热纳终于发作了，他在致富兰克林的信中愤怒地写道：美国人“在和谈中甚至不问我们这边谈判的情况，就要实现美国的和平。先生，你是聪明谨慎的，完全懂得什么是得体；你把自己整个一生都用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请求你考虑，你打算怎样完成该对法王尽的义务。我不想夸大事实，只把它们诉诸你的良心。当你愿意消除我的疑惑时，我才能答复你们的要求以取悦于国王。”

几天后，富兰克林给韦尔热纳写了一封回信，用极其巧妙的外交语言回答了法国人的责问，富兰克林首先承认美方单独与英媾和之举失之轻率，是一个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过失，但他指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它的最终签订要取决于英法和平的实现。富兰克林希望这一行动不至于损害两国之

间久经考验的同盟关系，他告诉韦尔热纳：“我刚刚获悉，英国人正为他们分裂了我们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这一小误会秘而不宣，英国人就会发现他们完全弄错了。”接到富兰克林的信后，韦尔热纳没有再表示什么，但不久他就批准了给美国人的一笔巨额贷款。

法国人对美国与英国草签和约一事作出温和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首先，从法律意义上看，该条约要等到英法间实现和平之后才能生效，这显然是出于美方代表的努力，证明美国人在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时已考虑到法国盟友的感情和利益。其次，韦尔热纳不愿意因这件事把美法关系弄糟，从而损害付出了巨大代价建立起来的美法同盟关系，他十分清楚，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得益者只能是法国的宿敌英国。第三，美国单方面媾和还为法国摆脱西班牙人的纠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法国人已卷入西班牙与英国争夺直布罗陀的旋涡之中，并付出了巨大代价，而现在法国人可以直率地告诉西班牙，由于美国退出战争，收复直布罗陀已经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就这样，由于富兰克林施展其卓越的外交才华，美法关系中一度出现的危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1783年9月3日，美英双方代表在巴黎的约克旅馆正式签署和平条约。同一天，英法和约在凡尔赛签署。美国人民乃至欧洲人民期待已久的和平终于实现了，独立战争以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正式宣告结束。

富兰克林此次出使法国历时近九载。此时他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但仍然为了美利坚民族的革命事业而日夜操劳。除了冗杂繁忙的公务外，他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读书、写作、交友、娱乐，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沉浸在一种充实高雅的生活氛围之中。

富兰克林的住处位于帕西村的雷努阿尔路旁，这里四周有花园草坪环绕，近旁是一个八角形的小湖，湖水清冽静谧，还有一条幽深的小径斜道通向塞纳河。从住宅的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帕西村——它由一些别墅、四座皇家城堡和许多小农舍组成，几条石板道把它匀称地划分为若干部分，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葡萄园，村中有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小教堂和几家顾客稀疏的店铺。

富兰克林家中的常住成员除了他本人以外，还有孙子坦普尔和一位法文秘书。外孙贝奇和约翰·亚当斯的儿子昆西曾与他同住了一个时期，但都是平时在寄宿学校里读书，周末才与富兰克林团聚，共同进餐。

富兰克林一家的饮食算得上是比较丰富的。早餐通常有面包、奶油、蜂蜜，外加饮料（咖啡或者茶）。正餐常常有牛羊肉、蔬菜和甜食，有时还有禽肉和野味，夏季还要吃水果，偶尔也喝一点酒。大陆会议拨给他的年薪是11428利弗尔，基本够用。有人批评他的生活过于奢侈，已经贵族化了。此话有些言过其实，与其他国家驻巴黎的使节相比，他的生活要节俭得多。但由于常常要接待许多来客。生活中也难免会出现超支的情况。

富兰克林一向很喜欢孩子，认为孩子们能给生活增添情趣和快乐，这大概就是他要求贝奇和昆西与他同住的原因之一吧。当约翰·杰伊来到巴黎时，他那年仅一岁半的小女儿玛丽亚·杰伊又成了富兰克林的心肝宝贝，倍受关照宠爱。他似乎从不会被孩子们惹怒。相反，少了孩子们的嬉戏喧闹，他会感到生活乏味，百无聊赖。正是因为这样，他于1784年夏天反复催促早年在伦敦结识的彼莉·休森女士带着孩子们来这里旅行。那一个冬天他是与波莉的三个孩子一起度过的。一直到来年的五月份。当波莉返回伦敦后给他来信

表示感谢时，富兰克林则在回信中说：“其实，表示感谢的人应该是我。这个严冬十分漫长，而你们的到来使它成为我度过的最短的冬天。我爱威廉、托马斯和伊莱扎，至今仍常常回想起他们令人愉悦的哑哑细语。……现在我感到很孤独悲哀，坦普尔病了，贝奇去了巴黎。”每当寂寞烦闷之时，富兰克林常常会想起费城的家，渴望见到他离开后陆续出生的四个小外孙。

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帕西村，富兰克林是一位最受尊敬和欢迎的特殊人物，而他则把这里的每一个居民都看作亲密的朋友，用最友善的态度和宽厚仁慈的胸怀去对待他们。虽然他早已年过古稀，但他的风采和魅力仍不减当年，引起了许许多多人的赞叹和崇拜，而那些妙龄女郎和高贵的夫人们则把他当作自己追求和苦恋的偶像。对此，富兰克林竟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似乎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当。他把老房东肖蒙先生的女儿和帕西城堡主人布兰维利亚伯爵的女儿戏称为自己的妻子，而她们则为此感到由衷的幸福和荣耀。这是一种超越了情欲的纯贞的忘年之恋，从未有人为此而指责他张狂好色。但是，富兰克林与帕西女人们的亲密关系始终是村民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其中尤以他与布里隆太太和爱尔维修夫人的交往最为引人注目。

布里隆太太是一位财政官的夫人，这位官员比她大很多岁，是一位循规蹈矩、保守固执的老夫子，缺乏浪漫的生活情趣。布里隆太太此时刚刚 30 岁出头，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大家闺秀，身材窈窕，气质高雅，生性活泼大方，善于交际。由于家庭生活下太和谐，她竟然爱上了年迈的富兰克林，喜欢他丰富的才学和儒雅的风度，把他当作了自己深深怀念的父亲。初次见面时富兰克林恭敬地称她为“夫人”，为此她着实沮丧了好几天。她要求富兰克林称她“女儿”，而她则亲切地叫他“爸爸”，并像对待父亲那样向他倾吐了生活中的坎坷和与丈夫的隔阂。对此，富兰克林像一位慈祥的父亲那样给她以人生的忠告，告诉她对于夫妻间的龃龉摩擦千万不能实施报复。“假如他们伤害你，这表明他们已经失去了与你平等的地位而置于你之下。但如果你以牙还牙地报复他们，你就恢复了他们已失去的平等地位。要是你不予惩罚就原谅了他们，你就把他们钉在那种低下的地位上了。”富兰克林与布里隆太太之间往来频繁，通常一周要互访两次，富兰克林还时常带着孙子坦普尔去她家作客，他们坐在阳台上闲聊、下棋、喝茶，或者听她弹琴唱歌。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感情逐渐超出了“父女”关系的范围，有人曾亲眼看见他们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喃喃细语，还有侍言说富兰克林向她提出过“超出父亲”的要求，遭到了婉拒。但富兰克林确实不忍心拆散布里隆夫妇，因为他认为布里隆先生是个忠厚的好人，一向对自己十分敬重。于是富兰克林向布里隆太太提议把他们之间的问题保留到天堂里去解决，但他又感到在天堂里等待 40 年（他比她大 40 岁）会令他清冷孤寂的。布里隆太太则充满深情地告诉他：“我要用名誉担保，我将在天堂里作你的妻子，但条件是你等我时不能在那里的少女中赢得太多的爱情。”

富兰克林与爱尔维修夫人的关系更具有浪漫色彩。爱尔维修先生生前是一位总包税官和哲学家，在巴黎上层社会中颇有名望。他死后，其夫人和两个女儿住在与帕西相邻的欧特伊。爱尔维修夫人生得肌肤丰满，眉目俊秀，顾盼神飞，其美貌和才气在巴黎社交界广为知晓。她在欧特伊开办了一个家庭沙龙，时常与巴黎的各界名流们聚会交往。为了争取这个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支持美国的事业，富兰克林来到帕西不久就成了她的座上宾，两人遂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富兰克林和坦普尔每个星期都要去欧特伊作客，他们尽情地

交谈、讲故事，下象棋和唱苏格兰歌曲。富兰克林非常欣赏爱尔维修夫人娇美的容貌和优雅的举止谈吐，坦率真诚地向她倾吐了自己的爱慕之情。他称她为“欧伊特的圣母”，把她的女儿叫作“星星”。富兰克林对爱尔维修夫人的追求完全是公开的，尽管这里面有些作戏的成分，但双方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满足。与爱尔维修夫人的密切交往似乎又激起了富兰克林久已淡漠了的创作激情，这时期他提笔写了不少充满灵感的书信和短文，表达了自己圣洁美好的情感。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道：“富兰克林先生起床后便洗浴、刮脸、梳理、修饰得漂亮整洁。当他洗刷完毕出门时，脑子里装着四个爱尔维修夫人，并想尽情地偷吻她们。可是他屈辱地发现这种幸福可能又要推到下个星期。他将尽力克制自己，希望星期二能见到其中的一位夫人。……他甚至想劫持她，以便与她厮守终生。”

《致爱尔维修夫人的信》可以说是富兰克林所有短文中优美抒情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富兰克林在梦境中见到了故去的爱尔维修先生和自己的夫人德伯拉，发现他们已经在天堂里寻找到了新的幸福生活，于是他决定与爱尔维修夫人永结秦晋之好，共同走完人生的旅途。虽然富兰克林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这一梦想，但他与爱尔维修夫人的爱情却是真挚持久的，他们之间的通讯联系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回到美国三年以后，富兰克林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常常在梦中挨着你坐在沙发上，与你一同进早餐，在你那美丽的花园中并肩漫步……我们在下辈子将与所有爱我们的人相逢，到那时我将作为丈夫，而你则是妻子——但我认为你是一个淘气包，会有不只一个丈夫。”

在巴黎的最后几年中，年迈的富兰克林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有充沛的精力亲自从事科学研究，但他对科学事业的迷恋却始终未改，其执著程度甚至日益加深。特别是在和平条约签订之后，国内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世界处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之中，他作为美国驻法公使也有了一些闲暇，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研究和写作中去。

1783年8月27日，富兰克林在战神广场观看了物理学家凯撒·查尔斯制作的氢气球在巴黎的首次飞行。9月19日，他又在凡尔赛目睹了约瑟夫·蒙戈尔费埃制造的热气球的精彩升空表演。12月1日，他又不顾严寒亲临现场观看了罗伯特兄弟制作的氢气球惊险的载人飞行。虽然他此时正在受到痛风的严重困扰，行走十分不便，但仍坚持观察了每一次试验的全过程，并为试验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浮想联翩。试验结束后，他并没有加入热气球派与氢气球派正在进行的激烈争论，而是深入探讨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气球的实用价值如何？它将来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免遭陆路旅行之苦呢？

虽然年迈多病已严重妨碍了富兰克林亲身参加科学实验，但他仍不甘心当一名置身于科学实践活动之外的旁观者，而是尽其所能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他挤时间写了一些研究文章，对某些人们感兴趣的课题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关于气候的想象与推断》一文写于1784年5月，对于1783年冬天出现的寒冷天气的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他认为这次严冬的起因是1783年夏季长时间浓雾弥漫，使地面温度降低，结果冬季的大规模降雪不能及时融化，气温便比常年偏低了许多。《对棒子或称印第安玉米的观察》一文写于1785年冬春季节，富兰克林根据自己搜集的大量资料向人们详细介绍了玉米的巨大经济作用（特别是作为食品和饲料的实际用途）。该文对于扩大玉米的耕种面积和增进玉米的精加工起了

积极的作用。

出于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富兰克林还对科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搞伪科学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抵制，以维护科学研究事业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对梅斯梅尔的“动物磁力说”的调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弗雷德里克·安东·梅斯梅尔是一位江湖医生，他宣称发现了一种支配所有的星球、弥漫于自然界的所谓“宇宙流”，这种物质以动物磁力的形态出现，可以用它治愈各种疑难病症。他常常把病人们召集在一起，用类似于念咒的办法向他们发射“宇宙流”，并结合用手触摸病人躯体等方法，使病人做出各种异常的动作和反应。这种类似于降神会式的治疗方法在巴黎风靡了若干年，并得到了王后和许多显贵们的推崇。富兰克林对这种“动物磁力学说”表示怀疑，他受科学院委托与几位著名学者对梅斯梅尔的治疗方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调查，事后向科学院递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根本不存在动物磁力之类的物质，“公众降神会”上的效果只能归结于其他。一些原因：病人受到“医生”手的刺激产生出了亢奋感；病人在心理暗示下相互间进行模仿等等。他们还指出：这种方法可能对个别病例有疗效，但总体来说是有害无益的，并可能被坏人利用进行犯罪活动（如污辱妇女）。富兰克林等人的这一调查报告沉重打击了那些靠行骗为生的江湖术士们，维护了科学的尊严。

富兰克林还曾对英国的刑法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发现某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刑法条文过于严酷，必须进行改革。有一次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妇女因从商店偷走了价值14先令的薄纱就被处以死刑。他愤怒极了，对这种苛刻的法律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指出：“对犯罪者做出过于严酷的惩罚与对无辜者进行惩罚没有多少区别。”他主张遵循罪与罚相称的原则，并认为社会上的某些富人之所以制定如此严酷的刑法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而不惜牺牲整个人类的利益和尊严。富兰克林的这些主张受到了英国刑法改革家们的高度赞赏。

鉴于富兰克林对科学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在巴黎的最后两年中得到了各种国际荣誉和头衔，先后被推选为皇家马德里历史学会会员，奥尔良和里昂科学和艺术学会会员，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会员。与此同时，富兰克林早些年在英国结识的朋友们也纷纷与他恢复了友好的关系，并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这成为富兰克林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特别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威廉从伦敦给他来了信，重叙父子之情。富兰克林此时行动已很不便，于是让孙子但普尔专程赴伦敦探望父亲，两人相聚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回国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

1785年5月2日，托马斯·杰斐逊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公使，富兰克林多次提出的回国申请终于获得了国会的批准。

为了表彰富兰克林为增进美法友谊做出的贡献，法国政府特赠给他一座镶满了钻石的法王塑像。韦尔热纳还亲自前来向他热情道别。7月12日下午，当富兰克林与孙子一同离开帕西时，全村都沉浸在一种悲伤沉重的气氛当中，不时能听到有人在低声啜泣。

7月28日，富兰克林一行乘坐的“伦敦”号邮船启锚了，这位已衣为“世界最著名公民”的哲学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熟悉并深深眷恋的欧洲的土地。

这大概是富兰克林一生中最快乐而忙碌的一次航行。他认为自己的公职

生涯已经结束，可以回归自然专心致力于他所钟爱的科学事业了。因此，这次航行富兰克林完全是在科研和写作中度过的。他在别人的协助下每天测量气温和水温，认真地观察海潮、风暴、墨西哥湾流和航行于海面的各种船只，并写下《海上观察》一文，记述了航行途中的诸多见闻。此外，他还根据自己平时的研究心得写了几篇小论文，其中《烟囱冒烟的原因及防治》和《一种燃烧坑煤并消除烟尘的炉灶的说明》两篇文章后来经整理公开发表了。

9月14日，在飒飒秋风的吹拂下，鼓满了风帆的轮船将他们送上了北美金色的海岸。

## 第二十四章制定宪法

这次会议中，我对会议的结果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又忧心忡忡。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着主席座椅上的那半轮太阳，却无法说出它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降落。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幸得知，这是一轮喷薄东升的旭日，而不是一轮冉冉西下的落日。

本杰明·富兰克林

出使欧洲将近 9 年的富兰克林终于又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费城。家乡的同胞们倾城而出，用最隆重豹仪式和最高的礼遇迎接这位功勋卓著、享誉世界的费城骄子。当富兰克林进入这座城市时，钟声和礼炮声齐响，在城市上空汇聚成一种巨大庄严的轰鸣，整座城市被淹没在鲜花和彩带的海洋之中。这种热烈欢迎的场面大大出乎富兰克林的意料，感动得他热泪盈眶，无法言表。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的家几乎变成了人们朝拜的圣地，前来造访者络绎不绝：费城大学教务长尤因亲率教授们登门拜访，向这位“建校元勋”表达了真挚的热爱之情和最美好的祝愿；宾夕法尼亚众议院议长约翰·贝阿德和议员代表前来探望他，并向他宣读了美好感人的祝词；立宪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前来作客时，称赞他力“自由和宪法的奠基人和捍卫者”；……另外，令富兰克林感到十分高兴的是他当年亲手创建的一些团体和组织也派人前来看望他：费城民团的军官们在詹姆斯·欧文将军的率领下前来向他表示敬意和问候；联合消防队的成员们也赶来了，其中还有建队时的四名老队员，他们与富兰克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美洲哲学会的几位负责人则盛情邀请他出席该团体召开的会议。

富兰克林此时已经达到 79 岁高龄，痛风病时时困扰着他，身体和精力都大大不如以前了。他原想就此从政治舞台上退出，返回到大自然和书斋中去，在读书、研究和游乐中颐养天年。谁想回家后这一计划就被打乱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生活的巨大旋涡之中。

返回费城还不到一个月，宾夕法尼亚的议会选举开始了。10 月 11 日，他当选为州参事会主席。29 日，他又以绝对多数票（除他本人和另外一票外的全票）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31 日，他在一片满意的称赞声中宣誓就任州长职位。

如果说，富兰克林以前处理的是一些世界性的事务，而当上州长以后便只是经管一个州的政务了，虽然管辖的范围大大缩小，但要办的事情却更为具体杂乱，工作异常艰巨繁重。此时的富兰克林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且体弱多病，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日理万机，事必躬亲了。他现在的角色更多的是充当一名幕后的决策者和指导者，而把更年轻的政治家们推上前台，让他们出头露面，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和威信。富兰克林把日常的州务工作交给副州长查尔斯·彼尔德，而他每星期只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出席州务会议。对于这种情况，似乎并没有人发出过疑问和怨言，大家都把富兰克林看作一个年高德助的特殊人物，他们需要的是他的头脑、智慧和权威，而不是让他去亲自处理具体的事情。所以只要他住在费城，人们能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质朴坦率的教诲和忠告也就足矣。

州长任内，富兰克林仍然笃信他一生所遵奉的一个重要原则：只要选定了某项有益的工作，就应该扎扎实实地把它干好。在助手们的大力协助下，他为宾夕法尼亚人民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其中比较有意义的一项当数

对州宪法和刑法进行的改革。

富兰克林是宾夕法尼亚宪法的奠基人之一，而且基于其民主主义思想，他仍然对宪法的某些重要原则（如一院制议会体系、复式行政机构、主权在民和不设置享有特权的州长等）公开表示赞同，但他对于后来通过的“试行法”却怀有强烈不满。根据该法令，担任官职和投票选举前必须宣誓忠于宪法。立宪派在战争期间制定这一法令是由于危险的形势要求把州权牢牢控制在爱国派手中，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公民的权利等问题。富兰克林认为，战争既已结束，任何法律都必须建立在全民意愿的基础之上，但如果该法律继续有效，就会排斥教友派等原则上反对宣誓的教派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因此必须废除这一过时的法律。

12月15日，一项废除“试行法”的议案提交到了议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1786年2月，辩论继续进行。由于废除“试行法”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普遍要求，富兰克林对此事又施加了巨大的个人影响，在3月初进行的投票表决中，这一议案以45票对23票得以通过。

9月，议会又就修改宾夕法尼亚刑法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比较而言，宾州的刑法在美国诸州当中算得上是严厉苛刻的。根据有关规定，对于偷盗、抢劫、纵火、伤害、过失杀人、强奸、鸡奸以及谋杀和叛国罪均处以一种徒刑——绞刑。同时，刑法中还保留了许多十分残酷的惩罚方式，如割耳、鞭笞、烙印等等。富兰克林一贯坚持罪与罚相称的原则，认为对轻罪处以重刑的做法与惩罚无辜者并无根本区别。在他的努力和指导下，议会对刑法做了重大修改，并通过了一部修改该州刑法的条例。按照这个条例，只有谋杀罪和叛国罪可判处死刑，其他罪行则分别给予监禁和劳役等处罚，并废除了那些带有中世纪痕迹的野蛮酷刑。

宪法和刑法的改革在宾夕法尼亚是一件顺应民意、大快人心的事情，不仅使宾州的政治更加公正开明，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的基本权益进一步得到了保障，也使富兰克林的社会威望大大提高。在1787年底进行的州选举中，富兰克林以全票再次当选为州长。

这一时期，富兰克林在个人产业的经营方面也取得很好的效益。富兰克林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贡献给了美利坚民族的事业，特别是他的后半生，围长期出使海外，很少能照顾自己在国内的产业，而且他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要远远胜于对金钱财富的追求，他出任州长后决定不拿分文报酬（规定他的年薪是1500镑）就是很好的例证。但由于革命后朝不动产增值等原因，他的房地产的价值一下子翻了两番，这一事实给了他以重大启示。他看到：国家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但资金短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于是他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把自己的资金从法国的股市上抽回，转向开发国内的房地产业，结果仅仅几年的时间就见到了效果，他的财富总额急剧增加，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房地产所有者。

虽然考虑州务和国家大事花去了富兰克林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他仍然与科学事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常常忙里偷闲读一点书，整理一下资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但他毕竟是一位进入耄耋之年的垂暮老人了，所以他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对他先前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总结，或者与他晚年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1785年夏天，他在美洲哲学会上宣读了返美途中写的《海上观察》一文，其中许多发现引起了与会者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这篇论文于第二年发表在学会的会报上。1786年年初，他设计制造了



一种人工手臂，可以用它将书籍从高高的书架上取下来，商店的店员则可以用它从高处取下货物。晚些时候他还发明了两种多用椅子，一种是可以折叠起来当梯子用的折椅，另一种椅子上装有摇动器和大扇子，只要用脚轻轻一动就能为坐在上面的人扇风、驱蚊。另外，他还向已经从事农场经营的孙子但普尔介绍了一种石膏肥料，据说使用后效果很好，并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任州长的三年里，富兰克林做了许许多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是富兰克林晚年向故乡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越了这一时空概念，因此他获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重，他们为自己的土地上出了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和时代伟人而感到自豪，纷纷把最崇高的荣誉和美好的赞颂奉献给他。1785年，宾夕法尼亚的韦南戈地区建立了一个要塞。当地人称它为富兰克林要塞。12月，费城的一个区被命名为富兰克林区。1787年，麻萨诸塞州又命名了一个富兰克林镇。田纳西州建立之初也曾称为富兰克林州。由此可见，富兰克林不仅仅是属于费城和宾夕法尼亚的，他属于整个美利坚民族，因此即使他的故乡也不能独享他的英名。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家又向他发出了召唤。

相对于战争时期而言，富兰克林返美后的这段生活是很平静的。但与此同时，他的生活又十分充实忙碌，并不断泛起新的波澜。他原想就此从政坛隐退，返回到大自然和书斋中去，在充满书香的氛围中颐养天年之乐。但他是身不由己的，似乎早已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结下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不解之缘，因此在他的晚年，他不仅要读书、写作、从事科学研究，还要为家乡宾夕法尼亚的重大事务奔走忙碌，同时，他还在不断地观察思考国家事务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并为之而操心劳神。

独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有了—个比较安定的生存环境，社会经济开始走向复苏和繁荣，国家的疆域也逐步有所扩大，人民群众渴望安居乐业，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充满了朝气与生机。但是人们逐渐发现，在《邦联条例》下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体制还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由于中央权力极小而州的权力很大，各州如同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使整个邦联俨然成了一个由13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在这种体制下面的美国出现了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国家不能建立稳定的财政秩序，无法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特别是战争中欠下的大量国债无法偿还；国家不能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以保护美国年轻的民族工商业；美国在国际上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国家无法保护美国人的海外利益；国家还无法保证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等等。因此在邦联治理的几年中，表面十分平静的美国社会内部隐藏着严重的危机。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政界人士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迫切要求修改宪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变国家的这种软弱涣散的局面。此时退职在家赋闲的华盛顿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抱怨说：“在建立邦联时，我们也许把人性想得太好了。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强制的手段，即便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措施，人们也是不愿采纳实施的。如果不建立一个握有控制整个合众国的权力的政权，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其灭亡将指日可待。”对于上述这些意见富兰克林并不完全赞同，他认为国家的经济生活仍是健康的，财政状况和政局也比较平稳，但他清楚地看到国家体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他在11月2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总宪法和州宪法中存在一些缺陷。考虑到它们形成的时候，有这些缺点是

不足为奇的。但我们对此应作出修改。”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1786年9月11日，弗吉尼亚、纽约、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特拉华五个州的代表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了一次正式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起草的报告，决定：鉴于在邦联体制下难以解决全国性的商业问题，建议于1787年5月的第二周在费城召开一个由13州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修改《邦联条例》。

虽然邦联国会赞同这个呼吁，但由于全国存在着广泛的反对者，特别是南方诸州和小州的政客们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心怀戒备，因此许多人都预见这次会议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一场徒劳无益的争论。就在这时，一场震撼美国统治集团的危机——谢司起义骤然爆发了。

丹尼尔·谢司（1747—1825），出生于麻萨诸塞州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年轻时在家务农。独立战争爆发后，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他于1775年毅然投军，报效国家。他参加了般克山和提康德罗加战役，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1777年初被提升为上尉。后来，他又参加了斯通波英特和萨拉托加战役，立下卓越战功，深受拉法那特将军的赏识，特赠送给他一把随身宝剑。

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国内矛盾日益激化，大资产阶级和大种植场主过着奢华糜烂、一掷千金的生活，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却日益恶化，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商品奇缺，通货膨胀，货币严重贬值，捐税多如牛毛，使得百姓无以为生，怨声载道，许多人因负债累累而被关入牢狱。那些复员回乡的美军士兵更是一贫如洗，生活陷入了绝境。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以票面额几分之一低价把自己从军所得的土地券转卖出去。谢司返乡后每日辛勤劳作、节衣缩食，但仍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他忍痛卖掉了那把心爱的宝剑。

目睹人民群众在战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谢司对社会的贫富悬殊和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深恶痛绝，也深刻认识到国家司法制度和选举制度中存在的严重不公正性，他主张：“全部财富是美国人民一道从英国人的统治下夺回来的，因此理应归人民全体所有。”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而斗争”。1786年秋天，谢司提出土地与自由的口号，率领麻萨诸塞人民举行起义，并向波士顿进军。顿时，人民纷起响应，从者如云，起义军最强大时曾达到15000人之多。他们捣毁法院，焚毁债务档案和税册，打开监狱释放因债务而坐牢的贫苦农民，很快，起义像燎原的烈火一样燃遍了北方诸州，持续达半年之久，直至1787年初才被政府镇压下去。

谢司起义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震撼。面对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美国政治领导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虽并不赞成农民群众用武力来解决债务问题，但他从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革命权利学说出发，对人民反抗暴政的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认为这种精神对于保卫共和政体和民主政治是极为必要的。他用充满激情的笔旗帜鲜明地称颂了麻萨诸塞人民的革命行动，他写道：“但愿每隔20年发生一次这样的叛乱。……如果统治者不偶尔被其国民的反抗精神所警告的话，一个国家就不可能保持其自由了。让他们拿起武器吧！……在一两个世纪内丧失少数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灌溉。它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

但是，像杰斐逊这样对人民起义抱同情和赞颂态度的只限于极少数激进

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当时美国绝大多数政界人士对起义的爆发都感到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谢司起义视为洪水猛兽，既恨之入骨又怕得要死。如果说在起义前他们对于加强中央权力的主张还怀有疑虑的话，那么此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是急不可耐地要求立即对政府做一次大手术，加强它的权力和职能，以确保国内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这一要求受到了某些民主派分子的激烈抨击，但它已经得到了在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的大种植场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安纳波利斯会议关于 1787 年召开 13 州代表会议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各州的广泛响应。

对于谢司起义，富兰克林不像美国的保守分子那样憎恶，但也不像杰斐逊那样持赞颂的态度。他认为麻萨诸塞人民的行动事出有因，而政府进行降服则是它的责任。他认为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面，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国内的矛盾和冲突仍有可能发生。由于富兰克林的巨大社会声望，他被宾夕法尼亚议会推举为出席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但是他本人起初并不想参加这次会议，一是缺乏兴趣，二是结石病此时正严重困扰着他，使他的体力极差。但经过与政治研究会（1787 年初创建，富兰克林为第一任主席）的同事们协商和认真思考，他认识到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重建国家的政治体制，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推选出的代表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说话。于是他出席了会议。

5 月 25 日，有七个州的代表到达费城，刚够法定的数量，制宪会议正式开幕。后来，派代表参加会议的州达到 12 个，共有代表 55 人，只有罗得艾兰没有派代表出席。

应该公正地说，这 55 位代表都是美国政界最出色的人物。他们大都年富力强，平均年龄 43 岁。其中 5 人的年龄在 30 岁以下，其余大部分人的年龄在 50 岁以下，60 岁以上的有 4 人，其中最年长者便是本书的主人公——本杰明·富兰克林，此时他已经 81 周岁了。与会者多是相当富有的种植场主、大商人、著名律师及其他头面人物。而且，他们大都是久经风霜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具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度的使命感。与会者原希望由富兰克林出任会议主席，但由于大雨阻隔，富兰克林三天后（28 日）才到会，于是，华盛顿被推举为主席，富兰克林担任副主席。但是，会议真正的灵魂却是一位年仅 36 岁的青年人麦迪逊。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是弗吉尼亚金乔治县人，在新泽西学院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独立战争，是一位见多识广、富有成效的雄辩家和立法者，制宪会议的首倡者之一。麦迪逊带着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方案参加了制宪会议并大唱主角。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在这个政府中实行分权制衡原则：设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一个具有民意基础的两院制国会体系和一个独立的联邦司法部门，并给予州一定的权力。会议期间，麦迪逊一直坐在会议厅的前面，对会议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作了详细记录，并起草了大部分宪法条文。由于麦迪逊在制宪会议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使他得到了“宪法之父”的称号。

如果说麦迪逊是以其高深的政治理论和法学知识在制宪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成为会议的总设计师，华盛顿以其高度的权威性和组织才能保障了会议的顺利进行，是会议的杰出主持人和领导者的话，那么，富兰克林则是以他巨大的个人声望和高超的协调能力周旋于与会者之间，大行中庸调和之道，消弥分歧，减缓对抗，促使不同的利益集团达成政治上的妥协，从

而保证了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实事求是地说，在制宪会议中，富兰克林本人尊奉的一些重要政治原则并没有全部被采纳。例如，他主张的一院制议会、复式行政机构和官员无薪制等原则遭到否决，而他提出的另一些重要建议虽得到代表们（或大部分代表）的认可，但也只有部分内容真正落实到宪法中去。所以，他对这次会议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指导代表们接受某种特定的宪法思想和框架，而是促使代表们排除障碍，实现和解，在谋求美利坚民族总体利益的前提下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富兰克林的这种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围绕议会代表名额分配问题展开的斗争中——这是会议进程中争论最激烈的一个焦点问题。在最初的讨论中，大州代表主张设立两院制国会，采取以人口多少为依据的比例代表制；而小州代表则主张一院制国会和各州在国会中有同等的代表名额。由于双方观点相去甚远并互不相让，会议辩论很快就变成激烈的争吵。大州代表认为，美国大小州的居民人数相差悬殊（例如，特拉华只有3万余人，而弗吉尼亚的总人口已达42万），因此让它们享有相同的代表数额是绝对不公平的，而小州代表则指责大州在搞奴役小州的阴谋。双方互相猜忌，斗争愈演愈烈，会议一度走到分裂的边缘。

6月11日，富兰克林就这一问题作了第一次发言。他要求代表们停止争吵，就具体问题平心静气地进行磋商，他说：“我有幸看到，当这个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时，会议是在冷静而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意见，希望不要再重复争论，因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互相争执而是互相协商的，是宣布一种既定的看法和作出不可更改的决议，而不是来受启发或者被说服的。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并保卫公众的利益。”

富兰克林的话暂时平息了代表们的怒气，会议进入建设性的协商阶段。但由于双方都不想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几天后矛盾再度趋于激化，双方互相进行指责，连持客观公允立场的富兰克林和华盛顿也受到了牵连。小州代表甚至扬言要采取有力的抵制行动，会议随时都有可能陷于流产。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富兰克林立即进行了干预。

6月28日，他就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作了第二次重要发言。他首先提议：以后每次开会前应进行祈祷，因为“如果没有他（上帝）的帮助，……我们将被狭隘的地方利益所分裂，我们的事业将会遭到挫败，我们自己将遭受后人的耻笑。更糟糕的是、人类从此以后将会因此对根据人类智慧建立政府感到绝望，从而付诸投机、战争和征服”。

一向笃信自由主义原则的富兰克林竟然提出要向上帝祈祷，使得与会者们颇感意外。这一建议虽未得以实施（据说是因为会议没有钱请牧师），但却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人们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休会两天后富兰克林提出了一个方案，呼吁双方修改各自的观点，以求在立场上有所接近。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当制作一张大桌子而板条的边不合适时，工匠就会从两边取下一点，使它们能很好地接合起来。同样，为了能在某种调和的建议下结合起来，我们双方就必须放弃某些要求。”这一方案为会议所采纳，7月2日，富兰克林被选入一个委员会，负责设计一个妥协方案。

委员会讨论的第一个方案的要点是：设立两院制国会；在两院都实行比例代表制。但遭到小州的坚决抵制。此时，富兰克林又作了他的第三次重要发言，他们希望双方作出妥协，并提出“财政事务应由人民直接选出的代表负责”这一重要原则。富兰克林的话得到代表们的赞同，并为最终解决问题

提出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通过反复讨论，大州首先作出让步，小州也对自己的立场作了调整，于是双方达成了妥协。7月5日，该委员会向制宪会议提出了一个方案（通常称为《康涅狄格妥协案》，也称《大妥协案》），该案规定：国会设上下两院；上院代表每州两名，由州议会选出；下院代表以各州人口为比例选出；一切有关征税的法案皆出自于由普选产生的下院。这一方案经制宪会议讨论以5票对4票获得了通过。

《康涅狄格妥协案》的通过是制宪会议取得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胜利，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美国新宪法能否制定出来并为各州所接受。由于这一方案调和了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为新宪法的诞生和实施扫除了许多障碍，而这次著名的妥协则是与富兰克林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对制宪会议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制宪会议每天开会4至7个小时，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会场门窗紧闭，武装哨兵严密地把守着各个出入口，以防止外来的干扰。尽管时值酷暑，烈日炎炎，室内蚊蝇乱飞，卫生条件较差，但与会者们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全神贯注地商讨这件关系到祖国千秋大业的事情。会议整整开了16个星期，于9月17日结束，代表们终于为未来的新国家勾勒出一幅宏伟的蓝图。虽然争论远没有结束，新制订的《联邦宪法》还有待于各州的批准才能生效，但代表们仍为完成了一个极其神圣的使命而感到无比欣慰。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签署宪法的日子。在秘书宣读了新宪法的正式文本之后，富兰克林起身发言，他说：“我承认，这部宪法中的一些内容我目前还不赞同，但是我不敢肯定我会永远不赞同它们；因为活了这么久，经历了许多，由于有了更丰富的知识和更充分的考虑而改变观点的例子，即使对于重大问题，也是这样，我原以为是对的，后来却发现并非如此。随着年事的增长我越发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而注意别人的判断。……因此我同意这部宪法，因为我希望的不是一部更好的宪法，而且我也不能断定这不是最好的宪法。为了公众的利益，我愿牺牲对它的缺陷所持的意见。”接着他要求全体与会者同他一起签署这部宪法。

讲完这番话后，富兰克林十分庄重地在宪法文本上签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代表们也陆续在文件上签了字。在最后一批代表们签字的时候，富兰克林凝视着雕刻在华盛顿座椅上的半轮太阳，语重心长地说：“在这次会议中，我对会议的结果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又忧心忡忡。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着主席座椅上的那半轮太阳，却无法说出它究竟是在上升还是在降落。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幸得知，这是一轮喷薄东升的旭日，而不是一轮冉冉西下的落日。”

9月18日接近中午时，富兰克林来到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会场，用十分庄重的声音向议员们宣布了《联邦宪法》签署的消息，并把宪法的文本呈交给议会批准。21日，州议会正式开会讨论这一问题，12日新宪法被批准了。与此同时，一个争取批准宪法的运动在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至1788年11月，北卡罗来纳州最后一个批准了宪法，这一运动最终在全国取得了胜利。

一个新型的联邦制国家在北美诞生了

## 第二十五章桑榆之光

如果我有选择余地的话，我决不反对从头至尾再度同样的人生，所需要的只是能有著作家在作品再版时修改初版毛病的条件。

本杰明·富兰克林

制宪会议结束之后，富兰克林又回到家乡喧闹的政治生活之中。这一年10月31日，他再次以全票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民对他多年卓越公务生涯的一种褒奖，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荣誉。就在这一时期，他生命的航船已经驶入了最后的行程。

富兰克林当选州长后不久就病倒了。这一次发病虽并不很突然，但却迟迟不能痊愈，从此以后，他就很少再去参加行政会议。来年1月份，他又不幸在花园中跌倒，摔得鼻青脸肿，手腕严重挫伤，以致一段时间里连笔也握不住。从那时直到夏季，他一次行政会议也未参加过，就连7月4日的独立纪念庆典也未能出席，只能从窗口远远地眺望游行的人群和热闹非凡的庆祝场面。后来为了方便起见，行政会议干脆就在他的家中进行。1788年10月14日，富兰克林卸去州长职务，从此结束了长达60年的政治生涯。

与那些一生揽权弄权，一旦卸职或者丢官便感到心灰意冷，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凡夫俗子们截然不同，富兰克林为自己终于离开了政坛而感到无比欣慰，因为除了从政外，他还有许多美好的追求和高雅的情趣。他在多年前就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读书、研究和写作计划，如今他为最终能过上自己所渴望的这种充实恬静的生活而兴奋不已。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欣然写道：“现在我已结束了州长任期，不再忙于公务，我希望能长期盼望的宁静中安度短暂的余生。”

但是，富兰克林此时已经理智地发现，沧桑的岁月和艰苦的工作已经严重地侵蚀了他的肌体，他的精力已不像从前那样充沛旺盛，生命之火也不会燃烧得太久了。于是，他抓紧时间去做两项重要的工作：写遗嘱和自传。

1788年夏秋时节，富兰克林写下了他的遗嘱，并进行了公证。这份遗嘱显然是富兰克林经过长期的周密思考和反复修改之后作出的。对于如何处置他身后遗留下来的价值20多万美元的遗产，他花费了一番苦心，其中某些遗赠的安排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在这份遗嘱中，几乎他的所有亲属都得到了丰厚的遗赠，其中包括他最亲爱的孙子、外孙、外孙女、小妹简·梅科姆，另外还有彼士顿富兰克林家族的后裔们，以及在革命年代与他分道扬镳旅居英国的儿子威廉。同时，富兰克林还把自己的部分遗产（包括书籍、文件、手稿和用具等）分赠给了自己的许多亲密朋友，以留作纪念或补贴生活之用。其中，华盛顿得到一根带有金质杖头的精致的手杖，他在遗嘱中称这位将军是“人类的朋友”，并说“假如这是一根权杖的话，他将受之无愧”。

为了推动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他还专门从遗产中拨出一部分，赠送给图书馆、美国哲学会、波士顿美国艺术科学学会和宾夕法尼亚医院。他还为波士顿的儿所免费学校设立了一个基金，要求用其利息制作银质奖章，颁发给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

为了回报他的出生地波士顿和居住地费城对他的哺育和培养之恩，他从遗产中为两座城市各拨出1000英镑，设立了一项为期两个世纪的慈善计划，

其内容是：用该项资金向年轻的学徒们贷款，以鼓励他们履行职责、发扬良好道德、锻炼成材。借贷者需付 5% 的年息，再用这笔利息贷款给类似条件的青年人。根据富兰克林的计算，100 年后这笔款项可达到 13.1 万英镑，其中一部分可用于公共工程。200 年后可达到 406.1 万英镑，一部分用于当地人民，其余由两州政府支配。

尽管富兰克林的遗嘱中具有某些不切合实际的设想，尽管他的良好愿望后来并没有全部实现，但人们从这个遗嘱中不难看到富兰克林对子孙后代、朋友、广大同胞的一片拳拳爱心和他对故土、祖国的深深留恋，以及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哲人、科学家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人类美好未来的殷切企盼和执著追求。因此，仅仅这个遗嘱本身就是他给人类留下的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

写一部真实反映富兰克林全部人生经历的自传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一个宿愿，也是他的朋友以及千千万万热爱他的各界人士的一个真挚美好的愿望。他们认为，把这样一位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时代伟人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思想品德展示给世人，流芳于青史，是一件功德无量、福及子孙后代的事情。因此，许多朋友经常向他提出这一要求，并催促他趁着精力尚可尽快完成这一大作，以飨读者。欧洲的朋友们更是急不可耐，几乎每封来信必谈此事。因此到了富兰克林晚年，写自传几乎成了他的一项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单纯的私事。

富兰克林的《自传》大致分为四大部分，前两部分早已有了手稿。1771 年前后，他在宁静幽雅的退福德写完了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他的家庭、成长经历和早年的坎坷生涯，一直写到立业成家。第二部分写于 1784 年巴黎附近的帕西村，主要写他在费城艰难而辉煌的创业史和与业主、总督进行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初稿，富兰克林晚年又花了很大精力对它们进行了充实和润色。通过浏览可以发现，这部分书稿中充满了求实的风格，毫无夸张和娇柔造作之气。它并不太像一部出自大学者之手的著作，倒更像一位慈祥 and 善的耄耋老翁在用轻言絮语向晚辈们讲述如烟往事，其言辞流畅、素雅、真诚，而在这自然朴实之中却蕴含着不少深邃的哲理和发人深省的人生教诲，充盈着作者百折不挠，奋发向上，为达到真善美的高尚境界而孜孜以求的执著态度，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启迪。这是一部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生活启蒙书。

《自传》的前半部分完成后，他又开始撰写第三部分。到他卸职时已经写了大约 1/4，当时他认为至多再有两个月就能完稿了。但由于结石病的剧烈疼痛折磨得他寝食不安，依靠鸦片才能勉强止痛，每天只有很少的时间能用于写作，所以直到次年（1789 年）的冬天才陆续写完。11 月 2 日，本杰明·贝奇抄写完毕，富兰克林让他把书稿的前三部分分别寄给英国和法国的友人，要求他们认真阅读，“进行批判性的审查，直言相告需要修改或删除的部分，并请告诉我它到底该不该出版”。第三部分书稿与前两部分在风格上比较接近，只是道德说教和程式比的痕迹多了一些，朋友们仍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

《自传》第四部分的写作工作是富兰克林在生命的最后半年中忍着剧烈的病痛进行的。此时他已经坐不起来了，只能躺在病榻上进行口述，由外孙笔录。写作时断时续，后来突然间中止了，这大概发生在他病情恶化的那段日子里。可能与上面这些因素有关，这部分书稿的文风与前三部分迥然不同，

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的那种简洁、自然的特色，带有较多的书卷气，内容也显得比较平淡。好在人们对于他晚年的事情知道得相当多，有关的文字材料比比皆是，不然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富兰克林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在疾病的煎熬之中度过的。从他退职之前开始，结石病和痛风就不断地交替发作，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有时甚至奄奄一息。为了抑制病痛，医生给他服用了大量鸦片，结果又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使他几乎丧失了食欲和睡眠的功能，到 1789 年末，他已基本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日夜缠绵于病榻之上。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下，富兰克林仍然没有放弃自己一生所热爱的那些事情：读书、研究、写作。与其说是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这样做，倒不如说这些事情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方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他是在一股巨大惯性的推动下从容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的。

由于富兰克林的行动已十分不便，脑力也在衰竭，所以这时期他写的东西比以前少了许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信。富兰克林晚年虽然离开了公共生活和官位，但并没有因此失去朋友们的关心和尊敬，他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他的府上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国内外来信，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他有时也写回信，与朋友们谈古论今，回首往事，交流信息，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大乐事。可以说，富兰克林退休后虽然卧床不起，足不出户，但他并不孤独，他是在充满亲情和友情的氛围中安度晚年生活的。他自己也说：“朋友们在用友谊来宠我，而现在我也有时间接受和享用了。”

富兰克林卸职前后写就的作品中也有一部分是科研论文和政论性文章，其中某些文章还可以列入他的精品之列。例如，为费城学院重组写下的《关于费城学院创始人意图的思考》；为宾夕法尼亚废奴协会写的《致公众》以及《论奴隶贸易》等等。纵观富兰克林最后人生阶段的这些作品（包括书信），其数量虽不多，每篇文章的篇幅也不大，但仍然充满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对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真知的见，其中许多带有结论性的内容表达了他对当时美国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见解，闪烁着人文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耀眼光芒。

关于政府。富兰克林坦率地认为，把一个新政府建立得“完美无缺”是不可能的，因为“建立新政府的人如此之多，他们的观点和所代表的利益又是如此对立”。但是他认为有一点是必须把握住的，即政府必须建立在几个重大原则的基础之上：第一，自然权利学说和契约理论。富兰克林认为：所有的人都享有某些生来俱有的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劳动权和财产权等等，这是人们不可剥夺的最基本的神圣权利。为了保障人民的这些权利，消除压迫、暴政和罪恶，人民才与他们自己选出的代表签定某种形式的契约，建立起政府。因此，每个公正和自由的政府及其法律制度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富兰克林认为这是建立新政府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原则。第二，人民主权学说。富兰克林认为，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是打着上帝的旗号来统治人民的，由此便产生出暴政和腐败，而人民则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所有的政治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并属于人民，广大民众是国家政权的基础，除非人民同意或授权，统治权便不能存在或继续存在。另外，富兰克林还要求人们警惕最容易发生的统治者权力膨胀的弊病，认为这是导致专制和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以避免新政权蜕化变质，转变为人民的压迫者。



关于法国大革命。1789 年底，法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美国。起初，美国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赞颂摧毁巴士底狱的革命行动，但不久他们就发生了分化，保守主义者感到恐慌，而民主派分子则不断发出由衷的欢呼。由于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期间曾长期出使法国，并一直与法国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显然，富兰克林一向厌恶战争和暴力，但盛传法国发生“暴民骚乱”的消息并未改变他的基本政治信仰。他对法国的进步事业始终怀有深深的同情，希望法国通过革命能建立起一个完全新型的民主共和国，走上进步繁荣的康庄大道。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在法国，骚乱总是因恶劣的环境而出现的。但如经过战斗，赢得并保卫了未来的自由，一部好宪法和几年的幸福生活便可完全弥补他们的损失。”但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又为法国革命的激进性质和社会的剧烈动荡感到忐忑不安，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些朋友许多可以归于特权等级之列，他们能平安度过这场暴烈无情的革命吗？他不能不为他们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富兰克林就去世了，否则的话，他的担忧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关于少数民族。在富兰克林的那个时代，印第安各部落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散居在偏僻的山林和荒漠地带，在与凶险的大自然和白种人的斗争中顽强地生息繁衍着。富兰克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印第安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他们勤劳、勇敢、坚韧，虽不懂法律，却有着鲜明的善恶是非标准，忠实于朋友，热爱亲人子女，对敌人嫉恶如仇，宁愿英勇地战死沙场也决不投降。对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土著民族，富兰克林始终怀有一种敬佩和好奇的心理。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民族本身的一些带有悲剧色彩的东西——各个部落之间的分裂仇杀以及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深刻疑惧和戒备。他认为，如果这一点不能改变的话，这支古老种族的前途将是难以想象的。富兰克林早年虽然曾组织民团打击过印第安人的“骚乱”，但那是出于本能的自卫和打击法国人的需要。当他晚年理智地观察民族间的纠纷时，总是对印第安人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他不只一次地说过：“几乎每次印第安人与白种人进行的战斗都是由于后者对前者的不公平引起的。”因此他主张应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利。

富兰克林在黑人和黑人奴隶制问题上有过不太光彩的一页——曾拥有过奴隶并出售过他们，这是时代留下的痕迹。在他生活的那个年月富裕家庭常常蓄养奴隶，奴隶交易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与当时的革命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是大奴隶主）相比，富兰克林在这一方面还算比较清白的。而且，富兰克林很早就开始反省这一问题，并为废除这一罪恶的制度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在这方面，当时的革命领袖中只有托马斯·杰斐逊的成就在他之上。富兰克林是美国最早指出奴隶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缺陷的人（1751 年）。他还公开呼吁给黑人受教育的权利，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生活常识，以便能独立地立足于美国社会之中。1787 年，费城废奴协会恢复了活动，富兰克林被选为主席。他一生担任过许多显赫的职务，却为能出任这一弱小民间组织的领导感受到一种莫大荣幸。1789 年 5 月 23 日，他写了一篇幽默辛辣的散文《论奴隶贸易》，对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年底，他还为该组织起草了一份题为《致公众》的文件，呼吁各界支持废奴协会，为它提供资金。

关于宗教。同那个时代的许多政治领导人一样，富兰克林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是一位自然神论者，相信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认为上帝在创造了宇宙之后，自然进程便开始起主导作用。从这种意义上他崇拜上帝，并认为人们虔信上帝的最好表现是行善事。他曾经说过，好的宗教劝导人们驱恶向善，这种宗教值得信仰，但不幸的是在许多场合上帝的精神被人“讹化”了，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特别是宗教专制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原则出发，富兰克林对宗教专制持非常厌恶的态度，认为政府应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人们拥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情感，对不同的教派和教义不能随意压制干涉，各个教派应和睦相处。富兰克林相信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人有来世，“根据人们此生的行为，他们在来世会受到相应的对待”。到晚年，他的来世观念变得更强烈了，因此常常深刻反思自己的一生，以便评判在来世中是否会沐浴到上帝仁慈的灵光。结果他是基本满意的，他写道：“如果我有选择余地的话，我决不反对从头到尾再度同样的人生，所需要的只是能有著作家在作品再版时修改初版毛病的条件。”

从 1789 年下半年开始，富兰克林的病情加重了，他感到死神在向他走近。但是他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并且特别关心那些负有治理联邦制新国家的重大使命的老朋友们的情况。9 月 16 日，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诚恳地祝贺他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并为看到这个新型国家的诞生而感到高兴。富兰克林与杰斐逊的私人关系一直非常融洽，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情趣相投，政治信仰十分接近，又都出使过法国。1790 年 3 月初富兰克林逝世前一个月，杰斐逊在回国赴往国务卿的途中到费城拜访了这位他最敬仰的前辈。此时富兰克林已病入膏肓，见到杰斐逊后异常激动，急切地询问法国朋友们在大革命中的详细情况。为了表达对杰斐逊的深厚情意和殷切期望，富兰克林把自己的一部手稿赠送给他，并一再叮嘱“不必归还”。杰斐逊怀着虔敬的心情收下了这部珍贵的手稿，这样他便成了除富兰克林家族外唯一享有保管富兰克林手稿这一殊荣的美国人。杰斐逊在纽约就任国务卿不久收到了富兰克林的一封来信，这是富兰克林生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写于他去世的前九天。

就在这时，他多年前患过的脓胸病发作了，低烧不退，胸闷难忍，时常伴有剧烈的痉挛和窒息感。亲人们开始为他料理后事。几天以后，他的病情突然缓解，精神显得格外好，有一次竟然起了床，要求为他修整一下衣着仪表。大家感到几分欣慰，以为这是康复的好兆头。谁想富兰克林平静地告诉他们，他已经听到了上帝的召唤，准备泰然自若地走向死亡。很快他就进入了昏迷状态，没有呻吟，没有焦躁恐惧，只有宁静和安详，如同他一生所期望的那样。1790 年 4 月 17 日晚 11 时，他在亲人们的环绕下溘然长逝，享年 84 岁。

一个伟大的生命安息了，人类从此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尽管某些卑鄙的政敌在富兰克林身后曾对他进行过恶毒的诋毁，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谁也无法抹煞他一生所创下的近乎神话般的丰功伟业：他是杰出的发明家和科学家，在电学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在机械、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光学和金融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为此他成了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等著名学术机构的成员，获得了许许多多崇高的学术荣誉；他是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为费城和美国人民的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思想

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并成为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他还是毕生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的政治家、革命家和外交家，《奥尔巴尼联盟计划》、《独立宣言》、《美法同盟条约》、《巴黎和约》和《联邦宪法》等重要的历史文件都与他的名字息息相关。仅仅上述这些成绩就足以使他进入世界伟人的最高殿堂，但这位圣哲却是那样质朴谦虚，以致他为自己写下的碑文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印刷工富兰克林。

